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Wayne Johnston

(加拿大) 韦恩·约翰斯顿 著
赵 伐 张 陟 译

纽约的

The Navigator of New York

探险家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他笔下的世纪交接的纽约令人神往，北极的风情却更难于忘怀……子午线相交的冰雪大陆，冬天到来时，爱斯基摩人都会黯然神伤，恰在此地，主人公找回了自己的生活。”

——《纽约时报书评》

“他擅长描写景色，刻画人物，故事耐人寻味。”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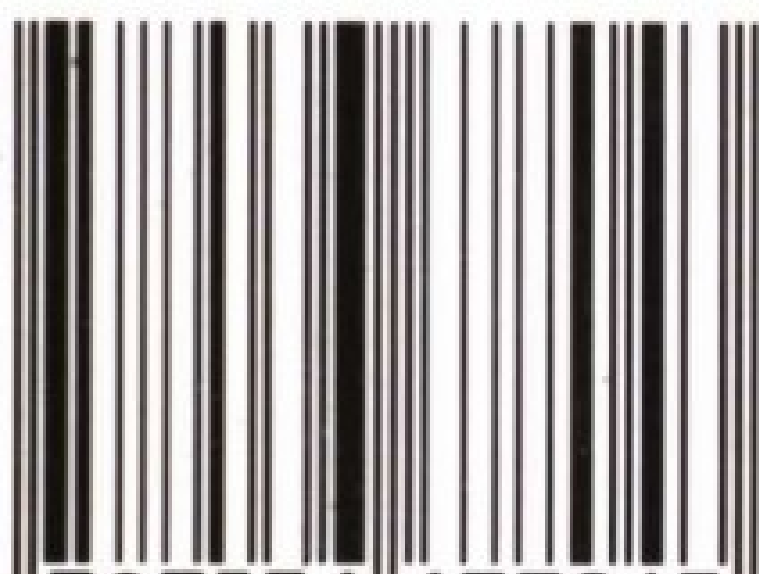
“对人类发现与探索的天性，对人性的高贵与卑微均有深入探索。北极探险赋予小说极大的叙事张力，历史场景把握细致。这是截至目前他最出色的作品。”

——《出版商周刊》

“韦恩·约翰斯顿极具天分，是继莫迪凯·里奇勒之后加拿大最出色的作家。”

——《环球邮报》

ISBN 7-5366-7704-9



9 787536 677043 >

ISBN 7-5366-7704-9/1 • 1447

定价：22.00 元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Wayne Johnston

(加拿大) 韦恩·约翰斯顿 著
赵 伐 张 陟 译

纽约的
The Navigator of New York
探险家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纽约的探险家 / (加) 约翰斯顿著; 赵伐, 张陟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4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 赵伐, 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 The Navigator of New York
ISBN 7-5366-7704-9
I 纽 II ①约 ②赵 ③张 III 长篇小说
—加拿大—现代 IV 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614 号

THE NAVIGATOR OF NEW YORK by Wayne Johnston

Copyright ©2002 by Wayne Johnsto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据 Vintage 2003 年版译出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2005 重庆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123 号

纽约的探险家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作 者 [加拿大] 韦恩·约翰斯顿
翻 译 赵 伐 张 陟
责任编辑 江 萍 editress88@hotmail.com
装帧设计 吴庆渝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地 址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电 话 023-68814956 (发行部) 023-68809452 (邮购)
网 址 [http //www cqph.com](http://www.cqph.com)
印 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93 千字
印 张 11 625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6-7704-9 / I·1447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韦恩·约翰斯顿的两部获奖小说:《纽约的探险家》和《梦碎之地》。

主 编:赵 伐 张敏生



主要人物表



德夫林·斯特德(德夫)	小说主人公
弗雷德里克·A.库克	美国探险家、医生、德夫林的生父
弗朗西斯·斯特德	医生、德夫林的父亲
阿米莉亚·斯特德	弗朗西斯的妻子、德夫林的母亲
爱德华·斯特德	医生、弗朗西斯的弟弟、德夫林的叔父
达夫妮·斯特德	爱德华的妻子、德夫林的叔母
罗伯特·皮尔里	美国探险家、海军上尉
约瑟芬(乔)·皮尔里	罗伯特·皮尔里的妻子
摩西·普劳迪	德夫林的儿时同学
玛丽·库克	库克医生的现任妻子

目 录

卷 一

第 1 章	3
第 2 章	10
第 3 章	18
第 4 章	25
第 5 章	33
第 6 章	42
第 7 章	62
第 8 章	68
第 9 章	71
第 10 章	78
第 11 章	83
第 12 章	94

卷 二

第 13 章	105
第 14 章	137
第 15 章	146
第 16 章	166

卷 三

第 17 章	173
第 18 章	184
第 19 章	193

卷 四

第 20 章	209

第 21 章.....	212
第 22 章.....	218
第 23 章.....	233
第 24 章.....	238
第 25 章.....	240
第 26 章.....	246
第 27 章.....	249
第 28 章.....	252
第 29 章.....	257
第 30 章.....	267
第 31 章.....	277
第 32 章.....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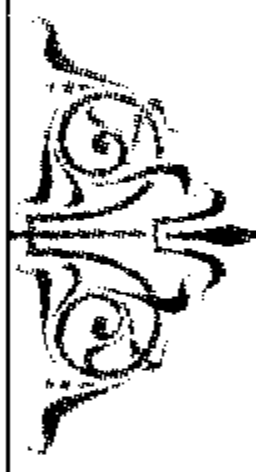
卷 五

第 33 章.....	285
第 34 章.....	290
第 35 章.....	297
第 36 章.....	305
第 37 章.....	310
第 38 章.....	313
第 39 章.....	318

卷 六

第 40 章.....	323
第 41 章.....	329
第 42 章.....	333
第 43 章.....	342
第 44 章.....	348
第 45 章.....	350
第 46 章.....	353
第 47 章.....	356

卷一



第 1 章

达夫妮叔母说,1881年我刚满周岁不久,我父亲就告诉家人他报名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①为改善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生活而组织的希望谷传道团。他打算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作为一名游医沿拉布拉多海岸行医。他说,不管怎样,他都始终是个英国国教徒。不过,最让家人担忧的倒不是怕他成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而是变成傻瓜一个。

在他即将出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包括我母亲和祖父母,还有叔父爱德华,都试图劝他别去。他们没法反驳他要去的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给出任何理由。他也不肯反驳大家提出的他应当留下的理由,而是以缄默应对大家的每条劝告。祖母告诉他说,这么成年累月地离开家庭,像个使舵弄桨的人,只把醉酒没用完的那点钱捎回来养家糊口,这样做太有失体面,不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的所作所为。祖母还邀来牧师,和大家一起来责备父亲。可父亲默然无声地忍受一会儿,然后告辞,起身上楼躲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已经走了,已经远离了我们。

也许,只是在他当了游医之后,他才想起要去探险。也许当他在拉布拉多行游时遇见了探险者或听到了有关他们的事。我说不准。

总之,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只干了一年,完成了第二个半年任期后回到家,又去响应他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的一则广告,申请担任随船医生首次参加极地远征。他写道:“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着一种需要艰难远行和长期离家的职业。”“多年”而不是“一年”。他说,对于即将成为远征队员的人来说,如此粉饰是常有的事。

1882年,他签约加入了他的第一次远征。一艘从波士顿驶来被他称作“北上”的轮船拐进圣约翰斯港,把他接走了。

之前跑去传道行善,如今又离家探险。可他有妻有儿,儿子才两岁,还

^① 约在1722年由约翰·赫斯的信徒在捷克创建的基督教新教的一支,18世纪初被逐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移居德国的萨克森,后部分教徒移居北美。该教派热衷传播福音,喜好离群索居。



有个他答应要终身搭档的兄弟——我的叔父爱德华。

我祖父斯特德是个医生，他的愿望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同堂坐诊”，这个要求他们答应了。我父亲比叔父大一岁，为了跟爱德华叔父一同报到上学，他推迟了一年去爱丁堡大学。1876年回来时，兄弟俩成了两位医生。在圣约翰斯，英国国教徒看病要找信奉国教的医生，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回来后，国教徒医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位。在家庭诊所的招牌上，列着本城三分之一的国教徒医生名单：“A. 斯特德医生，F. 斯特德医生，E. 斯特德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仿佛“斯特德”不再是个名字了，而是他们三位所赢得的代表某种资格的缩写，代表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某一医学团体的缩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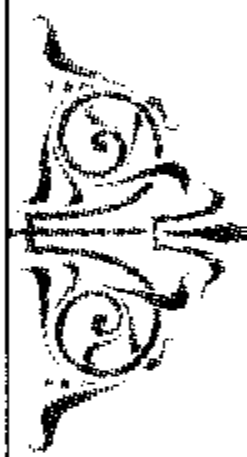
兄弟俩大学毕业三年后，祖父去世了，可那个家庭诊所没有改变。祖父去世之前，兄弟俩分享一个候诊室，祖父去了之后，我父亲搬进了大厅对面祖父的诊疗室。他的名字从那扇嵌有兄弟俩名字的门上被取走了。在祖父诊疗室门上的那块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只需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把字母A取下，安上字母F，F是“弗朗西斯”的缩写。

即使祖父没了，家庭诊所依然兴旺。当问及谁是他们的医生时，人们回答“斯特德兄弟”，体检、诊断、治疗，好像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样样事都搭档着做。当新病人初来看病时，接待的人不问他们要哪位医生看，并且大多数人来时也主意未定。病人们都是依次被分配给兄弟俩的。信任他俩中的一位，就是信任另一位。

可祖父去世后，“斯特德”这块招牌就不如从前了。有一阵子，诊所的业务有所减少。爱德华叔父说，不少才怪呢，因为他俩中的一个曾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肯与自己的同类为伴，而更愿意与爱斯基摩人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为伍，如今连医生也不做却当起“保姆”去照顾满满一船的社会另类。既然兄长非要这样做，那小弟又有何办法？

在同一档次的人中，斯特德家族的声望也有所降低，仿佛隐藏在这个家族中的某种性格缺陷终于昭然若揭了。我父亲的病人不肯穿过大厅去找爱德华叔父看病，而是去找别的医生。爱德华叔父的一些病人也这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来自更低阶层的病人。

在写回来的家书中，我父亲强调说有朝一日他会重操旧业的。他向叔父许诺会付给他房租的，就用把自己的诊室出租给别的医生换来的钱，可这句话等于白说，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全部房产。



爱德华叔父没找别的搭档，也没把家庭诊所拆分开来，挂上某个陌生人的名字，而是原封原样地保存下我父亲的诊室，一样东西也没动。

你瞧瞧那扇门：医生早已离去但门上依旧嵌着他的名字。爱德华的病人肯定以为，为了自己离去的长兄，爱德华陷入了某种漫长得有些过分的悲恸之中，简直不忍心重新安排他的财物，更不用说将其变卖了。每天，当他来来回回经过时，那扇门，那块墨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嵌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跟他的不一样，所有这些都无法不让他想起自己的兄长弗朗西斯。

父亲说，“北上”远征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地图，又给这世界增添了三座渺无人烟的荒岛。

不久，一次次的远征成了我父亲人生的计时单位了。每次远征回来，要过数周之后他才不再询问时值何月、何日。他总是去自己的办公室，把爱德华给他留在那儿的一摞报纸从最新的那张看起以了解他不在的时日里世界发生的事情，寻找关于他服役的远征队都写了些什么报道，创了什么记录。由于父亲还不是远征队的队长，因此这些记录没有一项是属于他的。这些记录很少有什么“第一”、“最远”，但多数却是耐力的记录，因为灾难、失误、厄运而必不可少的英勇壮举。宣布一项记录往往是体面地承认失败的一种办法。“首次在纬度以北过冬……”是“船只卡在远离格陵兰的冰洋上，极地探险队被困数月”的一种委婉表达。

一熟悉完这些信息，父亲又走了。只要时机成熟，只要队长为下一次远征筹集到赞助，只要他的申请得到认可，父亲便又离开了。

他从来没法告诉母亲回家的具体日期，只知道他的船会在春天的什么时候靠岸。何时回家探望几乎没个准。母亲回想起那些日子，与其说他人走心也走，倒不如说他影在人不在，知道他回家却很少见到人。母亲说他们一起就餐的时候，那沉默令人难堪。要不然，他就猫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书报，研究地图、海图，母亲认为他是在为下一次远征做准备。那书房有人时总关着，没人时总锁着。

父亲不在时，我们家很少有客来访，也很少去拜访别人，母亲几乎没接过什么邀请。

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有时来访，不过次数很少，而且是爱德华坚持的结果。

照叔母的描述，爱德华叔父坐在客厅里一把椅子的边缘，老是转动着圆顶硬礼帽的帽檐，刚一进门看上去就像是要离去的样子。她说，爱德华

就这模样。不管他们去拜访谁，他的帽子要不在他头顶，要不就拿在手上。他的背从来不靠着椅子。大约过了15分钟，他们便走了，其间母亲和爱德华几乎什么话也没说。

母亲告诉叔母：“在我面前提‘丈夫’、‘父亲’、‘医生’或‘儿子’，大家感到尴尬。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也尴尬，因此也回避这些词，包括字典里的好多其他的词。只要我不在场，只要德夫林没跟我在一块，大家就想起了弗朗西斯，因为报纸上总有关于他的报道。”

达夫妮提醒母亲说，那些报道不是有关父亲个人的，而是他参与的远征队，是当地报纸转引自国外报纸上的报道，中间塞进一段有关我父亲的文字。

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大家肯定经常谈起他——探险家斯特德医生。即使他像其他远征队员一样中间休假时也回家，他们还要谈论他。况且他不回家，大家更要因此谈论他了。探险家，却是个失职的丈夫和父亲。尽管我装着没注意，可怎么可能让大家在我面前装出一副从没听说过他的样子？这明明是一目了然的事。大家都在装，大家都很不自在，包括我。我简直是受够了，我不知道……”

“不要为你丈夫烦恼，阿米莉亚。”一天晚上，当斯特德家的所有人全都集聚在客厅的时候，祖母对母亲说，“总有一天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想念我们。他会回家的，再也不会离开了。”

在另一场合，祖母又说：“他逃避的是婚姻，不是你和孩子。婚姻、责任和约束。”她说这话的语调跟预言他回家的语调一样，单调乏味，像是在诵读祈祷书。

母亲是个独生女，18岁时父亲死了，不久母亲也跟着去了，给她留下那幢我和她居住的房子和一大笔钱。假如精打细算，即使我父亲拿不出一分钱来，这笔钱也是足够我们维持生活的。

可是，用母亲继承的部分遗产，父亲不但建起了他的诊所，而且还花在了自己的首次远征上，可这一点并未征求母亲的意见。

虽然父亲是长子，但祖父把一切全留给了爱德华。按照习俗，身为有儿子的寡妇，祖母什么也没得到，连她居住的房子也没给她。

爱德华借我和我母亲来彰显他如何慷慨、如何顾及家门名声。只要母亲在他和旁人面前稍微提及缺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赶紧送到我们家门口，像是一种责备，言下之意是他得赶紧，以防母亲向他人抱怨或说他的不是。



他装出一副柔心弱骨、慷慨豁达、很容易被人占便宜的样子，被他失职长兄的妻子、这个挥霍无度的兄嫂纠缠着不放，其目的就是要把他最终给挤干。

每次经过诊所，达夫妮叔母总要看看招牌上爱德华叔父的名字，就在我父亲的名字下面。这招牌似乎在说：瞧，医生世家的最后一位，继承的不仅是他父亲的诊室，还有他兄长的欠债和义务，所有这些如同招牌上的雨水，一点一滴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我和母亲很少外出。我们定期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外出就是星期天的礼拜，这是每个人显摆自己人生际遇的场合。我和母亲沿着教堂的中央走廊走到与爱德华和达夫妮同座的那条长凳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想起我那位缺席的父亲。寡妇的身份只有在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教堂时最引人注目。同样，我们所遭遇的抛弃、我父亲的失职也一样昭著。即便在进门时有人大声通报“玩忽职守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被弃妻儿阿米莉亚和德夫林·斯特德驾临”，人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众目睽睽地盯着我们。

从我们在教堂所受到的关注，从无意间听到的话中，达夫妮叔母觉察到有人认为我们的伶仃孤苦是故意的，是我们母子俩喜欢这样离群索居，我们生性甘当局外人，冷漠，甚至孤傲。礼拜结束后大家离开时，男人们面朝母亲，摸摸帽檐，女人们朝她点点头，以示招呼，问声日安，其口气不容你多应答半个字。偶有一两个人问道：“今日可好，斯特德太太？”可眼睛却看着我，等我答话。母亲回答很好时，他们却带着安慰的微笑看着我。除此之外，母亲和我像块岩石，人群从两边绕着流过。

在房子后面的一间小马厩里，母亲自己养马，马的名字叫皮特。“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马。”她说。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事。她惟一需要帮忙的是把皮特套上她所谓的马车，或者解下来。那是辆双轮马车，栗色的皮革车篷往后叠着。要是周围没有她认识的人，母亲会干巴巴地站在车道的尽头，等着某个她能求助的男人或男孩经过。

“但愿我不听爱德华的话，多陪她一阵。”有一次叔母对我说。

就像我父亲和叔父原来那样，我和母亲也成了传说中的一对“斯特德”搭档，赶着那辆双轮马车到处乱跑，头顶车篷，全神贯注，神情急切地仿佛要急着回家，急于恢复那种与众不同、不曾有过的度日方式。

母亲带着我去商店，有一两次达夫妮叔母与我们同行。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日子过得还好吧，斯特德太太？”肉店的屠夫常问道，母亲总是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这句冷不丁冒出来的问话，说日子过得还好。屠夫用牛皮纸把母亲买的肉裹好，然后用绳子捆了一圈又一圈，边捆边拿眼睛看着我，每隔几分钟朝我挤挤眼，好像我和他分享着什么秘密，不得在母亲面前泄露。

有一次，我俩坐着马车从一些女人的身边经过时，母亲无意中听见有人说我们是“一对隐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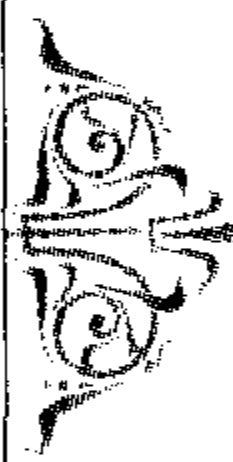
“一对隐士。”母亲对达夫妮说，她好像弄不明白过去的她为何变成了现在人们眼中的她。

终于在一次远征之后，我父亲不再回家了。从那时起，在写给母亲和爱德华叔父的信中，他借口不断，总说自己因为不可掌控的情况而没法回家：因拉布拉多外海的冰厚而滞留；急救；天灾人祸；或者因为有人请求他参与救援其他探险队员。凭良心讲，这些请求他是不能拒绝的。他找这些借口仅仅是出于形式，他甚至不希望这些托辞能蒙骗我们，甚至想让我们一眼看透。

“我生病了。”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不是太严重，但医生说为了康复我最好别走动。”

1886年的春天，在从远征返回的路上，在离开巴特尔港往南去之前，父亲寄回来一封信，里面写到他要搬到纽约住。事实上，他要径直去那儿，等找到房子，再来接我们母子俩。他说他做了个“重大决定”，计划尽早地组织起自己的极地远征队。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听从“无能之辈”的差遣，服从那些他认为是“愣头愣脑”的命令，本该直言不讳却闭口缄默。他说自己“在北极地区的经历比在世的任何人都长”。（爱德华叔父说，这话不实，即使是事实，那也不是家书该写的内容。）可是，正如许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当务之急他必须把纽约作为基地。他说：“纽约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他必须去纽约，在那儿，从那些希望能受雇参加极地远征的众人当中，他能挑选出迄今为止最好的团队。在那儿，他会结识那些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像他这样的人的实业界巨擘、金融巨子。这些人愿意为他们自己不敢涉足的探险埋单，仅靠他人来感受荣耀。举世瞩目的竞赛即将开始，争夺北极，争夺南极，不住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就休想被人视作重要的竞争者。他声称，搬去纽约后，他会挣很多的钱，还会寄一些回家。



“我亲爱的妻子，终有一天，我这种孤独的浪迹甚至很有可能让我们富有。”他写道。

纽约，虽然是向极地进发的最好的出发地，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我父亲终究没有来接我们。这是母亲从他那里接到的最后一封信。

不知道达夫妮叔母关于我的故事究竟在哪儿中断，我自己的故事究竟从哪儿讲起，不过，我经常在想，也许就从这儿开始吧：

念一年级时，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屋子空空的。屋后的马厩也是空空的，那匹马和马车不见了。我以为母亲外出办什么事去了，于是等着她回来。我等到5点以后，天几乎黑了。接着，我沿着德文街走到爱德华叔父家。他还没从诊所回来，诊所在街的那头。我问达夫妮叔母有没有看见我母亲。

第二天，在信号山的山顶，人们发现了那匹马和那辆马车。据正式的说法，母亲是意外溺水死亡。但照有些孩子巴不得让我偷听到的那种说法，母亲爬下朝向大海的那面陡坡，爬下一块长满青草的礁石，从那儿跳进一条狭窄的海峡，一侧是海岸，另一侧是绵延伸向海天交汇之处的坚冰。



第 2 章

两年了，我们给在纽约的父亲发了许多信，但都没有回音，就连那封关于母亲死讯的信也没回复。这期间，我跟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住在一起，住在我母亲的房子里，他们是在发现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后才搬进去的。那实际上是张纸条，爱德华称之为“一句话遗嘱”：“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母亲走的前一年，祖母就去世了。从那年起，爱德华和达夫妮成了斯特德家房产唯一的所有者。我母亲的房子要小些，更适合一对夫妇加一个孩子住。于是，斯特德的房产被卖掉了。

1888年秋的一天，他们被正式确立为我的监护人，法院判定即使我父亲回来，情况依然如此。那天，达夫妮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她让我穿上我最好的上衣。她打扮得好像要去什么正式的场所。披肩下面，她穿了件紧身的丝绸连裙，有裙摆和裙撑，黑绿相间的条纹上点缀了一朵朵的刺绣，也许这是件新衣裙，以前我从没见过。

爱德华穿了件对襟的双排扣长礼服，翻领是绸面的。他的头发用润发油抹得油光水滑，向后梳着，中间分开。

“喂，德夫林，”就坐前叔母问道，“你最近怎样了？”

爱德华吃惊地看着她，好像以前他从没意识到，有他在的时候我还继续存在。可达夫妮执意追问。她想知道我的近况：学得怎样，玩得怎样，唱诗唱得怎样。我回答时，爱德华在自己的盘子里切着食物，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好让我的话被人听见。

当有关我近况的话题谈完后，屋子沉默了。风使劲吹，一股突如其来的阵风夹着沙砾和石子撒在窗户上。爱德华凝视着我身后的炉火，仿佛被什么事驱使，郁闷地沉思起另外的什么事。我看着叔母，她身穿盛装，好像一腔希望若不满足便很伤心的样子。我想，为了今晚，她精心准备，精选服装，保证一切安排妥当，并且敦促爱德华也这样。她试图用自己的打扮来传递无法用言辞表达的情感，却并不巧妙，因此有些令人同情。

祖父家有条规矩：饭桌上要等到大家都吃完后才能讲话。这也是爱德



华的规矩,不过,这规矩不可能遵守,因为他吃得非常慢。吃着吃着,他好像精神恍惚起来,一边咀嚼,眼睛一边茫然地呆望。

“我们早就在你之前吃完了,你可能觉得我俩在狼吞虎咽?”达夫妮说。

开始,爱德华不理她,可像这样被激了几次之后,他回答道:“你们吃得太快。”

“如果你时不时地说几句话,我们可能会吃得慢些。”她说,但爱德华没反应。

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漫长的沉默时而被叔母的说话和叔父简洁、精练的回嘴所打断。叔父吃光盘子里的东西,但没推开盘子,叔母就站起身,又给他盛上,同时歉意地看我一眼。等他吃完,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客厅,喝他的白兰地,抽他的雪茄去了。

“你想想,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达夫妮笑着说。她隔着饭桌把身子探过来,悄声对我说:“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仿佛她认为这个特殊的场合正是透露机密的时刻。

我查了字典,发现了“反刍”的意思。在学校,我念叨着这个对句,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恶意,也许是因为我的解释很不到位,没有哪个孩子能真正听懂。可这句话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所针对的那对夫妇被学校的老师知道了,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这句话竟从他们那儿又传回到爱德华的耳朵里。

一天晚上我上楼睡觉时,发现枕头上有一张爱德华写的纸条,上面写道:“听说你到处吟诗作赋,说我‘反刍’。可惜,我的热诚慷慨没有激发你去做更高尚的事情。”

只要报纸提及我父亲服役的远征队,达夫妮总要对爱德华说些俏皮讥讽的话,没有意识到我能听见。

“谁不知道格陵兰^①冷?不需要人去那儿带着冻伤回来证实。”她说。

“白人研究爱斯基摩人。爱德华,你会不会认为不久的将来,爱斯基摩人也会出现在圣约翰斯的街道上,被派来研究你我?”她又说。

她说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是一本有关格陵兰爱斯基摩人的一个小部落的语言的词典。“他们被称作‘阿库克’。”她

^① 属丹麦的岛屿,位于北大西洋加拿大东北。岛屿的绝大部分在北极圈以内。气候异常寒冷。



说，“爱德华，跟阿库克人呆一块儿，我再也不会无话可说了。圣约翰斯的宴会再也不会以争论阿库克人的单词怎么写而告终了。”

一天晚上，在大大声地读完一则被困远征队最近被营救的报道之后，她说：“瞧瞧，大家都怎么在说我：‘你看达夫妮·斯特德，她大伯子就是那个几个月靠吃狗肉为生的家伙。’”

上床之后，作为回击，爱德华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我母亲，他的声音很大，肯定知道会传到我的房间来。

“难怪，我兄长跟她结婚两年了，终究还是觉得北极更值。”他说。

达夫妮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

“我不知道这样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跟她一起生活还比不上在刺骨的寒冷中度过半年的暗无天日更有诱惑？”他问。

“爱德华，”叔母叫道，用责备的口气继续说着，显然是叫他小声点，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听不见她说的什么。

“我说弗朗西斯是说着玩的，可你……”她说。

“谢天谢地那小子还只是她的一半。”爱德华说，“另一半是弗朗西斯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在弗朗西斯最终跟她缠上之前，他身上有时也有许多可贵之处。”

也许是自己的记忆、想象或者是达夫妮的讲述，我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我正穿过走廊，这时我父亲从他的书房里冒出来，看见我，弯下身子跟我一样高，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可我所能看清的大概只是一个男人的轮廓。

我对母亲的记忆要多一些，但也和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相像。我记得的那个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就是她。我记得跟她在这幢房子的不同房间里呆过，跟她一道坐马车，跟她手牵手在一条街上走，我猜想那是德文街。可我记不得她穿的是什么，记不得她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记不得我们去的地方。我想不起她的面容。

母亲死时我才6岁。父亲离开时我更小，难怪对他我只保留了那个模糊，可能还是虚假的印象。不过，似乎我应当有些记忆，母亲不仅仅是个印象，不仅仅是她和我的血缘关系。

我对母亲的记忆好像融进了对父亲的记忆，他早就从视野中沉了下去，好像母亲正在被父亲往下拖，虽然能看见她，但已经陷得很深很深，辨不清她的细部了。总有一天，就像父亲那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她也会完全消失。

奇怪，两个我依稀记得的人却能对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好像这两



个人我从不认识却跟我形影不离。其他人，比如达夫妮和爱德华，也记得他们，看见我时就想起他们。仿佛他们就站在我的左边或右边，除了我，大家都看得见。

房子里有我父亲的两张照片，挂的地方很考究，不张扬。一张是用银版照相机拍摄的侧面照，夹在众多照片当中，挂在客厅的餐具柜上，就在楼梯脚边。另一张挂在楼梯边墙上，四张照片中的第三幅，上楼时，借着房间射出的灯光便能依稀可见。对客人来说，这种挂法似乎更像是一种表示，而非为了纪念，所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屈辱到靠否认他的存在来偿还他的失职，但在我们心中，他也不再有多大影响了。当然，这不是真的。我这位总不在身边的父亲的肖像从来没有不使我着迷的时候：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紧贴着头颅，从中间分开，浓重的八字胡两头往上翘起。如同所有银版照片中的眼睛，他的眼睛好像也从里面发亮。我不知道这是拍摄出来的效果。

客厅里有张我母亲的银版照片，反面潦草地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据达夫妮说，那是我母亲的笔迹。她说这照片是他们订婚后不久拍的。母亲双手叉腰站着，眉毛扬起，也许是因为感到好笑，认为被这个称作照相机的新玩意儿瞄准，自己很有可能站不稳了。

达夫妮喜欢宠我，可爱德华却很不乐意看到她这样。我觉得，他看我时就想起了他的兄长，他凭什么福气不浅居然有个许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儿子？

圣诞节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我解开礼物上的丝带，撕开包装，达夫妮陪着我坐在地板上，可爱德华却远远地坐在一边。每次我发出欢快或惊喜的叫声时，达夫妮总要看一眼爱德华，笑一笑，而他没法也不愿假装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她，也会笑一笑，那是施与一个孩子的双唇紧闭的抿笑，似乎在表示：这孩子对可能的幸福的向往或许是可以满足的。

我想，也许男人对孩子就这样：冷淡、漠然，我父亲无非是把爱德华所代表的这种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通常，爱德华好像很冷漠，疑心重重，似乎他的职业和性格已经合二为一，总是带着诊断的目光看待一切，总是在寻找、收集大量的观察资料，他的表情暗含着一种不会轻易表露的机警和精明。

我去水塘和溪流钓鳟鱼时，达夫妮跟我一起去，这城市就是围着这些水塘和溪流建起来的。我用夜晚从地底下爬上草丛的大蚯蚓作鱼饵，即使



打着手电筒也很难找见这些蚯蚓，更不用说捉了。房子背后的院子里，草不深，因此很适合大蚯蚓生长。

“该玩找虫捉虫的游戏了。”天一黑，达夫妮就说。找虫者提着桶，拿着手电，捉虫者跟在蚯蚓后面爬，没等它钻进地里，双手一捧把它捉牢。通常，我是捉虫者，可要是我捉的蚯蚓有一半钻进了土里，达夫妮会来帮我。她会放下手电，我俩跪下，像一对外科医生弓腰俯在蚯蚓之上，四只手一点点地把虫从土里抠出来。她把脸扭向一边，不忍看到蚯蚓万一被扯断的情景。爱德华站在厨房的窗户前观看，达夫妮朝他挥手时，他总是转过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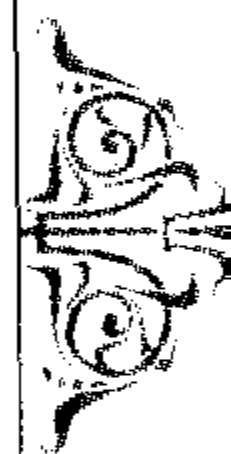
“爱德华，我们过去不也常玩找虫捉虫的游戏吗？”有一次我上床之后，听见达夫妮在对叔父这样说。“我们有自己的玩法，跟德夫的不一样，是不？”声音听起来好像她正站在楼梯脚，可没有响应。“是呀，我们自有我们的玩法。”她的声音更加轻柔。爱德华发出几声听不清的响应。

由于城南有座名叫“眉脊山”的山峰阻挡，站在圣约翰斯城的大多数地方，你只能看见海港却看不见大海。你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海港是一片湖，眉脊山那边伸展开去的依然是更多的湖泊和山峰。你只能在某个地方透过峡口看出去，在峡口的地方，海水突然变了，被风搅动起来，但在海港内离峡口仅一英尺远的地方，你却感觉不到这风，海港和大海的水面迥然不同，很难相信这峡口的里外同是海水。

“是时候了，你真的该看看大海了。”一天，达夫妮对我说。

我和她坐在母亲的马车里，被皮特拉着爬上信号山的山顶。上山时，我回头看着这城市，从这个高度看，圣约翰斯的形状就像地图上的一样。我们住在文明的边缘。城的北边有几处有名有姓的定居点，但不能称作城镇。城市紧靠着自400年前划定之后就没多大改变的边界。我在想，要是从海上看这城市会是什么模样？会不会是往北而去时海岸上的最后一团灯火，是最后一处值得考察的地方？边远房屋背后的那片森林跟城市中心的森林一样茂密。在街坊之间的树林里，人们布下圈套捕捉野兔，在离校园百尺之内用枪猎杀野鸟。就在城内，就在某个地方，文明退却了，让位于荒蛮。

沿着道路爬上半山坡，来到一片坐落着两家医院的高地，一家专门收治白喉和热病病人，另一家收治天花病人，都是严格隔离的。道路离它们远远的，一直退到岩石的边上。我抬头看了看山顶上的那间木屋。只要驶向圣约翰斯的船只一出现，商号的旗帜就会从那儿升起。升旗的目的是提



醒码头边的商号,他们的船只要到了,给他们准备接船和卸货的时间。

“我第一次看海才12岁。”达夫妮说。她讲述了那天自己不听父母和老师的话第一次爬上信号山的情景。她说,那不是为了看海。她跟别的几个女孩去的,她们真正的目的是去看那副绞架,关于那东西她们听过好多的故事。可是她们走岔了路,最后来到了山顶。

“我早就知道那边就是宽阔的大海。可就像早知金字塔一样,没亲眼见过。”她说。

我们到了山顶,达夫妮让皮特停下来。我看见了辽阔的大西洋。

“到了。”她把脸扭向一旁,大声吼道。风在怒号,突然到处都是。

“海面好平啊!”我说。

她笑了。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天空,风,光,空气,寒冷,灰色,遥远,咸味,海腥味。如今,所有这些词拥有了以前从来没有的意思,而“海”这个词包含了它们的全部。“海”在我的脑海里弥漫开来,淹没了所有的脑室,我知道的所有词汇被这个单词改变了。在见到大海之后的第二天,我发现,不管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不管在室内、室外、家中、学校,还是深夜在自己的卧室里,我都更加能够闻到它,尝到它。

“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达夫妮说。“我们知道自己住这儿。我们知道他们,可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

“他们是谁?”

其他地方的人,她说。我们通过书和杂志了解他们,以他们的生活为典范,像他们那样吃穿,照着他们的房子布置我们的房子,学着他们消遣娱乐。

“英格兰在那边。”达夫妮说,“加拿大在那边。美国在那边。”接着,她指着海岸说,“拉布拉多在这边。还有格陵兰群岛,在右边,在拉布拉多的东北。”

“我父亲去的是哪儿?”我突然问。

她笑了,点点头。笑容消失了,她久久地看着我。我意识到,她带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激发我提起我的母亲。自从她去世之后,这是我俩一直闭口不谈的话题。

“他们是不是在山脚下找到了我母亲?”我用手指了指说,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看不见水边。

“是的,在下面什么地方。要是在这儿让你难过的话,我们可以走。”

“我不难过。”我说，“她好看吗？我真的记不起她了。”

“她非常好看。”达夫妮说。

“她为什么跳海？”

“没人能真的弄懂这种事。”她说，“这不是谁的错，更不是她的错。”

看来，她相信我从学校听来的是真的。

她把我拉到跟前，吻了吻我的头顶。

晚上，达夫妮要大声读书，不是读给我或爱德华听的。不管屋子里有人无人，她都这样读，并且等我们上床之后，她经常在客厅里自言自语地读，声音微弱、怪异。

她说，这跟孤独或无人交谈或我们上床之后房子太静因而无法忍受没关系，只不过是喜欢这样。她说，即使自己是只群居的牛蝇，她也会大声朗读自己依然有时间阅读的书籍。

她说，自己是在给父母大声朗读时养成这个习惯的，他们发现晚饭后听她读书是一种消遣。

这样做不管是不是为了驱赶寂寞，但听起来她确实很孤独，我不忍心听见她一个人在楼下念叨，仿佛在跟虚构的朋友交谈，仿佛除了我和叔父外，她所拥有的生活只能从书中寻找。听到她的朗读，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母亲。

一天夜里，我坐在楼梯顶端，一直坐到她发现我。

“我是不是吵得你睡不着了？”她问。我摇摇头。

“要是愿意，你可以到我房间里读。”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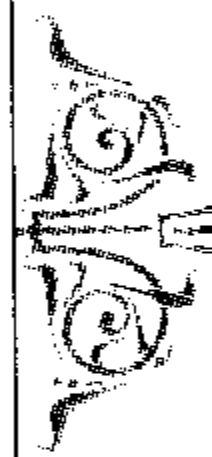
她坐在我床边的一把高背藤椅里，头顶的墙上有盏煤气灯。她只点上这盏灯，因此她的影子投到对面墙上，被放大了，轮廓更加清晰。每次她翻页时，我都看着她的影子，此时她停止朗读，一会儿又开始了。

她读简·奥斯丁^①的小说，还有查尔斯·狄更斯^②的，弗朗西丝·伯尼^③

① 简·奥斯丁(1775-1817)，英国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理智与感情》、《傲慢与偏见》和《爱玛》等，描写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和恋爱观念。

②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品有《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和《艰难时世》等。

③ 弗朗西丝·伯尼(1752-1840)，英国小说家，以其诙谐的书信和从1768年到去世期间的日记最为著名。



的,萨克雷^①的,勃朗特姐妹^②的。一开始,我几乎没注意她读的小说的名字。夜复一夜,在我头脑里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些人物的名字。一连几个晚上,那可能是卡米拉、塞德利和曼德伯特,接着是塞西莉亚、德尔维尔、莫蒂默和蒙克顿。还有爱玛、哈丽特和奈特利,以及伊丽莎白、达西、宾利、凯瑟琳太太。^③常常是一本新书要等她读到一大半我才意识到反复不断出现的是另一组人物。

“是本新书?”我问。

即使我俩都知道,她不是在给我读书,只是相互做伴,但对她所朗读的内容如此健忘,令她很不舒心。

“是的,是本新书。”她说。“只剩10页没读了。”

她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跟上她的朗读了。一天晚上,我让她帮我回忆那个100多页以前出现过的人物。

我睡着很久之后她仍在读。有时,我把自己弄醒,发现她依然在读,声音压得更低,语调更像是在内省。尽管我就躺在她身边,但此时此刻她早已没了那种在为别人朗读的感觉,而是在对她自己读。不过,我还是尽可能久地让自己醒着,用枕头支起身子,几乎坐着,背靠着床头板。旁人看来,她好像是在给一个病人读书,一夜夜地陪着他熬过漫长的康复期。

有时,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会醒来,此时已是深夜,甚至外面开始天亮了。我发现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膝头上的书依然翻开。她说,要是两点以后我醒来发现她睡着了,不要弄醒她,否则她再也不能入睡了。有时,她会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度过整夜,吃早饭时,爱德华叔父会对此表示不满。

① 威廉·M. 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擅长以讽刺笔法嘲弄英国社会,代表作有《名利场》。

② 包括夏洛特·勃朗特(1816-1855)和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英国女作家,作品包括:《简爱》、《谢利》、《呼啸山庄》等。

③ 这些都是上述作家小说中的人物。

第 3 章

我去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国教徒中上流社会的孩子全都上这所学校。

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们或许不知道我父亲长期不在家，或许不懂其中的含义，他们都很渴望跟我谈论我父亲。他们羡慕我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父亲，他传奇式的职业是“探险家”，而他们的父亲却是律师、商人、政客。他们总是要我在教室的地图上指出我父亲目前在北方的位置，问我他最近的一封家书中讲了什么历险。我满口答应，瞎编一通。

“他在这儿。”我会用手指着拉布拉多或格陵兰的某个地方，或更北面的某块大陆或一片无名的冰洋。这些地方上面盖满了问号，表明它们的形状甚至存在完全是猜测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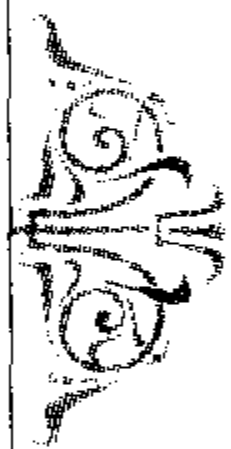
“他大概在这附近。”我说，“可这是‘*arctus incognita*’^①，因此没人真正知道。”无名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我给他们讲险遭溺水的事，与北极熊的遭遇，海象和其他怪兽，数周不停的暴风雪。在我的故事中，有许许多多的灾难，所有这些都使我父亲的英雄壮举或迄今仍无法梦想的精湛医术不可或缺。我因此受到一个名叫摩西·普劳迪的男孩的注意。

摩西的父亲是个法官，祖父是位猎捕海豹的船长，与他相比，亚哈王^②可谓善良和温和的化身。“催命鬼”是这位船长的绰号，即使他的船早已远远驶过哪怕是最鲁莽的船长也得掉头返航的地方，但为了猎捕海豹，他依然催命似的命令水手前进。在冰海中，他的船常常被毛皮压得沉到了船舷上缘。仅有一次他被船员说服同意减轻载重，结果是让 35 名水手坐上救生艇随波逐流。

在摩西身上更多地保留着猎豹船长而非法官的特性，不过在学业上，他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以一种毫不费劲的才气拿到高分，但老师们

① 拉丁语：意“无名（未知）的北极”。

② 基督教《圣经》中邪恶的以色列王，异教徒，以其凶残著称。在位 20 年（公元前 869 至前 850 年），纵容其妻拜祭假神，触怒上帝，后与叙利亚王交战中箭身亡。在西方文学中，亚哈成了与上帝作对而招致灾祸的象征。



却对他的这份才气不加称赞、不予评论,而是无言地、略带嘲弄地微笑着把他的论文和考卷还给他。他们似乎相信,摩西家的人终究是摩西家的人,在费尔德中学获得的知识只会被滥用。

他的肌肤平滑、红润,一张小小的圆嘴看上去老是好像刚刚吞食了一块饱浸油脂的肉。他用润发油把头发往后梳,又光又滑,穿一件马甲,戴一只金表链的怀表。他14岁,个子却有6英尺高,不仅个头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且体重也多出50磅。据说他父亲都害怕他。老师们却不怕他,至少在成群结队的时候。听说老师们曾告诉过他,要是他敢动一动其中一个,那他就得应对所有其他老师。

他兜里揣着雪茄,而且堂而皇之地当着老师们的面一边若有所思地吞云吐雾,一边站在街对面注视着学校和操场。因为抽烟,因为带着威士忌酒味上学,因为被发现拥有“淫秽”书籍,他经常遭到鞭笞,可他毫不畏缩,仿佛他的屁股是皮革做的。

“摩西·普劳迪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男孩’的定义。”达夫妮叔母说。

可老师们又带着某种喜爱看待他,认为通常那些外表看起来最没前途的男孩内心却怀有神圣的使命,有时是意识不到的。听到这话,摩西总是笑笑,抬抬眉头。

“普劳迪,你有领袖的魅力,”费尔德中学的校长盖恩斯说,“准确地讲,那是圣灵之光。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是位领袖。你这个年龄的男孩是最没能力抵御诱惑的,最容易受撒旦伤害,因为孩子们的单纯和诚信让他怀恨,令他妒嫉。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所以他引诱你比引诱别的男孩更加厉害。如果上帝召唤你,撒旦就没法得逞,如果上帝召唤你,你也没法抗拒。换句话说,除了束缚,你的未来一无所有。这只有让时间来证明。”

一天,当我走路回家时,摩西来到我身边。他俯视着我笑道:

“你叫斯特德,是不是?伟大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儿子?”

我点点头。

“我能叫你德夫林吗?”他问。

“当然啰。”我回答。

“当然啰!”他说,“对我们这些知道自己老爸是咋样的人来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他笑了,于是我也笑笑。

“德夫林,”他边说边用手搂住我,光是这一举动就足以引来其他男孩的目光。与我相比,他年岁长得多,个子也大得多。年长的大个儿男孩是

不跟年少的小个儿孩子结伴走路回家的。而在所有年长、个大的男孩中，摩西这样做就更引人注目。

“摩西，”他的一个朋友喊道，可他装着没听到。

我很快发现，有关同学家长的事情，摩西跟许多成年人了解得一样多。真真实实的事、半真半假的事、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他全都知道。他也讥讽、骚扰其他男孩，但似乎把我和我的父母作为最有价值、最有兴趣的目标。

“你知不知道，德夫林，所有南下船只在去大陆之前都在圣约翰斯停靠？”我摇摇头。

“比如说，你父亲的船中途也到圣约翰斯停靠。去年春天，他坐的一艘船就来过圣约翰斯。他在圣约翰斯，但他没来看你，是不是？奇怪，离家这么近，干吗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去看看你妈的坟？”

我问达夫妮，摩西说的是不是真的，她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我父亲作为军医服役的远征船队有两次停靠圣约翰斯港。但她知道没人见过他，就连找他采访的记者也没见过他，两次都被告知他生病了。

“你知道他来过？”我问。

“是的，我知道他来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有一次，我捎了封信去船上。”达夫妮说，“但他没回。我甚至不知道他收没收到信。我不想让你失望。”

“那我母亲呢？她活着的时候父亲的船靠没靠过岸？”

“靠过。”达夫妮回答。

“她去看过他吗？”

达夫妮摇摇头。

“为什么不去？”

“他知道你在哪儿住。”她说，“要是愿意的话，他早来看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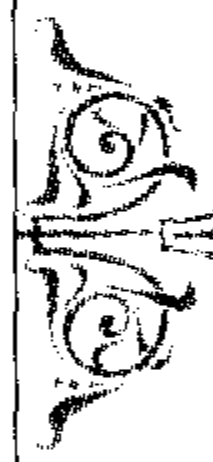
“他为什么不愿意？”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德夫林。”

摩西又说话了，“德夫林，你父母结婚7个月后你就出生了。你知道这是啥意思？”

“知道。”我回答，希望以此堵他的嘴，不过，我根本不知道我出生的时间与我父母的婚姻有何关系。

“那就是说他们得赶紧结婚。你妈是个婊子，你爸是个色鬼。他娶她



是因为没办法，是因为你。他之所以跑掉，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门勉强的婚事。”

我该怎么办？跑掉？对于他的指责我也是一知半解，我又如何去为父母辩解呢？我最害怕的是其他男孩会旁听到他的话。他既然这么有名，我的任何反应肯定会引来一群听众。

我再一次去问达夫妮叔母。

“我的上帝，我不敢相信，”她说，“这个普劳迪才14岁，就这么恶毒，肯定是个魔鬼！”

对于我父母结婚7个月后便生下我这件事，她做了解释。

“我早该亲口告诉你的。”她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丑事。毕竟，在圣约翰斯，我父母并非是唯一一对在婚前就提前圆房的夫妇。结婚后7个半月母亲就生了我，人们都善解地佯称我是早产的。

“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深深相爱的。”她说，“你出生时，他俩依然相爱，也爱你。我不知道你父亲为何变了，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摩西。“斯特德要是在街上碰见他父亲，他也不认识。”如今，他的听众包括曾经专注于我一言一语的那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那个伟大的探险家也不认识他儿子。斯特德根本就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跟我们一样只能读读报纸。他父亲从来不给他，还有他的叔母和叔父写信。那个伟大的探险家早已把他们抛弃了。”

他又跟我一道走路回家，把手放在我肩头上，朝我歪着头。

“你爸宁愿禽土著婆娘，也不肯禽你妈，”他压低嗓音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德夫林？”我知道“禽”是什么意思，至少知道它的过程细节和生物学目的。“我真同情你那可怜的老妈。”他说，“丈夫还没死就得自寻寡妇之欢。你知道什么叫‘寡妇之欢’吗？不知道吧？去问问你叔母叔父吧！”

令我如释重负的是，他说完就径直朝前走了。

可第二天又是这样。

“这下，你知道什么是‘寡妇之欢’了吧？”他问道。

我摇摇头。

“他们不肯告诉你？哼，这不奇怪——”

“我没问他们。”我说，尽可能地无动于衷。

“真可怜，父亲失职，母亲死了，监护人又不管你。那我来帮你吧。所谓‘寡妇之欢’，我还是这样说免得惹你心烦。你知道不？你上学时，男人

路过你妈房子，你妈就把他们带到楼上房间。他们付给她钱。你现在住的房子以前是妓院。谁都知道。”

当我把这个最新的“发现”告诉达夫妮，问她是否真实时，她说她已经受够了。

第二天，她让我呆在家里。放学后，她去找盖恩斯校长。

回来时，她的面颊因为愤怒而通红。

“这下好了。”她说，“这下再没麻烦了。盖恩斯校长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鞭打摩西·普劳迪一顿。‘不准摩西再欺负德夫林。我向你保证。’这是他说。我费了些口舌才让他说这话的，不过他终于说了。”

盖恩斯说对了，摩西具有领袖的魅力。没过多久，其他的男孩，甚至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都鼓动他（用他们的话说）“盯紧斯特德”，都纷纷围在他周围，听他接下来怎么讲我或我父母。

“德夫林，”摩西说，“因为被抛弃了，你妈曾要求主教对她的婚姻作无效判决，可主教不同意，说你爸可能会回来。‘无效判决’的意思是她跟你爸不再是夫妻了，要是她愿意，还可以跟其他人结婚。‘抛弃’的意思是——”

“胡说！”我回答，然后照着他的小腿就是一脚。我心里十分清楚可能的回报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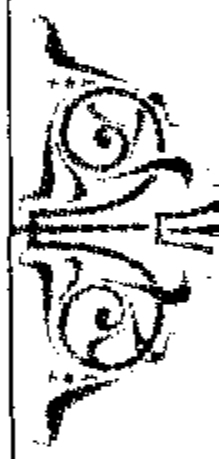
他用单腿跳了几下，时间很短，我没时间逃跑。

我回到家，鼻子流了血，一个嘴角肿起，颜色像洋李。当达夫妮承认摩西说的都是真话时，我质问她这么多的秘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等你长大，懂事后才全告诉你。”她说，“没想到像摩西·普劳迪这种比你大得多的男孩会这样盯上你。”

她又跑去找盖恩斯校长，说鉴于摩西没有被鞭笞吓住，不服管教，应当暂停上学。校长说，摩西过去被暂停过，但效果甚微。于是达夫妮说，那就应当除名。对于这个建议，校长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把摩西·普劳迪从学校开除，但他们没法把他开除出圣约翰斯市。只要愿意，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我，而且他肯定是愿意的，只要他知道他被开除是因为我的缘故。很早以前老师们就决定，为了大家，也为了他本人，要尽可能久地让他羁留在学校的管辖之内。“我们还没放弃摩西·普劳迪。”盖恩斯校长说，“心怀希望总不是愚蠢之举。要是他硬是想证明我们错了，那么受损的只是他本人的名声。”

没多久，我又带着新伤回家。摩西不再需要小腿被踢上一脚这样的挑



衅了。

“我们怎么办，爱德华？”一天晚上，达夫妮叔母说，“那个普劳迪小子不会罢手的，不会的。他毕业至少还要等4年。”

“我不知道德夫林能不能更放开点。学校的事情应当在学校里解决。”

达夫妮说起要送我到别的学校。“可一旦发现他为何离开费尔德中学，他们也会把他生吞活剥了，而且摩西依然知道怎么找到他。”

吃晚饭时，她坐在那儿，手撑着头，朝一边歪着，拇指摁在面颊上，四指分开捂着太阳穴和额头，盘子里的食物都冷了。

那天夜里我上床时，她已经好几个钟头没说话了，呆望着炉火。

“该叫这小子‘催命鬼’摩西。”他们上床后我听见达夫妮在说，“他不会放过德夫林的，就像他祖父不会放过成群的海豹一样。”

“你对德夫林太溺爱了。”我听见叔父在说。

“我不能让那个大个头小子欺负我儿子。”

“你儿子？瞧瞧，你怎么这么容易自欺呀？他是你侄子，不是你儿子。一个月内你就去见了校长两次。你把他娇惯得在学校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过不了多久，他连猫都会害怕的。”

“爱德华，你小时候跟弗朗西斯在一起，可德夫却没个伴。”

“我见过普劳迪。在你侄子的那个年龄，我面对过跟他一般高大、甚至比更高大的男孩。”

“喂，别吹了。弗朗西斯总是护着你，不让恶棍欺负你。可他们都没普劳迪一半高大。”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在场。我——”爱德华说。

尽管在争吵，但她笑了，不是嘲笑，而是怜爱地笑了，因为他说话的口气很当真，以为自己在人人都知道他无可救药的地方真的很能干。

“你的意思是认为我是个懦夫，是个弱者？”

“对不起我笑了，真的对不起。我之所以嫁给你，并不是因为你在费尔德主教中学揍了多少男孩子。”

“你是知道的，他不是你儿子。你这样做让人看不起，可怜。他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儿子，是那个疯女人的儿子。他身上没有你的一滴血，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身上都不会有你我两人的一滴血。”

我听见达夫妮下了床，不一会儿便下楼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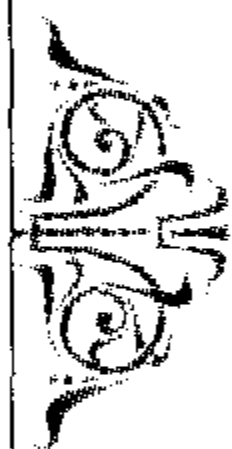
“我叔母会编诗骂你的。”摩西在学校又一次欺负我时，我愚蠢地对他说，“就像她给我叔父编的那样。”

“我也会编。”摩西说。

不久，一首题为《朝拜者的勇气》的匿名诗用铅笔誊写成许多份开始在男孩子中传开了。“医生娶了斯特德太太 / 立刻跟她上床做爱 / 他用麦秆挠她直打喷嚏 / 可哎呀呀她却很难欢喜。”这首诗尽管匿名，但肯定是摩西的杰作，这小子在学校操场上凭着记忆大声朗读。老师们把能找到的稿子全收了，对不主动上缴的男孩处以鞭笞，可还是有许多稿子没有查到，传入其他学校，又从其他学校传到大人们的手里，最后，在圣约翰斯市，几乎无人没有读过这首诗，或至少听说过这首诗。

这首诗流传开来之后，费尔德主教中学的绝大多数男孩是不可能与我来往了，他们都不理睬我，甚至连那些最不受欢迎、最招人欺负的男孩也远远地避开我，不愿给他们的折磨者提供折磨他们的新理由。

即使对摩西来说，我已不再是他的目标了。我想，自己像是最终被革出教会的人，反而被看成是被逐者的吉祥物，几乎赢得了那些男孩的好感。



第4章

我父亲去纽约已经5年了,但他依然没法为他自己的远征筹足经费。他再一次应征参加别人组织的探险,成为由罗伯特·皮尔里海军上尉指挥的北格陵兰远征队的两名军医之一。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试图发现我偶尔听到达夫妮所说的“人人拼死都想知道的”真相:格陵兰究竟是座岛屿还是大陆?

1892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圣约翰斯城,不过,地处城东头高地的德文街幸免于难。爱德华叔父和城里的其他医生被临时招募进医院。达夫妮志愿参加了许多为救济受灾者而组织的委员会和基金会。我跟许多被征募来的学生一起,帮着用车把房屋的废墟运出城去,以便修建新房。

就在我们大家忙于赈灾的时候,皮尔里的远征船“风筝号”在杳无音信了15个月之后,于1892年9月在费城靠了岸,皮尔里宣布他的远征圆满成功。他告诉那帮他还没来得及下船就蜂拥而上的记者,格陵兰冰盖仅到维多利亚人海口以南为止,他声称这项发现证明格陵兰是座岛屿。同时,在报纸边角的补充报道中,他还传达了一则消息:在所有的远征队员中,惟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没有回来。

我们是从当地的报纸最先得知我父亲失踪的消息的,或者说是爱德华叔父最先知道的。当时的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城市灾后重建的消息。“斯特德医生失踪”、“斯特德医生未归”、“斯特德医生下落不明”,这些是“风筝号”停靠费城后的那天早晨爱德华在自己诊所门廊处发现的堆在那儿的报纸的标题。我父亲失踪的消息头天很晚才传到当地报社,因此记者们来不及与斯特德家的人联系,了解他们的反应(以为他们已得知此事了)。作为父亲的近亲,爱德华叔父的名字虽然列在皮尔里的航海日志上,但皮尔里并没立刻给爱德华发来电报。为此,爱德华写信指责他没有用恰当的渠道报告我父亲的失踪,但没收到任何回信。

我是从达夫妮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的,她没有叫醒我,而是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该起床的时候。她在哭,没等她来得及告诉我,我便知道父亲发

生了不幸。我有父亲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记忆，如今他死了，估计是死了，不过，达夫妮能够狠下心说的话只是“风筝号”返回时没有搭上他，“还在那儿”，我父亲还在那儿，可能永远在那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把他找回来。

我们是坐在餐桌旁度过上午的，达夫妮在上面放了杯牛奶，还摆上所有的糖果：半个苹果派、一块磅饼^①、还有高高的一堆奶油曲奇饼干^②。9点半了，桌上依然摆满了糖果，这样铺张使得氛围更加沉重，极不相称。爱德华叔父整天大多呆在楼上，不过我时而瞥见他，为自己的所见感到吃惊。

从他脸上和眼里的悲伤来看，你或许以为我父亲还从没离开过，以为就在几个小时前爱德华还见过他，他过的就是斯特德家族所指望他的那种生活，直到这么一个早晨，在去诊所的路上，他这才遭遇了某种致命的灾祸。在我看来，似乎对爱德华来说，他过去指望过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如今他的指望被证实了。对于他，这似乎没多大区别。

“他去纽约很久以后，他停止写信回来很久以后，你母亲还不断写信给他。”达夫妮说，“我一直在回忆他，回忆他离家前的模样，我们相见时的情景。但我没法把弗朗西斯年轻时的样子与他后来的样子分开。我没法在脑子里再现那个年轻人，同时又假装不知道他后来的样子，哪怕是假装一会儿。”

“我根本记不起他。”我说，愚蠢地以为我对他的记忆比她还少会对她是个安慰。

“德夫，对你的不幸我很同情。”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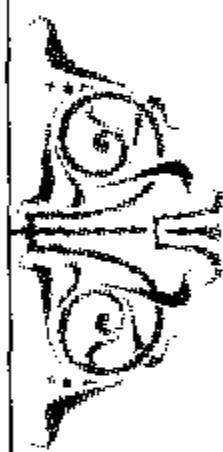
她看着我，仿佛觉得她应该用某种形式来正式宣告我父亲的过世，稍微总结一下他的生和死，好让它们有所意义。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我抱在怀里。

当地报纸在披露我父亲死讯的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我父母疏远的关系，只是未加评论地提到“斯特德医生住在布鲁克林”，他妻子多年前“溺水死亡”。

“风筝号”靠岸两天后，报纸上披露了一份正式的“报告”。这份关于我

① 这种蛋糕得名于原始配料单，制作时要配以奶油、糖及面粉各一磅。

② 一种油脂含量较高的酥饼。



父亲失踪的报告是应皮尔里上尉的要求,由远征队的另一位军医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在离开麦考密克湾驶往费城期间写的,其目的是陈述报告人所说的“关于斯特德医生的怪事”,在质疑皮尔里可能玩忽职守的猜测之前抢先刊出。

由库克医生起草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关于我父亲失踪的全部可以披露的内容。按照远征队的常规,全体船员都曾在保证缄默的法律文书上签过字。皮尔里早已事先把这次远征的报道权给卖了,唯独他才有权就此次远征写东西,或接受采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之后,当他写作和受访时,也根本没提我父亲。

关于同事、同伴斯特德医生失踪的情况报告

8月18日,在红石屋,我们醒来时便发现斯特德医生不见了。他的睡袋丢在地上,里面空的,没有捆。远征队进行了仔细搜寻,对找到失踪者的当地人奖赏一支步枪和子弹。搜寻者在一条冰川脚下发现了一些脚印,以及一张咸牛肉罐头的商标,除此之外再没查到任何踪迹。

据发现,斯特德医生把自己全部日志都带走了,或藏起来了。他的大部分衣物被他藏在红石屋的许多地方,其用意我们无法揣度。

搜寻到第5天,严寒气候开始了,派克船长报告皮尔里上尉说如若我们不赶紧离开,就很有可能被迫留在麦考密克过冬等待下一年了。

“风筝号”出发前,皮尔里上尉写了一张便条留在红石屋,告诉斯特德医生如果回来,那些爱斯基摩人会照顾他,等到第二年的6月,一艘捕鲸船会驶进麦考密克湾来接他。但是我们担心,他也许永远看不到这张纸条了。

对于斯特德医生离奇、神秘、不幸的失踪,我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也就是他失踪的那个晚上,不论是精神和身体,我并不觉得他过度疲惫。他也没向任何人说起自己要离开的打算。

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



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不管他现在的命运如何或可能如何,令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的上司、他的同伴还有那些土著人已经为寻找他的下落竭尽了全力。

谨此呈报指挥官 R. E. 皮尔里海军上尉。

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外科医生、人种学者

F. A. 库克医生

敬上

1892 年 9 月 9 日

写于“风筝号”轮船

尽管公布了库克医生的报告,还有全体船员保持沉默的允诺,但没过多久传闻便开始散布开来。9月24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个来源不明的说法:我父亲和皮尔里上尉之间曾发生过争吵。据说从远征一开始,我父亲就“缠着”皮尔里要他准许他留在北方以便更好地熟悉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和语言。而皮尔里大概认为我父亲要求留下的真正意图是继续往北,也许是去北极,因此他没有同意。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据说斯特德医生穿着美国的裤子,但身上却穿得很少,几乎每天他都要通过冰面上凿开的洞,赤身裸体钻到水里。他不承认自己冷,想方设法让自己适应这严酷的气候。他穿着破鞋到处行走,光着脚丫踩着冰冻的泥土,让爱斯基摩人觉得很有趣。”报道说,在费城为皮尔里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提到过我父亲,说他开小差,因此政府和远征队的资助者没有义务再派人前去寻找了。“皮尔里上尉说,总之,进一步寻找已无意义。虽然他说自己无权沉溺于猜测,但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相信斯特德医生依然生还的机会是没有的。”

一想到这篇描写我父亲在北极的行为的文章正在被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达夫妮就感到伤心。

“我才不管写的是否真实。”她说,“他没法替自己声辩,他们这样写他太不公平了。不过,我相信那不是真的。当然,我是不像自己曾经以为的



那样了解他,但我敢肯定,他绝不会像那样行事。”

她写了下面这段声明,并劝说爱德华叔父作为声明唯一的签名人,然后发给当地所有的报纸以及《纽约时报》:“我了解我哥哥。我知道在他思维正常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的。显然,鉴于远征的严酷和艰辛,他的本性出现了失衡,对此,库克医生和皮尔里上尉肯定是看见的。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阻止他伤害自己?这是两位绅士必须回答的疑问,今生今世无法回答,那就来生来世回答。我哥哥的声誉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受损,事情的真相定会大白于天下。在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眼里,在他们的心中,他从来没被久久地遗忘过,他的形象也从没遭受玷污。”

当地报纸转载了来自美国的其他报道。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达夫妮坐在餐桌前,双手几乎遮住了整个脸,正透过指缝看一份《邮报》,头版上刊登的是根据船员提供的描述绘出红石屋的室内布局。

皮尔里的妻子约瑟芬(昵称“乔”)虽说算不上真正的远征队成员,但当时作为客人也参加了对格陵兰的远征。在麦考密克湾的那幢美其名曰“红石屋”的房子里,她与皮尔里以及全体队员共同过冬。那幢“屋”比我的卧室还小。墙壁里里外外蒙上焦油纸,又挂上红毛毯阻隔寒气。这房子有两间屋,一间放着皮尔里夫妇睡的床,另一间是全体队员睡的地铺,共有半打人,我父亲和库克医生就在其中。这两间屋子仅靠皮尔里太太用两面丝旗做成的帘子隔开。皮尔里夫妇的床头柜是船上用的木箱,上面摆着一个碗和一只有柄的大水罐。沿一堵墙边立着的是简陋的书架,放满了书,每当北极的夜晚降临时,读这些书便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报道说:“墙上是皮尔里太太挂的家里亲人的照片,他们是她不变的思念。”另一间屋子是我父亲和其他队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樽水壶模样的大肚炉子,一张桌子和几把临时凑合的椅子,还有一排铺位,上面盖着用地毯做的床垫。队员们轮流睡铺位,要不就围着炉子躺在地铺上,头离炉子只有几英寸远。我父亲就是从这圈人当中悄然离去,没有惊醒任何人,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失踪才被人发现。我凝视着这幅貌似照片的画,凝视着这位艺术家所画的原木地板,仿佛它描绘的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被发现还活着的地方。

乔·皮尔里太太有张照片让我看了特别惊奇:她站在格陵兰岛荒芜的岩石上,好像是周日要去散步一样,穿着一件束带的丝裙,配了件背心,撑着一把太阳伞为自己遮挡阳光。她的眼光朝下看着一家爱斯基摩人,像是大人站在孩子面前,高出他们所有人一大截,包括那对夫妇。那些爱斯基

摩人身披兽皮,而她则穿着或许我母亲也会穿的连衣裙,两者极不相称,仿佛她根本就没在照片里面,而是鲜活地站在照片之前,把所有文明的标志都展现在画框之外。

“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达夫妮说。不过后来,爱德华说,据他的一位朋友讲,她是“费城的笑料”。

我看见照片中的乔·皮尔里,眼睛矜持地俯视着,阳伞为她遮住阳光。那些爱斯基摩人的脸干裂、起皱,头发很长,缠结在一起。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女人背上的婴孩,眼睛刚好掠过背带的边缘向外窥视。

报上刊登了一段皮尔里家的故事,还配有一幅他小女儿房间的照片。里面全是纪念物,床上堆满了与极地有关的纪念物。玩具海豹、贝壳、羽毛,还有皮尔里在北极发现的陨星碎石,他称这些石头叫“星星石”。

第二天,在肉店里,有个人看见我和达夫妮叔母进去,便对另一个人说:“他大概是疯了什么的。夜里趁其他人睡觉的时候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他肯定不知道我能听见他。在他的语调中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不知怎的,我父亲的死跟我母亲的死一样神秘古怪。不久我便感觉到,这是大家的看法:我父亲的死终于证实了斯特德医生和他妻子阿米莉亚的疯癫。

虽然在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我父亲是个不负责任、嗜好浪游的人,他抛弃家人的做法不可原谅,但总有那么些传闻,模棱两可、毫无根据的传闻,说是因为要逃避我母亲,父亲才去参加远征的,爱德华叔父似乎也这样认为,但不肯公开这样说。我记得有一次摩西问过我:“你爸宁愿禽土著婆娘,也不肯禽你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现在,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与其说是自愿倒不如说是被迫前去远征的人终有一天会被远征逼疯,或者被他的妻子、被她的古怪逼疯。即使他去了北极,即使她死了之后,即使他多少年都没见过她,但他是无法忘记的。

人们看着我好像在问:有这两个如此怪诞的人作父母,这孩子将来会是怎样?

就在爱德华准备前去纽约打理我父亲的后事时,他收到一个自称“斯特德医生同事”的人的来信,说我父亲租过一套几乎没有装修过的公寓,没去远征的时候他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为穷人看病,有一点点薪水。他死了,没立遗嘱,银行里只有140美元,除衣物和书籍外没有其他财物。达夫妮叔母决定,这笔钱将由他们为我托管,直到我21岁。爱德华叫我父亲的



同事按照他所认为的合适的方式处理那些衣物和书籍,因为把这些东西邮寄到纽芬兰的费用比它们本身还要贵。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关于我父亲的任何新消息的报道。爱德华叔父说没有意义再等到明年6月,到那个时候库克医生报告中提到的捕鲸船才会例行公事似地驶进麦考密克港。他的意思是,没有意义要等到那时才为我父亲举行葬礼。所有报纸都与皮尔里的看法一致:即使有这个可能,如今斯特德医生也无生还的机会了,更不用说捱到明年6月。

在报上刊出的那则讣告中,爱德华没有给那些不了解我父亲的人透露丝毫这样的信息,透露他如何背离众人期望他终生追求的正业,透露他如何荒度了过去的10年,如何死去的,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圣约翰斯市艾尔弗雷德·斯特德医生与其妻伊丽莎白·斯特德(娘家姓哈得逊)之子,于1892年8月17日辞世。其子德夫林、弟爱德华·斯特德医生、弟媳达夫妮(娘家姓杰斯帕森)悲痛至极。其妻阿米莉亚(娘家姓杰克曼)早已仙逝。”

房子不远的墓地里,在埋葬自家亲人的那块地上,一块刻有我父亲姓名的墓碑在我母亲的墓旁竖了起来。这是一次简短、非公开的葬礼,由一位长期找爱德华叔父看病的牧师主持。达夫妮叔母哭了,不过好像更多的是为我而不是我父亲,因为她不停地看我,试图微笑。在爱德华叔父的脸上,那天获悉父亲死讯时我见过的那悲痛的阴影依然挂着,但他没有也不能摆出比这更伤心的模样。

父亲的墓碑象征着他最后未被标示、不为人知的安息之地。墓地里还有其他人的墓碑,他们大都死在海上,尸骨根本就没找到。

“可怜的人!”达夫妮看着墓碑说。可怜的人,我心里在想。对我来说,这碑石、房子里的那两张照片、“可怜的人”这几个单词、在红石屋他曾住过的房间的图片、报纸上有关他失踪的报道,这些是他一生留在这世上的全部结果。我努力把自己也想成是他存在过的一个结果,但做不到。

达夫妮每晚依旧大声读书,有时在楼下,有时在我房间里。

我注意到,夜复一夜地这样苦读,她的声音有时会变得沙哑。她会频繁地喝放在椅子旁边的一杯水,每读完一页便喝一口。

“干吗不让我给你读?”一天夜里,我问道。

从此,我们轮流朗读,每个晚上书要递来递去两三次。有时,她得把头

伸过来，看我指的单词，帮我认字。对于我不认得的单词，我学会了发音的诀窍，学会了根据上下文猜词义的诀窍。

“你干吗不去为盲人朗读？”爱德华说，“至少那样你大声读书才合乎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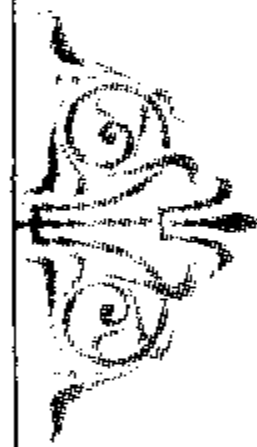
“两人同读一本书就这样。”达夫妮叔母回答，“要么三人也行？”

可我们刚开始朗读，他便跑上楼去听他的胜利牌留声机了。

我喜欢这样两人结伴着阅读书籍。它有别于一同目睹某一真实的事件，比如她带我去参加的像音乐会和戏剧这样的演出。相互间大声的朗读就像是在合作编织什么不断发展永无穷尽的秘密。我俩心照不宣，从不谈论两人之间读过的书，仿佛我和她都不想知道对这些书的印象是否不同或如何不同。我觉得每天都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的脑子反映了她的思想，我喜欢这种感觉，哪怕它仅仅是幻觉。

一天晚上，我们读完书后，她说：“我想让你懂得，发生在你父母身上的事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不是你父母的结果。你就是你，德夫林。懂吗？”

我点点头，如释重负，感激她说了这话，感激她不仅猜到我需要有人来安慰自己不会最终沦落成我父母那样，而且还猜到我终日惶惶，不敢鼓起勇气向她说明这一点。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好像她努力说服的人不仅是我，还有她自己，但这没有关系。她也需要安慰，也情不自禁地抱有疑虑，尽管都是些转瞬即逝的想法。



第 5 章

我 17 岁那年的冬天，爱德华向达夫妮建议要我去他诊所做个体检。他说他觉得我看上去跟平常不一样，也许没什么，但还是小心为妙。

第二天放学后，我去了诊所，扫了一眼那块已经没有我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只剩下爱德华名字的招牌。走进诊所，我瞥了瞥爱德华诊室对面的那扇门，依旧没变，上面写着“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爱德华甚至连再找一位搭档的话也不说了。

候诊室里，我前面有好几个病人，可等他看完的那个病人出来，他把我叫了进去。

“坐下，德夫林。”他指着桌旁自己对面的那把椅子说。

“你觉得我哪点跟平常不一样？”我问。

他摇摇头。

“这里是我俩见面最好的地方。”他说，“最保险的地方。”有好几秒钟，他胳膊肘搁在桌上，手指相互搭着做成一个牢笼的形状，没说话，仿佛在考虑，在试图预见我对他要说的话可能会有什么反应。他往后靠了靠，转动椅子，背朝向我。

“我有封信。”他说，“是弗雷德里克·库克来的信，所有报纸刊登过他写的关于你父亲失踪的报告，就是那人，记得吗？”

我点点头。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没有直接寄给你是因为库克医生不想让达夫妮看见。遵照他的建议，我也没看，不过我相信这里面没有……假话。我决定，除了你，这事我对谁也不说。相信看了这信后，你也会觉得谨慎是明智的。”

我的心在狂跳。以前，从未有成年人像这样对我说过话，更不用说爱德华叔父了。

“他干吗要我向达夫妮叔母保密呢？”我问道，“难道她认识他——”

“当然，你根本不需要看这封信，不必看这封信。假如你愿意，我可以



把它一烧了之。”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壁炉。

“没看这封信之前，很难保证我会保持谨慎。”我说。以前，我从没用过“谨慎”这词，从没如此一本正经地对任何人说过这词。但在这种情势下，似乎不模仿他说话的口气不太可能。

他耸耸肩，“即使你能保证，你可能也会改变主意的。我在这儿只不过是库克医生扮演一个类似‘信使’的角色，一个中间人。假如你非要看这封信，那看了之后，你可以做自己认为恰当的事。我觉得我知道你会做什么事，不过，也许我会猜错。”

“我也可以把信给达夫妮叔母，让她先看。”我说。

他摇摇头，“我不愿让你太晚了才后悔没有及早选择谨慎。我觉得你必须当着我的面看，然后把信还给我。”

“好吧。”我说，难道看了这封信会对我或达夫妮有何伤害？

为什么库克医生等我父亲死了3年之后才写信给我讲他的事？我猜想他的信里有我父亲的消息。我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他为何写信给我。也许，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也许他认为如今我已长大成人了，该明白这些事理了。

爱德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曾经是白色，可如今成了黄色的小信封，很平很薄，看上去里面好像是空的。信是封着的，除了我的名字外，上面什么也没写。这信一定是装在另外一封写给爱德华的信封中寄来的。

“我去后台站站。”爱德华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绕过桌子，把信递给我。“10分钟后回来。”他走到与我进来的那扇门相对的另一扇门，缓慢地把它推开，走到外面，然后又缓慢地把它合上。

我拆掉封泥，撕开信封的一个角，抽出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这信纸看上去很陈旧，要是不好好地拿着，好像会破成碎片。折叠的地方被压在一起，像是被熨斗烫过，或者被什么平的重物压了数月。笔迹是草写的小字，潦草得几乎没法辨认，两面都有，一直写到信纸背面的底行，最后几行字挤在右边的页边空白处，仿佛写信人已经用完了自己的信纸。

我亲爱的德夫林：

我一直在想你。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这话很奇怪吧？说这话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我写信的地方，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地方，一切都好像很奇怪。



在我写信给你叔父时，我原本早该出发去南极探险了，而不是在尚未离开码头的船舱里，在酷热的里约热内卢。从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刻起，我下船的次数还不到6次。去年春天，就在我们准备出发前，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攥住了我的心。

我想象着皮尔里从北极得胜而归的情形。在我梦中，宣告他大功告成的报刊头条频频出现，我只得下令所有报纸不得上船。皮尔里从未在公共场合承认过我和你父亲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暴风雪中，他的腿被船的舵柄压成粉碎。要是遇上医术差一点的医生，他必死无疑。

德夫林，最平凡的事情似乎是最有先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我一直在犹豫不决，该不该向你吐露这个秘密。

我发现自己事事都犹豫不决，甚至连最简单的决心也很难下定。我听说皮尔里20岁时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出名，必须出名。”他比我强在为实现目标他可以不择手段，而我……我却缺乏那种铁石心肠，对于探险这种事，恐怕那种心肠是必不可少的。

德夫林，除了你，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着折磨。我不敢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他人。要是大家知道了我的思想状态，谁还会愿意资助我去远征？谁还会信任地让我统率这些远征？

我常常从记不得的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据船长告诉我，睡梦中我莫名其妙地尖叫，好像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这就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身体状态，船长因此以为我染上了疟疾。我告诉他，由于为本次远征筹资耗尽了精力，我现在所经受的是“短时衰弱”。再过三周，我们本该驶往巴塔哥尼亚^①，7月份我们从那儿出发去南极冰川。但船长和其他人不肯走，要等到他们所说的我身体好转之后。他们也不肯就这样既不去南极，又不折回，白白地再等上一个春天。如今，我们已经在此停留了7个月。

① 南美洲阿根廷南部和智利间的一高原，从里奥科罗拉多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从安第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大西洋。

我知道自己绝望的缘由，但愿因此也知道疗治的办法。就是那件事，就是你父亲失踪前夕我便无法忘却的那件事。你接下来要读到的将令你吃惊，或感到震撼，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想象不到库克医生会对我透露什么样的事。我头晕目眩，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在北格陵兰探险途中，在你父亲失踪前不久，他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一件事。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因为极地远征的严酷而变得疯疯癫癫一阵之后的幻觉。然而，他喋喋不休的应该说是对他妻子的责难吧，只不过他的语气是如此的镇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你不是他的儿子。

我要他拿出证据，证明他不是你父亲，而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你是他儿子，想以此来让他意识到远征的过度疲劳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但他提供的一些细节却使我深信他透露的事情是真的。那些细节还为我证实了我心中秘而不宣的某件事情。我一生中跟不少的女人有过来往，不可能全记住她们。但作为老于世故的人，我还是能记住我的初次。在你父亲讲他的事情时，我意识到他提到的那个男孩正是我自己的儿子。

相信我，所有这些完全不是我的捏造。捏造这样的故事除全然没有必要之外，向你吐露这些事等于是把我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你手里拿着的这份以我的笔迹、我的签名写成的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你叔父和叔母也会受罪，在人们的记忆中，你父母，尤其是你母亲的形象会受到极大的毁损。从你父亲——应该说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口中得知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当时我的心快要碎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德夫林，你还太小，不懂真爱是如何的珍稀，在这世上是如何的少有，当它真正出现时，又是如何的短暂。而且它一旦失去，无爱的生活是如何的艰难。我曾试图“写信”给你母亲，把我的思想传达给她，权当她依然活着，但我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最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写给的人是你。

写这封信时，我充分意识到它将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



法想象我自己像你这样的年龄会如何接受这样的消息。如今，你我作为父与子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显然，我不能公开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叔父会就此与你细谈）。

不管怎样，我能再次给你写信吗？在下一封信中，我会向你提供细节，向你证明我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封信中，我之所以略去不写，并不是要激起你的好奇，而是我不忍向一个也许收不到他回信的人倾吐我的全部故事。

等你叔父对你说完他的话，我想让你当着他的面在这个信封上写下“是”或“否”，然后把信封给他。他会把你的回答转寄给我。如果你回答“是”，我会给你写信，你会以我向你叔父建议安排的方式收到我的信。如果你的回答是“否”，我会不再给你写信。

你的

F. A. 库克医生

1897年2月11日

读完这封信，我脑子里翻腾起模糊不清的思想和疑问。平台的那扇门开了，爱德华叔父迈步进来时，我被惊了一大跳。在他看到我的表情之前，他还是很镇静的。直到我看见他盯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惊恐的神情，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抖得如此厉害，信纸因此也抖得厉害。

“不用说，达夫妮会反对你与库克医生通信的。”他竭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如果她发现了这事，她会与他联系，你就再也收不到他的信了。如果你同意接收库克医生的来信，那等你读完、手抄完每封信后我就把它烧掉，你可以抄这封信。你可以等在这儿，看着这封信烧掉。从现在起，我们就在你父亲的诊室会面。记住，就说你手抄的这些信件是你自己写的，不过，这些信的风格和内容不像是你这样年龄的孩子能写得出来的，因此，把它们拿去给别人看是愚蠢的，让他们以为你是在自己给自己写信。”

他指了指桌上的笔和墨水池。

“把你的答复写下来。”他说。

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把信封递给他。

他看了看我写的字，叹了口气，是无可奈何、如释重负，还是自怨自艾，

很难说。

“把这信抄了。”他边说边递给我两张白纸，“快一点。”我飞快地抄着信，爱德华交叉双臂站着，背对着我，好像是在保证他没看到一个字。

“抄完了。”我说。

“把抄好的信放进你的夹克口袋里。”他说。等我放好，他转过身。

“先把原来的那封信折起来。”他说。

我把信折好，递给他。他接过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手臂伸得老远，仿佛他不想跟这信有丝毫的干系，飞快地把它扔进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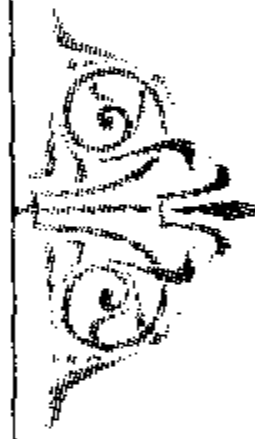
“叔父——”我叫道，可他举起手，然而他的脸色似乎表明，参与进这场诡计当中，他是心甘情愿的。他为何如此冒险深陷其中？好像他特别急于让我与库克医生联系。如果我说“是”或“否”，他的得与失又是什么？毫无疑问，他很想看到我跑去找达夫妮叔母，或许已经预见到终有一天整个事情会把我俩分开。他嫉妒我，认为她更喜欢我而不是他，这似乎很荒唐。也许从这些信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线希望，不必继续在她仅次于对我的关爱下度过余生。可这些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他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的原因。

无疑，他以为由他作中间人，斯特德家门再遭辱没的可能性会小一些。他知道，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他行事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库克医生要我在信封上写下我的“答复”，他是知道的，可他似乎又真的没有看过这封信——给我的时候信依然封着，而且事先告诉我等还给他时他会烧掉它，仿佛必须要我看着他烧掉，以证明他从未读过这封信。他走回到自己的桌前，坐了下来，转过椅子面朝窗户。

“不知道库克医生什么时候再写信来，什么时候他的信寄到。他肯定要收到我的回信后才寄出。从……”——他胡乱地指了指天花板——“天知道从哪儿寄来，可能要寄很长的时间。因此，我得预先提醒你，必须耐心等。我估计最早也得到12月份了。”

离现在还有三个月。

“信来没来，这样你就知道了。”他说。清晨下楼吃早餐时，他会在自己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塞一张红色的佩斯利手帕。达夫妮叔母最讨厌这张手帕，觉得为了她他至多只能隔几个月才佩一次——这可能与收信的次数差不多。“只要我一佩上它，那就是你庆‘信’的日子。”他说，后悔般地皱眉蹙眼，仿佛是我在用双关语捉弄他。那一天，他会告诉护士他要在门厅对面他兄长的诊室里用午餐，因为在那儿他可以拿本书安静地休息一下。我会



告诉达夫妮，因为唱诗班要练歌，所以中午我不会回家吃饭。为了确保不让其他同学看见，我会去他的诊所，先绕到那扇通向后面僻静花园的铁门（他会让那门开着锁），然后经过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门，缓慢地、悄悄地上楼，走到楼梯平台处。在我父亲诊室门外的平台上，他会坐在一把椅子上，病人进来的那扇门从外面反锁着。换句话说，我的一进一出都没法不让他看见。我得在12点半准时到达，不要对他说一句话，然后走进诊室，那封信会在桌子上方抽屉里等着我。在诊室里，灯不能开。大白天读信和抄信，光线是够的。等完成之后，我回到楼梯平台，把原信给他，不能说一句话。接着，我俩一同回到诊室，相互当着面在壁炉里把信烧掉，然后我再离开。到达和离开，以及在我父亲诊室的这段时间里，我不能说一句话。假如有人看见我离开诊所，问我在做什么时，我就说是来看我叔父，做个检查。万一去诊所这事让达夫妮知道了，我们就说为了免除她不必要的担忧我们才没把检查的事告诉她的。

离开诊所后，我没回学校，也没有直接回家。在我见到达夫妮之前，在她看见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之前，我得有所准备。她非得问出点什么，否则是不会罢休的。我担心哪怕是陌生人也会注意到我的悲伤，于是我抄小路钻进树林，沿小路走了一段，然后离开小路，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在那儿，过路的行人看不到我。

难怪库克医生没法想象他的信会对我产生何等的影晌。既然原信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想象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也是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库克医生疯了，甚至那封信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的。

可第二封信会接着寄来，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下了“是”。读了第一封信之后，我又如何能告诉他不再写信给我？我的头在旋转。要是库克医生说的话是真的，那我的父亲从一个我没有记忆的人变成了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

对于我，父亲永远是个陌生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可如今，好像他又活了。如今，这个陌生人名字不同，而且依然活着。我的这两位父亲都是从医生变成了探险者。两者无从区别，除了有一位给我写过一封信。

我记得信中的词句，不必去翻阅口袋里的那份手抄的拷贝。“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你手里拿着的这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那份原件会给他



带去极大的伤害。可爱德华叔父说，我的拷贝要是拿给别人看的话，则只能伤害到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他为何写信给我？如他所暗示的，如果我们不可能相见，不可能作为父子公开出现——甚至不想让我给他回信——那他为何给我写信？他为何以为写信给我就能重振他的勇气？在开头几段，他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差点失去了理智。

还有我母亲。想想看，她竟然让我，甚至鼓励我把她那位离家出走的丈夫想成我的父亲，而她自己却始终知道他根本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段短暂的时光已不再像她所营造的那样了。每时每刻已经被讽刺、被她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的那一桩桩的事实所动摇，那些事实她一定是准备永远瞒着我。

我起身朝家走去，犹豫着是否应该告诉达夫妮。走到家门时我还没拿定主意。等我推开门，达夫妮沿着门厅迎了上来，几乎是一路小跑。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谢天谢地，你放学回家太晚了，我正要……德夫林，爱德华没查出你什么问题吧？他说了些什么？”

我本该回答“没有”，以免她错下结论，但我不敢信任自己的声音。

“德夫林？”

我摇摇头，努力吞咽着以免哭出来。

“亲爱的，你看上去……爱德华说了什么？”

“他说我很好。”我飞快地说，又咽了一口。

“肯定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事？”

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任何解释听起来令人信服。

“只是有些我不想说的事，摩西·普劳迪说的事。就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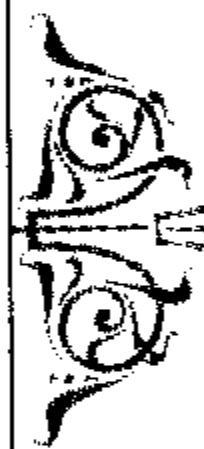
“爱德华真的没查出什么问题？”

我点点头。“如果您愿意，问他吧。”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她是不是有可能知道一切，也在一直误导我？我决定拖延一阵才告诉她，至少拖到下一封信寄来的时候。

经过那扇门，走进为父亲保留着的那间诊室，拉开桌子抽屉，读信，抄信，看着爱德华把原信烧掉，我在想做这些事会是什么感觉。

与叔父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特别期望他下楼吃早餐时背心口袋里塞的是张红手帕。可他佩的却是蓝手帕，第三天是绿手帕。



一想到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正在路上,我就很难去想别的任何事情。爱德华说,从现在算起三个月以内期盼来信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三个月里,每天早晨我都要看他佩的手帕是什么颜色,只要哪天他下楼时口袋里伸出一截红手帕,我就会欣喜若狂。

三个月的时间满了,从爱德华把我叫到他诊所的那天算起刚好三个月,可他的手帕是灰色的。我问自己,叔父估计的信件寄到的时间有多大的准确性?信没到,这种估计就没有意义。

从这时起,我是多么急切地等着看他下楼时佩戴的是什么手帕呀!当没看到手帕,或者看见手帕不是红的时,我真的难以掩藏自己的失望。于是,我猛吃鸡蛋、土司,猛喝茶水,想借此缓解失望的情绪。你说奇不奇怪,我情绪的好坏好像取决于叔父手帕的颜色。

又过了三个月,每天早晨我都要经历这段相同的感受。最后,我开始纳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也许叔父改变了主意,不肯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不向他人提及信件的事,他不会让我永远纳闷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或许是库克医生改了主意,觉得爱德华叔父还是不可信赖,或者决定不再向我透露任何事情,毕竟我还是个孩子。

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假装生病,这样就可以去爱德华的诊所找他,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不去。在家时,他格外小心,不与我单独相处。当着达夫妮的面,他像平常那样看我,对我说话。

我想起库克医生在关于我父亲死讯的正式“报告”中有段话:“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看来库克医生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可我却煎熬中等着接收他的来信。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或看着达夫妮往我盘子里堆食物时,我心里在想:此时此刻库克医生在哪里;我为他的安危担心,而以前我从没为我父亲的安危这样担心过。



第 6 章

从收到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起差不多6个月过去了，最后我几乎放弃了再收到库克医生来信的希望，可此时爱德华叔父却佩着红手帕下楼吃饭了。那手帕看上去好像特别的耀眼，达夫妮好像不可能猜不到他佩戴的理由。就像很难掩藏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样，如今，掩藏我的喜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敢肯定自己的脸与那张手帕一样的通红，眼睛没法从那儿移开。我的心在狂跳。爱德华叔父跟以往一样无动于衷。我知道他肯定在想什么，肯定在担心什么，在渴望我的言行不要引起他妻子的怀疑。不过，即使是我也无法从他脸上发觉任何异乎寻常的表情。我如何才能度过上午上学的这半天时间？

好歹我熬过了上午，午饭时分，我来到德文街，横穿过街，停下脚步。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驶过，路上没有行人。我绕到诊所的后面，推开后院的大门，身子挤进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房门，轻轻地在身后合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42

平台上，爱德华正坐在一把椅子上，远离窗户，这样没人能从外面看见他。他已经不再佩戴那张红手帕了（不过，后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又佩上了）。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放了本书，手指还没完全离开嘴唇就浏览完了一页。他的手飞快地一挥，示意我径直走进那间诊室，不得停下。

诊室的后门敞着，毫无疑问是他打开的，这样，他的护士和病人从门厅那边就没法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我想象得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坐在平台上，担心我的到来会弄出什么响动来。我走进诊室。以前，我曾进来过一两次，但从未单独进来过。我能听见门厅那边传来的低语声。一个身影投到我父亲诊室门上的毛玻璃上，是个男人在戴帽子。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吸墨台和父亲曾经用来写处方和转诊介绍信的那支笔，插在一个笔架上，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链系着。还有那块从海边捡来的用做纸镇的石头，放在吸墨台的最右上角。墙上挂的只有他在爱丁堡获得的证书。诊室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空书架，一把深褐色的皮沙发，涡卷形的扶



手上钉满了黄铜纽扣。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开着，又是爱德华的小心之处。他好像正坐在阴暗处，手指放在嘴唇上。迎面看到的是放在空空的抽屉里面的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德夫林，就这三个字，没有邮戳，没写回信地址。我想，不用说又和上次一样，是装在给爱德华的信中一并寄来的。信封是裁开的。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仅是演练，尚未来信。”我把纸条放入信封。

我极度失望地回到平台。爱德华伸出手。我把信封递给他。我们两人回到诊室。他擦燃一根火柴，伸向信封，然后举着信封在壁炉里让火焰由下而上燃烧，几秒钟后，那信封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卷暗红的灰烬。他两眼盯着信封，手一挥示意我走。我照着他的指示慢慢走下楼梯。

没过几天，他又佩上了那张红手帕。我怀疑这又是一次毫无必要的演练。

同样，他又坐在平台上的那把椅子上，腿上放着那本看起来跟上次一样的书。我径直走进父亲的诊室。

同样，爱德华早把信封裁开了，裁得齐齐整整，可能用的是解剖刀。可在我看来里面的信好像没被抽出来过。他是出于谨慎才把信裁开的，以减少撕开信封时的沙沙声。我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封好的信，撕开封泥，那是用红蜡做的，上面戳有一艘帆船的印记。这封信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页，而是几页，扎扎实实地折在一起。我轻轻地把信展开，开始读起来。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在参加北格陵兰远征时，弗朗西斯·斯特德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12年前，也就是1880年，他妻子曾经参加过一次由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酒会。他提到的那个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没错，酒会是在他们家举行的。你母亲告诉弗朗西斯·斯特德，在这次酒会上她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可她什么也记不清，甚至连那人的脸和名字。她说，除开始的半小时外，酒会的其余事情她一概记不起了。她接下来有记忆的是黎明前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幢陌生房子许多卧室中的一间里。这次遭遇使她怀了孕。

我们见面时，你母亲没有告诉我她未婚夫的名或姓，因此，在弗朗西斯开始讲他的故事前，我还不知道与我共事的这位军医和

我所共有的经历。

没等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我便意识到他是何许人也，我是何许人也。她在酒会上遇见的那个所谓的姓名不详、面貌不清的男人就是我。“阿米莉亚”，弗朗西斯第一次提及这个名字时，我毫无察觉，虽然我确实觉得有些巧合。通过一点一点令人痛苦的细节的叙述，我了解了真相。我是一个男孩的生身父亲，他名叫德夫林，正由他的叔父叔母抚养。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他妻子死了时，我几乎忍不住要痛哭起来，深受打击，他说的那个意外溺水而死的女人就是我的阿米莉亚。

他一边在讲，我一边在想：我是这一切的祸首，这一切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他对你和你母亲的抛弃，他自己一生的堕落，他糟糕透顶的心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的阿米莉亚，要是她从没遇见我，上天会安排让她远离那场夺去她生命的意外事故。接下来，我还要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谴责我自己。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沉住气，坐在那儿聆听，假装在等着想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尽管我正是他故事中的一员。要是第三者在场，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觉察到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可弗朗西斯太专注于自己的讲述了，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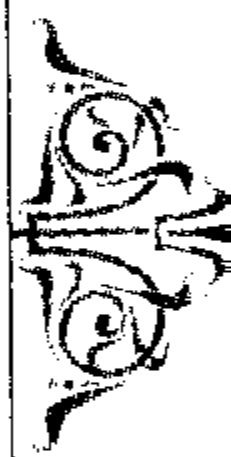
“结婚前我没跟她来过。”弗朗西斯对我说。他看着我，想让我明白他说的“来过”是什么意思。我点点头。

他说你母亲央求他为她保住这个秘密，有两个办法，他和你母亲选择了最体面的办法：他们对家人讲是他使她怀孕的。接着很快他们便结婚了。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着，从我身边走开。

几个夜晚之后，他离开红石屋，失踪了。在报纸上刊登的那篇我写的报告，以及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很早以前，在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情以前，他的确跟皮尔里争吵过，的确要求过我们其余人返回之后他留在北方。他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我，非常入迷。

皮尔里不许他留下，他们因此几个月没说话。我不想暗示皮



尔里应对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我已说过，我自己必须承担责任——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再也不会作为一员参加皮尔里率领的任何远征了。我再也不愿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再提起他。

接下来是18年前在曼哈顿发生的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你母亲有个家住曼哈顿的表姐，名叫莉莉。她的母亲跟莉莉的母亲是亲姐妹。阿米莉亚的母亲过世了，莉莉的母亲死了丈夫，后来再婚。

她们经常通信，并在一封信中决定，在阿米莉亚的婚礼上，莉莉将为她作伴娘，虽然她俩从未谋面，婚礼在圣约翰斯举行。对阿米莉亚来说，请母亲最亲密的姐妹的女儿作自己的伴娘，是对自己母亲的一种纪念。

莉莉邀请你母亲结婚前去纽约跟她住几周，这样她俩可以相互了解。她也准备在参加婚礼前先到圣约翰斯住几周。对你母亲来说，这是离开纽芬兰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以前她从未有过，要是等到结婚之后，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有，生活就是这样。

她俩参加了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毕业酒会。

年轻男女喝了很多的酒。和其他女的一样，你母亲不像男人那样习惯喝酒。也许以前她最多只喝过一两杯。

我不是参加酒会的客人。我只有16岁，平日干勤杂工，周日找到什么零活儿就干什么。办酒会的那对夫妇都是医生，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教授，女的是个顺势疗法医师。每年的这场酒会名声不好，因此不管人手多缺，没有哪个女招待愿意来帮忙，于是他们雇了4个跟我一般年龄的男孩作酒会的帮手。我们兑酒、送酒、送吃的，收拾丢在一边的盘子和杯子，给其他人腾出地方。

虽然是被雇来帮忙的仆人，但我的身份却不完全是仆人。其他三个男孩都是医生的儿子，算得上半个客人，对他们来说，来酒会帮忙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仪式。

我帮着收租的那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是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开的，另外的人帮着在管理。偶然有一次这对夫妇去公司走访时我正巧也在。他们跟我聊起天来。当我告诉他们我去世的父亲曾



经也是医生时，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那个女的是这个国家各科中少有的几个女医师之一，她想知道我父亲是在哪儿“学的医”。我所知道的只是大概在德国——我想是汉堡。

我记得当我提起汉堡时那女的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既不冷淡，也不屈尊，而是心照不宣的表情。立刻，她知道了我的家史。我的双亲是从德国来的移民。在德国，我父亲原本不是医生，而是“博士”，科克博士。不过，他学了很多医学知识，因此他居住和“行医”的那个镇上的人都称他“医生”。他的病人没钱，就把自己农场上种的或养的给他作报酬。他移民去了纽约州的那座小镇，那镇上的人也一样；也是在那儿，尽管是医生，他自己却死于一种到新大陆来的穷人很容易得的叫做肺炎的疾病，撇下我们后，我们就像其他的移民家庭一样，艰难度日。（德夫林，我跟你一样，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我们家从杰维斯港搬到纽约。等我长大能干活时，我跟三个哥哥一起拼命地干，帮着养家糊口。我发现，所有这些那个女的都了解，从我的脸上，或许她觉察到了我的一点点羞耻和怨愤。总之，她邀我去他们的酒会当个跑腿，我欣然接受。

我想当医生，因为我父亲曾经是位医生，但我没向任何人讲。我不知道给医学生和教授们端酒送三明治何以能把我与那个目标拉近，但我感觉有这个可能。像往常一样，周六早晨我告诉母亲，说是去曼哈顿的富尔顿市场看有谁愿意雇我干点杂活。可在曼哈顿消磨了些时间之后，下午5点我去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地址。

酒会不到一个小时，我们4个男孩中最大的那个就喝醉了。其他男孩看见没人注意时，每兑好一杯酒便呷一口才送出去。

以前，我从没去过这种场合。房子拥挤不堪，客人们得把自己的酒杯举到空中，以免玻璃杯被挤碎。

我猜想这是纽约典型的酒会。食物之多，可供我们一家6口足足吃上一年。到处都是咬了一口便扔到一边的三明治，还有一盘盘的烟熏鲑鱼，一块块西瓜和切成楔形的柚子。有些东西像馅饼、鱼子酱、肉冻，我从未见过，或者不知叫什么，应当怎么侍奉。这些叫不出名字的食物也没人碰，或只吃了一点点。我想这些食物一定有什么问题。尽管很饿，我是一口也不会吃的，因为其他



三个男孩对食物没兴趣，我想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天真得没有意识到我的衣服却让我露了馅。

这不是我的世界。一连几个小时，我在这个在此之前只能瞅一眼的世界里来来去去。我曾在夜晚沿着街道行走，下班回家抄近路时绕过这样的街区。我曾站在街对面，隔着巨大的窗户往里看，这是观看这些房子内部的最佳位置，因为站在窗户边的那条人行道上不可能看到窗台以上除枝形吊灯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些房子里，每个房间都照得灯火通明，但我不敢停下来长时间观望，只瞅一眼那一群群穿着我现在才知道叫晚礼服的男男女女入座用膳，由女仆和男佣服侍着，这些佣人尽管也很招人注意，但相比之下似乎并不存在。我曾看到年轻的男女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的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们一家6口住在布鲁克林一处名叫威廉斯堡的两间房子里，离东河很近，终日被罩在我们称作“糖塔”的阴影中，那是一家炼糖厂，工人干活的时间比我母亲的还要长，从那儿传来的男人和机器的嘈杂声不绝于耳，从那儿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糖浆味久久不散。

可今天，我却在这样的豪宅里面，与那些住在豪宅的人说话，兑酒送酒，端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大家不停地喝，那三个男孩甚至不必躲躲藏藏地偷着喝了，因为没过多久，客人们便开始自斟自饮了。

有一对小提琴手正在一个房间里拉里尔舞曲，莉莉说你母亲祖上是“爱尔兰人”，因此坚持要她伴舞。小时候你母亲练过很长时间的踢踏舞，于是不一会儿，屋子中央只剩下她一人在跳了，其余人全在一旁鼓掌。

那是个初夏，纽约已经很热了，她不习惯这样的天气，于是脱掉外衣，里面穿了件前面带排扣的普通紧身胸衣，下面是一条带荷边装饰的褶皱裙，脚上穿着长筒袜和带扣的靴子。那件裙子几乎没到膝盖，因此跳起舞来很方便。

当她喊口渴时，我被叫了出来，有趣的是，在客人们的催促下，我竟给她兑了杯酒端上去。要不是因为跳舞，我想她肯定会吐出来。

当她再也跳不动时，问题就来了。刚一停下脚步，她便晕了，

或者说开始晕了。我一把抓住她，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喝彩，声音之响，把她惊醒了些，这时，在莉莉的帮助下我搀着她站起身，可她不停地说屋子在旋转。

莉莉说她们最好还是回家，可你母亲却执意要莉莉和她一起留下。她说要是能躺一会儿就会好的。我看得出莉莉是不愿离开如此热闹的酒会的，因此她也觉得躺一躺或许是个办法。要是你母亲睡着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搀着她朝楼梯走去，在楼梯脚，你母亲停了下来，说剩下的路她自己能走。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居然轻轻松松地上了楼，莉莉转身回到酒会。

我跟着她上了楼。在楼上，她朝一扇门走去，不知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还是又晕了，她一个趔趄朝前，本能地伸出双臂不让自己倒下。

“你怎么啦，小姐？”我问。

她转过头，仰望着我。她的眼睛特别的大，特别的圆，很蓝，但头发却是黑的。

“但愿不要伤了自己。”我说，“大概是酒喝多了。你不会喝酒。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给你的最后两杯酒实际上是水，可你好像没注意。”

“你叫啥？”她问道，我觉察到那是我以为的英国口音。我以为从前没听过的口音都是英国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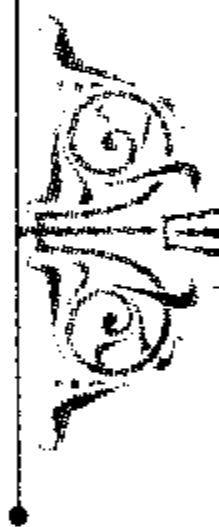
“弗雷德。”我答道。好像这名字短得可笑，短得简直不像个名字，当她说“我叫阿米莉亚”时，她证实了我的这个感觉。6个音，4个是她的名字：我叫阿米莉亚。要是我说“我叫弗雷德里克”，那听起来一定很好笑，可她说起来好像阿米莉亚不仅仅是她的称呼，而就是她这个人。

我蹲下身，一条腿跪在地上。我俩的眼睛平视，离得很近。“你家住哪儿？”她问。

“布鲁克林。”我说，“你住哪儿？”

“纽芬兰。”她回答，“可我一直告诉别人说我是从爱尔兰来的，这样就不必解释纽芬兰在哪儿了。”

“船从英国出发，往北去就要在纽芬兰停。”我说，“我没去过那地方，除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我哪儿也没去过。”



“家住这里，谁还愿意去别的地方？”她问。

我发现她在看我的衣服。

“每样都是别人的。”我指着裤子说，“这是我哥哥的，”指着背心说，“这是我叔叔的。”就连鞋子也不是我的，我解释说那是我父亲的，他几年前死了。

“你是个好心的年轻人。”她说。她朝我笑时，我往一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着她的眼睛。

“你该回家。我去叫你的朋友。”我说。

“是表姐，”她说，“是表姐，也是好友。不过我已经好了。”

“你的舞跳得真好。”我说。

“好多年没这样跳了，还是小的时候像这样跳过。自己跳，很有趣的。在圣约翰斯从没这样跳过，因为长大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教我们跳舞，长大后又不让我们跳了。”

“你要结婚了？”我看着她的订婚戒指问。

“是的。”她答道，也看着那戒指，“我18岁了，订了婚。他是个医生。”她沉默了。

“你喜欢纽约吗？”

“比圣约翰斯大多了。不过，我喜欢。要是我一生都住这儿，不知会成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从没过河来过曼哈顿。”我说，“她说不喜欢站在布鲁克林看这城市的模样。”

她笑了。

我告诉她：“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她看着我，我认为她是想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看得出她是不幸福的。她笑了，似乎是在向我证明，并非所有人都把她看成是不幸福的。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居然对她表达同情？要是其他什么人，她也许会生气，视他的同情为放肆。不过，后来她说，她看得出我并非嫉妒酒会上的那些人因为出身而拥有的特权。她说她相信，探究他人的本性是我人生的主要乐趣。这话部分正确。

“只是我感到有点不适应。”她说道，可看上去她好像在默想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快。

“玩不玩弹子游戏？”我们身后有个声音在问。那是莉莉，终



于上楼来看看你母亲怎样了。

“她只是绊倒了。”我说。

我和莉莉把你母亲扶起。

“这儿我来吧。”莉莉边说边牵着她朝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走去。我返身下了楼。

她说第二天她常想起我，她说我好像知道她来到纽约便产生了怎样的感觉，知道她对自己未婚夫的疑虑，知道她多次想着要逃脱，逃脱她的生活，在人群中与莉莉走失，让自己在曼哈顿无穷无尽的人流中走失，不再回到纽芬兰去。

她要莉莉安排我俩再见面。莉莉从一开始便知道你母亲喜欢上了我。她也知道你母亲是不幸福的。显然，你母亲曾经告诉过她，也许是在信里。大概是这个原因莉莉才邀请她来纽约的。我想，莉莉并没把我看成是婚配的对象，未婚夫的替代，而是你母亲摆脱现状所需的几个步骤中的第一步。

有莉莉的帮助，在你母亲住在曼哈顿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们三人去快乐宫殿（如今叫游乐园）全景画、博物馆、坦幕尼协会会堂的歌舞杂耍、画廊、剧院。我们在长亩广场漫步，是个名叫阿斯特的有钱人家建的一条街，现在叫时代广场。这里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有许多高档的“院子”，被称作大礼帽妓院。

莉莉是我俩的陪伴，我俩的借口，我俩的掩护。这样我和你母亲就能挽在一起了，我们三人挽着胳膊，莉莉和你母亲在我的左右，我们一起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步，观赏一家家商店。我们希望在旁人看来，莉莉像我一样跟你母亲“要好”，同时也像你母亲一样跟我“要好”。她跟我们一起漫步，我们说话时她几乎一声不吭，有时，当她觉得我俩想单独呆一会儿时，她便稍微落在后面。

我和你母亲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莉莉则打着阳伞在我们面前闲散地踱来踱去。

我们去了最大的手推车市场，即下东区的那个。你母亲来时，这里已经改变很多了，但即使这样，在她看来，下东区还是人头攒动，房子拥挤，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紧紧地偎着莉莉或我，而我们却漫不经心地往前走。

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有集市，只要远处忽然聚起一群人，



你母亲就会想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有人打架,她说在圣约翰斯,这通常是人群在外面聚集的理由。

我告诉她,曼哈顿岛过去有50多万人,如今却住有200多万人。在我看来,与现在的这个纽约相比,当时的纽约不足挂齿。

她说,没法想象在一座13英里长、两英里宽的岛上住着比整个纽芬兰的人口还要多出5倍的人,而且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人住。这密度,这喧嚣让她不知所措。

布鲁克林大桥还没彻底完工,但几乎在布鲁克林或曼哈顿的任何一处你都能看到它,桥拱伸向对岸,从这样的角度,站在桥的一头你是看不见桥的另一头的。桥是从两头建起的,准备在中间合龙。由于中间的桥梁还没架起,因此两边的拱桥像是悬在半空中,仿佛连接这两座拱桥的横梁坍塌了似的。这景象已经很完美了,她说,忘了它不久即将拥有的实际用途。

水里的船只密密麻麻,你几乎看不到水面。我们乘坐渡船从河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只是为了感受东河凉爽的风。

我和莉莉还带你母亲去看三一教堂,那是当时曼哈顿最好的建筑,这座仿哥特式建筑高耸在百老汇和华尔街上。

我们坐着缆车和高架火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后一种车很受欢迎,因为有笑话说,要躲避从高架铁道上雨点般落下的通红滚烫的煤渣、油污和煤灰,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脆坐进这肮脏的东西。煤渣给人行道上方的遮阳棚上烧出许多洞来,掉在马和行人身上,当火车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这些行人被煤灰呛得没法呼吸,还要查看自己的帽子,看有没有被烧坏。除了乘客,人人都在咒骂高架火车,但坐上它很带劲。如今,大部分的线路已经电气化了,不像以前那么令人讨厌了。

曼哈顿使你母亲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渴望独处的静谧和天地的宽阔,另一方面又向往着像莉莉那样在这里自在地徜徉,她觉得我也是这样。

这里使她想起她的未婚夫,使她希望他们从未谋面(她和莉莉都从没提起过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名或姓)。有时,她想赶紧离开回家,可有时,她又没法想象再回圣约翰斯的生活。

她原来总以为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像她这样的家庭是“微不

足道”或“无关轻重的”。可如今她发现，这些词语还远远不够。她正在目睹着一场大众的追求，可追求者们却说不清在追求什么，也不知道所追求的这东西有多么宏大，不过，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仿佛表明真的有这东西。她说，即使纽芬兰被完全抹掉，那也不会让这个城市的人停止下来。假如纽芬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那也不会减缓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进度。

“建大桥的一些人就是从纽芬兰来的。”我说。

“是可以替换的。”她说，“别的地方来建桥的人可以把他们换掉。”

她说莉莉的“圈子”好像没有止境。参加了接二连三的宴会和聚会之后，相同的脸庞她没见过第二次。她不知道莉莉对圣约翰斯会是什么印象。在社交场合，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不安、欠缺。

她告诉过一位妇人，说自己来自纽芬兰。“是吗？”那女的说，“我想，我听说过那地方。你是在哪儿学的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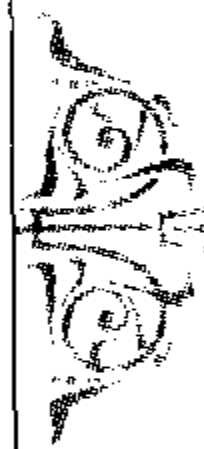
她说，有时她想到从这儿逃走是多么的容易呀。她常望着曼哈顿的那座伸向半空的巨大的桥拱，像一座代表生机的里程碑。她想到要是自己愿意，她完全可以就此消失，不像在圣约翰斯，需要花多少力气。她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她想象着自己登上渡船，独自坐在上面，让船载着她驶过哈得逊河，驶向新泽西。那是她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接着往哪儿去，什么打算，何以养活自己，她没有考虑。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逃避。

逃避。我问她，逃避什么？她只是耸耸肩。

一天傍晚，我们三人要了辆双轮马车沿麦迪逊大街行驶，这条街上住的人家虽不富裕，但也殷实。接着，我们拐进中央公园。车窗敞开，车棚的帆布卷起。你母亲说来纽约后她还没抬头看过夜空。天很晴朗，但星星不像在圣约翰斯的夜空中明亮。

“人们说夜晚站在布鲁克林大桥的高处，曼哈顿看上去就像这片夜空。”她说，“群星一样的灯火，中间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你觉得好不好看？”

我告诉她，我觉得好看。夜幕下的中央公园，被这座城市包围的城中荒野。如今，这里看上去不再像以前那么荒凉了。对于这座公园的建造者来说，他们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像是在海滩沐



浴，或天黑后来海滩漫步。仿佛这就是建这座公园的目的：允许在这儿表达某个阶层伪称是不该表达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这里有马蹄发出的嘚嘚声；有你一走近就会停止，然后又重新响起呢喃细语；有从一盏煤气路灯到另一盏煤气路灯之间没有照亮的小径。草地凉爽，泛着露水的银光。树林间飘来水的气味。尽管地上的空气静止不动，但你能依稀听见树梢上的微风。别处没法说的事在这儿说了，欲望袒露了，内心的恐惧和希望也承认了。你不会觉察不到你是被这座无形的城市包围着。因为知道这一切不会长久，这更使人感到真切。它使眼前的一切充满捉摸不定、耐人寻味的忧伤感。离开这公园，回到城市，就像美梦初醒一样。没人会提起这梦，因此很快便被遗忘了。

可怜的莉莉小心翼翼，耐着性子，装着没看见我俩在窃窃私语，没看见我的胳膊搂在你母亲的腰间，公园的氛围对她毫无影响，唯有她才能抵御它的魔力。

“据说到1900年，曼哈顿的每一寸地方都要亮起来，连天上的星星都要黯然失色。”你母亲说。1900年，离现在不远了。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活到那一天看看此话是否当真。可现在还不是。在曼哈顿，你依然能看到星星。

第二天，我俩坐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里，莉莉好像是预先安排了似的，在远处散步，比以往更远。你母亲告诉我，她跟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订了婚，可她并不想结婚。

开始，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很好。”你母亲说，“跟我一样出身不错，不过我父母去世了。我俩被说成是‘天生一对’。天生一对大都婚姻美满，可我俩不会。我本该不答应他的求婚，可现在好像太晚了。”

“还不晚。”我说，“你还没结婚呢。可不要因为担心变了主意怕难堪而让自己终身不幸福。也许你觉得现在结婚还不合适，要不就是你觉得跟某个别的男人结婚会更幸福。”

她看着我。

“我已经遇见了那个会使我幸福的男人。”她说。

“我看是吧。”我说。

我俩知道，离开纽约的最后一天，她应当跟莉莉的家人在一



起，因此，在这天的前一天，在没有莉莉的帮助，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俩最后一次相见。

我们只打算两人单独呆一个完整的下午，诉说在莉莉的陪伴下或她在附近时不敢说的话。可我们发现，即使莉莉不在场，我俩也没法在大庭广众下像期待的那样甜言蜜语。她说自己好像觉得是在圣约翰斯，人人都在看我们。我说，尽管曼哈顿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有时在街上也会偶尔遇见熟人。

我俩都觉得应该找个能说话的隐秘的地方。我告诉她说我知道在下百老汇街有家便宜但也不错的旅店，她点点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终身难忘——太美了。“我爱你。”我低声说。

我俩各自坐车去了那儿，先后到达，各租了一个房间。没有结婚的证明，我们是不准同租房间的，即使准许，我们也没法忍受由此而生的难堪和窘迫。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单独租房就已经是够让人难堪的了。

我首先登记好，然后在大堂读报，等她到达。她拿出自己的房间钥匙好让我看见，然后上楼去了。15分钟后，我去了她的房间。

在一起了，终于私下单独在一起了。不久就要天各一方，不久就要山水阻隔，可眼下我俩在一起。在这个房间里相聚几小时，声音从外面的世界，从下面街道上来来往往懵然无知的人群那里飘了进来。我俩相拥着躺在那儿，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再有谁曾经这样相爱过。她小睡了一会儿，额头贴着我的面颊，脖子上是她温暖的气息。

如今我才意识到，她冒的风险比我大得多。我冒着失去她的风险，而她却拿自己的一切在冒险。

我们一遍遍地说着相爱的话。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说愿意。我告诉她等她回到曼哈顿，我会给她戴上订婚戒指。

我告诉她，她得跟自己的未婚夫正式解除婚约之后我们才能再次相见，然后在报上登一则解除婚约的公开声明，就说终止婚约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不是她未婚夫的任何言行所致，因为在他们相识期间，他的行为无可挑剔。然后她就搬到曼哈顿来跟莉莉一起住，然后我们就开始体体面面不慌不忙地求爱、订婚、最终



结婚。在她的前一个婚约解除之前，我们不告诉莉莉任何事情，也不把我俩下午相会的事告诉她，不过，你母亲说她很肯定不论什么情况莉莉都是支持她的。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谨慎行事，就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最多是些与她解除婚约有关的议论我俩何时何以相识的短命传言。

她说，我最好不要给她写信。

我们分手了。她回到了家乡。

通过莉莉，我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天两三封，信封没有开启。莉莉知道寄给她的信中哪些是写给她的，哪些是写给我的，因为在写给我的信封上，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个“X”记号。

你母亲的信中没什么消息，表达的只有期盼和急躁，埋怨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情。在一封信中她写道：“我马上对他说。”可此后，信便中断了。

我再没收到她一封书信。

三个星期后，莉莉来找我，说是阿米莉亚捎信给我，想让我知道她和未婚夫不久要结婚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烦得寝食不安。她变了心。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曼哈顿。她幻想着离开纽芬兰，梦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逃避——不仅逃避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的那场婚姻，而且逃避她厌倦的一切。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我成了他们的帮手。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学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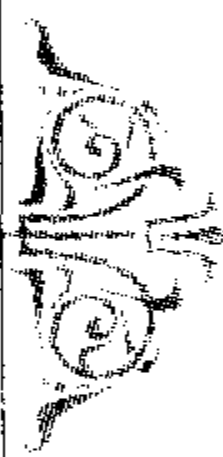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可我没这样的理由。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

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



恕显得太放肆了。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这些最隐秘的细节从库克医生的心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似乎毫无顾忌。他把这一切讲给跟我母亲邂逅相遇后所生的儿子听。我怀疑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有哪个男人能有他一半的坦率。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无比荣幸。

我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空白纸来,一阵狂抄,生怕爱德华会等得不耐烦,管我抄没抄完便进屋来把信烧掉。

我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地抄完了库克医生的信,离开时兜里的信等于就是原件。我不会向任何人展示这封信。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保守秘密,有能力把这几页信纸隐藏下来,不为人知。(我把这封信塞进自己卧室的床柱里,第一封信和今后要寄来的信全都这样藏在柱子里面。8岁时我意外发现,床柱的顶端很容易拧开。我把信纸叠在一起卷成圆筒,这样要比折叠起来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走到楼梯平台,把原件和信封交给爱德华,他默默地接过信,从椅子上起身时头也没抬,眼睛仍然在看书。我跟着他走进屋子,静静地站在壁炉边,看着他又一次执行起烧信的庄严仪式。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信封,让火苗从下往上燃烧,从壁炉的两根铁栅之间塞进炉里。我们看着信烧掉。



等信烧完,他点点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出来。我离开房间,慢慢地走下楼,关上身后的门,匆匆走向后园的大门。

这封信使我深信不疑,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我觉得他过于自责了。事情的缘由很清楚,他的罪责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深重。不过我觉得只要牵扯到罪责和羞耻这种事,推理和逻辑对于他没什么意义,就像对于我一样,因为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相信了摩西·普劳迪曾经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我的双亲之所以结婚,我的父亲之所以抛弃我母亲,我的母亲以及后来我父亲之所以死掉,都是因为我这个出乎意料的孩子。

读我母亲的往事,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在她跟我毫无关系之前就认识她的男人的角度来了解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信中的那位年轻女人不是背后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字样的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在那张照片中,她的姿势是摆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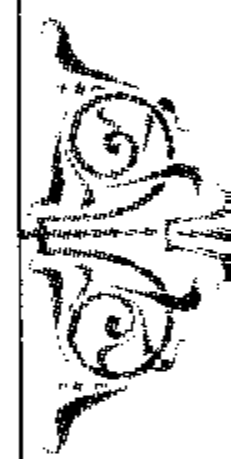
可怜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即使她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了,他依然娶了她。为什么?因为爱她?因为她“乞求他为她保密”?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事情肯定发生了变化。

在北格陵兰远征中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我父亲,我很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我的父亲还没有死,而是因为我终于如释重负,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痴心于荒野的男人,他的死成了一个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谜,一个他身后的亲人永远无法解开却要纠缠终身的谜。我的母亲没有变,我依旧是她的儿子,可我终于摆脱了他。对我来说,他这个谜已经解开了。

至于我母亲,她把自己的耻辱在心中秘藏了5年,让谁都不知道,尤其是我,我是这耻辱的人证,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提示。那些年,她一直在担心丈夫会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别人。到头来他还是告诉了别人。

我不想对达夫妮讲任何事,否则她会写信给库克医生,那肯定意味着我再也收不到库克的任何信了。欺骗她我感到内疚,但我对自己说,我这样缄口会免她伤心。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名叫库克的医生可能会取代她和爱德华叔父作为我双亲的位置,她一定不会心安的。我没法想象:我怎能给她讲我母亲订婚后的那段韵事,告诉她我就是那段风流的产物?我没法想象:当她从我口中得知母亲是跟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的我,而我与那个人人都视作是我父亲的人其实毫无关系时,她会怎样?不,为了我,也为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她。

“我母亲有没有离开过纽芬兰?”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爱德华晚上加



班没回家，我忍不住问达夫妮，眼睛搜寻着她的脸，可什么也没发现。

“离开过一次。”她回答，“她去了纽约。她在那儿有个表姐叫——什么——莉莉，大概是吧。是她邀请的。你母亲快要结婚了。莉莉告诉她成家之前应当出去见见大千世界，至少走几个地方。”

“母亲讲没讲纽约是啥样子？”我问。

“讲了，她说那地方很刺激，人很多。”我又一次搜寻她的表情，依旧一无所有。这些年来，这件事她从没提起过。

我母亲找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她同意的话，作为医生，他可以做出库克所暗示的不太体面的选择。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这事，谈没谈过那种简单的处置办法，没等我出生就给打掉。“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场婚姻一定是非常孤寂的。

夜晚，在我自己的卧室里，点上蜡烛，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库克医生是多么地不同于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他居然写信给我，请求我的宽恕，我的赦免。他仿佛认为自己健全的心智，自己整个的生命，全都维系在这上面。要不是这封信，不知有多少事情我会永远不知道。虽然我对写这信的人有所了解，但它依旧犹如从天而降。

又有一封信来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不知如何告诉你，你让我无比欢喜。你回答的“是”恢复了我的精神和勇气。在收到你叔父的信之前，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真真实实地存在。

我第一次是跟利比·福布斯结的婚，她生下一个孩子后便死了，孩子也只活了几个小时。真是祸不单行，一时间我好像无法复原。我现在的未婚妻叫安娜·福布斯，是利比的妹妹。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她时，她病了，大概是担心我在这次远征中会出什么事。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除了你，我还没有孩子。

德夫林，我很幸福。至少可以这么说，许多年来我第一次相信自己还存在有幸福的可能。得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自己造就的孩子，有一个身体的一半是跟自己一样的人，我从此会带着

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这样想过。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巴塔哥尼亚了。明天我会再写封信给你寄去。你读到信时，我已经到了巴塔哥尼亚。我的心又开始驿动了。停滞了如此长久的世界又蠢蠢欲动起来。

我又要前往南极了。去过那儿的人甚至相互之间都说不清是什么感受。不过我知道，只要去过一次，没有谁不希望再去，没有谁不被那景象彻底改变。

在去过极地的人和没去过极地的人之间有一堵不透光的、无法逾越的墙。前者所目睹的不仅有人性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你会经常听人说极地远征展示出“最好的”人性。可除了我在给你的信中所暗示的，你从没听说过它会昭示最坏的人性。我猜想你或许以为自己懂得在探险中“最好”和“最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你不知道，而且无论我怎么描写都无法使你懂得。我的所见，我的所做，使我不可能再把社交这样的大戏当回事了。需要补充的是，不把演戏当回事往往使人演得更加得心应手。我和皮尔里就是这样的情形。对于一个不是探险的人，其动机以及所谓内心深处的渴望在我看来其实跟孩子的一样显而易见。我不会再被语言所误导，所迷惑了。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在南极，或者在巴塔哥尼亚的什么港口，不论我在哪里遇见这样的人，那双眼睛，那张脸，那张脸的颜色，还有那身体的姿势，都清清楚楚地向我昭示着他的真实自我。一次，有个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了几个小时，单凭他的声音我就很快判断出他的人品，他的声音与他讲话的意思毫不相干，常常还相互抵触。这就是我要你不要给我写回信的原因之一。要是写了，你会无意中引起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走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会故作姿态，明显得使我对你产生恶感。你也许认为我这是双重标准，也许感到奇怪，既然我对语言如此怀疑，甚至鄙视，不让你给我写信，那为什么我还在给你写？显而易见，我们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有可能，也是不明智的。你在我前面提过的那堵墙的外面。我在用你唯一懂得的语言，也是我们唯一可用的途径把信息抛给你。

暫且告別
你的
F.A.庫克醫生
1898年8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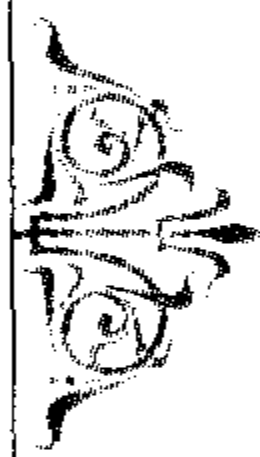
第 7 章

我的生活仿佛与这个社会一直格格不入,可这些信驱散了生活中的孤独和沉闷,成了我在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生活。上教堂、听音乐、看演戏、去野炊,达夫妮叔母老是想方设法,徒劳地企图通过这些让我结交些朋友,但所有这些,甚至连跟她在一起的朗读,却仅仅是排遣的方式,让等信的那些间隔好受一点,让阵阵孤独好受一点,此时我只需想想这些信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信也成了我掩饰、伪装自己心神不宁的手段。只有当我读到它们,重读它们,或心想着下一封何时到来,会写何事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做着生活中的正经事。要是没这些信,也许我得去寻找,或不得不去寻找别的什么适应的方式。

我并不感到缺少什么,相反,我相信在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的男孩中,名气再大的人,他的生活也没法与我的媲美。当我爬上楼梯朝“我父亲”的诊室走去的时候,当我知道里面有一封信在等着我,而没人知道写信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哪个男孩的生活中有我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男孩子看的惊险小说里写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也惟有我,这些东西是真真切切的,当然,爱德华叔父的参与也不同寻常。每次,当我慢慢地爬上楼梯,这位乐于助人、不可思议的爱德华叔父总在现场,库克医生信赖他,我也信赖他,他成了一名不求我回报只求我谨慎的默默无声的哨兵(每次总是看不见那张手帕,可回家时又出现了)。

在街上行走时,为了寻求犯事的快感,我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是库克医生之子。我是库克医生之子,并非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之子。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则不是。”我把这事闹着好玩,看看朝我走来的人或被我追上的人在离我多近的距离之内我还敢大声地把这秘密唱出来。有人听见我了——听见了我的声音,听见了那古怪的节奏——可他们听不懂意思。我不在乎这种行为给我留下疯言疯语的名声,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议论,说我已明显地在朝着我父母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如同对肉体的监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



影响。

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其中，被困在其中，比从前更加离群索居。信中的世界成了我的所爱，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实在了。过久地逗留在这信中的世界，身后的那扇门即将关闭，使我身陷其中，我看到了危险。我想象这种情形会发生，为何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如愿以偿地制止它？我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的确，有一阵子我再也没法如愿地让自己脱离他的世界了。走在上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在北格陵兰远征的途中，跟随弗朗西斯·斯特德和库克医生，听斯特德向库克讲那个除了结局他早已知道的故事。我站在库克医生的身旁，在1880年他16岁的时候，当他搀着我母亲走上曼哈顿那幢房子的楼梯，我跟着母亲离开酒会，回到她表姐的家，看着她躺在床上，尽管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我想象着库克医生遗漏的细节，从只言片语中编造出漫长的故事。在南美，在他的船舱里，当他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汗流浹背。我注视着他给我写信，注视着他的脸，有时是那支在纸上滑过的笔，写出的字因为阅读了多遍而铭记在心。我注视着他写下我的名字：德夫林。

我从读他的信变成了听他的信。信中的那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来，当我坐在客厅里时，我为他想象出的那声音便朗朗响起，达夫妮似乎不可能听不见，或者说我不可能没有大声地把这些词语说出来。

有一次夜晚在我房间里，我呆望着那根床柱，所有的信都一层层地卷着塞在里面。像爱德华烧掉原件那样把床柱里的这些信一烧了之，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那会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再也毋须在吃早饭时心神不宁地等着看爱德华的手帕是不是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解脱。整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

可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更珍贵的了。没有那种对下一封信的期待，没有那种因为不能预知自己和库克医生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刺激，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

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库克医生是我爸爸，”我说，“1880年在纽约他遇见了我妈妈。”就在这幢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曾经住过，眼下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正睡着的房子里，大声地把这些话说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说到这些信,我为之遗憾的,当然也是爱德华的得益之处,就是达夫妮了。

这些信把她信以为真的一切全推翻了。

当着达夫妮的面,我一无所思,唯一在想的就是自己的一生所依据的是一条不真实的前提,我知道那前提是假的,可她却依然相信那是真的。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原来不是我父亲,母亲在与我共度的每时每刻里却假装着他是。我想象着她夜晚坐在客厅里,读着书,或呆望着炉火。她就坐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带着那种自我认罪的坦然掩饰着。可这不公平。她误导我,当我是傻瓜,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结婚,当他是傻瓜,这不公平。

爱德华不是我的叔父。我跟斯特德家族毫无血缘关系。这一点甚至连爱德华也不知道。好像他并不想知道库克医生为何给我写信。好像他极其不想知道,当他递给我那些信时,都是封好的,他非常注意当着我的面把信烧掉。似乎万一我们的事情被发现了,我可以向达夫妮证明,向任何人证明,他没有读过那些信。他在帮着库克医生欺骗,却不肯泄露理由。他和我在合谋欺骗达夫妮,可我们之间对这场阴谋却从来只字不提。骗局比比皆是。我怀疑还有谁是表里如一的。我已经不再表里如一了。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在隐瞒什么,或向谁隐瞒。

“你好像不再盼着和我一起读书了,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达夫妮说,“但愿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认为自己这么大了,干吗还让叔母给自己读书?”我向她保证不是这样的。“以前所有的书都是我挑选的。你干吗不选几本?”她说。

我从图书馆挑选了几本书,我知道这些书她会喜欢的。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要是把我隐藏的所有书信在我俩之间一分为二,相互朗读,那会是什么情形?

我想象得到爱德华叔父惊慌的模样,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楼下,从达夫妮和我的口中听到的是库克医生不许说的话时,他精心练就的镇静将彻底不在。我心想,要是在别的情形下,要是听我给她读这些信,让她给我读这些信,达夫妮会有多么的高兴。最能理解这些信件对我产生意义的人却是最不能知道它们存在的人。

我不禁觉得,自己忠诚的天平已经从叔母的这一边斜向叔父的那一边。他和我共享着一个不让她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增加我俩之间的憎



恨,可这并不重要。

就像爱德华被排斥在我和叔母的相互吟诵之外一样(即使是他自愿的),达夫妮也被排斥在这些书信之外,非但不知它们的内容,就连它们的存在也不得而知。有时候,爱德华的表情似乎在说:不管这些信中写的是什麼,50年前写的几页小说怎能跟这些信件的内容相比?我跟他共享着信息,共谋着把信从他向我进行传递,由此我俩的盟约远比我跟叔母相互吟诵简·奥斯丁和弗朗西丝·伯尼时结下的同盟更加牢固。

当我和叔母开始朗读时,叔父便走上楼,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两个相互读吧,愿读多久就读多久,嗓子愿扯多大就扯多大。他知道这是假的,知道我是装的,可他不敢冒险向我扮鬼脸,甚至连朝我笑笑也不敢,害怕叔母察觉,或者害怕引我露馅。不过,他很少看我,因此,除了我所赋予的那种意思外,那些眼神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感到很虚伪,特别是在为叔母朗诵小说的时候。我无法忍受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单词都在增加我对她的背叛。我声音单调地读着,因为带着感情,带着真诚去朗读仿佛成了嘲弄她的笑话,字字句句被一种讽刺所弱化,这讽刺她一无所知,而我和人不在场却正在偷听的爱德华却在共享。当她朗读时,我感到是在遭受责罚。如今,在这些朗读中,仿佛涉及我们三个人:两人在读,还有一个人不读不听,却怀着暗中颠覆的沉默坐在那儿。

我甚至有些希望叔母会发觉我们。我想象着她说这样的话:“你们唱诗班练歌那天爱德华干吗总戴红手帕?”于是,我会坦白一切。

一天,在书房里,达夫妮叔母问我:“德夫,你最近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更好了。”我真想说,我所不如的那个从前的“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从我的变化中,她为什么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产生这一变化的缘由。可是,难道她看不出我更加快活,更有生气了吗?

“你好像始终无精打采的样子。”她说,“看上去很疲倦,很苍白。”

她所说的恰恰不是我所感觉的,可对着镜子看时,我吃惊地发现她说错。我所看到的与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反。我的内心和外表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是因为青春发育期。”达夫妮说。

我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几个月来我沉醉于异常的欣快之中,几乎



完全醉心于自我了，近乎于狂热，那狂热从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开始，从来就没有消退过。我因此简直不敢正视镜中的自己。

“这孩子也会‘那个’的，等着瞧吧。”一个周日，当我们离开教堂时，我听见身后有个妇女在说。她的口气在暗示，人们说这话或这样说已经有好多年了。要是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无意中听到这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

我心想，我让自己陷入的这种状况是否就是“那个”的先兆？对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变化，我能表现出其中的原因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母亲的一生中，不是也有类似的原因吗？

不过，人们认为我也会“那个”，依据是我的双亲都已经“那个”了。可是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丝毫基因，而且在库克医生的身上也丝毫没有“那个”的基因。因为守着我母亲曾守过的秘密，我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没有道理。更多的是她的秘密，而不是我的。我更多的是在为她 and 库克医生，而不是在为我守护这秘密，其负担也完全不像她曾承受的那样重。我告诉自己，因为达夫妮说过“你最近不如从前了”，她已经从我身上察觉到可能是发病的最早征兆，我母亲快30岁时，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样想太可笑了。我注视着她，想发现她是不是在看我，想看看从她的表情中，我是否能看出她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怀疑我的血液里存在“那个”的基因。然而，从她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只有那种一如既往的安详，自信在她的呵护下，谁也不会真正受到伤害。

她叫我到爱德华那儿去再做个“检查”。“查查保险点。”她说。

这一次，爱德华真的给我做了个体检，望闻问切，还提了些问题。在我快要离开时，他才拐弯抹角地提到那些信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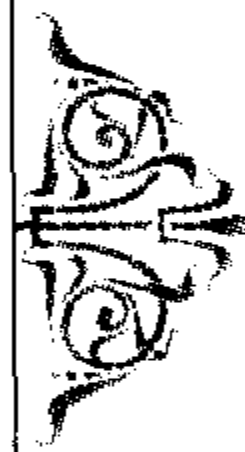
“小心你的举动。”他说，“甭以为别人都看不见你。小心你的模样。希望你最近的行为不是更糟糕的事情的前奏。比如说精神崩溃之类的。要知道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干哟，知道不？”

“当然，知道。”我说。

“不会有什么相反的证据吧？”

“不会。”

正如爱德华叔父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牵扯进任何事，那么，他为何如此害怕呢？我要是把库克医生的事情告诉别人，或出示我誊写的用我的笔迹签写他名字的信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会遭到嘲笑，甚至更糟糕。



假装成另一人自己给自己写信，在信中用一个素昧平生却想象成自己真正父亲的人的口气说话，难道这不就是德夫林·斯特德会做的事情吗？就连达夫妮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尽管我是相信库克医生的，但他自己也无法证明他就是我的父亲。

突然，我意识到爱德华为何做这般安排了。他不是怕我万一去达夫妮那儿把信的事告诉她时为他自己找个不知情的托辞。他不需要托辞。要证明自己没看过这些信，他的对象不是达夫妮，而是库克医生。

连看也不看便把信转给我，上面的封泥没有拆开，我还给他时立即当着我的面把它们烧掉，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小心，而是在遵照库克医生的指示行事。库克医生告诉他不要看信，而且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

唯有一种解释：爱德华并非心甘情愿地在为库克医生和我充当“邮差”。库克医生怎么知道爱德华没看过这些信？我是唯一知晓的人，可库克医生又明确地要我不得写信给他。

也许我错了。很难解释爱德华为何这般安排。不过，一想到库克医生为了与我联系，也许恐吓过他，我便有种变态的得意。而且我对自己该如何面对他，心中更有数了。



第 8 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在我返回之前，这是你将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我们是坐雪橇出发的。我们补给队的最后一批队员明天返回，把我们每个人给各自亲人的信带回去。之前，在每次远征的这个时刻，便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向我袭来，因为除了对我的兄弟姐妹之外（我与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我能说“暂时告别了”的人就没有谁了。我必须坦白的是，即使可以给你和安娜写信，我仍然感到有些忧郁。明天，我们这队精挑细选的人真的就要开始如此伟大的壮举了，在这前夕，人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次远征一旦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的目标是通过这次远征吸取教训，使下一次远征失败的可能性小点，可我没有把这个目的透露给此次远征的资助者或全体队员。极地探险就是这样成功的，靠一次接一次失败的启迪和教训。可这不是人们想要听的，更不是资助者们想要听的。那些资助者。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远征队指挥官，但就已经讨厌他们了。有钱的男女付钱给我，把我发现的什么地方，某个岛屿，海岬或海湾，命上他们的名字，如今，在地图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名字。谁给我的钱最多，我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最显眼的地方。百万富翁们付钱给我，要我远征时带上他们的儿子，好把他们塑造成才。

我被指定为这次南极远征队的副指挥官。远征南极，朝南极圈而不是北极圈进发，这似乎是浪费时间，因为从前我去过那儿多次了，对那儿了解得够多了。我想去的是北极——用皮尔里曾说过的话，是“地球之巅，而非地球之脚”。

但我必须努力做到专心致志。我可以从这次远征中学到许多可用于北极探险的经验。北极可达，但永不可占。我相信，在自己尚未垂老得无法率队远征之前，将会有人抵达北极，而且我



相信,没有哪个活着的人更有可能比我最先抵达那里。

当光线还充足的时候,我便阅读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①,我的那本诗集是拿外科医生用的胶布粘在一起的。《鲁拜集》,算不上是对南极昏天黑地的一种排遣吧!“在春天的暖火中,扔掉你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这诗句。它在诗中有何意义已不再重要了。我被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重压着在寒冰上跋涉,此时,我是多么地企盼能扔掉这层层外套,感受源自身体以外的温暖。

夜晚,空气中,水中,冰上,地上,有种东西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法入睡。为了看到夜空,我已经习惯了钻进睡袋,躺在离帐篷不远的冰上。开始,我的牙齿打颤,全身肌肉发抖。我想让体温快些散发出来,快些温暖睡袋里的空气。我把睡袋拉紧,只留一个类似吹气的小口,透过小口我能呼吸,看到星星。其他人说,从帐篷里往外看,月光下能看见我的气息不时地冒出来。他们觉得我奇怪,心想我何以能忍受这严寒,既然给自己留的睡觉的地方最宽,又为何要这样,露营时每晚睡在外面,像个孩子?如若我不是头儿,他们是不会容忍我这古怪的行为的。没有风,没有声响,唯有我挪动时身下的雪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很高兴自己无法入睡,更喜欢这宁静,而不是我那些嘈杂的梦。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我不知道你何时再会接到我的信,极地探险就是这样。希望你会想着我,在你的祈祷中记住我。就此暂别。

你的

F. A. 库克医生

1898年4月17日

摩西·普劳迪曾告诉我,而且达夫妮叔母也证实过,我父亲的船间或在圣约翰斯停靠,可虽然近在咫尺,他却不肯联系我们。我心想,自从北格陵兰远征开始,自从库克医生发现他是我父亲之后,他是不是也到过圣约

^① 古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所作的每节四行的长诗。

翰斯？通过翻阅图书馆里的过期报纸，我可以断定，自格陵兰远征以来，他没有来过，没有往北来过。也许原因很多，还不只是“那些资助者们”的异想天开。一旦他把注意力转回到北极，他的船队或许会在圣约翰斯停靠。他会愿意见我吗？安排某种形式的相会？或者像我父亲以前那样躲避我？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只要他的船靠岸，我就能找到他，找个机会我们相见，不过在信中他只字未提。既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给我写信，那么他肯定不愿与我公开相会。但我发誓，假如他真的停靠圣约翰斯，我一定要找个途径把我自己介绍给他，或者至少不声不响地看看他。

我决定尽其所能了解库克医生，从他写的书中，从杂志和报纸上有关他远征的报道中把他的人生故事拼凑起来。但我不可能做到。关于别人率领的远征，他是不准写的，也不得接受采访，因此有关他早期的探险经历没多少东西可以读到。

按照他跟像罗伯特·皮尔里上尉这样的远征队指挥官达成的协议，他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没有稿费，没有读者，除了那帮相信极地探险能促进医学事业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医生。他的文章包括：“居住地球北极的部落”（《纽约医学考察》1893年）；“关于北极爱斯基摩人患病、死亡和悲伤的奇特风俗”（《今日》1894年6月）；“爱斯基摩人的妇保与助产”（《布鲁克林医学杂志》1894年）；“北极寒冷、黑暗与光线的某些物理作用”（《美国医学会杂志》1897年）；“从风筝号上观察到的北极光”。最后一篇文章共12页，对极光进行了非常客观的描写。这些文章我全读了，但大部分都没法读懂，我寻找着他无意中流露出的那些少有的，简短的轶事和感想，却无法找到他写给我信中的那个库克医生的丝毫痕迹。



第 9 章

“比尔及亚号”晚了6个月。此前我老早就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如今我更有理由。报纸推测说这艘船太往南冒进了,它还没来得及折回,冰便把退路给封死了。除非它的木制船体能够承受冰块的挤压,否则船会被挤碎,船上所有人都会没命。毁灭的噩梦在半夜里把我惊醒。我再一次读起库克医生那段关于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神秘失踪的报告。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也许现在正卡在某座冰川的缝隙里,模样看上去与那天晚上坠落时没多大差别。我一遍遍地给自己朗读库克医生的书信。要是没有那些我誊写的可以拿出来看的信,我可能就不再相信他曾写过信给我。有时候,我仿佛觉得站在他和毁灭之间的其实就是我,仿佛只要我脑子里想着他——读着他的信,时不时地努力唤起他可能的真实的形象——他或许至少还有一次从另一世界回返的机会。但是,要是我不保持觉醒,要是我让自己长时间地连想他一下都不想,他便会死去。

我不知道,也真不忍心知道那种等待是什么滋味。我从图书馆借来理查德·哈克卢特^①的《航海大事记》,书中探险者被称作“航海家”;我读以利沙·肯特·凯恩博士^②的《极地探险》,这书讲述的是在北极的史密斯海峡一连数月船被冰冻住后的生活。那艘船当时被认为是船毁人亡了,可很久以后它居然回来了。我寻找其他类似的书籍,寻找有关早被人认为是船毁人亡却又回返人世的故事。我偶尔读到一段关于格里利^③率领的远征队的故事,这队人在萨宾角遭遇海难,传说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吃自己同伴的死尸。虽然格里利给予否认,但如今大家都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我读关于富兰克林远征队的图书,这支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本身成了其他注定

① 理查德·哈克卢特(1552?-1616),英国地理学家,收集了有关英国探险航行的材料,于1589年出版。

② 以利沙·肯特·凯恩(1820-1857),美国北极探险家。

③ 阿道夫斯·华盛顿·格里利(1844-1935),美国陆军军官、探险家。他领导的北极探险队于1881-1884年到达了前人从未达到的地球的最北点。

要失败的远征队搜寻的目标。

无疑，我和库克医生还没有相互彻底地了解，因此他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每天早晨，我急切地等着爱德华叔父下楼来，希望看到那张从他背心口袋里伸出的红手帕，情不自禁地希望我会第一个得知库克医生返回的消息，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消息会先出现在报纸上，而不是在他给我的信中。

我想知道爱德华在想什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浏览报纸，寻找有关南极探险的消息。他是否知道“比尔及亚号”已经迟返很久了？或许我所害怕的正是他所希冀的：但愿再也不要接到库克医生的书信了。

最后，“比尔及亚号”仍迟迟不返，甚至连最乐观的人也断定它肯定遭遇了什么不幸。

我几乎相信库克医生在企图抵达南极的途中已经罹难了。报纸上有关那艘船本该何时返回，何时停靠巴塔哥尼亚的故事和补充报道越来越少了。

可是有天早晨，等爱德华翻完报纸后，我翻开报纸首页，一条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比尔及亚号平安返回”，还有一条副标题：“除一人外全体队员生还”。除一人外。我扫视着这段报道，寻找库克医生的名字。由于没找到，于是又放慢速度又看了一遍。在南极冰海上被困了13个月之后，“比尔及亚号”于1899年3月28日出现在蓬塔阿雷纳斯。死去的那个队员叫埃米尔·丹柯海军上尉。库克医生的名字没有提到。

现在，比起那船杳无音讯的当时，我不那么为他的安危担忧了，但我依然不敢肯定，依然不愿冒险妄信他平安无事。有关远征归来的最先报道常常是不准确的。

终于，在报纸刊登第一条消息一个月以后，爱德华下楼来吃早饭，惹人注目地佩戴上了那张如今有些褪色的红手帕。

从爱德华的表情看，我接到库克医生最后的那封信似乎只是头一天的事。从他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既没有失望，也没有宽慰，更没有丝毫迹象表示这一天有任何非同寻常之处。爱德华完全可以走下楼来大声宣告：“库克医生没死，还活得很好。”可他甚至都没瞥我一眼。我看着那张手帕，一直看着，眼睛不敢移开，生怕一移开，那手帕就会不见了。一时间，我敢肯定自己会叫出声来，可这冲动却被一阵狂喜所代替，使我不由自主地笑



出声来，爱德华假装没注意。

“有啥好笑的，德夫？”达夫妮问。

“没啥。”我说。显然，看见我兴致这么好，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自从上次写信给你，你已经快长大成人了。毫无疑问，你从报纸上早已读到很多有关我远征的消息了。一方面，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去想你会因长久没有我的音讯而对我的命运失去兴趣。我担心，这个世界早已接受了我的消失，重新融入它也许会不可能。

除了抵达地球的最南端，我们这次远征真的一无所获。我们究竟登没登上南极大陆，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可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发现有封信在等着我，信上说在我离家的时候，我深爱的安娜去世了。我被告知，在我出发去南极之后有一阵子，她的病好像有所好转，可当报纸开始猜测说“比尔及亚号”和全船队员遇难之后，她旧病复发，慢慢地死于一种更凶险的疾病，比我离开纽约前那些专家让我相信的那种病更致命。自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挣扎在内疚和悔恨的双重重压之下。

等这些痛苦稍有缓解之后，我再给你写信。

你的

F. A. 库克医生

1899年4月15日

“我深爱的安娜。”前几封信中他都这样称呼他的未婚妻，可我却没想过她，这个和我同样的人在千里迢迢之外跟我遭受着同样的煎熬，而且至死也不知道我的存在。她香消玉殒的过程我最能想象。

在我收到他下一封信之前，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尔及亚号”远征的报道。我兴趣盎然地看了这篇文章，但更感染我的是他刊登在《世纪》杂志上系列文章中的那些照片。每个月我都从公共图书馆借来杂志，藏在外衣里面偷偷带回家。不知道爱德华和达夫妮发现后会做



些什么。我想爱德华是不会拿走这些杂志的,但在读这些文章前我不想听他说东道西。

库克医生的这些文章是为了怀念弗朗西斯·斯特德的,献给这位“足智多谋、坚忍耐心、和善可亲和善于沉思的斯特德医生,因为他的勇气和智谋,北格陵兰远征队生还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才得以幸免”。他说,要是斯特德还活着,他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伟大的探险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我再也想不起有谁比他更在乎自吹自擂,但没有哪个探险者的探险动机有斯特德医生的那样单纯。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他的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那些名副其实的探险者来说,探险不是争夺,而是一项事业。”

我很注意这段有关弗朗西斯·斯特德人品的描写。即使是库克医生在他给我的信中,即使是我母亲或爱德华在他们对他的责难中,都没有谁曾如此详细地描写过他。毫无疑问,这段献词和描写一半是出于内疚而写的,一半是因为知道我会读到它们,或脑子里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才写的。

《世纪》上的文章没有那些照片有趣,是用写冒险故事的语气写的。一个故事的副标题这样写道:“库克医生直面极地险境,幸得生还”,大标题是“身陷绝境”。这些文章根本不像他的那些信,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请人代写的。

在给我的下一封信中,库克医生会写到这些照片:

“我不知多少遍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们不能生还,我拍的这些照片将成为我们的遗物。我记得这样想过:等到被人发现,这些照片早就损毁了,或者还没等送回家就被哪个心怀好意的傻瓜给损毁了,那该多可惜呀!我写了封信给在我们死后碰巧登船的人,告诉他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以及保管的恰当方式。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全船人员的安危,但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整天,我呆在甲板上,或站在冰上晾晒那些照片,共有100张。我用本计划用来毒杀动物制作标本的毒药做成氢氰酸,代替使用完了的定影剂。不用说,我有自己的暗室。想想看,在南极,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在冲洗照片时更有生命危险?”

根据致谢所示,所有照片都是库克医生拍的,有白熊、企鹅,有一张“比尔及亚号”被困在冰上的照片,月光下看上去好像被套在光环之中,桅杆、横杆、绳索、卷起的船帆,还有救生艇,全都蒙上了白霜。有一张拍的是三名队员,根据照片说明,其中两人“来自纽芬兰”,尽管在冰上被困了13个



月,但他们看上去依然兴高采烈。有一张是在冰沟里埋葬埃米尔·丹柯上尉的照片。虽然有库克医生的照顾,但他还是死于肺炎。

最有趣的还是库克医生自己的照片——他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以前,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但没有哪一张能与这些相比。

他一共有6张照片,每张都取名叫“库克医生的自拍像”。不知何故,除了他自己,好像总是没人为他拍照。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孤独、他寂寞人生的写照。一个长久失去了友情的人,一个给从未谋面的16岁男孩写信的人,谁会可能为他拍照呢?

他总是拍自己的侧面像,除一张例外,总是从右边拍,从不正视相机,好像不知道相机就在跟前,而是凝视照片以外的某一点。照片的质量很高,表明他是下了功夫的,照片下面写着“自拍像”,这些都破坏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所造成的假象,使他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蔑视相机。在拍摄上的别出心裁似乎是信手拈来的。

我努力想象他在南极的情景:用三角架支起他的相机,望着一位旁观者,仿佛正准备拍摄镜头瞄准的任何东西,然后从遮光布下钻出来,在相机前面站好位置,做好表情,“咔嚓”一声摁下用线连着相机的快门。他肯定不会满足只照一张照片。他不敢肯定在这张照片中,甚至在10张照片中,他能否拍到一张自己喜欢或在返回途中能保存下来的照片。于是,快门一声接着一声地响,烟气一股接着一股地冒,镁光灯一片接着一片地燃,极地的白昼顷刻间变得更白,像两团白炽映在照片中他的那双眼睛里。在南极大陆的中心,他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摆着姿势,醉心于自我留影、留念,他的随从们远远地注视着他,在他这样忙着的时候,他们却干着他给布置的繁重活。自拍像,也就是说,拍每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是用总在画面以外的那只右手捏着快门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没有那种疑而不信的感觉,我似乎能看到那架相机,或那只捏着快门的看不见的手。

“自拍像,1898年”。玻璃板底片,那是在照像室里用的——照像室是其他探险队员拍照的唯一地方,因为照人像,人看上去就得梳理得最油最亮。就像皮尔里一样,在他的照片中,他看上去总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认真、特别无所顾忌地想产生一种好的印象。可库克医生却不是这样。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脸朝向一边,几乎与相机成了直角,脸转过来对着相机,两只眼睛刚好照出来,不过外面的那只在鼻梁上几乎只是一条透光的缝,里

面的那只被他难得拂到一边的那缕头发遮了一半。他这副模样好像是除了他,没人会看到这些照片,好像相机就是一架自我检查的机器,好像他的意图就是拍一些自己的照片,用于客观研究,仔细凝视,发现这一个个体向他表明的种类特性。

没有哪张照片显示出足够的景物,产生背景的感觉。他身后岩石上的雪,掠过肩头能看见的云或冰,这些景物也只有了解这照片拍摄时的情景的人才可能认得出来。有一张是他在室内的照片,紧挨着一堵光秃墙壁的侧面像。还有一张下面写着:“摄影师库克,由库克医生拍摄”,这照片肯定是他对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拍的,镜头凑得很近,你看不见镜子的边缘,库克医生手里捧着一架很大的盒式相机,面带微笑: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凝视着自己的眼睛。这把戏很妙。那微笑也因此很妙。

这些照片拍摄时所发生的事情,无人知晓,唯一的迹象就是他的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凌乱的胡须、凹陷的眼睛、憔悴的面色,还有大衣和衬衫破损的边沿。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屈从于这样的事实:等世界看到他的这些形象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仔细打量照片中库克医生的脸,寻找他与我的相似之处。我站在自己卧室墙上的那面镜子跟前,把我的脸与登在《世纪》上照片中的那张脸进行比较,我把那张照片贴在镜面上(事后我又把它取下,以免别人看见)。我看一眼镜子中我的脸,又看一眼库克医生的脸。我感觉很傻。镜子里看不出来。我原以为用它能同时看到我们两人的影像,但要看到库克医生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眼睛要从我的脸上移开,反之亦然。以前,我从未用这种方式端详过自己的脸,估量过自己的五官,凝视过自己的眼睛。我感到很不自然,比不上库克医生,在他那个时间静止了的世界里,他脸色镇静、冷凝,而我的脸却时刻在变。直到我把自己最近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他的照片旁边,我才能更好地做个比较,不过,我仍然找不见自己所希望的。我俩看上去并非完全不像,但也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从抽屉里拿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一张照片,是那张与报道他失踪的消息一并登在报上的照片,我剪下来的。我把三张照片并排着摆在衣柜的台面上。看上去我既像弗朗西斯·斯特德,又像库克医生。或者说,我跟这两人却没有明显的相像之处。我把母亲的照片(那张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的银版照片)放在我父亲和库克医生中间,把我自己的照片放在她的正下方。我母亲的一侧是斯特德医生,另一侧是库克医生。(好像我甚



至连我母亲也不像。我希望这意味着在其他更不肤浅的方面我们也不相像。)从她看上去的年龄可以判断,这张照片一定是在她去纽约前或刚从纽约回来时拍的,在她遇见库克医生之前或之后。

我努力想象母亲的长相与库克医生的相貌混在一起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不出来。他们的相貌类型完全是相反的,她瘦弱、娇小,近乎于玲珑剔透,而他总的来说五官粗大,头发又直又粗,额头很高,嘴唇丰满,颧骨尖突,还有他那从侧面看比正面看更瘦削的鼻梁。远征途中他让自己的头发蓄长,不过看上去好像他经常栉梳洗过。他的胡须蓬乱,但是故意这样的,好像他正在培育某种形象,好像他不相信,身为探险者就可以使自己像个探险者。

我想,也许再等我长大一点后,我会更像库克医生。后来我才认识到,没有一双像他那样的眼睛,谁也不可能长得真正像他。

虽然他从未正视过相机,但在所有的照片中,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眼睛。不论他是在照片的正中或者只是在框内,不论他的脸占了整个照片,或是只占了一部分,我的眼睛总是立刻碰见他的眼睛,我敢肯定,即使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他,我也会这样。随着我的成长,不管我的脸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拥有像他那样的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那双眼睛的形状:眼白很大,眼睑很不匀称,上下都没有触及虹膜,因此整个虹膜完全可见。不过,那双眼睛还包含着什么,还表达着一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

第 10 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在我给你的第二封信中，我谈到补偿我所造成的伤害。假如这些信件是赎罪途中的第一步，那什么又是第二步呢？

在被困南极的那段长久的时日里，我认定，对你我应当担负的其实就是父亲的责任。同时我也认定，公开承认父子关系对于你我都是愚蠢的做法，这不仅是出于我在第一封信中所陈述的那些理由，而且还因为这样做会剥夺我最宝贵的财富，并因此而使我无法给予或留给你这笔财富。

我是个探险者。除了作为父亲，与其说我是个医生、兄弟、丈夫（但愿上帝让我名副其实），倒不如说我是个探险者。那么，除了让你成为一名探险者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除了我的职业，我还能给予你什么更伟大的事业？

等你长大了，强壮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假如有一天你回答愿意，那对我来说意义有多么重大，你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在去北极的征途上，我经常带上富人的儿子。他们以为只要跟着库克医生扬帆去趟北极，自己就步入了成人的行列。与此同时，我按照他们掏钱的老子们的意思，满足他们的每一个要求，确保让他们吃苦吃得恰到好处，好让他们确信自己真的是在“冒险”。跟我同行北上哈佛和耶鲁许多学生的毕业礼物。

我提这些年轻人，只是想减少你的顾虑，认为自己缺少北极旅行的经验。我特别擅长带年轻人去北极，再把他们毫发无损地带回来。对于北极，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总是有第一次的。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鉴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遭遇，鉴于我在其中所扮演的不管是多么无意的角色，我这样发出邀请在你看来一定很奇怪吧。



我得坦白,发出这样的邀请不仅仅是为了补偿我对你的欠缺,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作为父子俩,可以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同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要求是多么的冒昧,因为我要求你答应跟一个人去干这样一件事,而这个人的手你还没握过,他活生生的脸你还没见过,他还不允许你给他写信。

假如你要参加我的远征,我会把你作为我的门生。假如在某种情况下摆明了我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你,我的儿子,如果那时你觉得你已准备就绪,就继续我的求索吧。

最近,南极远征之后,我感到特别的压抑,用爱斯基摩人的话叫“piblocto”,人世的重负朝我压来。独自承担起这个重负,连今后获得援救的希望也没有,这个压力如今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在南极等待解救的那段漫长时日里,尽管我知道解救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我经常想起你,自我安慰地想:即使我死了,但我会留下一个儿子,他自己也会生儿育女。我想起我的第一个妻子利比,还有我们没有取名的女婴,想起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我说那个全世界都以为是他儿子的男孩其实是我的儿子,我好像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又失而复得了。

即使罗伯特·皮尔里有几个年龄够大足以加入远征的儿子,他也不懂接收门生的意义。唯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的成就。不过,好像我也身陷其中。惟有你能把我从实现抱负的孤独中解脱出来。放弃这一抱负我也依然无法解脱,但我能放弃吗?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受上天的召唤承担这一使命的,就像教士和牧师接受召唤从事他们的神圣职业一样。正如在介绍弗朗西斯·斯特德时我曾写到的,我相信自己的辛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效力人类。

你或许觉得愿意立誓跟我的年轻人有的是——不像你,那些20来岁的人年龄够了,可以跟我一起远征了;我可以指导他们,而不是等你长大成人,这样会增加我或者我指导的人摘取殊荣的可能性。可他们中谁也不是我的儿子。

你只有18岁。或许你还太小,不懂“是”与“不”的涵义,不懂它们对于你自己和我的涵义。现在强求你做出一个许多年之后你也许会后悔,但由于已经应允却要坚守的承诺,这样做不公

平。

你可以说“不”，你可以认为这样做是未来几年里我在北极可能遭遇的某种灾祸的起因，要不是因为老缠在我心中的疑问，那场灾祸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让我明白我向你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请求。首先，你不应当有任何负罪的感觉，不能因为害怕要是你拒绝我就会出什么事而接受我的邀请。我描述了自己的境况，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我的本性，而不是逼着你做出让我最高兴的回答。

我敢肯定，你叔母和叔父是不愿让你去探险的，理由很明显。除了我，在我见过的人当中谁也体会不到你可能会给他们带去的悲伤。

一个人要么在他的心灵中渴望我过的那种生活，要么没有那种向往。我希望你有。倘若你有，倘若如我所想，在你的血液中也像在我的血液中一样必定流淌着对极地的向往，那么，你所面对的有关危险的描述无论怎么长篇累牍，都不会把你给吓退。倘若我错了，你没有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长篇累牍同样也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你还小，因此，唯一我不能接受的答案，至少现在不能接受的答案是“是”。你可以对我说“不”，或者你可以对我说“也许”，但你不可以对我说“是”。（把你的回答写在信封上，留给你的叔父，就像你写在我以前给你的其他信上一样。）如果你的回答是“也许”，那么我们把这事留到你长大成人，能完全理解说“是”或“不”的可能含义之后再说。如果你的回答是“不”，我会理解的，而且不会再费力劝你。不过，我会继续给你写信。

在你长大成人能够远征北极的时候，假如我仍未抵达极点，我会带上你，把我知道的一切全教给你，那些东西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活在世间的人所能教给你的。

如果到某个时候我被迫放弃探险，假如你代替我抵达了极点，我不会感到惋惜。

如果在我的帮助下你率先抵达极点，我将确保不让任何不应得奖的人获得这一殊荣。

1900年4月19日

他为什么不让我回答“是”？但愿我能在信封上写下大大的一个“是”。假如我写了“是”，他会怎么着？他会不会感到高兴，会不会认为我太草率，不能指望我谨慎行事？我写了“也许”两个字，比以前更强烈地希望我能直接写信给他，告诉他不论何时他说出那句话，不论是下周还是下月，我都会遵照他的指示，任何指示。

想到探险，我并不畏惧。相反，我畏惧的是除非去探险，我将过的那种生活，爱德华叔父过的那种生活。成为一个在跟像达夫妮这样的女人的婚姻中毫无乐趣的男人，这才是我所畏惧的。

探险对我来说仿佛充满了诱惑，尽管有那些危险和孤独，尽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先例。他的一生的确有教训可学。那天夜里他走出帐篷，走进冰川，并不是因为北极生活的苛严所致。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无法放弃对生活的苛严。同样，在我母亲的生与死中也有东西，即便不是可学的教训，但至少也是应当记住的：丈夫从事探险并非她的死因。

对于库克医生和其他所有描写探险历程的人来说，没有谁能想象出比探险者的生活更显赫的生活了。我坚信，探险中的那些艰难困苦和风险危机都不能阻挡我。我宁肯在“比尔及亚号”上与他一起被困13个月，也不愿呆在家里，为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人的安危而烦躁不安。

虽然迄今为止在我人生经历中还没有极地探险的丝毫准备，虽然我未曾上过船，开过枪，或在户外睡过，但这无关紧要。虽然我从未见过狗拉雪橇，更不用说狗群了，但这也没有关系。探险家依靠他们的队员、他们的船长、他们的仆役、他们的向导来完成保证他们安全的艰巨重任，这样他们就能去争荣夺誉了。

尽管我身体的一半来自于库克医生，但我的教养与他是多么的不同！像大多数探险家一样，他是个城里人，从事探险相对较晚。就像他过去跟着像皮尔里这样的人学过一样，我也可以跟着他学。“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他智慧、熟虑，像城里人对生活抱着怀疑却同情的观点，期望有所成就，真正值得实现的成就，期望因此而被人缅怀，因此而出人头地，我敢肯定，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在他开始探险之后获得的，或磨练而成的。他在一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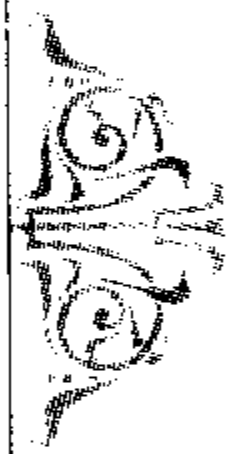
物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无论是谁最先到达极点，他都会以全人类的名义做到这一点，在全球激发起精神、钦佩、敬畏和友情。”我当时读的时候就相信这话，不过现在更加坚信无疑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一读到这句话，我仿佛立刻觉得自己整个一生等待、期盼的正是这份邀请。如像库克医生呆在被困船上苦等解救，却不知何时或能否获得解救那样，我也一直在苦等。我相信自己跟任何人一样，有理由怀疑文明，但同时又不愿彻底地放弃它。

文明，除非成为一名探险者，或者除非像我母亲那样，谁也无法摆脱它。探险无疑是摆脱它的唯一途径，既不必撒手人寰，也无须遁世隐居。有人只是一走了之，在为一个接一个上司的服役中消耗生命，无所成就。

他没有对我谈起我俩将如何合作，将如何告诉别人我俩怎么成了合伙，将如何向公众解释他为何要把他所认识的许多年轻人孜孜以求的荣誉给予我。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谈到何时来接我，没有谈到在从未见过我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我已“长大了，强壮了”，可以探险了。像困在浮冰当中的“比尔及亚号”一样，我依旧飘浮不定，依旧等着解救，虽然现在看来获救是必定无疑的了，但好像还要等6个月或一年后才能如愿以偿。



第 11 章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库克医生提到弗朗西斯·斯特德曾告诉过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喜欢在春天爬上信号山去“看冰”。我不知道除了那山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看冰，但自从小时候跟达夫妮叔母一起去过之后，我就再没去过那山，因为我不想让它使我回想起母亲的命运。

那是从拉布拉多往南漂来的浮冰，夹带着与海平面齐高的格陵兰冰河漂出的流冰。春天，浮冰经过纽芬兰的东海岸往南漂去，像秋天树叶变色那样很有规律。

以前，我见过那些浮冰，是站在城市北面一处高地上掠过峡口隐隐约约看见的，是在港湾里面看见的。被风暴吹着经过峡口，进入港湾的浮冰，在煤灰和舱底污水中漂浮了数周之后变得污秽不堪。我想，这些冰，这些几乎是黑色的大块漂浮物，难道就是人们在谈论浮冰时所指的东西？

得知弗朗西斯·斯特德常去看冰的地点之后，我一连几周遥望天际，等待着海天一线之处的一丝变化，心想浮冰会来的。终于，一天早晨，我透过楼梯平台的窗户看到了浮冰，看到了一排参差不齐，凸凹不平，酷似锯齿的东西。离我最近的“锯齿”也有 50 或 60 英里远。

又过了两周，在一个周日下午，我跟步行的和坐车的人们一起，沿着那条路登上那座山，任何只要以为那浮冰“值得吊着下巴呆望”的人，爱德华叔父都称作朝圣者。

当浮冰漂得很近时，来往船只少了。这天，信号杆上没有旗帜飘扬。从工棚烟囱里冒出一缕烟被风几乎吹成了横向。

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冰时，即使身边有人，我也无话可说。以前，看见大海，我从没意识到这世界上还有“异乡”，也没在我心里激起流离的欲望，像那浮冰一样。海洋消失了，那浮冰仿佛一路延伸，直到英格兰。浮冰、混杂着雪的浮冰、成排成排的浮冰，全都拥挤在一起，碰撞在一起。从那天起直到初夏，我经常去那山上，唯有冰山位置的变化显示出它的底下有水，要过

几天或几周才能看得出它在往南漂移。

这浮冰完全不同于近海的冰,即所谓的“新冰”,洁净、脆薄、平坦,几乎透明。这陈年顽冰看上去多历年月,一块块冰堆凹凹凸凸,达数英尺之厚,仿佛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灾难之后漂来的一大片残骸。很难相信,导致我眼前这一切的是春天的到来,是空气和海水的变暖,是白昼的延长。

岸上,雪早已融化,青草翠绿,树枝上挤满了蓓蕾和大小一般的叶片,可紧挨海岸的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冬天突如其来,这里的一切如此惨白,在晴朗的日子里,那浮冰光芒闪耀,像第二个太阳。在这片冰的天地里,很难区分不同冰块的形状。就连那一座座冰山也很难辨认,除了那些远离陆地,像云朵一样突现在天际的冰山。一座巨大的冰山从冰堆上昂起头颅,雄伟、突兀,它的底部肯定从海床上犁过,像在雪地里一样。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冬天,而是冬天的原始。铸就这浮冰的雪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远古的,如顽石一般久远,仿佛整个格陵兰四分五裂了。很难相信这整个景象第二年会再次出现,很难相信这浮冰漂来的地方是否还有冰块残留。

我经常爬上那座山去看那浮冰。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即将与库克医生一起共同经历的一种全新生活的边缘。我想象自己在山下的浮冰上,与库克医生肩并肩站在由一队狗拉的雪橇滑板上。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作为一名探险者更伟大的了,那是我深信不疑的信念: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他的过去决定的。

可不久,谣言便传开了,说我沉湎于对母亲的某种追忆之中,因为她的遗体就是在我正观看的这样的浮冰边找到的,就在几百英尺的山脚下。我听见人们在说,我是在痴心地为她和父亲守望。

我父母的古怪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在别人的眼里,他们的儿子也继承了这种古怪,或许还会因为这古怪会遭遇他们一样的命运。

一天,站在我身旁的一个男子对另一个人说:“就在他现在站的那地方,人们发现了她的马和车。”他似乎以为没有对我说话,我就听不见他的话。“她就是在那儿下去的。他每天都站在那儿,只是呆望。”两个人好像以为我不在意别人的审视,以为只要仔细审视我的脸,就可能解开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谜团。

一天晚上我下楼时,突然听见叔母和叔父在交谈。我在客厅外面停下



脚步,以为他们听见我来了,达夫妮会马上问我需要什么。可他们依旧在谈。

“人家在说,他在学他的父母。”爱德华说。

“唉,好多年来大家都这么说。”达夫妮回答。

“每天下午他都去那山上,在那儿站几个小时看冰。别的人每年去那儿一次。可他,每天去。不管有多冷,不管风吹得多猛,他都在那儿望着那冰,像尊雕像。人家说他迷了心窍。就站在他母亲……下去的地方。人家说他曾对人讲,他父亲并没有真正死,终有一天,那冰会把他平安带回家,他会从那儿踏上陆地,一切都跟他离去时一样完好如初。”

“谁这么说,谁就是捏造。”达夫妮回答,“他从不对任何人讲他父母,甚至对我也不讲。他现在比过去想得更多,这非常正常。不久就会过去的。现在,他只是真的开始懂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弄懂他们的事。”

听到她声音中饱含着如此多的同情和理解,我不知有多么内疚。我不知道爱德华会有什么感觉,他装作对自己知道的事一无所知,无法告诉达夫妮她的同情和理解给错了对象,我是不配得到它们的。而且他知道,是库克医生的那些信使我开始上那山去守望的。他不知道那些信里都写了些什么,这个不知道却让他颇费心思。既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他因此没法预见我可能做什么,库克医生可能做什么。

他的着迷不亚于我的痴心。不过,他忍不住要给达夫妮讲那些传言,即使冒着她会更加关注我的风险,而且我相信她会。

一天夜里上床之后,我注意到月亮很圆,可看见峡口之间那浮冰放出的微弱光芒。我想起了那张“比尔及亚号”的照片,月光下的那艘船被罩上一圈光环,因为严霜而发白。库克医生在信中经常提到北极无尽的夜晚。迄今,我只在白天见过那浮冰,在北极,那只是半年的景象。我得看看它在另一半时间里的景象,这一半夺走了更多远征队员的性命,尤其是他们的意志。我走到藏信的地方,找寻库克医生的那封信,信中描写了他所形容的“无尽的黑夜”。

他写道:“试想,太阳下去了,虽然你知道在此后的90天里,它再也不会升起,但你仍禁不住希望每天‘清晨’会如期来临。”他把“清晨”加上引号使我毛骨悚然。三个月没有清晨。三个月里清晨不曾存在,除了在你的怀表上和你的心里。库克医生写道:“时感混乱并不罕见。有那么几天会看



到黄道光^①，日落和日出时沿天际展开的那顶蓝色花冠。此后，至于光，你最多能看到我所说的月照。要是碰巧没有月亮，只剩下微弱的星光。要是遇上阴天，甚至连……”

信中的另一段写道：“在你夜半三更听见冰的响声之前，你没真正听到过冰是什么声音。由于没有膨胀的空间，但又必须膨胀，因此整个冰层开始抖动。我发誓，我曾听见的那声响是流浪者疲惫的脚步声，是木轮缓慢的滚动声，是马蹄发出的啾啾声。在冰雪中，我读过《战争与和平》^②，因此，‘似乎听到’法国人在莫斯科城下战败后穿过俄罗斯辽阔冻原往西逃跑的沉重步履。夜晚，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

我意识到，要想目睹、聆听他在信中描写的这些，我毋须再等待。

第二天礼拜五，晚上，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为1892年那场大火烧毁的部分城区的重建工作筹集款项。他们告诉我说要很晚才回家。

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信号山上是不会有人的。而且我能很容易地在叔母和叔父回来之前返回。我望着窗外，等着他们离去，心中祈祷眼下晴朗的天不要变脸。

他们离去后，我一直等到黄昏。在北方，夏季有两个时间的光线最暗：午前太阳和夜半太阳^③最低的时候。

在食品贮藏室的橱架底层有两盏多年没用的提灯，弗朗西斯·斯特德天黑出诊时曾把它们挂在他的马车上。我给其中的一盏灯灌满海豹油，这是最后一点海豹油，是达夫妮装在金属罐里，放在屋背后的那间棚子里以防万一的。天刚黑，我飞快地绕过城市街道，借着提灯的光亮，循着那条窄路上了信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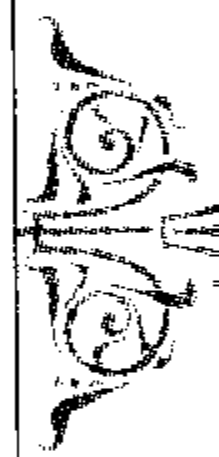
天空无云，月亮快满。吹了一整天的西风如今只剩下一丝微风。

我站在山上，俯视那片白里透蓝的浮冰。那是一个整体都用相同物质构成的世界。我努力去想象木头的世界，岩石的世界，盐的世界，煤的世界。最接近的沙漠的世界，可沙漠却没有这无穷无尽，变幻多端的形状。像一座建设早期的城市，或像那些分崩离析的古城。

① 太阳光在黄道面上被大气微粒反射引起的黯淡模糊的锥形光柱，常在日落时的西方或日出时的东方看到。

② 俄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长篇小说。

③ 在南极和北极地区，夏季午夜可以看见的太阳。



那是个怪诞却美丽的景象。在那“无尽的夜晚”当中，它是否依然这样？对一个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精神遭受折磨的人来说，作为一名远征小队的成员，四面八方目光能及的地方一无所有而全是这般景象，那也许是无法忍受的。作为或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不是冰造的事物，我禁不住想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在他的最后时刻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冰上徘徊，茫然、迷乱，陷入恐慌，对于人来说，在黑暗和荒野中迷失就意味着末日来临。他从红石屋的地铺上站起身，走出门，向冰川走去，没有弄醒任何人，包括库克医生，躺在睡袋里的其他同事，睡在布帘背后房间里的皮尔里夫妇，还有爱斯基摩人，他们的圆顶冰屋连成一排，你从红石屋也能看到。

我告诉自己，不应当再去想弗朗西斯·斯特德了，应当想库克医生和所有其他人，想皮尔里太太，他们没有从红石屋出走。

我背朝峡口对面阿默斯特堡和斯皮尔海角上的灯塔，仔细聆听。我听见长长的一阵咯吱声，接着是突然折断的劈啪声，仿佛是一棵树被慢慢地弯曲，直到折断。一阵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从海岸深处某个地方传来，像是在形成断层，好像是一面厚重的冰层被砸成碎片，然后无数的冰块像小型炸弹从天而降，散落在地上。好像到处都是炸裂声，应当还有火光伴随，但却没有。只有冰，那片奇形怪状，白里透蓝的冰，月照下的冰。灯塔上的灯光阵阵闪烁，那浮冰立刻被照得透亮，像是在拍照。

“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我怀疑，对于这些幻听，还有哪个听者比我更敏感？我仿佛听到白天藏匿于冰洞和冰窟的大群动物眼下正四处游荡，重新搬弄着东西好让自己舒适些，或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迫不得已地守着冰，被一种它们无法抗拒的本能所驱使。

我举起提灯来回摇晃，像是在摇香炉，像是人们在暴风雨的夜晚给海上的船只发信号。

我想起库克医生信中更多的话：“城里人把极地夜晚想象得很悲惨，但那持续的黑暗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人走进屋子迎面扑来的一股暖气让人愉悦。从船外看船里的灯光。从圆顶冰屋外看屋里的灯光，那光使这冰的穹隆变得透明、乳白。冰海上月光如银，繁星晶亮。这景象有一种毫不遮掩的野性，这风暴有一股疯狂，这夜晚的死寂有一种尽管压抑但令人钦佩的庄严。生活在阳光和鲜花之地的人们是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描写这些极地夜景的。在极地的夜晚，人处在一个动物本能至上的世界里，人类胆怯的本性已被遗忘。”

开始下雪了，但依然能看见月亮，我以为那是海上的阵雪。山下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那些冰窟里的动物看到劳作即将结束，正在合力做最后的努力。四面八方传来了迸发和坍塌的声音，吱嘎作响，好像无数根冰梁正在被抬起，或者因为头重脚轻突然断裂，稀里哗啦地碰到地上，发出新的声响。

我挥舞着提灯，把它甩得更高，弧度更大。

提灯的绳索从我手中滑落，灯掉到山下，里面的灯火依旧燃着，直到砸在山下的岩石坡上。我听见玻璃砸破了，看见火苗一闪，顷刻，一块岩石被照亮，接着又黑了，又静了下来，只有冰低沉的劈啪声。

我抬起头，看不到月亮。此时的雪下得很大，因为无风，雪片直直地落下。同样，我也看不见雪，可扬起的脸上能感觉到。我什么也看不见，不管是城市的灯火，还是半山坡上的那两家隔离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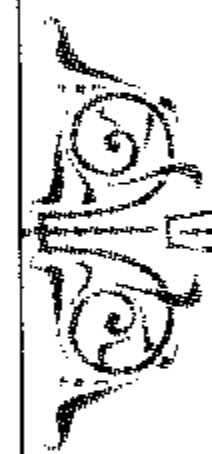
没有提灯，我不可能找到返回的路。如果往左多走些路，我会一脚踏空摔下那座悬崖，如果往右，我会最终走进森林，或踩进什么池塘，上面的结冰所剩不多，承受不起我的体重。即使我万幸摸到了来的那条路，可山坡陡峭、岩石嶙峋，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掉下路的两边都是要命的。

我尽其所能大呼“救命”，心想那座名叫巴特雷的渔村里或许有人能听见我的呼救。那村庄坐落在山背风的西面。无人应答。

天已经很冷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冷，这么冷的天，没有遮蔽是无法过夜的。我想起升信号旗的那间圆木小屋。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右边的什么地方。

我记得圆木小屋周围有一段矮栅栏，一直延伸到山脊。我手脚着地，用左手摸索着顺着山脊往前爬。几分钟之后，我的右肩碰到栅栏，沿着栅栏摸到门口，推开门，然后才站起身。我知道自己就到了圆木小屋的跟前，可我依旧看不见它。我抬起双臂，慢慢地往前走，直到双手触到像门一样的东西。

我用从地上撬松的石块砸开门锁，然后走进屋里。黑暗中，我在屋里摸索着，找到一个依然暖和的柴火炉，旁边有一小堆引火柴，但没有真正的柴火。我往炉子里扔了些引火柴，不一会儿火光亮了，能看见四周了。在最近的那堵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几盏提灯、几根蜡烛和一盒火柴。我思量着是不是点燃一盏提灯试着下山，可想了想觉得不行。我点燃一根蜡烛。炉子里的火烧不了多久的。屋子里有一把长沙发，一张铺位，照管这



屋子的人休息时肯定在这上面小睡。我坐在铺位上,背靠着墙。屋子中央有一把楼梯通向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我猜想人们就是从那儿爬上去升信号旗的。屋对面的墙上有一些隙缝模样的窗户,人们肯定是从那儿扫视大海,发现船只的。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完,只是暂时被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会等待多久,确信自己的等待肯定不会徒劳。在我跟库克医生首次北上的征途中,这样的困境何以能与每日遭遇的困境相比?我自豪地想,当提灯从我手中掉下去时,我没有惊慌。希望有一天我能把这次自救的壮举讲给库克医生听。

明天该向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做何解释,那是我该担心的。可除了说真话,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

我把身子往下挪,头碰到了枕头。天很冷,于是我蜷缩在毯子下面。达夫妮回家看见我不见了,她会怎么想,会做什么?

我睡着了,没有做梦。奇怪,我并没因身子酸疼而醒来,比在家里还醒得晚。醒来时,炉子里的火熄了。但面朝大海的那堵墙上的窗户有光,不是拂晓的微明,而是清早的晨光。

我站起身,往窗外望去。天色阴暗。那片浮冰像一条山脉的山麓小丘,无遮无掩地矗立在天边。从地上的新雪可判断雪刚停不久。

我刚转过身,圆木小屋的门便被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胡须很长、穿着工作外套的男人看着我,然后又看了看没有整理的床铺。

“你就是他们正在找的人。”他说,“斯特德家那娃,想出走,是不是?”我摇摇头,给他讲了丢提灯的事。

“可你当初干吗来这儿?”

我差点说,来看冰,来听冰。可我想了想没说。我耸耸肩,他也耸耸肩。

“看来我得把你送回家。”他说。

他送了,在圣约翰斯城里绕了一大圈,大概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他找到了我,找到了“斯特德家那娃”,这样,身边站着我这么个活证据,他就可以更加真实可信地向更多的人讲述他的故事了。

我坐在他的四轮马车上。我可以跳下车跑掉,但我知道会被追上,那只能让我的名气变得更大。

“跟你坐一起的是谁,查理?”一个老妇人问。

“斯特德家那娃。在山上的圆木小屋找到的。在那儿呆了整整一夜。

真的。”

“在圆木小屋？他整整一夜在圆木小屋里干吗？”

“不肯说。”查理回答。

“他没事吧？”

“好像没事。跟平常一样。”

“你呀，真不该。”

“你没事吧，德夫林？”一个像爱德华叔父一样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问道，他叫出我的名字，好像认识我，可我却不认识他。大概他是听说了找我的事。我点点头。

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凑到我们旁边。

“是他吗？”他问。

“是他。”查理回答。

“我先去斯特德医生家。”骑马的人说完，飞快地走了。

接着，我在哪儿被找到，我失踪整整一夜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在圆木小屋里。整整一夜。天黑后上的山。”一个女的传给另一个女的，仿佛谨言慎行用在我身上是个浪费。

“斯特德，整个晚上你在圆木小屋里干嘛了？”一个跟我一同上学的男孩问我。我没理他。

“这就是德夫林·斯特德。”一个小孩子说道，好像他以前听说我多少次了，可从未见过一样。

在我住的那个街区，每家每户的门全打开了。人们站在门外，双臂合抱，在交谈，在摇头，在说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人”。他们已经知道我被找到了，因此看见我时便停止了交谈，看着我，仿佛我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抓捕的。

在前门的两边，灯依然亮着。毫无疑问是一夜未熄。

我推开门。

“是德夫林吗？”

是爱德华叔父。

我一声没吭，也许这个原因，他没有出来见我。我拐过门廊，看见他正坐在一把安乐椅里，面朝着门，脸被壁炉里的余火映照得只能依稀可见。他叫我名字时我尽管没应答，但我觉得好像已经把什么事都给招了。

“你去哪儿了？”他问。



“上山了。”我回答。

“我大半个夜晚都坐在马车上，满城找你。每次没找着你回来，你叔母又把我撵出去。”

“抱歉。”我说。

“上山去了？”

“是的。”

“太阳出来后很多人都去找你了。达夫妮也去了。她叫我守在这里，万一你回来。她说坐在这儿干等，她再也受不住了。还不晓得她知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了。”

“我在圆木小屋里。”我又把给查理解释过的提灯的事和砸小屋门锁的事说给他听。

“‘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人们都这么说。全城的人都这么说。‘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当然，尽管人家从不当着我和你叔母的面说，但大家的意思不只是说你走迷了路。‘斯特德家那娃’，这称呼听起来好像你是个怪物，让所有姓斯特德的人都成了怪物。要是有人在海里找到你，没人会觉得奇怪的。我也一样。整个晚上，达夫妮都在说你可能跟哪个女孩在一起，要么就是喝醉了。我想告诉她，这些是正常男孩失踪的理由。可我假装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不过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在圆木小屋呆一整夜然后被带回家；周六早晨7点半坐上马车被送回家；从信号山上被人送回家，你妈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人从那儿抬回来的。左邻右舍肯定在这样想。”

“不要提我母亲。”我说。

要把他吓得不敢作声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消问问他为何如此害怕库克医生，或把那些信的内容告诉他。

“你为什么去那儿？”他问。

“去看冰。”我说，“去听冰。”

“天黑了去看冰？去听冰？去听冰？”他说，“你妈25岁后才开始做这些事的！”

“告诉你不要提我母亲。”

“声音小点。”

“你干吗帮我和库克医生？”我问。

“我谁也没帮。”他说，“上楼去，要是跟你吵起来，上帝知道达夫妮回来时我会说些什么。”

达夫妮叔母回到家，听爱德华说我回来了，赶紧跑上楼，冲进我的房间，我正躺在床上。她跪在我床前，又是哭，又是吻，又是搂抱我。

“啊，德夫，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去了哪儿，宝贝？没事吧？整整一个晚上你去了哪儿？我担心死了。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她说。

我告诉她圆木小屋的事，告诉她我去山上听冰的声音。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似乎只有发了高烧才能解释这样的事。

“你该不是在想……你该不是在想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吧？”她说。

我不敢相信她居然说了这话。我翻过身，不让她看见我是怎样在克制住自己不哭。

“我就是我，记得吗？”我说，“记得你说过的话吗？我就是德夫林。我不是我父母的结果。你要是不信，干吗对我讲这话？干吗假装呢？你是不是以为，要是我知道自己不正常，我会感觉更糟？”

“可你为什么去那儿，德夫，晚上独自一人去？要是你告诉我你想去，我会陪你去的。”

“怕我伤害自己？”

“怕你独自一人。当然，也是怕你万一出事好帮你。”

“你没问过我是不是想过会出事。伤害自己，这可是你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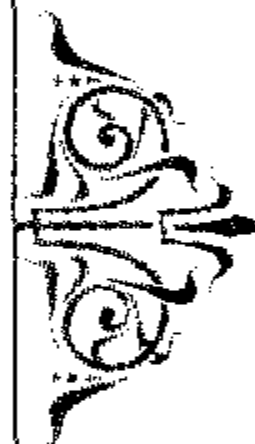
“那么，要是我整夜不归，你会怎么想？”

“我会担忧的。会找你，但不管其他人对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父母为何人人皆知，我都不会想你想过的那种事。”

此前，在我躺在床上等她回来时，我在想她会接受我的解释的。我会说自己上山是为了听冰的声音，看月光下的浮冰，不巧丢了提灯，被迫在圆木小屋里躲避。她，也只有她，会觉得这事没什么不吉利的，不像那些把我的一言一行当成恶兆的人。

“当初我真不该带你去那儿。”她说，“当时你还小。记得吗，我说：‘你该看看海了’，于是我们去了那儿，谈起了你母亲。你告诉我说你母亲的马整个晚上都站在那儿等她，到早晨还站在那儿等，直到人们发现它。可这个春天以前，你再没去过那山。”

她在责备自己。她肯定觉得我有问题，否则她没什么好自责的。她这种感觉产生多长时间了？她坚持了多久才终于承认爱德华这种人所说的话是真的，承认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



“德夫，我真为你担忧。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想。你想想，我回到家发现屋子里没人。你想想，我是怎么度过那几个小时的，想到外面这么冷，会把你冻死的。我尽量在想你可能去的地方。你不会相信我都希望了些什么。我希望你在跟妓女过夜。我希望你喝醉了酒，在哪个屋子里睡着了。要是我不相信，一开始我就不会把你单独留在家里。你得承认，你做的事是很危险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对信号山如此感兴趣，对此她一无所知，但即便这样，我的这个危险举动也不至于使她产生那种想法，使她问出那样的问题。要是别的男孩，别的年轻人做了同样的事，她还会这样问吗？

“别担心，”我说，“我不会再去那儿了。我会远离危险。我会忍住伤害我自己的冲动，不做我父母做出的事。”

“德夫林，我爱你。”她说，“我非常爱你。你信吗？以前我从没告诉过你。我早该告诉你。”

我知道她爱我。我知道自己曾经、刚才、昨晚、以及过去常常对她不好。但我也知道她不再相信我了，已经有好一阵子她不真正相信我了。她已经在想：这场危险过后、这次莽撞过后、夜深人静爬上信号山过后，接下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她外出时会再次留我一人在家，但只是为了让我相信她是信任我的，可与此同时，她会一直担心等她回来我是否还在。她已经预见到自己会终身保护我不受外人的伤害、不受我自己的伤害，没有怨愤，也没有期待任何回报。

我最后一次上了那座山，是在下午，没有理睬另外那些浮冰的朝拜者，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仿佛我就要一头栽下那座山，跳进水里。

几周前，我注意到北边的天际又变直了，不再参差不齐。浮冰的终端快出现了。在海岸对面我看不见的地方是开阔的水域。那是浮冰的终点，浮冰的后缘。我想看看那冰，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站在山顶，从我这个有利的位置望去，浮冰的边缘很平整。我站在四个世界的交汇之处：陆地、坚冰、大海和天空，各自的界限绝对分明。

大海的一半是坚冰，一半是辽阔的海水。在海天交汇的那条连绵不绝的地平线上，海水突然消失了，坚冰出现了。

第 12 章

“我要去纽约见库克医生。”我说。

我俩在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如同在那些收信的好日子里一样，爱德华叔父告诉他的护士，说他要在那儿吃午饭。我叫他在那儿见我。那是8月初。我在报纸上读到库克医生没能准备好远征，只得在布鲁克林住一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会在第二年做一次探险北极的尝试。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将和他一道向北极进发。

我告诉爱德华，我去找库克医生，但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没告诉他我要去。我打算不打招呼就这么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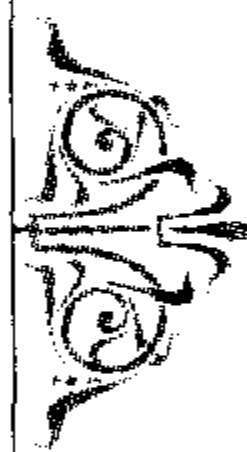
该走的时候到了，到发出这些书信的地方去，不再梦中虚构了，让它成为真实，实际上就是抛开这个无论哪个方面我早已抛开了的世界。

“你不必对他提寄信的事。”我说，“等我到那儿后，他自然不会再寄了。要是我走后有信寄来，你可以转寄给我。”

“我的天！”他叫道，眼睛看着门。他意识到，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能跟我吵。当库克医生第一次写信给他时，当他第一次把我叫到诊室时，他肯定早就预见到，我俩之间的这种“安排”不会仅仅是接二连三没完没了地收信，必定会有别的后果。他肯定有这个预见。他几乎恐惧地预见到会出现如今他所面对的这种结局，但由于不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他没法准备。我看得出他吓坏了。

他已经竭尽所能想阻止因为库克医生的异想天开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最想的，他一直以来最希望的莫过于让那些信件不要再来，莫过于终止我们之间的这种“安排”。但如今当这种安排好像要结束了，他又吓坏了。

害怕什么？如今我不能问他，不能让他对我产生敌对情绪，因为我即将离去，而就我所知，纯粹出于恶意，他有可能会阻止的。我敢肯定，他不知道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我不清楚他何以能够忍着不读那些信件，同样，我也不清楚他为何一开始就答应了库克医生的要求。我所能想到的理由依然是讹诈。难道库克医生知道了什么让爱德华害怕的事情？



“我要和你做个交易。”他说，在“交易”二字上顿了顿，我等着他接着说。“如果你不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我就不把你的打算告诉那个给你写信的人。同意不？你可以突然去找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不要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

“你不会告诉他我要去找他？”我问。

“什么也不会说。”

一旦我在纽约找到住处后，爱德华叔父愿意按照我给的地址把他后来收到的信转寄给我吗？

“我得考虑考虑。”他说，“我的意思是考虑最佳的办法，对我们两人来说最安全的办法。记住，不要对达夫妮提一个字。”

把我的决定不假思索地告诉爱德华是对的。一想到跟库克医生的这种有来无回的通信还要拖泥带水继续许多年，我就没法忍受。既然已经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门生，那不跟他住在同一城市又有何意义？

我一直担心，尽管他发出了邀请，但他可能满足于永远这样继续给我写信。可我不满足。如果以后的信件不再有更精彩的东西，我会厌倦它们的。如果由着他，那我到了30岁可能还在收他的来信。

想想好像也很奇怪，我怎么等了这么久才去见他？我想，不管他如何担心我的年龄，他或许会让我跟着他，在他下一次的远征中至少跟一程。我发过誓，终有一天要在极地探险中做他的门生。这一天为何不能早些到来？6月我就从学校毕业了，快要20岁了。

等我到了纽约，我就去找他，等他独自一人时，给他来个意外造访。在尽快说明我的身份后，我会明确地告诉他，我来纽约的目的不是公开他是我父亲的秘密，也不是让他在公众面前有任何难堪。

我想让他大吃一惊，就像他的第一封信让我大吃一惊一样。

我不想把所有这一切考虑得太清楚，害怕遇上障碍使我失去勇气。我只是想离开，去纽约，去布鲁克林，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他就在那儿居住，去把我自己介绍给他。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跟库克医生一样，我也在竞跑——如果他抵达北极，或者皮尔里或其他人在他之前抵达北极，我也许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除了以最不经意的形式，他，或者我们，如何设想一个相互交往，结伴而行的理由呢？在社交圈子里，我们是没机会的。只有在外面，在远离它的地方——只有作为探险同伴——我俩才能具有类似父子的那种关系。



我再一次跟着爱德华走进父亲的诊室，此时此刻使我想起第一次去那儿见他的情景。他示意我坐下，十指相扣做成一个笼子的形状，透过笼子看着我。

很显然，自从我俩上次会面后，他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有时间思考，谋划了。我祈祷但愿他没有找到毁约的办法。

“去纽约？”他说。

纽约。对于我母亲，对于弗朗西斯·斯特德，它是灾难，希望破灭，青春终止的同义词。

“我读了很多介绍。”我说，“去那儿的人都说它很快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它已经是了。”

他笑了。

“你父亲在那封信中是怎么说来着？‘布鲁克林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我点点头，不过，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的是“纽约”，不是“布鲁克林”。

“你是不是以为，你父亲离开家，离开你和你母亲，是为了效力什么事业而做出的什么巨大的牺牲？”

我想起库克医生发表在《世纪》上那些文章中的一句献词：“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这话听起来好像他也读过那些文章。

“是不是为了某些他原本不愿做，但为了更大的益处不得不做的事？什么更大的益处？”

“我不知道。”我说。

他笑了。突然，他“啪”的一声把手掌放在桌面上，把我吓了一跳。

“至于你提的第一个要求，我不会把你也要去的消息告诉你的通信人。至于你的第二个要求，我将销毁你走之后寄来的所有信件，因为我和那个通信人都不想让你拥有信的原件。”

我耸耸肩。

“你是在没有父亲引导的情况下长大的，甚至连长者也没有——我本来很愿意担当起后者的责任，但一开始你就明确表示，你不想让我这样。”

他停了停，话似乎说完了。我想告诉他，我真正的父亲早就给我写了好几年的信了。他旋转着椅子，几乎面朝窗户。

“你可曾处在我的位置上想过？一个成年人为他的侄儿暗中跑腿。我



觉得自己像个送信的伙计，给老板送信，自己还不准看。”

“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看。”我说。

“想想看，每天早上我都要在诊室里翻弄邮件找信，找那个大小颜色对得上的信封，然后藏在抽屉里，傻乎乎地佩上那张红手帕，爬到楼上你父亲的诊室，把信放进抽屉里，坐在那把椅子上，等你到来，在外面把门，让你读那些宝贵的书信，然后把信烧掉。”

的确，我没有设身处地想过这些。

“你不得告诉任何人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鼓起勇气向你提出这事。作为你和那个通信人的中间人，我冒的风险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我注意到那些信件寄到后不久你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无法欣赏那种对冒险的渴望，然而我相信，沉湎其中乃至把它作为主要职业是不负责任的。不过，你毕竟是你父亲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做你想做的事，不会考虑对他人有什么影响。”

我的脸羞愧得发烧。他说对了。

“我想，你去纽约，不仅仅是去看那个通信人，而是有朝一日加入他的远征。我还在想，他要是带上你就够蠢的了。要是达夫妮知道你的打算，她再也不会会有片刻的宁静。你知不知道她想让你去学法律，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圣约翰斯了。她已经在打听了。”

这事她一点都没告诉我。她已经开始着手保护我免受自己的伤害了。

“你想没想过如何离开，如何不让达夫妮知道？”他问。

我摇摇头。我没去想这些，没去想会对她有何影响。

“你知道，她是不会让你单独一人去纽约的。她会试图说服你放弃，如果不行，她会坚持跟你同去。只要可能，她绝不会让你离开她的视线。”

我去纽约见库克医生，达夫妮在我身边或随后就到，那怎么行？这会让他非常恼火，再也不会跟我继续来往了。

爱德华隔着桌子朝我俯过身来。

“对她，对你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干脆消失掉，”他说，几乎是耳语，“什么也不告诉她。留张纸条，但不要告诉她你去了哪儿，为何离开。”

说到底，这样做是为他，不过他不会明说的。

“她最终会知道我去了哪儿。”我说，“而且为什么离开。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登在报上。”我已经在构想了。我的一幅照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在纽约的报纸上。“在这群探险者中，有一位名叫德夫林·斯特德，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子，他与库克医生共同……”

“到那时你更大了，可能更成熟了，达夫妮不会那么喜欢干涉了，你也不会那么依赖她了。到那个时候，她也习惯了你不在她身边。”

“可我就这样拔腿就走——”

“她会担忧的。可要是知道你决定步你父亲后尘，那她更加担忧。不要忘了你父亲那么一走所导致，所留下的东西。她会很快习惯你的离去，比你想象的要快。过去有段时间，没有你她不是过得很好？这种情况还会再来的。一家三口有两口已经消失了，没了他们我们照样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消失。你要是走了，我兄弟一家全消失了，总有一天在她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毫无疑问，他是在想，或者希望我与库克医生的相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会终于忘掉自己的童年，按照移民的传统在美国另起炉灶，因为在那儿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我在纽芬兰的过去不曾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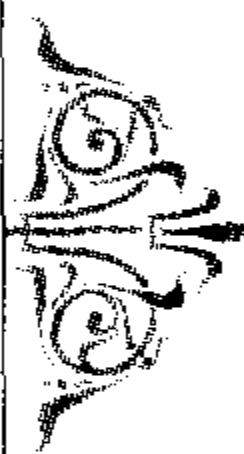
他干脆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了。“我兄弟一家”，他从没把我看做是他家的一员。我仅仅是个客人，如今做客的时间到了。他与库克医生的交易不久就会终止，那些书信不会再来，他的痛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会消除。走吧，走吧，不要回来。永远不要回来。不要写信。让我们忘掉你的存在。我对他没有好感，但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对我的蔑视。

“我给你买张去纽约的二等舱船票。”他说，“达夫妮用你父亲留下的钱开了个托管账户，我照上面的数目有多少就给你多少。原因很清楚，我是不能从那账户上取钱的，不去问达夫妮，你也不能。我会给你加到两百元。你上路完全够了。”

这听起来像贿赂，简直像是犹太人的钱，我真想拒绝不要。可我没钱付路费。如何去纽约一直是我盘算的问题。

“要是你想对达夫妮保密，不告诉她你的去处，你也得对所有人保密。不能让人看见你上船，因为全圣约翰斯城的人都知道这船是去纽约的。我会另做安排，回头再通知你。”

几天之后，我们又碰面了，他告诉我说已经为我安排了一条去哈利法克斯的帆船，在那儿我可以搭上一艘从英格兰开来的客船，因为这船不在圣约翰斯停靠，所以船上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上帆船的地点不在码头，因为那儿肯定有人会看见，而在峡口的外面，在天黑之后，或在拂晓之前，那时不太可能会有人看见帆船临时改变航道。



“他们会抛锚停下，放一条划艇来接你。”他说，“这是夏天，这个时候在外面呆几个小时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的箱子怎么办？”我问。

“你不必带太多的东西，这个包就够了。”他边说边递给我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用过的医生提包，上面依旧有他名字的缩写，一个提手的一头下面是F，另一头是S。

“等你到纽约后，你可能得换个名字，看看那个给你写信的人怎么想。”他说。

留张纸条。给这个爱我，视我如子的女人就这么留张纸条？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

我的出走并不是因为您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走了，但不是永久。去哪儿，我不能告诉您。走多久，我不知道。如今，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没有错。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您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您就不会过多地为我担心，不会怀疑我们是否还会相见。“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我母亲曾经说过。她知道她做不到的，您能做到。您使我幸福，但愿我也能让你如此。希望我们再相见时，我会更加值得您爱，您永远是值得我爱的。

爱您的
德夫林

我该不该这样对待她？我甚至在想，干脆只字不留或许会更好些。不论我写什么，都不是她应得的。当她读到这纸条时，会有何想法？尽管我已说明了，但她认为自己应受责备，认为我的出走是因为她问过我是不是想伤害自己，认为我之所以要走，是因为我要伤害自己，在她根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伤害自己。如果是前一种想法，她或许还有些正确。如果是后一种想法，那她对我的信任比我想象的还要少。我发誓，只要可能，无论如何我将以某种不会危及我与库克医生关系的方式让她放心。

我一只手拧着提灯，一只手提着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用过的提包，沿

着陡峭的坡路朝海边走去。往下走了10分钟后,路又成了上坡。这路差不多是我母亲走过的路。她在仲春时节走过这山路,当时地上或许还有残雪,路很难找到,不过,她走的也许不完全是同一条路径。也没人知道她是不是一直等到天黑才下山去大海的。我努力不去想她。我怀疑这种离奇的巧合是不是爱德华有意安排的:母亲和儿子踏上同一条路“离走”。也许真的没地方让帆船抛锚而又不被码头上的人看见。就我所知没这地方。

“斯特德家那娃又跑了。”第二天,这消息会传遍全城。这一次是一去不返了。留了张纸条,寥寥几个字向他可怜的叔母道别。达夫妮会坚持叫人去寻找,去查寻,以为还能找到我。爱德华会依着她,尽力帮她,然后在一无所获后安慰她。

我翻过第二个山头,看见离海岸300英尺远的那艘帆船上的灯。我挥了挥提灯,帆船上的一盏灯也来回地晃了晃。我走下山,看见在岩石嶙峋的岸边还有一盏灯,我想那是划艇上的灯。

这里没有沙滩,陆地在我右边突然沉了下去。这路真不知怎么走。当接近那盏灯时,我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于是我沿着河床一直走到划艇的上方,那小船正在水上颠来荡去,靠一头锚和一个大个子稳在水面上,那人正用双手抓住一块岩石。“还好没风浪。”他说。小船离我站的地方至少还有十英尺低。

“我怎么上来?”我问。

“把灯灭掉,然后跟包一起递给我。接着你跳下来。”

“包我拿着。”我说。

包里除了我的个人物品外,还有我母亲的那张单人照和我保存的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这些信被紧紧地裹成卷在床柱子里藏了很多年。

“随便你。”他说。我把提灯递给他,当他松开一只手接住时,船颠得更厉害了。他把灯放在身后尽可能远的地方,另一只手没有松开岩石。

“好了。”他说,“跳吧。”

我犹豫了,又一次想起了母亲。人们在远离海滩的地方发现了她,就在这艘船现在的位置。尽管现在是夏天,水也一定很冷。头还没入水就会感到寒冷刺骨,冷气倒抽,大口喘气。如果人们正好在发现她的地方又发现了我,这样的巧合既离奇又合适。

我感到一阵恐慌。如果有人在15年前我母亲跳海自尽的那块岩石下找到我的尸体,谁还怀疑我不是死于自杀?我告诉自己,这样想很滑稽。爱



德华肯定不会这样做，他肯定还没绝望到要把我从他生活中除掉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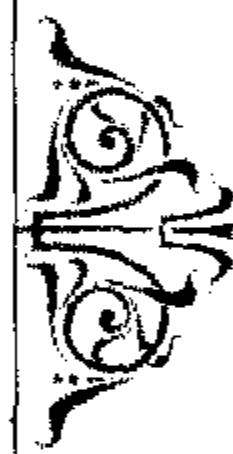
我跳了。当那人抓住我的时候，他尽量在颠簸的船上保持身体的平衡，手卡在我的腋下，感觉好像是手在捏紧，拇指差一点就和其他指头合拢了。甚至在他把我举在半空的时候，我还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举过船帮，摁到水下。他这样做轻而易举，而且不留痕迹。他慢慢地把我放下，让我坐好，面朝着他。他坐下，拉起船锚，把划桨架在桨架上。只划了一下，船便升到了浪尖。很快，小船飞快地滑行起来，仿佛正被一艘蒸汽船牵引着。

此时，借着提灯的光，我能看清他的面容了。他头戴一顶破烂的冬帽，一簇簇赤色的粗发从破烂处露出来。怎么想他也不可能是爱德华的同伙。

爱德华叔父。达夫妮叔母。

也许，我把她孤独地留了下来，永久地留给了他。

卷二



第 13 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每天，我站在曼哈顿隔江遥望布鲁克林，或应邀跨过布鲁克林大桥，此时，我是多么地珍爱这地方。

科学、商业、工程、运输、交通，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们每天都在申请专利。每一个居住在曼哈顿的人似乎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某项任务的大师，这任务事关重大，非他莫属。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往上”的趋势。在曼哈顿已经找不到建新房子的空间了，于是人们拆掉老房子，改建更高的楼房，有些房子建了还不到10年就拆了。去年，一幢20层的楼房落成了，报纸说不可能再建更高的大楼。可如今人们又在建更高的楼房，建30层、40层，让最雄伟的大教堂看上去像教区小教堂。

街道上交通拥挤，于是，在这些街道上面又建起了新的“街道”，高架铁路把唯一能射进街道的那一点点阳光也挡住了。江面上挤满了渡船，于是，江上得架起桥梁，桥上有桥。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好像是在峡谷的深处。只是在曼哈顿这样的峡谷里，没有孤寂和宁静，只有弥尔顿^①所描写的地狱的喧嚣。

高架铁路的修建，只考虑到了那些乘车的人。在下面行走是绝对危险的，每次火车疾驰而过，每次火车拉闸刹车，都会向下面的行人倾泻大量的通红滚烫的煤渣、火花、煤块和令人窒息的煤灰。

有时，我去曼哈顿的北面，参加一些募捐活动。在那儿你能看出不久前整个岛是什么样。一堆堆尚未连成片的棚户区，住着

^①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其作品《失乐园》描写魔王撒旦与上帝抗争的情景。



从未见过曼哈顿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它存在的唯一证明是那些建筑发出的灯光，在夜晚映亮了南面的天空。站在这片棚户区遥望南边那片光亮，站在这不断变窄变小的过去，遥望远处的现实和未来，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我。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看过曼哈顿的两面，一面在扩张，另一面则在萎缩，即将消失。

曼哈顿就像是个庞大的立体模型，展示了科技在过去百年发生的种种变化。如果说棚户区的人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存在，那么城市里的人们更不知道棚户区的存在。城北以外究竟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住这儿的人被称作棚户人家，我没有给他们谈起日复一日往北步步逼近的伟大城市，不过他们已经听说过了。我想，不久他们就能听到它雷鸣般的建筑声。要是我告诉他们，就在几英里以外，房屋拔地而起，拆房和建房都一样地快，告诉他们速度就是一切，像是赶在敌人入侵之前修建要塞一样，这些棚户人家肯定会以为我在说疯话。

在建筑工地，工人们像蚂蚁一样拥挤。他们没有吊带，也不系安全绳，像猫一样信步走在几百英尺高的铁架横梁上，庞大的幕墙被这些铁架支起，就像帐篷的帆布被支架撑起一样。

有一次，我站在这样的一栋高楼里，工程已完，里面没危险，街对面的另一栋楼还在建。我离铁梁上的人很近，看得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不相称，仿佛不是他们爬上了这个高度，而是大地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他们正巧站在这些铁梁上。这些横梁好像没有垂直的铁柱支撑，没有铁锚固定，而仅仅是悬在半空，不知能悬多久。

在纽约的这些建筑物上，假如现在干活的人全都从楼上掉下去，第二天这些建筑场地将依然如故。如今能用的劳动力可真是太多了。我听人说，曼哈顿的下东区是地球上居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我读到，轮船每隔几小时便启航一班，犹如排成一路纵队的舰队，像一辆接一辆的火车每天从美国伸向欧洲，艘艘满载，尤其是统舱，里面装来的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建设自己所需要的众多原材料的一种。客船则满载他们的行李。



报纸说,每天经过埃利斯岛^①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0000人以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永久地留在了曼哈顿。如今,人口最多的群体不再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了,而是东欧的犹太人。每天,3000个新的陌生人进入这座城市,他们不仅对曼哈顿感到陌生,而且对美国、对英语、对除自己同胞的习俗和传统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陌生。

3000人。要是没有看见他们迷茫、无语地浪迹街头,这似乎难以置信。他们推着装着自己全部家当的箱柜和大车,其他家当早已被永远地抛弃在了不会再见的家乡。

在哈得逊码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走下轮渡,便再也不会离开曼哈顿岛,甚至不会坐船过江,或坐上最原始的马拉车跨过雄伟的布鲁克林拱桥。就只这么一次,他们看看曼哈顿岛,看看它差不多完整的全貌。

当他们挤在围栏边观看我们这位绿铜色的,高举火炬的伟大女神时,当他们望着那些在亲戚的来信中读到过的高楼大厦时,我怀疑这些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亲戚比他们早来,为了让旧世界的人前来而在信中大加渲染,因为曼哈顿的这些新世界的人孤独、思乡。

可是,德夫林,一旦看见了它,你就不可能离它而去,似乎它根本不存在。

那些新来者从远处看到了它,看到远处用石头垒起的带状的曼哈顿——被关在船上两周之后,这景象雄伟、恢宏、令人欣喜,没有那种压抑得受不了的感觉,即使有,他们也乐在其中,因为这些人所希求的就是那种受不了的感觉。对于自己做出的而且是没法不做的这个决定,他们深信是正确的。

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看上去似乎永远是这幅景象。于是,他们走了进去,很快便忘了局限他们生活范围的那些小树林实际上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一天他们站在远处瞥见的那一大片绿茵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既使我感到振奋,又使我感到恐惧。我觉得自己

^①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曾是移民入境美国的主要检查站。

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这飞速的成长所蕴涵的重大意义仍然很难解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跟不上这速度，有可能被甩下。我没有屈服于这恐惧，继续与之抗争，当然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这样说或许你会吃惊，因为我似乎已不得彻底地抛开文明一走了之。但看到了这一切，你就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落伍，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被人抛弃。这好像正是鼓舞每一个人追求的动力——不仅是那些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还有那些付钱让他们干活，付钱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人们。

没人愿意落伍，可至于前方的目标是什么，几乎也没人想过。报纸上用“新开端”的振奋来解释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夜以继日的狂热。但我却觉得，这一切与其说像新的开端，倒不如说是最后的机会。

什么机会？谁知道。那就是我从人们的眼睛里所看到的。我觉得如果这种狂热再加一码，这场争先恐后的竞赛就会变成一场争先恐后的撤离，这场追求就会变成一场大逃亡。除了概念不清的“进步”外，我们所追求的，或者有朝一日惊恐逃窜避之不及的会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即使对此毫无头绪，我依然很难抗拒它的吸引。

我自己也身陷于一场竞赛之中，它的真正目标有时候好像也和那些房屋建造者的目标一样令人费解，无法确定。

探险者用崇高的语言表达迅速抵达南北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

我觉得自己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如此辛劳的人。当望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城市建造者时，我看到的没有自己，而是那些像皮尔里这样的人。

每个人都以为前方一定有目标，否则大家干吗要跑呢？于是，他也跑了起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身旁的那个人知道往哪儿跑，因此必须跟上他。

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不能、不得、不会落伍的。

你的

F. A. 库克医生

1900年5月11日

船从哈利法克斯驶出后,我把库克医生的这封信读了好几遍。这是我接到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寄到的,它使我坚信,自己长久考虑的离家出走的计划不能一推再推了。

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前往美国的移民,而是这新世界土生土长的人,我和库克医生无非是出生地不同而已。我心想,要是我看见他描写的那奇特景象,那些从东欧和南欧涌来的移民,我也会产生他那种感觉。但当我从二等舱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那片毫无特征的北美大陆时,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们在海上过了两夜。前方难道是大陆吗?直到注视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大陆。一开始,我把它当成一座小岛,地平线上模模糊糊的一个裂口,时有时无,只有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它才再次出现。不一会儿,它好像又变成了几座岛屿,然后这些岛屿又连成一座更大的海岛。这景象像这样持续了好长一阵,小岛渐渐成形,然后相互连接,最后似乎成了一条横挡在我们面前的高低起伏的屏障,我们得驾驶着船穿过这屏障才能抵达大陆。

虽然在我记忆中,地图上没有与之相符的标示,但我依然没想到这片隆起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就是自己的目的地。我觉得,要走近那个这些年来一直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自己在海上的时间还不够长。

这些“岛屿”形成了两大片陆地,中间有条狭窄的水道,我不敢相信就连这条最后的通道会不会被不断膨胀的陆地所关闭,不敢相信自己正望着的这片似乎刚从海底崛起的土地就是北美大陆。我似乎在岛上住得太久,太孤陋寡闻了,习惯于海岛变形的幻象,直到这种幻觉过于低俗,不得不放弃为止。

在此次航行之前,我从未远离过纽芬兰,发现它是个岛屿,从未真正想过它就是个岛屿,从未真正相信过假如沿着海岸走,你就会回到当初的出发地。

驶离哈利法克斯之后,从陆地多久以后才消失的,我就知道现在我们离陆地还有多少小时的航程。我们没有直接驶向大陆,而是往西南航行,右边是陆地,左边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可惜我看不见。



我告诉自己，只要我盯住它看，这片毫无特征的“大陆”就不会改变形状、线条和颜色。虽然十分激动，但我依然躺在铺位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半梦半醒，过去几天的记忆在头脑里随意流过。

我回想起在哈利法克斯最后那次奇怪的记忆：搬运工用推车把乘客的行李箱推上甲板，而我却只提了个医用提包。

我梦见那艘英国轮船船体上写的字母，尽管我知道它们拼起来是什么英语单词，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辨认不出来。

我从没看见也没听见坐在统舱里的那些旅客，不过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舱位的下面。

有个乘务员的英国口音让我肃然起敬，我试图掩盖这感觉，但没用。他教我怎样关上舷窗盖子，使船舱保持黑暗，好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起床的时候。接着，他彬彬有礼地等着小费，可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再次把他叫来，把他已经告诉我去餐厅怎么走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等他答完，我飞快地朝他扔去一块硬币，他接住钱，身体畏缩了一下，好像以为我想砸他。

我在餐厅里转悠，想找个空位，一对老者邀我坐在他们旁边，可我拒绝了，嘴里咕噜着，像是在说“我的朋友在别的什么地方”。

有天半夜，我起了床，觉得有人在敲我的舱门。可站在黑暗中，除了轮船单调的嗡嗡声以外，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试图用电话联系库克医生。以前我从未用过电话。我一遍遍地对着话筒说话，可就是没回音。

我又一次醒来。船上声音嘈杂，好像人们正在慌忙撤离。头顶上和外面走廊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和孩子的呼叫声。在脚下，我第一次听到从统舱传来的声音，像是被捂住的，听起来像惊吓甚至恐慌的叫声。我从舷窗斜着看出去，瞥见我以为的曼哈顿，但后来才知道那是斯塔滕岛。

我离开自己的船舱，加入到人流当中，朝二等舱的甲板走去。来到甲板，海风吹拂着我的脸，此时我才意识到空气是多么的热。船舱内依然保留着大西洋凉爽的空气，可甲板上却又热又闷。

我走到舷栏边，所有人都站在那儿，凝望着那尊自由女神的雕像，巍然如同伟大的预言者，全世界的人都见过她的照片，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下面统舱里，由各种语言汇集而成的旅客的喧嚣声沉静了下来。船从雕像



的旁边驶过，仍有一些旅客回头凝望，但大多数人期待着曼哈顿更令人惊叹的壮美。

我见过这个角度拍摄的曼哈顿的图片，巴特雷的城墙像雾中的幻象一样若隐若现，仿佛在它们背后的土地上，还有更多更大的奇景。但那些图片依旧让我对眼前的这景象措手不及。

站在这儿，在得知这座城市一幢幢大楼的名称之前，在行走于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之前，在通过亲身体验而非从书本上得知这片带状的石头建筑实际上仅是眼睛的错觉之前，在得知这艘轮船将驶往哪个码头停靠之前，在得知码头只有号码没有名称之前，我必须努力记住它的全貌，记住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好多我无法称呼、没有看见的东西，我只是把所有这一切都统称为“曼哈顿”。

这城市看起来不像是由许多建筑构成，而像是一个整体，从单独的一块巨石上耸立而出的座座高楼。我忍不住想寻找它的核心，与所有其他建筑相连接的核心结构。最奇怪的是，我从库克医生的信中所得知的这座不断成长，不停变化的城市看起来却非常陈旧，那些楼房像我在书刊中看到的哈得逊河边的岩石一样古老、久远。

想想可笑，这就是我对那个“异乡”的初次感受。我回想起当初站在信号山山顶上所看到的情景，一排巨大的冰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昂起头来，像一座城市从平坦空旷的平原上拔地而起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人工建造的庞然大物。据我所知，船上再没有第二个纽芬兰人了。我想，在这条船上所有人当中，包括儿童，也许只有我是从未出过远门的人。即使是那些在偏远山村过了大半辈子的旅客，在这次即将结束的旅程中，也曾经见过欧洲的一些旧城，见过它们伟大的城堡、宫殿、桥梁和大教堂，或者见过更加古老的城市的废墟，巨型神殿的柱头。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座他们为之张口结舌的城市实际上起源于他们抛在身后的那些城市。

可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而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偏远，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儿的人类生活与别处的人类生活迥然不同，这个概念需要反复地查阅古籍和地图才能消除。这座城市从根本上来讲是这些新来者的，不是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而且我禁不住怀疑今后会不会是。

我仿佛跻身于历史，他们的历史当中，加入了他们抛弃过去，重新开始

的一个新历程。我跳上了他们那艘正在航行的船，是个偷渡者，比统舱里的那部分人更无根基，他们孤身一人飘洋过海，没有家人或朋友陪伴。

然而我告诉自己，这些都会改变的，因为这就是我眼前这些信件中所描写的世界，这就是库克医生的世界，是我人生起步的地方。

顷刻间，所有其他的東西——我的过去、我的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达夫妮叔母、爱德华叔父、我住过的房子、圣约翰斯城——仿佛全都成了一场梦中的些许残余，正在快速淡出。

但接着，这种感觉被另一种相反的感觉所取代，眼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不那么真实，变得遥远了。我刚想要接触它，或者准备走近它，便感到了这一点，这城市会从我眼前撤退，就像我们在梦中追逐的所有东西一样。

我嫉妒那些移民，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来这儿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疑虑、三思、乡愁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沉醉其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对于他们，从第一眼见到这个新世界起，旧世界肯定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再也看不见它和他们留在那儿的亲人了。这很残酷，却非常简单，有一种我所渴望的专断。

可比起他们，我的家却离得很近，至少从距离上讲，我无法选择一个世界而摆脱另一个世界。我想不出一个能一锤定音，摆脱一切犹豫和怀疑的办法。

我曾以为自己能够像库克医生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同情和高傲俯视与我同行的这些移民。可我大错特错了。

突然，我觉得这好像是个错觉，我真的曾经收到过库克医生的信吗？我真的是他儿子吗？这个库克医生就在这个城市的河对面长大，他伴随着它的成长而成长，常常勇敢地走进它，有时候他说起话来好像对它早已习以为常，好像他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唯有极地探险才能使其充满生气——凭什么说这个库克医生觉得非得要把我找到，要寻求我的帮助，要乞求我跟他一起生活？

我心中充满了一种令人难受的疑虑。我是他儿子，万一这说法是个虚构，是服务于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在纽约停靠的时间并不长，可之后他便稀里糊涂地死了。很难说一个在这儿度过一生的人不会受到影响。

我走到船的另一边，那儿只有几个人，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他们一定是看过好多次了，他们斜倚在舷栏上，神情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布



鲁克林,谈话时流露出讥讽的表情,当激动的欢呼从船的另一侧响起时,他们不时地相互笑笑。

布鲁克林也有自己令人难忘的景象。假如河对面与之媲美的不是曼哈顿的街区,而是美国的其他城市,那让旅客瞠目结舌的肯定是布鲁克林。沿岸,纵帆船的桅杆林立,看上去犹如一片树枝和树皮全被剥光了的树林,树林的背后是一排排随意排列的仓房,像两辆迎面会车的火车车厢。工厂向四面八方无限伸展,在它们变细了的烟囱之上,在那片仓房之上,在那块我已经看出是曼哈顿岛上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城市,好像被分割成了一格格的教区,一座尖塔就表明那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教堂的尖塔比比皆是,耸立在房屋、树林和建筑物之上,与河对面的相比,这些建筑物很矮,不过远比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要大得多。

驶过总督岛,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因为这两座城市应有的烟雾,大桥仿佛悬在半空,没有支撑。库克医生住在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在一个名叫布希威克的街区。可那地方在布鲁克林桥塔的哪个方向,哪个位置,离桥塔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咒骂自己的土气和内向,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整个旅程中,这癖性使我窝在自己的舱位里,好像是不屑或者是不敢与非纽芬兰人或其他陌生人交往。我说不清那到底是因为孤傲,还是害羞。不过,我发誓,自己到纽约来不是为了成天碌碌无为,于是,我回到舱位,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收拾好那个印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姓名起首字母,装着库克医生书信的医用提包。我想这些信虽然是他写的,我抄的,但可以作为我与他见面的介绍信。

在准备行李时,我曾打算把所有的信缩减成六七卷,可结果是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信的页数简直是太多了,其次是因为有些信我很多年都没看过了,很多年都没展开过了,我不敢把它们打开,害怕信纸破烂。

因此,当我走上甲板时,我的提包里装有三打卷起的信件,有的用线系着,有的用丝带捆着,像是文凭。为了不让其他东西压坏这些信卷,我把它们放在提包的最上层,因此看上去好像包里装的全是这些信卷。我想,要是有人往包里看,这些东西看上去一定很奇怪,很像什么奇怪的禁运品,明文禁止旅客带上船的什么物品。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往包里看。那艘把我从圣约翰斯送到哈利法克斯的纵帆船上的人告诉过我,坐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只要外表没病,只须粗略检查一下就可以上岸。

船的右舷靠上凸出海岸 300 英尺远的码头。在得知离下船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沿着舷栏一直走到一团铁丝网状的障碍物前。

此时，我站在左舷，这里正发生的场面似乎对右舷的人或岸上的人没有任何吸引力。透过障碍，我看见统舱的旅客正踩着几根跳板朝印着“埃利斯岛”字样的轮渡走去。有些旅客像是以为不准他们进入美国，他们又哭又闹，奋力挣扎，被毫不留情的官员拖下船去，我想，这些官员已经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在埃利斯岛上，要是你有情绪不稳的迹象，你就会遭到拒绝不得进入美国，你的肩上或背上就会被人用粉笔胡乱地涂上一个“X”。我母亲要是坐统舱来美国，或许会遭到拒绝。

“外表没病”。精神有病是最容易看出来的。我担心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对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会不会“外显”出许多人都坚信的那种留在骨子里的疾病。我不觉得自己有毛病，可同样，对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我母亲似乎也没显示出她有什么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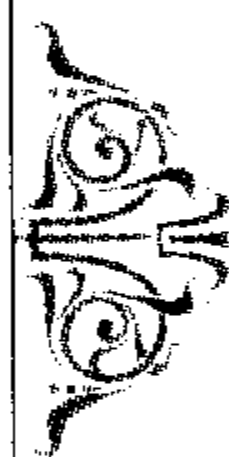
一个坐统舱的人，胸前捧着一包信卷，我想象得到他被立刻驱逐的情景，尤其是某个官员不厌其烦地读了那些信之后。我想不出任何能解救自己的理由，更不能说那个远非简单的事实了。最不能说的也是那个事实。纵帆船上的那个红头发曾告诉过我，如果问起，我应当说自己的行李已提前用行李箱托运走了。“不要告诉他们你只有这个小提包。”他说。

114

突然，我感到害怕，害怕被发现，一种对自己此次使命的古怪感觉油然而生。顷刻间，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要是他们不仅知道我提包里装的什么，而且还知道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他们会怎么看我？必须说明的是，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奇特、古怪的年轻人。

我回到右舷。乘务员叫我们在离舷梯 10 英尺远的地方排成队。我排在很后面，看不见队伍的起首，不过我能听见在每个人下船之前，有个男的在飞快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某种正式的欢迎。

全城的人好像倾巢而出，跑来迎接这艘船。在人群的前面有一些警察，如果他们的举动有丝毫的协调一致，我或许会认为他们围起的是一条警戒线。可在人群的前头，他们好像胡乱地分散开来，这儿站三两个，然后几百英尺以内却没有布岗。有些警察背对着船，可只是为了便于跟前面的人交谈，其他警察背对着人群，手插在裤袋里，对为何把他们安排在那儿站岗的问题，努力装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偶尔，浑身肮脏的小男孩从由大人筑起的人墙前排中蹦出来，径直朝那些双脚刚刚踏上陆地的旅客冲去，抓起他们提包和箱子的把手，仿佛要偷他们的东西。显然，警察也给逗乐了。有些旅客毫无反抗地松开手，让那些面容凶蛮的男孩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中，自己跟在他们身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另一些旅客则紧紧地攥住自己的箱子，那些男孩经过一阵短暂、滑稽的抢夺之后，只得放弃努力，跑回到人群当中。

我看见在拥挤的人群后面排着一长串运载东西的车和马匹，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些男孩是自己找活儿的搬运工。我看见他们爬上各式各样的马车，站在车夫跟前，朝那些被迫成为他们顾客的人招手，高举这些人的行李，以便让他们知道要坐的是哪辆车。马车夫戴着高高的黑帽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睡着了似的。等旅客和行李上了马车，男孩从车夫那儿得到报酬，然后又朝轮船跑去。

有个男子是这样把自己的包递给一个跑得疲惫不堪的男孩的，他把包拎起，离自己的身体有一英尺远，好让男孩从后面上前双手更容易抓住包。我似乎听到人群中几声赞许，既是为那男子，又是为那男孩，因为这行李交接得如此顺手，好像他们相互之间已经训练了好几年。这也许是这座码头所独有的惯规，或者是全美所有港口普遍的现象，警察既不禁止，也不鼓励，只是冷漠地观望。不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肯定会干预的，否则他们在这儿干吗？

如果哪个旅客的箱包不是由身穿制服的搬运工在搬运，那他就得面对那些扑上前来的小男孩，自己捍卫自己了。大家似乎以为，不管怎么说，人，甚至包括新来者，总是能自己想出办法的，不需要官员的介入。要不是自己马上就要走进这场箱包的拉扯之中，否则我很愿意欣赏这有趣的混乱场面。

我心想，除了双手把提包紧抱在胸前，我别无选择，然而就像我构想的那个可怜的移民，那样做又不可能通过检查。

我得用一只手提着包，经过队伍前头的那个人，我听前面有人说，他是个医生，可他连装样子的听诊器也没带。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我回答，可他早已把目光移到我身后的那个人

身上了,似乎能说英语就足以证明我没带任何的传染病。

我双手高举着提包走下舷梯。刚一着地,一个男孩朝我冲来,好像要把我撞倒,我一转身躲开了他,可由于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没看见另一个男孩从旁边冲过来,一个跳跃从半空下来双手抓住了我的提包把手。当他双脚着地时,他几乎是在猛夺提包。我把包抓得更紧。

“我自己会拿。”我说。那个男孩好像没听见,或者没听懂我说的话,眼睛盯着的不是我,而是提包,脸因为用力而扯歪了,腮帮鼓起,眼睛眯缝着快要闭上了。我简直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俩旗鼓相当,拉扯着提包开始转圈,像是在玩什么游戏一样四只脚在鹅卵石上拖曳。“你会把提包扯坏的。”我说道,可他紧盯着的就只是提包。我朝警察望去,希望他们插手,又害怕他们插手,担心要是包被扯开,里面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信卷倒出来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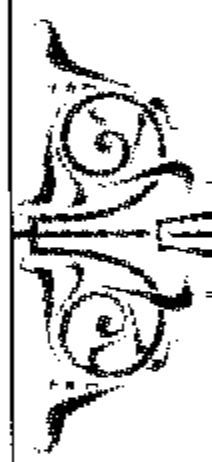
最后,我担心再这样拉扯下去,警察可能会干预,于是只好作罢,松了手,由于松得太突然,那个男孩往后一仰,失去了平衡,后背在鹅卵石上磨擦着,可双手仍高举着提包。

他转过身,站起来,身体还在往后滑。他穿过人群,朝马车跑去,全速在跑,因为那提包几乎没有重量。我跟在他身后,努力盯紧人群中的他,害怕盯错了人,再也看不见那些信卷了。我撞上了无数的人,庆幸自己听了纵帆船上那个红头发的话,把钱从钱包转移到了我的裤袋里。他说,偷裤袋里的钱更难。他还明确地告诉我,在纽约,到处都有小偷。“200元现金!”他边说边摇头,看着我把钱从钱包里拿出来揣进裤袋。以前我见过美元,但手里从没拿过。“两个口袋都放点。”他说,“一旦安顿好,就把钱存进银行,否则很快就没了。”

我看见那个男孩跳上一辆马车。就在他伸手去拿车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的那块硬币时,我赶紧一把从他那儿抢过提包。那个车夫体壮如牛,戴了顶很不合适的圆顶硬礼帽,蓄着四四方方的小胡子,他一把捏住硬币,眼睛看着我。

“先生,想坐车吗?”他用我觉得像是爱尔兰人的口音问道。我看了看那个男孩,他的眼睛像是粘在了车夫的拳头上,里面捏着他挣来的但可能得不到的硬币,在我看来,他的眼神跟我俩抢包时的一样呆滞。

提包不重,我原打算走路,可我不知道往哪儿,于是,我还是说:“好吧。”车夫扔下了那块硬币。钱刚一落进手掌,那男孩拔腿便走。他飞跑着回到



人群当中，朝轮船奔去。我叫车夫带我去相对比较便宜的旅店。

那天晚上，在溽热的房间里，我躺在毯子上面。两扇窗户我都打开了，但依然无法入睡，即使在这个时分，噪音也毫无减弱的迹象。

我心想，这城市离江河、大海这么近，为什么一丝风也没有？像沙漠里干渴的人渴望水一样，我渴望来一阵微风。窗帘纹丝不动。在圣约翰斯的室内也不会像此时曼哈顿的室外这般热。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抢我提包的那个男孩的脸，我怀疑以后会不会再见到他，不过我敢肯定，即使一年之后在街上碰见他，我也会认出他的。他或许是跟这城市一同长大的，曼哈顿的一个产物，我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怀疑他究竟会不会讲英语。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似乎深信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可我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模糊的、茫然的失望。我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第一眼看见这座曾孕育过我的城市时所产生的的一种激动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从前，当我看着曼哈顿的图片或明信片时，我经常这样想，我是在看一个孕育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自己曾经想过，当我亲眼看见真正的曼哈顿时，我的感受肯定比看见它的照片时强烈1000倍。可在船上，在坐着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这是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只是在想，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再也不肯回家，再也不愿一看见我就想起自己不是我父亲时，他选择了逃避，这就是他跑来生活的城市。这里不是布鲁克林，不是我真正的父亲在远征的间隙生活的地方。然而，即使看见了布鲁克林，我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激动过。

不知道库克医生每次在河对面遥望曼哈顿时是否想起过我，是否想起那天他坐渡船过河，在酒会上遇见了我母亲？站在布鲁克林，望着太阳沉入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之后，他也许想过许多崇高、远大的事，在所有那些思想中，是否有过“那儿，就在河对面，是孕育我儿子生命的地方”？每次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时，他是否想过那一天？

我想起了达夫妮叔母，立刻意识到是一种负罪感抑制了我理应感到的兴奋，我感到有罪，因为我抛弃她比弗朗西斯·斯特德抛弃我和我母亲还要突然。算上我出发的那天晚上，这是我离家出走的第四个夜晚。我怀疑自从在我的床中央发现我留给她的那张便条之后，她有没有安睡过片刻？

在度过了快14年的时间之后，她又一次跟爱德华叔父一起，孤寂地守着那幢房子。“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她曾开着玩笑说，然后给我念了句诗：“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

这下是她“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了。我猜想，除了对我，她从没大声地念过这诗。

如今，我人在曼哈顿，可满脑子想的却是纽芬兰。

第二天一早，我暗自决定当天就去面见库克医生。入住时旅馆侍者曾告诉我，可以坐高架火车过布鲁克林大桥。

我起了床，朝浴室走去，突然看见离门边几英寸的地上有个信封。我以为是旅店的什么通知。

我捡起信。信口是封住的，上面什么也没写，连我的名字也没写。我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折叠好的信纸。即使没有展开信纸，没有看到笔迹，我还是知道库克医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已经发现我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欢迎来纽约。知道你要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我刚结婚的妻子玛丽将整天不在家。我已经想了各种借口和差事把仆人全打发走，但愿他们整个下午都不回来。如果你2:30到我家，在玛丽回来之前我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单独在一起。见面时我会解释这一切的。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

信末没有致意，也无签名。

爱德华竟然食言了，把我来纽约的事告诉了库克医生。库克，或者替他办事的人，在轮船到达时就已经等在那儿了，然后跟踪我到了旅店。

这封信搁在那儿有多久了？整个晚上？在我躺在毯子上热得无法入睡时从门缝下无声无息地塞进来的？抑或是太阳升起后的什么时候？

我感到受骗了，同时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被骗去了自己精心预谋的让他大吃一惊的机会，就像他进入我的生活当中一样，从天而降进入他的生活。我如释重负，因为至今我还没能想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让他吃惊的办法。我害怕自己安排的见面过于笨拙，以至于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好，或者使他过于惊愕，讨厌以后再见到我。



安娜·福布斯死了还不到两年。在信中他没有提到自己再次结婚的事,从没提过玛丽的名字。不知为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又是他谋划的什么安排。这一次会是什么呢?写更多的信?只是如今允许我回信?我来纽约可不是单单为了给他写信!

2点30分。现在是8点。照旅馆侍者所说,从这儿到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只要9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还用不了那么久。假如我提前露面,在那些仆人仍然在家之前出现,我依旧会让他吃惊的。不过,他也许不在家,或者在他的诊室,只有那些预约过的人才能见到他,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完全可以不理睬他的便条,而是给他另外送一封信,叫他在别的什么地方见我。但既然他这么不嫌麻烦在我联系他之前抢先联系我,我怀疑他肯不肯让步,按照我的安排行事。如果我给他写信,或许我再也等不到他的下一封信了。

我离开旅店,去街对面一家便宜饭馆吃早饭。在我餐桌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宣传“即将竣工的地铁”,眼下正在挖掘地铁的河底隧道。海报上画的是地铁车厢里面的景象,看上去像装饰精美的坟墓,车站像矿井下的水平坑道。

我一边吃,一边读着早报,上面全是些预言、发明和有关发明创造的传闻。“无马车”即将问世,由马拖拉的车辆即将过时。曼哈顿所有街道都将与大桥相连,渡船拥挤的东河将留给游艇,这一天即将到来。每天都有专利注册,有项专利是关于中央制冷的装置,可以像散热片抵御寒冷冬季那样对付夏日的炎热。我衷心希望这装置能成功。地铁将使所有的地表交通变得多余。不久,通往布鲁克林的地铁也会开工。火车会在河床底下深挖出来的隧道里奔驰,一滴河水也不会漏进隧道。

从饭店到高架火车站,我看见几百条招工的广告。大多数广告这样写道:“只要你读了这广告,这份工作非你莫属。”如果需要,我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

我爬上一条盖着屋顶,层层盘旋的楼梯,每隔五六级台阶就有个平台,气喘吁吁的老年人站在上面喘气。车站里有间候车室,但空空如也,人们都走到外面有顶的站台上,等着火车驶来。

火车在楼宇之间蜿蜒前行,我在座位上无论怎么往下蜷缩都看不见这

些楼宇的屋顶。高架火车，这名称似乎名不副实，因为它高出地面最多不过40英尺。

在高架火车上，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15分钟过后就能到达。大桥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好像桥两头这对城市正在相互交换人口。

火车开始上升，很快，大桥的第一组钢缆斜立在车窗之外，不过我们的脚下依旧是大地，从这个角度看，远处的河流被桥柱和网状的钢缆遮挡着，几乎看不见。

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提包，里面除了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和库克医生的信件以及这天早上我发现的那封信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把自己唯一的几样东西从提包里拿出来了，留在房间里。我没敢把信件留下，因为想不出绝对安全的藏信的地方，我只得亲自照管。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这一次的使命非常奇怪。一时间，好像从一个无所不见的视角，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刚从纽芬兰来的年轻人，在离开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的路上，正坐在高架火车上跨过布鲁克林大桥，腿上支着一个皮革提包，里面装着一个名叫库克医生并且自称是他父亲的人的信卷——这些信不是库克医生的手迹，而是这些信件的接收人，即这个年轻人自己誊写的，仿佛他是疯子，仿佛整个事情都是虚构出来的，事情的高潮马上到来，与其说即将有所结果，倒不如说即将无果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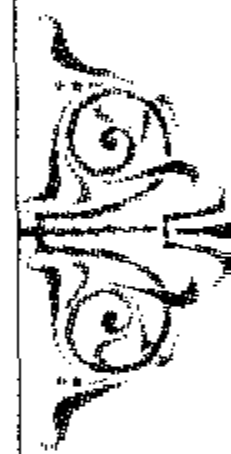
120

我庆幸自己拥有那幅照片和那些书信，因为这样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面对库克医生了。这些东西类似于某种介绍信。它们成了库克医生的一部分自传，写给我的自传。我想象着拉开提包，朝他递过去，这样他能看见里面那堆成卷的书信，还有我母亲的照片。

他也许没有母亲的照片。经历了这么些岁月，他如何能真真切切地回忆起她的面容？我会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递给他，告诉他可以把它留下。自从我离开圣约翰斯之后，我把这场面想了许多遍。与他相见的时候，除了我母亲的照片，我还能给他别的什么更加合适的礼物？

交通层层叠叠，横跨江河，把布鲁克林市区和曼哈顿市区连接起来。我知道，我们正在一条木制的人行道下行驶，但坐在车上看不见，在我们脚下还有缆车和有轨电车，在它们之下或旁边还有马拉的车辆和汽车，汽车的轰鸣把那些与它们赛跑的马匹惊得神经紧张。

再往下，汽船、渡船、被拖轮拉着的驳船、昂贵的单桅帆船和更小的船



只驶过江面。水下,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河床之下,有朝一日将有地铁穿过。

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库克医生曾坐渡船跨过那片水域去了曼哈顿。因为那一次,因为在他年轻时曾千百次去曼哈顿中的那一次,如今我朝着相反的方向,沿着大桥跨过江河,去布鲁克林最终与他见面。

我努力设想那天他出发去曼哈顿的情景:冬季刚过不久,一个男孩坐上渡船,衣衫过于单薄,牙齿打颤,浑身发抖,为了保暖缩成一团;从太阳升起,这个男孩就跟自己的兄弟一起在布鲁克林干活,等其他人都收工了,他的工作仍然没干完。有人雇他去曼哈顿的一个酒会“帮忙”,帮什么忙,他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地址,得从码头出发自己走路去寻找。他向母亲编了个理由,因为她不许他用这种方式挣钱,也不许他以任何理由独自去曼哈顿。

渡船驶进尚未竣工的大桥的阴影中,这时他抬头张望。因为太阳的那个角度,桥的阴影要比桥本身还要高大,而且在阴影中空气更冷。男孩看了看那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大了一倍,然后又仰望着那座桥。

他母亲很担心这座桥完工,她说那将是他们所熟知的布鲁克林的末日。

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在建这座桥了。在他的世界中,那座“桥”始终在建。好像桥就是属于那种总是没完全建好的东西。不过,在他看来,这座桥已经建完了。墩距的最后一段即将安装到位。用钢丝和铁丝编成麻花状的缆索比一个人的腰还粗,紧紧地绷在桥塔和头顶上的桥柱之间。

在男孩匆匆的一瞥中,包括了大桥的一段,20年后的现在,他的儿子将从那儿俯视桥下的河水。可那个男孩没有察觉任何的先兆,既没有察觉2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也没察觉两个小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刚靠上码头,桥上一串串的弧光灯突然全亮了。那些灯不像烧煤气或煤油的灯,没有火焰,从不闪烁,发出的光很不自然。

几个月来,这些灯一亮起,两岸的人们就知道这一天快完了。天黑很久以后它们依然亮着,因为人们在赶着修建这座桥。

等他半夜返回布鲁克林时,这些灯依旧亮着。此时,有营业执照的渡船已经停开了,不过他可以花三倍多的船费去坐一个男子开的夜船过河。这拖轮何时停靠、何时出发,没有固定时间。当被困岸上的人累计到一定人数,船老板觉得跑一趟划算时,他就开始收钱,然后驶往对岸。在这期间,



男孩在甲板上等着，呆望着河下游桥上依然发亮的弧光灯，身子瑟瑟发抖，脑子里除了惊叹一无所有。

我把自己从这幻想中唤醒。大桥缆索在所有的东西上都投下了一格格的阴影。时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直射下来，旅客们都闭上眼，像是在祈祷，同时挥舞着扇子。

在桥的最高处，我唯一看得见的只有水面反射上来的令人目眩的光辉。接着，桥塔出现了。我记得库克医生曾经写到他似乎觉得这巨大的拱门就是一尊雕塑，在即将竣工时有人偶然发现它自身还能作为一座桥梁。

在每座桥塔的里面，还有两个半椭圆形的，顶部呈尖角的哥特式拱门，像两扇被取走了玻璃的教堂大窗户。曾经有人建议建造罗马式的半圆形拱门，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采用了哥特式的风格，目的是为了平息僧侣们的愤怒，因为这座让大教堂矮了一截的大桥冒犯了他们。

一个拱门让朝东行驶的车流穿过桥塔，另一个拱门留给朝西行驶的车流。

我们朝东驶去，直到穿过了桥塔我才觉得自己离开了曼哈顿，真正上了桥。直到我们穿过布鲁克林那头桥塔上的半椭圆形拱门，我才觉得自己到了布鲁克林。在两座桥塔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暂离闹市，失去位置的快感。突然间，周围如此空旷。

我觉得好像这是我昨天从船上下来的第一次深呼吸。火车仿佛刚刚驶过一个叫大家开窗的信号牌，旅客们纷纷放下车窗，车厢里猛地吹进一股爽快的凉风，大家闭上眼睛，面朝着风。女人们把自己的扇子搁在一边，男人们摘下帽子。显然，沉浸于从河上、从海上吹来的微风，这是大桥带给本地的一个奢侈，只有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如此地远离烟雾，如此地凉爽清新。人们面朝着风，如同在春天第一个温暖的日子圣约翰斯的人们面朝太阳一样。

车窗放下时，一并吹进来的还有外面的声音：车轮的铿锵声、车轮下桥面的嗡嗡声、缆索奇怪的蜂鸣声。我们刚一驶过布鲁克林这头的桥塔，车窗全又拉上了。

桥下，在沿河两岸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是那些仓房，从船上望去，它们仿佛是沿着水边铸起的一堵实墙。船坞、干船坞、谷物升降机、货运站，还有在它们的阴影下库克医生度过童年的炼糖厂，好像维持纽约城五大街



区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布鲁克林运来的。

布鲁克林的这部分街道要比曼哈顿的宽敞，人行道也一样，因此街道和人行道都不那么拥挤。这里的汽车比曼哈顿要多，不过，马拉的车辆就更多了。街上驶过一辆闪闪发亮的四轮四座大马车，顶棚撑起为它的主人遮挡太阳，两匹马跟车夫一样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车夫手持缰绳高高站立，仿佛在向所有其他车辆显示自己车辆的优先权。

在默特尔大道有个车站。到那儿后，我问一个跟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路口怎么走。他说：“你应该继续坐下去，那地方也有个车站。”他给我指了路。

我沿着布希威克街步行，经过一片接一片的用砖砌成的坚实的独幢楼房。这些楼房外表很不起眼，看上去更像堡垒，不像住宅。

库克医生的房子也不例外。这房子楼高三层，中间有个五层的小塔楼。最上层的窗户呈山形，下面几层的窗户是凹进去的，上面是半圆形弧拱。房子被一圈铁栅栏围起，不过没有前院。我把胳膊伸过栅栏就能摸到房子。前门差不多就开在人行道上，之间只隔了几级水泥台阶。门洞凹了进去，顶上是用黑大理石一层一层垒起的拱门，拱门的底座、门的两侧是两根嵌入墙内的白色大理石柱。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库克医生的名字，也没有哪儿写着这房子住着一位医生，里面还有个诊室。仔细查看之后我才发现，门上塞邮件的狭缝上方有几个花押字，几个小小的银字：F. A. C.

我思忖着是否敲门，但想想这样做除了让我们俩尴尬之外也许没有别的结果。很难说谁会在房子里面。朋友、同事、病人。我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自报家门。站在屋外，我可能会被其他或他人从窗户看见，或者他可能会出来，或在门口出现，与谁道别。

我从口袋里掏出表。12 点半。我只用了旅店侍者所预计的一半时间就赶到了这儿。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个小时，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寻找庇荫的地方，可很难找到。这地方没有公园，没有遮荫的商店，只有一幢接一幢没有尽头的房子。

我站在那幢房子的街对面，在另一幢楼房的跟前，头顶上的树叶半遮半掩着阳光，双手交叉着把提包提在面前，好像这样提着包能让我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这样的动作更显得合理。

掠过蜂拥来去的马车、大车和汽车，我注视着那幢房子。仆人一个接一个地从靠屋后的那扇门离开了。

2点20分,我被热得头晕眼花,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可没有见到他,我怎么能回曼哈顿过夜,让这一天的大事半途而废呢?如果等下一次——不论何时——我再从曼哈顿来布鲁克林,我会显得很荒唐,整个事情都可能弄糟的。

我穿过街道。房子的前门开在中间那栋高大塔楼的底层。我差点没找到门环在哪儿。我提起门环,敲了几下。门开了,有人在跟着门往后退,因此那门好像是自动打开的。

“请进。”一个男子说,声音很大,很正式,我猜想可能是仆人,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没被支走,或提前回来,可能是库克医生信得过的能保密的人。

我走进屋。从阳光下走进这无窗的门廊,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当我转过身面朝那个开门的人时,他转过去面对着门,两只手都放在门上,一只捏着门把,另一只手五指伸开平放在门面的木头上,轻轻地毫无声息地把门关上。

他转过脸来,背靠着门,头倚在门上,仿佛刚刚撵走了哪个他很乐意摆脱的人。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根据许多我看过的照片,我认出了那轮廓。

“你就是德夫林?”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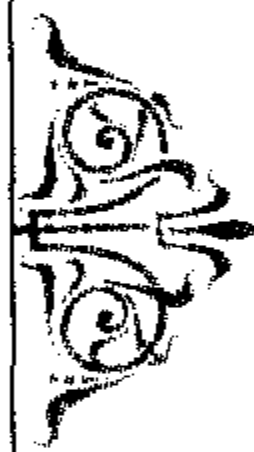
“是的。”我说,希望在回答我的名字时也加上他的名字。可“库克医生”不是回答“德夫林”时用的,而且这样称呼他还为时尚早,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这样称呼他。

“你知道我住哪儿。”我说,语气里没打算要责备他。他似乎也没把这话当成责备。相反,他朝我挥挥手笑了,仿佛他不配得到我的恭维。这时,我能看清他的模样了,看上去跟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拍的那些照片没多大区别,脸修得很干净,但头发很长,梳到了耳朵背后,人跟照片上一样瘦削,脸同样憔悴、深陷。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穿得很好,一件白色的带镶边的衬衫,一件黑色的背心,一条黑色的便裤。

他突然走上前来,用胳膊把我抱住,拥抱时他下巴和喉咙弯曲的地方紧紧地贴着我的脖子。他很壮,抱得很猛,我几乎倒在他身上,双臂无力地提着那个皮革提包,在我俩的身体之间那提包被挤压得吱吱作响。就在我放下提包准备也拥抱他时,他却松开了手,提包掉在了地上,我也差一点倒在了地上。

“你不舒服?”他问。

“外面太热。”我说,“大概还不习惯吧。”



“这天气你穿多了。”他说，“都湿透了。快进来，喝杯凉水。真正谈话之前有些事我得告诉你。”我似乎觉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仓促，赶紧拎起提包，跟着他穿过门廊，走过挂着一连串椭圆形镜子的前厅，来到一间很大的客厅。

他指着沙发的一头让我坐下。

“我去给你倒杯好喝的凉水，马上回来。”他说。客厅的天花板很高，等他说完，一阵拖长的回音依然在空气中振动。我模模糊糊能看清这房间。镀金的天花板，墙与墙之间的地毯，黑色的小雕像，带着巨大把柄的大花瓶，或真或假的蕨类植物和叶子，还有一张大理石台面的写字台，上面放了本砖头模样的书。

他很快就回来了，端着一大杯捣碎的冰块和橙汁。我坐着，怀里抱着那个提包，两只手握住提手。我松开一只手，端起杯子，一时间毫无意识贪婪地猛饮起来。

“好喝吧？”他这样问，似乎我正带着好情绪在喝他开的什么味道难喝的药水。我一口气把橙汁喝完，只剩下冰块。

“还要吗？”他笑着问。

我摇摇头，心想要是我开口，肯定会打嗝的。

他拖来一把扶手椅，正对着沙发坐下。

“德夫林，见到你真高兴。终于见到你了。我没有你的照片，不知道你啥样。”可我下船时他就认出我了。他肯定不会把我认错的，那个东张西望，孤身一人的年轻人除了是德夫林·斯特德，还有可能是别的谁？

他说：“通常，当你写信给谁时，你脑子里就会有那个人的形象。当我写信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你的母亲。我这样说应当感到不好意思，但我没有。即使在我知道你是我儿之前，我就经常回忆起她的容貌，记得比别的人都更真切。”我意识到，此时不是给他看照片的时候。

“我也很难。”我说，“只是收信，读您的信，不能给您回信。”

他点点头。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我告诉自己，第一次会面就期待我所有的疑问得到解答，这样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您和爱德华叔父通了很多信？”我问道。他皱起嘴唇仿佛在说：“这要看你说的很多是指多少了？”

“可以说我和你叔父有必要时才相互写信。”“你叔父”，而爱德华也称他是“你的通信人”。只要涉及对方，他俩都不提姓名。



“爱德华掺和进来，掺和进整个事情，我感到很吃惊。”我说。

“实话告诉你，”他说，“我自己也有些吃惊。但他做了，那是我俩的运气。有时间我会把一切全告诉你。”

我点点头，好像我早已期待他会说这话。

“还有一点是我俩的运气。”库克医生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把我的帽子摘下来，这样能把我看得更清楚。“你跟我长得不太像，除非有人有意在我我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其实也很容易。”

听到这我非常高兴，同时感到纳闷，为什么我在比较我俩的照片时没能发现这样的相似。他不必拿自己的照片跟我的比较就能做到这一点。我猜想，他经常给自己拍照，因此他能如实地想象自己的长相，而我却不能。在镜子里或照片上，我的长相总是让我惊诧。我看着他，努力想从他的脸上找到他从我脸上看到的什么。

我在想，母亲会怎么看我，好像她不知道我父亲是谁，不知道我的另外一半，那个不属于她的一半是从谁那儿遗传而来的，不知道我在长大后开始显露的究竟是谁的相貌特征，她是能够发现这些特征的，就像库克医生那样，而不像我。我想象她仔细打量我的脸、我的肤色、我的眼睛、我的嘴巴，努力想从两个生命的交融体中辨出哪些特征是他的。这个人就在这儿，这个陌生人，这个她认识了仅三个礼拜的人，正透过她儿子的脸注视着她。在库克医生看来这么一目了然的事，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126

“这房子真是不一般！”我说，心想大概是用远征的回报建造的，我觉得他在信中夸大了自己对“资助者”的依赖。不过，自我进门后一直挂在他脸上的那种笑容消失了。

“是的，很不一般。太奢侈、太过分了。我对玛丽说过，这房子太大了，大得每个房间的气候都不一样。人家说这房子是靠啤酒建的，是库克太太买下的。布希威克街上的许多房子都是靠啤酒建成的，而且依旧住着酿啤酒的人，所谓的啤酒大王，就是那些德裔酿酒商人。你是知道的，我父母生在德国，但我父亲是医生，不是啤酒大王。这房子还被邻居们称作‘豪宅80窗’，但事实上它有84个窗户，是西奥博尔德·恩格尔哈特为一个名叫克劳斯·利普休斯的人设计和建造的，可因为是他出钱，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房子是他‘建造’的。我吓过玛丽，说看到过他的鬼魂，我称之为‘游鬼利普休斯’。这房子很大，鬼魂出没几个世纪也不会有人看见。我相信，在某些人的眼里，我是个受人供养的男人，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有时觉得自



已在依赖别人，才怀疑别人会这样看我。玛丽的钱大部分都用在了这幢房子上。她的财力还远远不能完全资助我的远征。但用她的钱，我能把自己那匹白马拉的单车换成四缸的富兰克林牌轿车。我开着它四处转悠，转动着方向盘绕过街角，感觉像个孩子，像是母亲给自己买了件别的母亲买不起的玩具。用玛丽的钱，我还买了台X光机。很少有医生拥有这样的机器，这东西至少对别人有用，但不是我。也许这样对自己不公平，但我觉得自己给福布斯一家带去了伤害。不过，这一家两个健在的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告诉过我，她们为我和玛丽感到高兴。在遇见玛丽之前，我原以为通过婚姻获得幸福——以及婚姻本身——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对她来说，这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婚姻随着她丈夫的去世而告终，她丈夫叫威利斯·亨特，是个有点名气的顺势疗法医生，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

“有个医生同事在听说我结婚之后，写信说他为世界失去了我‘这样一个最狂热、最能耐、最坚定不移的探险家’而悲叹。他补充道：‘毫无疑问，你选择了更幸福的命运。’你会认为宣布我结婚，就等于是宣布了我事业的终结。难道皮尔里拥有了妻子和孩子就放慢了他竞争的脚步，或丧失了他作为探险家的地位？我担心那位朋友说这话的部分理由是因为玛丽继承的那笔财富。人们觉得我变成了中产阶级。这真是大错特错。当我向玛丽求婚时，她坚持要我继续探险，甚至隐讳地表达出类似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只要情形许可甘愿陪同我远征的想法。”

他停止了说话，看着我笑，好像在为自己的滔滔不绝表示歉意。

他把前臂放在大腿上，双手握住。

“你真的应该去上学。”他说，“你选了什么职业？”

“我还没拿定主意。你在《世纪》中曾写道：‘所有现存的探险难题将在下一个10年内被攻破。’如果我现在去上学，到我毕业的时候也许再没有什么可攻克的了。”

“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们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让资助者掏腰包。也有可能我说错了，10年之后那些难题依然存在，没有攻破，也许永远没法攻破。到那时，你没有能挣钱的职业，在社会上也没地位。”

“大学和学院会照样办嘛！”我说。

他笑了，点点头，然后朝我凑得更近，像是担心要是说话声音太大，等他妻子回来时话音仍留在空中似的。

“我给玛丽讲了你，说你是我以前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儿子，这人叫弗朗

西斯·斯特德,现在去世了,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不幸遇难,这事她是记得的。我告诉她,我俩是在曼哈顿邂逅相遇,你希望在纽约住些时候,在完成学业前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我告诉她你刚刚下船,看上去人地生疏,无所依靠,要是长时间没人庇护,说不准会出什么事情。我向玛丽建议,我现在一方面在训练,一方面在准备远征,雇个人,比如说你,作为我的助手倒不是个坏主意。我还建议,考虑到这房子很大,助手也需要在我身边,你住在这儿也不无道理。她同意我的建议。”

他轻轻一笑,因为我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和我的感觉一样,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对他的怀疑消失了,感到内疚,不该抱有那些怀疑,不该抱怨他抢在我突然造访之前安排与我见面。如今我发现,无论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安排”,都将会是很鲁莽的。显然,任何安排只能留给他来做。我看着提包,那些书信再也没有了丁点儿虚构的气息。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此时此刻,他正在做曾经说过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因为我的急躁,我竟然把这一天想成永远是那么遥远、模糊的一天。我没有等他的正式邀请,从天而降来到纽约想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但尽管这样,他还是主动邀我走进他的生活,在那儿已经为我留出了位置。

“怎么样?”他问,“愿意作我的助手,跟我们一起住这儿吗?”

他的建议正中我下怀,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从没想过那会是个建议,他所能想到的除了我感恩戴德地满口应允外,还会是什么别的回应?

“好哇。”我好不容易回答,“很愿意。”

他又笑了。我或许就像个小孩,对于礼物所作的回应完全如他所想的那样,他禁不住乐了。

“玛丽以为你叔母和叔父知道你在哪儿。你说话时尽量注意,不要让她产生别的想法。事实上,最好你不要提你叔母和叔父,除非她提起,也许她不会的。玛丽给仆人们讲了你。我会把你引荐给大家,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说你是我以前同事的儿子,如今受雇作我的助手,为了你我方便住在我家里。至于我和你,只有当我们像现在这样确保无人在旁边时才敞开说话。你必须小心,不要留下一点点需要保密的片纸只字。”

我真想告诉他不必担心,告诉他我早已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在眼皮底下骗人,如何在家里与一个人共谋向另一个人保密,不过,我还是仅点了点头。

我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与摆脱的那个处境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我



把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换成了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玛丽，依旧像从前那样戴上同样的伪装，与男人共谋对付女人；依旧不得与男人谈论此事，除非他允许；依旧客居他人之家，第二次被人收养，不过这一次是被自己的父亲收养。

不过，我发誓自己不会因为欺骗库克太太而感到负疚。我和库克医生的谨慎既对我们自己好，也对他人好。谁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好处？谁又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伤害？

“我一直在想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你应当怎么称我。除了‘库克医生’外，我没想到合适的称呼。假如用别的称呼，你可能会在有人的时候无意中漏嘴。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说漏一两次嘴倒不会露馅，但可能会使你我尴尬。”

我点点头。

“我们就对玛丽说，你的行李箱在码头的行李房给弄丢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知道我的全部行李就是那个提包。我猜想，安排我如何离开圣约翰斯也是他向爱德华授意的，这个安排具体到了我应该随身带上多少行李。

即使在他提到我那根本就不存在的行李箱时，他也没看一看我的提包。在我看来，他连看也没看一眼。在他说话这期间，我坐在那儿，怀里抱着提包，里面装满了所有我刚刚承诺不会大意，要保藏好的秘密。我希望来这儿之前能找个什么保险的地方把它放好，希望当初没把它带进屋。

走进门廊的时候，他没有主动伸手来接我的提包。也许从我拎包的样子，他知道我大概是不肯松手的。他甚至可能还猜出了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倘若果真如此，那他把自己的窘迫掩藏得一丝不露。

突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坐姿，从坐下开始，我就摆出和保持着一种很奇怪的姿势。从一个展示镀银餐具的橱柜窗户里，我看到了自己模糊的影子。肩膀耸着，膝盖拘谨地碰在一起，双脚扁平踩在地上，两只手把提包抓在怀里，像女人抓住钱包一样。

我发誓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怪人了。我要从头再来。在纽约，无人对“斯特德家那娃”有任何的了解，除了我或许永不再见的那些人以外，谁的脑子里会有“斯特德家那娃”的记忆？在纽约，人们理应把我仅仅看成是库克医生的助手。“我会把你引荐……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我不知道如何社交，不知道社交的规矩和惯例。虽然不太清楚，但我已经

预见到了会有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以及随后自己的退缩和库克医生对我的潜能的重新评价。

我把提包放到沙发上,就在我身旁,伸手就能抓到,以防哪个外出的人突然回到家。我手心朝下放在大腿上,腿上黏糊糊的,跟裤子粘在一起。

“德夫林,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库克医生说。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我记得在他遇见我母亲的当天他曾说过的就是这句话。我看着他,心里纳闷,在他眼里我的不幸福是不是就那么明显?希望他不要听到“斯特德家那娃”的事。他再一次肯定地朝我笑了笑。我觉得自己心中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强烈情感,眼泪盈眶。

“我把自己的信任全都给了你。”他说,“把一切全告诉了你,包括我所拥有的和希望拥有的,包括我的现状和希望实现的梦想。”

等玛丽回来,库克医生对她说我就是“那个向你提起过的年轻人”。他的脸上没有一丝非同寻常的表情,好像除了同自己的妻子见面,同死去的同事和朋友的儿子、自己的助手见面之外,并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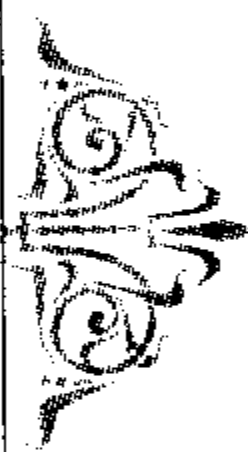
玛丽的脸小巧、漂亮,但除此之外,她应当属于身材粗壮的那种。紧握着她手的是一个小姑娘,大约有3岁,嘴里吮着另一只手的手指。玛丽告诉我说她叫鲁思,是她初婚时唯一的孩子。我从库克太太的眼里看到了一种旷日持久的疲惫,还有时刻保持的一种警惕,好像她一直在提防有人会欺诈,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她一直很难提防的人。她对我彬彬有礼,这一点非常明显。毫无疑问,这样做清楚地表明,虽然我住进了这房子,但身份仍然仅仅是个雇员。

“斯特德先生,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她问。

“有点累。”我回答,心里在想:她能看得出我跟库克医生长得像吗?不过这没关系。即使她觉得她丈夫和我看上去有点像,她也不会朝那方面去想的。

“从昨天起我丈夫就一直谈起你。‘斯特德医生的儿子快来了。’他说这话肯定有20遍了。我知道他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探险家们远征归来,要么成为亲密好友,要么就是终身宿敌。当然,还有些人根本就没归来,看来这个痛苦的事实你是知道的。我也为你父亲感到难过。希望你不要从我丈夫身上染上那种‘极地热’。非要探险,去希望公园冒险就够了。”

这话几乎不能证明她有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甘愿做他远征伴侣的



想法,不过我忍住没去看库克医生。他通过婚姻确实获得了幸福。

“我还要劝你,就呆在河这边,万不得已不要去曼哈顿。不过,我怀疑即使我给了忠告,你还是要学我丈夫的样。嗨,我相信你会成为他得力的助手。希望你在布鲁克林住得愉快。”她说最后两句话的口气好像是不相信她和我是否还会再次见面。她猛地一转身,离开了客厅。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住的房间在这幢房子无人居住的一侧,离客厅很远,被他称作“达科他”^①,就是西边那一整排从未住过人的房间。照他所说的,那排房间“就一直在那儿”。这幢房子减去“达科他”这部分就是库克夫妇的住处。

他告诉我说,他是借1884年在上西区修建的一幢公寓楼的名字给这一侧房子命名的,当时那幢楼的位置很偏,这名字似乎比较合适——现在依然合适。他说:“这城市还没真正往西推进多少。”

达科他。听起来不像是一幢建筑,而是一片建筑。或者更像是一片土地,上面建好了房子,干干净净地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人们。一座从未有人住过,但总是在等待有人来住的鬼城。

“你是第一个住进去的。”库克医生说,“而且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过有时我也会去的。这房子大得很。”

“希望我住这儿不会让库克太太感到不便。”我说。

“她是累了。”库克医生说,“有贫血病。否则她会很高兴你呆在这儿的。这病可能会加重,今后可能只得呆在家里,她因此很不安。”

我的房间很大,天花板同这幢房子的主楼部分一样高,陈设非常豪华。因为天花板很高,加上两扇摇头的大电扇,房间里很凉爽。我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冰柜,里面是当天上午新放进的冰块,还有软饮料和水果。库克医生说,仆人们会一直增添冰柜里的这些东西。我唯一的任务他会布置的。

“太周到了。”我说,“你和库克太太真是太慷慨了。”

“那是你的报酬。”他说,“当然,除了你的花费之外,我还会付些报酬,你应当把这些都看成是你的报酬。”

他问我有没有在旅店里留下什么东西。“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洗漱用

^① 美国人从东部向西部扩张时首先面对的蛮荒之地,后成为两个州:南、北达科他州。在纽约,人们用“达科他”称呼第一座豪华公寓,位于中央公园西大街72街交汇处,建于1880—1884年间,有65个公寓套间。能住在“达科他”的非等闲之辈,如英国“披头士”四成员之一约翰·列农就曾在这里居住。



品。”我回答。

“我叫人帮你取来。”他说，“你现在就住下来。”他依然没有看一眼我放在床上的那只提包。恐怕大多数晚饭你都不会跟我们一起吃，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

他说他的书房和诊室在这幢房子的另一头，大约跟“达科他”是等距离的。从他书房顺着走廊走下去紧挨着的那间小房子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他说等我安顿好后，他会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我究竟需要干什么，作为他的助手我究竟需要做的事情。

至于“达科他”的其他部分，他让我自己去熟悉。他说这房子本来是为大家庭设计的，但利普休斯一家尽管很大，还是散居在不同的房间，因此“达科他”从未有人住过，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住过。

当他们搬进来时，整幢房子所有的房间都是两套，有的甚至三套——饭厅、客厅、起居室、书房等等，都是两三套。有些房间他们改为其他用途，但“达科他”没有动过。

在依然沉睡的“达科他”，有几个房间因为我而重新启用了：卧室，紧挨卧室的浴室，相对较小、惬意的书房，这书房四面都是墙，没有窗户。库克医生说我可以在里面的书桌上吃饭，他不忍心让我一个人坐在饭厅的桌子旁吃饭，其余的39把椅子空无一人。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摁饭厅外面墙上的电铃叫厨房的人。

132

我把这里的房间转了好几遍，最后一遍是在天黑之后，我边走边打开所有的灯。我觉得除了有人检查灯是否能亮之外，这些灯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不过，这些灯还是每周清洁两次。天花板的角落里甚至连蛛丝也没有。镀金的天花板、格板的墙面、地板以及没被地毯覆盖的地板，都熠熠生辉，仿佛“达科他”是从昨天起才没住人的，家具才罩上了被单。所有的大件家具都盖上了白色被单。有些被遮盖的家具看上去像是无名的塑像，大理石一般褶皱的服装下依稀露出躯体的轮廓。从被单的形状大致能看出下面遮盖的东西是什么。

我原以为，除了为我而启用的房间外，“达科他”的其他屋子可能仅仅是关着门的空房间，除了墙壁装上壁板、地面铺上硬木外，不会布置别的家具。然而，要不是那些被单，要不是那些干干净净的壁炉，要不是这些房间里没有丝毫的气味，很少有迹象表明这里没有人住。到处都铺着地毯，挂着系有流苏的帏帐；我看见被单下隆起的油画、人一般高的花瓶，油亮的桌



子、装软垫的椅子和沙发、没有靠背和扶手的长软椅、玻璃台灯、装满瓷器的橱柜、搁满水晶器皿和银质器皿的碗柜。库克夫妇完全可以照样舒适地住进“达科他”，除了化妆用品和换洗衣服外，其他什么也不必搬来。他们住处的一切东西，“达科他”也有。

这些房间不只是为了能住下大户人家而设计的，还可容纳几十位应邀来访的客人；还可用来举办舞会、招待会、季节性的拜会、每年一次的聚会等，我猜想，这些聚会都是在库克夫妇住的那部分房屋里办的，而这部分屋子却一直空着。

这地方有种气氛，使我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似乎这地方是为某个人保留的，而这个人也许不会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没人再相信他会回来，似乎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的心中另有目的，不忍心将其摒弃。当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我禁不住在问：“到底是什么目的？”

单单在“达科他”，一大家子的人就能过得宽绰、奢华。幸好一切全都盖上了被单，否则哪怕是这里的一小部分，我也不可能一一“住”遍。夜复一夜独自一人坐在那些大如洞穴的房间里读书或听唱机，我会觉得滑稽可笑。

悬吊在客厅天花板上的是一盏巨型的枝形吊灯，当灯点亮时，我能听见它嘶嘶作响，好像充满生机，一时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在颤动。这灯呈碗形，吊着在我看来像是一根根对称的冰柱，每根冰柱里亮着灯，将各自的影子投射到其他冰柱上，整盏灯犹如亮光充盈的洞穴，像一间颠倒的圆顶冰屋。

前不久，在这间原本沉睡的大客厅里，有个角落因为库克医生而重新启用了。他说的有时候去过“达科他”，指的就是这地方，他称之为自己的“窝”，需要绝对安静进行思考时所去的地方。这地方在客厅最远的角落，靠近壁炉那小半圈家具没盖被单的地方。他喜欢夜里去那儿，独自坐在沙发上或扶手椅子里。他说，即使我住进了“达科他”，他也会经常来这儿，因此，如果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响动，或看见门关着，里面有灯光，我不必吃惊。他说，门关着时他希望不要去打扰他，但如果是开着的，我可以当做是让我进屋的邀请。

库克医生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挑选信件”。不久后我发现，他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件，把少数几封值得一读的信从一大堆无用的信中分拣出来，他发现这很麻烦。在这堆纷至沓来的信件中，有发明者的来信，请求他在

下一次远征时使用他们发明的什么新玩意儿，借以宣传、证明这些玩意儿的功效。

“发明成了国人的娱乐。”库克医生说。有人请求他试穿用某种“保暖性能优于毛皮且完全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衣。还有可同时用做望远镜的防雪盲墨镜。一种“折叠式的、轻型的打孔钻，其钻冰的性能优于钢钻”。一种更轻、更坚固、更快的雪橇，因为它的冰刀是用某种“无摩擦合金”制成的。燃烧时间更长的蜡烛。一种“不用燃料只须用水的”微型火炉。一种“能弥合冻伤的皮肤修补剂”。“能确保预防、治愈雪盲的”眼罩。能预防冻伤的鹿皮鞋。“一种不知疲倦的狗，能帮助你战胜所有坚持用爱斯基摩犬和其他犬类的竞争对手。”

我的任务就是回应这些广告，代表库克医生礼貌地回绝他们，解释说“库克医生更愿意使用他自己发明的装备”。

“写信给名人却得不到答复是最伤人感情的。”他说。

除了“有毛病”的人写的信我应处置外，其他所有写给他的信都得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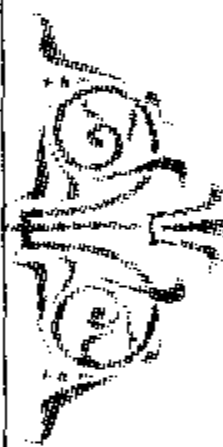
包括猎人、摄影师、记者、小说家、商人、医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自荐参加他下一次的远征，或提出付钱给他，要他带上他们或他们的儿子去北极。我得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库克医生不再作为北极向导而受雇于他人，如今他只带领以前曾跟他一起旅行过的人去远征。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因为他妻子有钱，他不再受雇于他人了，在他看来，为了向那些跟他故意作对的人证明自己并非为钱结婚而拒绝接受这笔钱是毫无意义的。

他给了我一张“正统探险家”的名单，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但大多数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人。这些人的全部信件我都得送交给他，不得拆开。许多名字我很熟悉，比如皮尔里、阿蒙森、戴德里克、卡格尼、阿斯特洛普、巴特利特和韦尔曼。

一旦我熟悉了这城市，我还得把他的信件和包裹送给住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人。

他的书房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十年来从极地收集来的纪念物。有六分仪和地球仪，鸟的羽毛，雪鞋，巴塔哥尼亚人的遗物，巴塔哥尼亚地区一个名叫雅干人部落的一本词典，燧石做矛尖的长矛。墙上挂着的是一架木制的小雪橇。就连滑板也是木制的。“是桤树木。”库克医生说，“13磅重，却能载重500磅。几乎每自重一磅就能载40磅。是我自己设计的。”



他的书桌上层层叠叠铺满地图，每张地图都各自不同地绘出了从南格陵兰岛通往北极的线路。他仔细研究这些地图，在自己的日志里记下笔记，查阅旧杂志和其他探险家写的东西。

我看不见墙，因为上面挂了许多照片，有的是类似《世纪》上刊出的那种自拍照。在一幅自拍照的下面，在玻璃框里面的一块木头上，蚀刻了一句不知是谁说的话：“人虽年轻，却有年长者的缄默与谦逊。”一句描述，仿佛照片中的这个男人早已死去。

“这些遗物中有的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库克医生说，“是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收集的。皮尔里委托我保管。我跟你叔父联系过，但他说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说，他不愿让家里堆满那些——他怎么称呼来着？——‘野蛮人的小玩意儿’”。

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遗物中有骨头做成的刀和针，一根海象的长牙，用驯鹿皮做的手套和睡袋，却没有他的任何照片。

装在木头和玻璃框里的是1892年在红石屋圣诞晚宴的菜谱：鲑鱼、兔肉馅饼、鹿肉、葡萄干布丁。菜谱画得非常精致，上面还有一幅库克医生的漫画，把他画成一头长发，双手叉腰正在审视一位裸体的爱斯基摩女人。菜谱的空白部分画了个量瓶，上面是恶魔般的头颅和交叉腿骨的图形。

“弗朗西斯·斯特德画的。”库克医生说，“他给我俩一人做了一个，都是仿造的，他甚至还仿造了一个自己的头颅，可惜我忘了什么样。”

库克医生审视一个裸体女人。对这个不经意的讽刺，他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把这幅漫画挂在了自家的墙上。

这房子里到处都有曾经属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东西。我真想问他，每次坐在书桌旁抬起头，他怎能容忍看到这些东西，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的母亲？这不是一种赎罪式的自我惩罚，永无止境的弥补？

一天下午，我问他眼下有没有什么在他看来可能会成功的极地探险。他告诉我皮尔里正在北方，大概试图征服北极，但事实上是在拖延一次早已失败了的远征，他们从停靠格陵兰到现在有18个月了，由于人员受伤和糟糕的天气，他们没有丝毫进展。他说，尽管不知道皮尔里的具体位置，但目前皮尔里正进退两难。

我感到很吃惊，既然知道皮尔里正在试图到达北极，不论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可库克医生却能如此的乐观、自信，此时此刻他却在布鲁克林，仅仅是在为今后不知何时的远征做准备，远征的经费还有待于筹集，出发

的日期还没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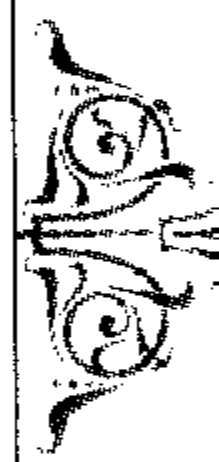
“难道你不担心他会到达北极？”我问。

“你不懂。”他说，“我倒不担心皮尔里现在成功的几率，他根本就没几率。从一开始就没有。他和他的队伍被困在了什么地方。最后一次听到他们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了18个月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他们还在格陵兰岛的最南端，计划等再次下雪时往北走。等到那时，他们的远征就超出两年了。那个时候，皮尔里唯一真正的雄心将是能够活着返回。他还能拖多久才承认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离开前有种说法，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现在45岁，如果能回来的话，至少46岁了。这些都不是猜测，都是必然的事。报纸上也不会出现令人惊讶的大字标题。只有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才依然在等待皮尔里抵达北极的消息。皮尔里本人心里清楚，全世界所有的探险家心里都清楚。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有些会员心里清楚，正不顾一切地向媒体，向其他会员封锁消息，俱乐部开会时，那些会员人是不到的，但钱照交。当然，我不会公开说这件事。我不愿把自己同行的坏影响留给那些一两年以后有望支持我征服北极的人们。”

他叫我别去想皮尔里，说到这名字时他发出冷笑，并且提醒我，任何一次远征成功与否要看准备工作做得如何。他说：“与其去5次北极却只能弄点吹牛用的新材料，倒不如好好地尝试一次。”

他说，自从1892年以来，皮尔里已经去过格陵兰好几次了，每次都带点能打动俱乐部成员的什么名堂回来，不让人们注意他又没抵达北极。他带回来三颗陨星，称其为星石，借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莫里斯·杰瑟普同时也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会长。他还带回来6个爱斯基摩人，在他的照顾下，4人死于肺结核。

库克医生挥了挥手，似乎想把一切有关皮尔里的思想从我俩的脑子里抹去。



第 14 章

在布鲁克林，每个人都认识他。一个周六下午，我跟他一起在布希威克街上散步。他左臂搭着夹克衫，右手拿着帽子，见到一家小旅店的看门人时，举起帽子同他打招呼。那人也脱下帽子以示回应。

他又举起了帽子，这一次是对着一个站在自己商店门口的珠宝商，等库克医生走过，那人走进商店，好像他是专门跑出来跟他打招呼的。

在默特尔线的高架火车站候车室，他简短地跟人们交谈，我发现这些人都认识他，可他却不认识。

人们之所以亲近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名气。他好像从没发现谁没意思，觉得人人都具有魅力，别人说话时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这博得了大家的欢心。他并不开朗，但当他以自己特有的直率朝大家笑时，他便释放出那种绝对的自信，好像这些人赢得了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的赞许，好像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工作从某种角度讲都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很有价值的，唯有他和这些人才能意识到。

在布鲁克林，我俩要么步行或坐火车，要么开着那辆富兰克林牌轿车到处跑，像是只有一辆车的游行队伍，布希威克街上的人们向我们打招呼，人人朝我们挥手，和善地取笑他的这辆“飞(非)马车”。纯属偶然，这辆车与一个众所周知遭遇灭顶之灾的北极探险队同名。多数人都取笑他不可能让这辆车载着他去北极，然后返回。

“你应当把那些爱斯基摩人留下。”我们飞驰而过时，有个骑马的人叫道。

库克医生告诉我，这笑话指的是有一年他从拉布拉多带回布鲁克林 12 个爱斯基摩人的事，我感到很吃惊。他在自家院子里搭起两座大帐篷让他们住下。“我对待他们比皮尔里好。”他说，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惊讶。他说，在布鲁克林，他们尽可能地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生活，当地人自始至终都在透过围墙上的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冬天，周末，他和这些人坐上狗拉雪橇在布希威克街上奔跑，狗在狂吠，吃惊的布鲁克林人成群结队徒步跟着，试图赶上雪橇。尽管他服侍周到，但当其中的一个爱斯基摩人死后，他

同意了他们返回拉布拉多的请求。

“我在布鲁克林很有名，但在曼哈顿却不为人知。”他说。

他说，开着富兰克林轿车进曼哈顿麻烦得很，那里的街道很窄，很拥挤，汽车和马匹挤得太近，马很不乐意。

第一次我俩一同过桥时，我看见一辆毋须马匹牵引的汽车把十几匹马惊得前蹄扬起，马车上的车夫、乘客和货物全都倾卸了下来，马儿的前腿高举，危及行人，大家朝那司机尖叫，叫他“弄匹马来拖车”。

一周里面有好几次，我俩乘高架火车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如果去的地方不通火车，我俩就赶马车去。他说，他喜欢这样，不喜欢租车，因为出租马车车夫是出了名的喜欢偷听，爱传流言蜚语。

他说，这样旅行我能看到并了解曼哈顿。有时候，对于这城市的布局和排列，我好像的确是在接受辅导，他说，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需要更好地熟悉这里，就像我熟悉圣约翰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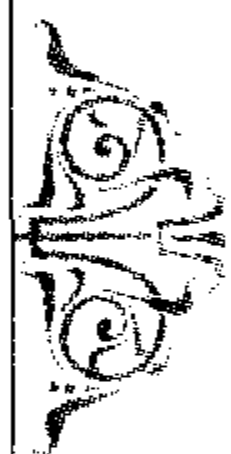
“从南到北纵向的称作大道，从东到西横向的称作街。大道比街更长，相隔得更宽，比街更多。街是编了号的，而有的道既编号又有名字……”他一声不吭地继续赶着车，一连几个小时在城里疾行，仿佛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我在他身边仿佛仅仅是给他做伴。

我俩以不亚于疯狂的速度，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朝北而去，除非有什么道路作为捷径，基本上是绕着中央公园的边缘走的。我想，在我到来之前，这难道就是他消磨空余时间的方式？尽管他劝我要有耐心，也许这就是探险者焦躁不安的一种征候。他在家，而不是在他喜爱的远征途中，因此他无法安心地坐下。

有一次，在即将外出游走之前，我经过书房，库克太太正准备离开，尽管依然时值9月，但她浑身裹满了毛衣和外套。我在她家已经住了好几个星期了，可与她见面还是第二次。库克医生偶尔提到她，通常都是传达她的歉意，说她的“状况”不容她与我共度时光。

我打了声招呼，她咕哝着应答了一下，听起来似乎对我很生气，好像是受我的鼓动她丈夫才如此疏忽她的。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我还是没叫他“库克医生”。虽然明白不叫他“父亲”的道理，但我依然无法让自己那样称呼他。称他“库克医生”，让我俩即使在私下也保持着那种伪装，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我称他“你”，很尴尬，尤其是在他经常叫我名字的情况下。我俩单独在一起时的叫法与有旁人



在时不一样,但很难用文字说出哪点不一样。

他谈起曼哈顿,好像这城市不是为住在那儿的人们建造的,而是为那些前去揽胜的人建造的。我们仿佛是在穿过一座巨大的名叫曼哈顿的博物馆,里面展示的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陈列着社会各阶层各层面鲜活的展品,最新的技术发展,所有已知的职业,所有已知的语言,各种样式的服装,各式各样的技艺和娱乐表演。我差一点觉得他似乎要指着坐在一辆马车上的两个人,一个中年,一个少年,两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游客代表,年长的那个也许也正用手直指着我们。

一开始,我理解这是布鲁克林人的自卫的本能,大概是比不上河对面的对手之后,所有居民似乎觉得在曼哈顿应该装出的一副孤傲、轻蔑的姿态。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怀疑,内心矛盾。他好像是在评判这座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某种目的,可他无法确定,始终无法确定。每次旅行完,当我们跨过大桥回到布鲁克林时,他默不作声,一副极不满意的样子。

我们去看歌舞杂耍,虽然他觉得台上的丑角好笑,但也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关注那些观众,不论他的注意力放到哪儿,他都饶有兴趣。

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他来到书房,我正在看《白鲸》^①,这是他推荐的一本小说,说是能帮助我理解“他探险的本质”。

“我得出去走走。”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抓着手背,指甲在皮肤上刮擦出声响。

我俩坐着他的马车跨过大桥,来到下东区的赫斯特街,这里是犹太人群集的地方,是手推车集市,即使是下午的这个时候,这里依然很拥挤,我简直分不清谁是小贩,谁是顾客。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黑胡须,头戴毡帽、身穿厚重大衣的男人分出一条道来让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茫然,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只是感觉到前面有障碍物。

“他们都是犹太人。”库克医生说,“但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他们语言不同,因此需要学英语。”

“搬运工。”他说,像是在指着纽芬兰的一种长不大的树木。男人、女人和孩子背负着一堆堆没有完成的服装,艰难地从一家血汗工厂搬到另一家血汗工厂,重压之下他们的脸几乎快贴到地上。好像是经过了什么灾难

①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的一部小说,描写捕鲸工人的艰苦生活。



之后,一切都在重建,人们以这样的速度干活,以为会有止境的。“可这永远没有止境。”库克医生说。一个披着头巾的女人,下巴下系了个蝴蝶结,被一大捆用带子扎牢的男式衬衫袖箍压得步履蹒跚。另一个女人头顶一个大木箱,库克医生对我说里面肯定是空的,可以用做引火柴。

离这儿只有几条街便是小意大利^①——桑树街。库克医生说,如今从百老汇到包厘街,到处都住有意大利人。

在第59街的东西两边,住着爱尔兰人,他告诉我,跟他们住一起的还有许多纽芬兰人,他们抛弃了自己辽阔、空旷的海岛,拥挤在这窄小的地方。我说最好别去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担心被来自圣约翰斯的谁给认出来。他点点头,似乎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知道要是达夫妮叔母发现我在这儿肯定会做什么。

我俩兜一大圈,来到圣胡安山,来到第60街和第64街之间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来到离未来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很近的第7大道。这些地方住着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黑人。库克医生称之为“搬运城”,因为这里所有受雇的黑人男子都是板车车夫、马车车夫、赶牲口的车夫、行李搬运工、打包工和信使,在这座城市里要么运人,要么搬货。

他指着一群群被他称作“街头阿拉伯小子”的儿童给我看。这些孩子在廉价的出租房里出生,因为父母付不起房租被赶了出来,如今流落街头。他们的脸和衣服肮脏不堪,好像是刚从矿井里钻出来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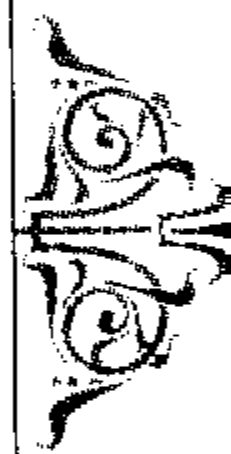
140

他说,在没看到这些男孩和女孩之前,他原以为不论具体境况如何,童年是人生中充满憧憬的时期。“看到他们,我常常想起你。”

他说,他们不是儿童。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不能作为儿童而生存。于是,为了他们,也因为他们,好像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生时期。只有在夜晚他们看上去才像儿童,此时,他们在门道、在楼梯井躺下,三五成群紧紧依偎在一起,你分不清缠在一起的是谁脚,谁的腿,谁的胳膊。有时候,你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堆外套、帽子和鞋。

“可我得提醒你,”他说,“你来这儿办事时会碰见这些人。他们会发现你是新来的,如果感觉到你怜悯他们,他们就会占你的便宜。像狗嗅到恐惧一样,他们会嗅到怜悯。他们会告诉你说自己的母亲或父亲或妹妹需要帮助,只有你才有这副好心肠听他们倾诉。一旦你相信了他们是如何的值得

^① 纽约意裔居民居住区。



得同情,你是如何的非同一般,他们就会把你领到一条背街,他们为之效忠的那群流氓会在那儿等着你。”

我们去了上东区,从第34街的茉莉山驱车到了第91街,经过了许多宅邸,相形之下,库克太太的房子像是小客栈。即使走近看,这些房子依然不像住家,倒更像旅馆或银行,整个街区到处都是。这些房子的前后左右都没有院子。

“在曼哈顿这地方根本就没有院子的空地。”库克医生说,“如果你想拥有这样的大房子,院子是没有的。不过,在乡下或者海边有其他的房子,跟这些房子一样大,或者更大些,周围有成片的空地。”

他把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52街的范德比尔特^①豪宅指给我看,还有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65街的阿斯特^②豪宅,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91街的卡内基^③豪宅。

我们游览了上西区,沿着滨江大道驱车而行,街的一旁有许多新建的宅邸,有些还在建造之中,脚手架上罩着帆布,好像不久就要被揭开。

我们去了坐落在中央公园西路和第72街的那幢名叫“达科他”的公寓大楼,库克医生就是借用这名字称呼他房子西侧那部分建筑的。这公寓有8层楼高,正面的圆柱上有许多三角形的饰物,顶上有尖塔,像埃利斯岛上的那些房子一样,第六层楼的栏杆被许多用大理石雕刻的宙斯和狮身鹫首怪兽支撑着。他说,在曼哈顿,这是他最喜欢的建筑。

“人们说,晚上站在楼房上面往北看,你依旧能看到棚屋区燃起的火。看见那些火突然冒出来,背景除了夜空什么也没有。这楼房方方正正,两边各有11排窗户。你瞧,从打地基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这里的街道甚至连路都没铺过。住在这儿的人不想铺路,以此阻拦游客和开发商到这儿来。有钱人,那些靠从事艺术、出版书籍和搞音乐的人,租这儿的房子住。西奥

① 范德比尔特家族修建的豪宅。最先由美国运输促进者和投资者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兴建,他从铁路运输和航运中积累了大量资金。他的后代包括其子金融家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1821-1885年),以及威廉·亨利的儿子们,铁路局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843-1899年),铁路行政长官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1849-1920年);铁路经纪人弗里德里克·威廉·范德比尔特(1856-1938年);以及乔治·华盛顿·范德比尔特(1862-1914年)。

② 约翰·雅各·阿斯特(1763-1848),德裔美国皮毛商和资本家,成为他那个时代美国最富有的人。

③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和慈善家,靠钢铁工业聚积了大量财富。

多·斯坦韦^①曾经住过这儿。那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这地方是城市的最西边。当时,从房子朝北的窗户望出去,人们能看见的只是树林、农场和满是棚屋的小镇。据说站在楼上的那些窗户前,可以猎杀到小野物。想想看,足不出户甚至不用下楼,就能打猎,那是什么情景?枪声一停,棚屋里的人便冲出树林,收拾猎物,有兔子、狐狸,然后在露天燃起篝火,烧来吃掉。”

他说,住在楼下的人是提着枪,乘坐电梯上屋顶花园的。当时,电梯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坐电梯本身就是很新奇的事。我能想象那帮人像群暴徒,涌出电梯,冲向栏杆,占据最佳位置。我能想象人们站在远处,注视着这幢楼,听着枪声,看着楼上、护栏旁冒出的阵阵硝烟,仿佛这幢楼的住户每晚都得捍卫他们的堡垒,抵御入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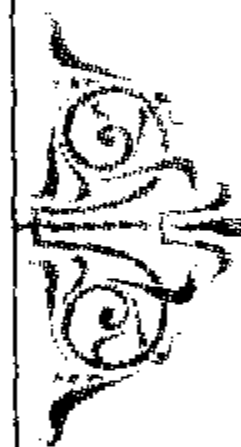
这建筑真的像座拔地而起的城堡,仿佛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后,整片土地正回归荒野之时,唯有这幢曾经是中心建筑的楼房还依然保留。它像一座堡垒,抵御着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我想起那些站在屋顶上和下面窗户旁的房客,瞄准棚屋小镇上的那些人,仿佛他们正准备入侵。

他的声音没有丝毫说教的语气,但从他的话中明显看出,对他来说,“达科他”就是划分新世界与旧世界,荒野与城市、贫穷与富裕的界碑。

库克医生称上城区是曼哈顿岛最北有人居住的地方。这地方住着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资助人,那些拿钱支持皮尔里最近一次北极探险并且相信他依然会成功的“百万富翁们”。库克医生在想,要是知道自己所资助的探险只是一场为了保全面子而在格陵兰毫无意义地拖延下去的逗留,他们会作何感想?

“贫穷的人各式各样,有钱的人也是各式各样。”库克医生说,“住这些房子的人,英国的贵族是最看不起的。他们不屑与布希威克啤酒大亨们交往,啤酒大亨们又不屑与医生们交往,医生们又不屑与顺势疗法医师交往。我对玛丽说,修建我们房子的那个游鬼利普休斯正是这种势利小人,因此他从不显灵。我们的有些邻居对利普休斯家族把房子卖给玛丽这样的女人不以为然。他们讨厌看到他们当中出现这样一个寡妇,她的前任丈夫曾经靠向忧郁症患者兜售骗人药物而发了财。他们倒是认可探险家,但只不过是向别人夸耀探险家就住自家的隔壁。”

① 19世纪美国著名钢琴制作家,曾作为房客在“达科他”公寓住过。



他这样说着，像个社会学家在发表客观的言论，丝毫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偏好或身份。

我看见，或者说我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这城市，因为我自己的双眼还不能看明白。无论是它的富庶，还是它的萧条；无论是它的奢华，还是它的贫困，这地方远远超出了我以前的所见所闻，太无边无际，太斑驳陆离了，在我的感知中除了留下混沌一片，一无所存。

他同意，这里的确令人惊愕，但如他所说，这里还存在着未来派的那种幼稚，那种追逐时髦的狂热，似乎那些所谓的发明创造总有一天会被人抛弃，那些为之而钟情，为之而投资的人将会成为笑柄，似乎这城市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未来世界的人会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个阶段。历史会把世纪之交的曼哈顿作为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极端例子记录下来。

他说，从我们经过的那些人的脸上，他看到了这种轻信，在一片乐观和躁动之下，他差不多也感觉到了这种轻信。他相信，每次听到什么新的发明，什么新的更好的做事方法，这个城市的人，或者说有些人，便愚蠢起来，这些人可以被称作社会的笨蛋。

“你知道这些笨蛋是什么人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

他说，不是有钱人，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发明家，更不是穷人，那些用自己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穷人。

“那会是谁呢？”我问。

“你和我。”他说，“中间这帮人。”社会的这部分人，他们的轻信和单纯成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是这座新城想要感动的人。它是不是想要感动那些街头流浪儿，那些住在廉价出租房里从不露面的房客？除了圣约翰斯，住在这里的人要比纽芬兰任何一处的人都还要多。在我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像雅各·阿斯特这样的富人因为布鲁克林大桥而张口结舌？不会。这城市是想诱惑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分享那些自己并未参与创造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享受得起，却不知它们的意义，无法掌握它们。

“是的，就像我这样的人。”他说，“至少像我在爱上一位碰巧富有的人之前的那个层次的人。”

他的话我几乎根本听不懂，更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滔滔不绝。

他用手指着那些头戴汉堡帽的人，这些人拄着拐杖，注视着蒸汽挖土

机在挖掘现场摇摇晃晃，茫然地呆望着—幢正在被拆除的建筑，这建筑比他们的年岁大一倍，此时此刻，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它行将灭亡。库克医生说，这些中产阶级的出现，要比把所有的创造发明加起来还要意义深远。

我们沿着中央公园的东侧朝西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又往南，再一次来到挤满人群和车辆的街道。

“这噪音似乎也是推动这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他说，“就像这昏暗、拥挤、令人窒息的环境。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了，纽约要以现在这个速度发展，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

大多数路面电车和高架火车都电气化了。头顶上到处都是电线，悬挂在城市上的俨然是一张松松垮垮编在一起的网。“不过，与阿米莉亚在这儿的时候相比，至少再没有煤灰和炭渣从头上倾泻而下了。”他说。

他既然提到我母亲，我便问他，他与她相遇时的那幢房子是否依旧存在。

“20年前的建筑几乎都不存在了。”他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补充道：“我想那房子还在那儿。15年前我曾经去过那儿。自从我最后一次在那儿当侍者之后，我就再没有从外面看过这幢房子。曾经拥有这幢房子的医生很早以前就搬走了。我也绕着道回避他们，还有他们的这幢房子。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那儿。”

“你愿意带我去那儿吗？”我问。

“如果你想看，你可以独自去。我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我只是想去看看。”我说，“我不想进去。你干吗不能跟我一起去？”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同去。”

“去那儿时你我之间的关系似乎就不那么神秘了。我知道这个秘是要保，但不是在你我之间，不像你要我叫你库克医生，即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经过那幢房子会唤起我痛苦的记忆，令人羞耻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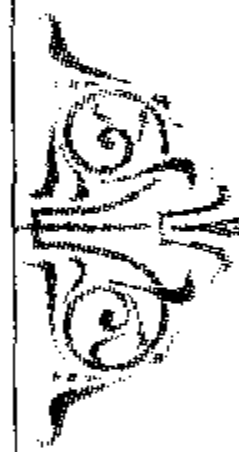
“可你看见我时肯定也有那些记忆。”

“那不一样，德夫林。”

“我觉得是一样。你不想去那使我感到羞耻。”

“这件事我们私下谈得越多，就越难在别人面前伪装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的死不是因为你。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我可以给你地址。你可以坐出租车去那儿，然后跟我在——”

“不，我厌倦了老是这么鬼鬼祟祟的。”我说，“假如有一天你改了主意，我们再一起去。”

他没说什么。

我们继续向前。过了一阵，我注意到我们正朝大桥驶去。街道远不及刚才那么拥挤了。布鲁克林上方的天空不再湛蓝。光线正快速地褪去。

“我在信中写给你的不全是真话。”他说，两眼紧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我是个出钱搭车的乘客。

我感到一阵恐慌。我将听到的会是什么？在这座城市里，好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此时此刻，即使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让使我感到自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格格不入。我真愚蠢，原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历史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是他的历史，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没有哪一点属于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等着他袒露那句真话：他终究不是我父亲；我的那些最坏的担心全都得到了应证；我是他儿子的说法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虚构出来的，如今，既然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进了他的生活，他这就要一吐为快，以便把我摆脱掉。终究，我不是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又成了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我浑身冒汗，感到虚弱，他赶紧抓住我的胳膊，没让我从马车上跌下来。

“在这儿不能告诉你。”他说，像是在大吼，又像是在耳语。“我更愿意赶着车在城里跑，而不是给你讲这些事。也许我本该独自一人出来溜达。”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证据。他也没有证据。不可能有证据。我相信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的话。他究竟是谁？除了他告诉我的之外，关于他我还知道些什么？因为我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法抗拒那些信件。等第一封信到来之后，这世界似乎不再狭小，未来似乎不可预料。

“库克医生——”

“我们在‘达科他’见面，我在那儿给你讲。”

第 15 章

他去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他妻子我俩有事要谈，然后在客厅与我见面。这是达科他最大的房间，我们可以坐在离门和墙很远的地方，尽可能不让我们说话的声音传到外面去。

即使我俩坐在里面，这个从未有人居住过的房间似乎依然空空荡荡，唯一的作用就是更增添了我不属于这儿的感受，犯下了某种可怕的、不可逆转的错误的感觉。即使回纽芬兰也不能更正这个错误，无论怎样都无法更正这错误。我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即使是仅仅在脑子里，我也要一直走下去。得知自己向往多年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也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就这样回去，还不如像我母亲那样一死了之，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毕竟还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以前，我只在梦里有这样的担心。

“你不是我父亲？”我悄声问。

“当然是。”他说，看上去很吃惊，接着不安起来。“当然是。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往别处想。从不会让你往别处想。我想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德夫林，请你不要有这种感觉，在我这儿你没什么可怕的。”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是何等的如释重负，刚才我是如何的害怕。这也许会使他怀疑我的情绪是否可靠。即使再一次得到了保证，我依然心存疑虑。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过分依赖他了，过分在乎他的认可，在乎满足他的期待，也在乎他满足我的期待，以为我俩所共有的是某种联系在一起的命运，这太危险了。不应当这样去依赖一个人，更何况这是个如此捉摸不定的人。

我俩坐在壁炉的两侧，摇曳的火光映在壁炉上方的镜子里，映在装饰华丽的镀金天花板上。虽然屋外很暖和，但他坚持要生火，说晚上这房间总是很冷。我们没有打开灯，不过即使如此，我依然能看见头顶上的吊灯，没有点亮但依旧发出微光，被看不见的铁链吊在天花板上，仿佛悬在半空。

我俩没有面朝炉火。他坐在沙发上，从那儿能看见两扇门。我没有跟



他坐一起，而是拉来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

“告诉我，”他说，“等我死了以后，等那些最容易受到真相伤害的人死了以后，你觉得你会做什么？”

“有些人已经死了。”我说，“比如我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他们的记忆？对我、我妻子、我的其他孩子的记忆？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你的记忆？”

“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我父亲。”我说，“没有人会知道。你应当相信从我这儿你没什么好害怕的。你是我父亲。”我父亲，父亲，我终于叫出了这称呼。听到这称呼，听到我没有按照保证只叫他“库克医生”，他打了个哆嗦。从此以后他会不会不再关心我，不再说我是他儿子了？可在信中，他却是经常用“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称呼的。

“我相信你。”他说，“如果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谁还有理由害怕真相？可现在的人要是知道了真相，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我一直在权衡是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犹豫不决。从你到来的时候起，我倾向于前者。希望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曾一度非常爱你母亲。也许比我更强烈。”

“他或许爱过她，但他肯定恨我。”我说。

“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18个月的时间，我了解他。有人给你讲过他吗？讲过他长什么样？”

“除了不得已，没人提过他。”

“我先给你讲弗朗西斯·斯特德。他根本不知道人的动机，好的或坏的，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他不觉得自己的性格水清可鉴，以为自己高深莫测，就像别人在他眼中的一样。

“他总是给我讲他自己的事情，以为这些事我很难想到。他总是一本正经，几乎严肃认真地自我袒露，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脱：终于有人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缺陷，那是多年来埋在心里的可耻秘密。

“‘我不善言谈。’他曾经说过，好像我从没见过他试图开口讲话。

“我简直不忍心告诉他，他喋喋不休向人袒露的那些事实际上都是常识。我让他变得像个孩子在说话，真的像个孩子。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假如他发现或怀疑有人拿他开玩笑，他会生气。并不是生他们的气，而是他自己，气他的举止言谈让自己成了傻瓜，但通常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笑他，但一般都是善意的嘲笑。他的‘故事’大家有点知道。我

们听说他抛开自己的妻儿来参加远征,听说他不在时,他妻子死了,不过详情不知道。我们大家以为她死于什么疾病。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妻子和他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他是谁。阿米莉亚只是曾经称呼他‘我未婚夫’。莉莉也从没说起过他。

“在探险者当中他颇受喜爱,他说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他为何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过,他们也笑他——笑他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笑他朝三暮四的追求目标,这些东西他夸夸其谈,好像已经实现了似的。今天是北极,明天又是南极,后天则是世界最高山脉的顶峰。

“要是他有自知之明,要是他明白自己并非天生伟人,也许他会成功的。但你听他讲话,好像伟人们已经把他算进了他们的行列。人们禁不住会笑他。

“‘我为什么经常被人嘲笑?’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他问我。

“‘没人笑你。’我说。

“‘妈的,我只是……’他说,‘为什么我不能……’他从来没把这些话说完,而只是东拉西扯的,更让人感到好笑。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是这次远征队里的吉祥物。在他看来,之所以成为吉祥物,也许是胡乱之中的选择。

“很明显,从远征一开始,皮尔里之所以雇他,是因为他能欺辱他。弗朗西斯以为皮尔里是他的朋友,因此对皮尔里的任性一味地迁就。

“远征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可怜他,因为皮尔里那样对待他,让他做最贱的活,好像皮尔里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弗朗西斯不肯屈尊去做的事。弗朗西斯,身为医生,却要倒垃圾,为皮尔里的住处扫地板,厨师病了还得顶上。在“风筝号”上的船员和付钱乘船的旅客当中有这种说法:船上有两个男仆一个医生,而不是两个医生一个男仆。

“不过,渐渐地,弗朗西斯变了。等到沿陆地返回格陵兰南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返回麦考密克湾的时候,他开始公开顶撞皮尔里了。当皮尔里在忙别的事情时,弗朗西斯两眼紧盯着他,似乎想与他对抗,不满皮尔里这样虐待他,不过此时的皮尔里已经尽量地不理睬他了。有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弗朗西斯紧盯着我,脸上带着他紧盯皮尔里时的那种表情。除了一开始皮尔里更乐意接受我的医疗建议以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对我不满的。

“弗朗西斯越来越令皮尔里讨厌了。他死后报纸上刊登的有关他的报



道大部分都是真的。有时，他离开船或红石屋，身上的穿着好像是要去希望公园散步的模样。他不止一次地脱光衣服，在冰冷的水中游泳，声称对冰冷的水没有感觉。他模仿爱斯基摩人的样子，蓄着长发，脸却刮得干干净净。

“他告诉皮尔里，等春天到来时，他不愿跟远征队的其他人回去，而是留下来跟爱斯基摩人在一起，他愿意过他们的那种生活。尽管很显然，弗朗西斯根本不可能抵达北极，甚至不可能再往更北的地方去，但皮尔里还是很愤怒。

“我们大家告诉皮尔里，弗朗西斯要么像许多探险者一样，是要‘返璞归真’，要么就是得了爱斯基摩人称作‘piblocto’的病，一种很快会过去的极地癫狂症。我告诉皮尔里，最好是迁就一下他，等他自己好转，但皮尔里却当面指责他的一言一行，这只能使他每况愈下。

“北极的夜晚降临时，他独自一人走到外面，来到一堆岩石旁，这成了他的习惯。他总是坐在岩石上背朝着红石屋，坐在背风、看不见他的地方。石堆中有一条类似长凳的凸出部分，他可以坐在上面，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此他得把腿放直伸出，否则只得蹲着。他不在那儿时，我自己曾去过一两次。在岩石上，在岩石前面的雪地里，有许多烟蒂和一小堆一小堆燃了一半的烟丝。

“不难想象，黑暗中他坐在那儿，浑身裹着毛皮，嘴里吞云吐雾，沉思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会一举成名，成为一名伟大的探险家。也许他相信，因为自己知道漫漫长夜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这些影响对他毫无作用。

“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回避与人交往。这种病态的沉思因为黑夜漫漫而无法抵挡。可黑暗却让他愚蠢地以为，与人交往是在浪费宝贵的精力。每天，当他离开房子时，他告诉我们说他出去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存办法。他把我们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某种错觉的症状，一种证明，这种错觉很可能会相互传染。

“不久，凡是我给其他远征队员开的处方，他都从中找茬儿。这些人极度虚弱，不知道到底该听我俩谁的。他说皮尔里锻炼得太多了，皮尔里太太最好不要锻炼（女人最好要做的总是与男人最好要做的相反）。他说范霍夫书看得太多，吉布森睡得太多，亨森又睡得太少。我们应当食用煮熟了的罐头肉，不该吃新鲜的生肉。过了一天，他又说完全相反的话，或者把

自己批评的矛头改变对象，挑剔亨森的睡眠方法和皮尔里太太的读书习惯，不过除了我，没人注意他在说什么。

“我不得不经常反驳他。没病的时候，其他人不会把他的话当真，但有病时，由于两个医生的意见相左，他们的心中便充满疑虑和害怕。他们不仅跟我吵，还跟他吵，甚至连皮尔里也这样，我提醒他不要再多吃罐装肉，他却告诉我斯特德医生说多吃罐装肉会增强血液循环。

“我甚至怀疑弗朗西斯是不是想通过乱下医嘱来破坏这次远征，不过，他焦虑不堪，几乎快要神经失常了，我怀疑他有没有能力谋划并且实施任何这样的计划，这样毫无意义的罪恶阴谋。

“每天早晨，我俩的巡视总是以争吵而告终，当着那些不知所措的病人的面，我俩大声争吵，直到最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出红石屋，几个小时都不回来。我只好劝那些最容易轻信他的人，或者身体最弱的人不要跟他一起出去。

“等他回来后有人问他时，他总是说库克医生的建议也不错，或者说那些既然早晨不听他医嘱的人，晚上就不应该来向他请教。

“他肯定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写他的日志的，因为平时没人看见他写过一个字。他走到哪儿就把日志带到那儿，厚厚的十几个本子，边沿已经磨得呈锯齿形了，最上面放着一本新的，每一页依旧是空白的。我想象他坐在月光下，手握成拳头，捏着铅笔，一边吐着烟雾，一边潦草地写着。在红石屋里，我只见过他阅读自己的日志，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像那些东西是别人写的。

“我们有三个月没见到太阳了，此时他的境况越来越差，我开始怀疑他是否还能康复。当时的天气很糟，就连他也不出门了。红石屋三面凹进一座小山，像是掘出的一个洞穴，只有房子的正面露在外面。

“暴风雪接踵而来，持续了几个星期。暴露在外面的那堵墙像一张床单来回地扭动，似乎抵挡不住狂风。那扇门虽然有好几层，每层跟地窖的门一般厚，但依然嘎吱作响，仿佛有什么巨人正试图挤进屋来。

“范霍夫蜷缩在离门最远的角落里，双手蒙住脸，战战兢兢地在呜咽，好像有人在揍他。皮尔里夫妇呆在帘子背后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吉布森坐在桌子前，两只手捂住耳朵，无法忍受风的尖啸。我努力让自己看书，却禁不住看着那堵墙，担心会不会被风吹垮。

“弗朗西斯不再挑毛拣刺，不再给人下医嘱了，他默不作声，慢慢地放



弃了随队医生的角色，变得非常消沉，不跟任何人讲话，甚至连我也不理，甚至连有人直接招呼他也不理。一开始，人们对他的这种变化似乎还很欢迎，但不久，看见他成天背靠墙壁，下身钻进睡袋里，像个紧张症患者一动不动的样子，大家开始不安起来。

“我担心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身体得了什么病，但给他做检查时，他好像毫无觉察。可以这样说，比起其他人，他要健康得多。那些人还以为他们会在某天的清晨一觉醒来发现他死了呢！”

“太阳再次出现的时候，天气依然很糟，可是当范霍夫指着从挡住窗户的木板边沿透进的光线时，他几乎是立刻走出了精神恍惚的状态。我觉得他的恢复太突然，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看到太阳，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会这样极富戏剧性地突然好转的。我们什么话题也不谈，只谈春天的来临，以及会搭上什么船只返回家乡的可能。

“一天，接我们的船只快要到了，我俩为两个爱斯基摩人看完病，翻过一个碎石山坡往回走，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向我吐露点事情，然后把我引到那堆岩石旁。

“他坐了下来，拍了拍石条示意我也应当跟他一起坐下。我照办了，以为他把我拉到一边是为了道歉。在过去的几周，他又履行起医生的职责，似乎很不好意思，不愿谈论过去几个月的事。

“在远征结束之前向自己的上司或队里哪个表现最佳的队员袒露心声，这并不罕见。后一种人往往是随队医生，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有他才真正有要干的事情，面对恐惧和黑暗，再没有什么比手上有事更能从中得以解脱的了。

“这些人私下与你相见，一是想知道回去后怎么向世人讲述自己的表现，或者怎么加以修饰，二是想让你确认，他们没有怯弱，没有丢脸。

“我决定一开始先狠狠地训他一顿，然后再尽可能巧妙地劝他今后不要再申请参加远征。

“他扫视了远处的冰川，叹了口气，身体再一次沉入岩石堆中，像是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上移了移重心一样，仿佛他的安排原来就是只看日落，他想让我做的原来就是给他做个伴。可是接着，他往前欠了欠身，收起双腿盘坐起来。

“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个妻子，还有个他抛弃了的儿子，原因是这孩子不是他亲生儿子。他说他妻子告诉他，因为喝醉了酒她被人占了便宜，可

是他不相信她。他说最近他找到了谁是这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没说怎么找到的。

“他说,他们订婚的时候,他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当时在圣约翰斯只有不到20个医生,包括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人。她不知道谁的嘴巴更紧,值得她信赖。

“于是,在他的诊室里,她把那件事告诉了他。她告诉他,因为有很多喝的,从走进那儿半个小时之后到她离开之前,究竟那次酒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记不得了。她说自己知道跟某人在一起,可就是记不清他是谁了。

“他的反应是她始料不及的。她原来想他会认为自己是故意背叛他。可他说,他相信她。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她没有责任,这件事由他们共同来处理。

“对于那个在她酒醉之后不由自主的时候占有了她的男人,他连骂也没骂一句,而是说他想给她做个检查,确认她的怀疑是否有误。她说这没必要,但他坚持要检查。

“‘好了,好了。’检查的时候,他不停地在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他检查的这个女人,过去他连吻都没吻过,从没看过甚至碰过她的身体,可现在却要确认她是否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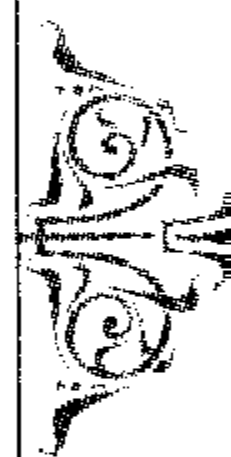
“‘这不能改变什么,真的。’他告诉她。‘就当我们收养了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告诉那些需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说是我让你怀孕的。他们想怎么反应随他们的便。我们相爱,这才是最要紧的。’

“他告诉我说,他讲呀,讲呀,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他想说服的是他自己。这个心中不存芥蒂,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应对,都会一样地钟爱自己妻子的弗朗西斯·斯特德,跟那个可能会第一个到达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同样,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说,他本该劝她考虑第二种选择,本该提醒她,既然他是医生,他们完全有办法永保她怀孕的秘密。除了他俩,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可他们没有说出这第二种选择。他自己坚信,无论怎样,他俩都会结婚的,而且会白头偕老。

“‘现在我才明白,她跟我结婚是为了那孩子。’他说,‘而且为了那孩子,她努力让我们的婚姻能维持下去。’



“她的一家，包括只剩下的姑妈、伯母、舅妈和伯父、叔父、姨丈，他的一家，也就是斯特德家族的人，全都知道了。斯特德家族的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相信这件事，就是他让她怀孕的，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但究竟该怪罪谁，他们却丝毫没有疑虑。

“她怀孕的事成了公开的秘密。婚期只好马上更改，因此许多被邀请的人都不能来了。他的弟媳妇作伴娘，可和你母亲几乎不认识她。

“弗朗西斯说他没办法，只觉得他们真正的秘密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全圣约翰斯的人都知道她怀的这孩子不是他的。

“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因为未婚夫而怀上孩子倒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假如果真如此，那些有关她的传言也不会让他心烦。

“孩子出生后不久，弗朗西斯似乎觉得他们三人还是有可能成为一家的。可他忘不了这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不是他的。除了他和他妻子，没人知道这个事实。他说他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兄弟。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老觉得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事。在他看来，自始至终人们似乎都在嘲笑他，因为他们觉得他迟早会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且现在笑得更厉害，因为他决意要证明他们错了自己对了的做法，其结果是恰恰证实了他们的预言。

“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蠢，没有看到他所谓的‘纯真’在首次面对真正的考验时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更使他痛苦：看到这孩子，还是看到他妻子。他感觉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怨愤、恶毒、仇恨。而在此之前，这些还仅仅是字面的东西。

“他尽可能地躲着他们，让人把晚餐送到书房。他告诉妻子为了确诊某个疑难病症，自己要在书房查阅资料。上午，他总是声称自己在工作时睡着了。

“几个月后这‘疑难病症’还是没确诊。有一次，他妻子开玩笑说，他试图确诊的那种病早就传染开了，第一个染上的人肯定早就呜呼了。他看着她，仿佛在说只有像她这样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如今，他对她说，她跟另外一个男人一起背叛了他，骗他结婚，骗他相信自己能抚养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好像是他自己生的。她得到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愿以偿了，既然这样，她还有什么必要假装爱他呢？

“一连几个月，除了同住在一起必须要说的话以外，他对她没说过多余的话。

“在那次，也是第一次爆发之后，他再没有，也再不会对她发怒了。

“她说了很多很多,想让他相信她依然爱他,他们的婚姻依然能够维持,但不论她怎么说,他都不肯回答,甚至连一点听到她说话并表示也没有,而是带着一种对这样无缘无故的批评早就习以为常的样子,干脆离开了房间。

“最后,他终于对她说话了,告诉她这样的生活不能继续下去了,好像是因为她在坚持,这样的日子才持续到今日。

“‘我已经想了好久。’他说,‘我应当改变自己的生活。’说完,他转过身,上楼进了他的书房。

“他已经决定要离开她和那男孩。可他不忍心就这么消失了,去到别的什么国家从头开始。他仔细查看地图,考虑过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可他无法想象自己在这些国度孑然一身的境况,为自己编撰出不太丢脸的过去,让人可怜他,或敬佩他。这些都只是些幻想。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彬彬有礼地对她说话,甚至不时地带着她误以为是宠爱的表情看着她和孩子。

“一天夜里,等孩子睡着之后,趁她正在前厅看书时,他从书房走下楼来,面朝壁炉站在那儿,开口讲话了。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到北方去。’他说。

“她等着,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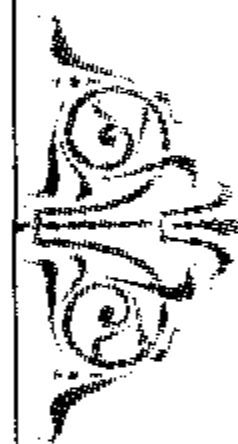
“‘拉布拉多希望谷传道团急需医生。’他说,‘我自愿报名参加,被接受了。只有6个月的时间,结束之后也许再延长6个月。这样我更有时间再考虑考虑。我经常在想,北方究竟像啥样。’

“他说:‘她的表情告诉了我两个事实:第一,她爱着的是另一个人,第二,她从没爱过我。’

“弗朗西斯在想:‘这另一个男人在哪儿?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他知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她如此爱他,可他是不是背弃了她?’

“弗朗西斯懒得向她提这些疑问。他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她是不肯松口的,对她来说,说出真情也为时已晚了。他无心对她说话,无心看她或那男孩,对他来说,仿佛任何谁都可能是他的父亲。

“就这样,他当上了传教士,后来又成了探险的人。他告诉我说,他不想被人遗忘,或者给人们留下坏印象。最好让人们觉得他抛弃婚姻是为了探险这个更加浪漫的使命,觉得他离开妻儿其实是极不情愿的,是因为他结婚后才发现自己天生是做大事的,可惜对于他的妻儿来说,这个发现来得太迟了。



“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干了一年。等他回到家，告诉她自己不再行医而是去北极探险，她彻底放弃了他。

“可他对她没有放弃。他说，他满脑子想的依旧是她和那个他不知名的男子。”

库克医生把面朝壁炉的脸转过来，看着我。

“故事讲到这儿时，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我、皮尔里还有他妻子之间的事。这话太突然了。在这之前，我感到忐忑不安，但在我看来这件事仅仅是个偶然。他的未婚妻因为另一个男子而怀了孕，而我也曾让一个订了婚的女子怀了孕。听到他讲自己的境况，我只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可这时他突然说：‘我知道你和皮尔里还有我妻子之间的事。’

“他知道跟自己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那个男子就是我。他知道我曾经做过的事。也许在远征队离开纽约之前早就知道了，否则就是皮尔里最近告诉他的。

“既然他终于让我大吃一惊，就没必要再提皮尔里了。但他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知道在曼哈顿的那次酒会上我不仅遇见了你母亲，其实还遇见了罗伯特·皮尔里。但弗朗西斯给我讲这段故事，这段我比他更熟悉的故事时，却用他一直使用的那种口吻，仿佛此时此刻我只是他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对下一步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皮尔里跟你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我问库克医生。

“他刚加入美国海军，军衔是海军上尉。”他说，“因为他接受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训练。酒会上他身穿军服，没人理他，我在信中曾说过，那场酒会是为了庆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毕业生而举办的。皮尔里的母亲跟这家女主人是熟人。似乎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朋友的礼貌，皮尔里才应邀来参加酒会的。

“他身着军服，再加上身高和体魄，还有搭配得当的红头发蓝眼睛，看上去非常英俊。可是，他似乎很尴尬，好像他不愿意这样引人注目，不乐意让自己的长相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女人。酒会上，看上去比皮尔里更不自在的人只有我了。我们四个有可能成为医学生的男孩为人端茶兑酒，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尤其感到格格不入。

“酒会上，皮尔里和一个即将毕业的医科学生发生了一场近乎于争吵的口角。好像是因为皮尔里最近突然跟一个年轻女子解除了婚约，据说这对那女子很不公。要么是那个年轻的医生对此事说了点什么，要么是皮尔

里误解了他无意中听到的话。皮尔里对那个年轻人吼了几句，一开始，那人一脸迷惑，接着变得好斗起来，他朋友只好把他从皮尔里身边拉开。

“皮尔里离开现场，来到吧台，我正在那儿招待其他客人。他默不作声地在那儿站了几分钟，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他正毫不掩饰地用蔑视的目光注视着我。

“‘听说你打算今后当医生。’我俩目光相遇时，他说道，尽管此前有所改变，但他的口齿仍略微不清。我看得出他依然因此而很不自然，很痛苦。我告诉他是的，我打算当个医生。他笑了，好像从未见过比我更无希望的医学院报考人，好像看到我这个双手抖个不停，酒和冰撒了一地，摔坏杯子的人，作为医生将会是多么的无能。

“我猜想他知道这次酒会的举办人因为可怜我，可能或多或少要资助我去读医学院。我无话可说。他的笑声终止时，嘴巴啪嗒一声合拢了，声音很响，后排的大牙咔嚓一声咬合在一起。我觉得他正准备用同样的口吻对我说话，就在这时，站在离他几英尺远正等着添酒的一个年轻女子上前插话了。她把脖子伸过前面人的肩头，大声说道：

“‘皮尔里上尉，看见你笑，我很意外。’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意外的。’皮尔里吃了一惊，嗓门提得像她的一样高。‘更何况我们从未见过嘛。’

“周围的人全都停止了谈话，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这个冒昧的年轻女子身上。

“‘你之所以笑，是不是因为在这儿比只跟你妈呆在一起时更快活？’她说，‘听说你妈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

“皮尔里又笑了，笑得比刚才更加做作，停止时嘴巴又一次啪嗒一声合拢，像是他还没能完全掌握的什么机械装置。

“‘小姐，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他说。

“‘梅·吉尔比说你从来不笑。’那个女子说，‘其实她说你只有为了不失体面才笑的。’

“很清楚，这个吉尔比就是跟皮尔里订婚的那个女子。这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因为这话被这个好像是无人陪伴的女子当众说出，似乎把皮尔里概括得完整无缺。大家都看着他，仿佛在衡量那个与他订婚的女子对他的评价是否贴切。

“笑声越来越响。皮尔里涨红着脸，大步穿过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



那里的人还不知道他的窘迫。

“那个出来替我说话，让他尴尬的女子就是你母亲。她的表姐莉莉给她讲过皮尔里和梅·吉尔比的事。

“几个小时后，你母亲的确喝多了，我把她扶上楼，当时你母亲跌倒在地，我单腿跪在她旁边，直到这时，我才又一次遇见了皮尔里。

“‘可惜那些觉得你那小玩笑有趣的人没来看看你们现在这模样。’皮尔里说。

“‘先生，她只是多喝了一点点。不要紧。’我说。

“皮尔里摇摇头，好像不相信。‘她一个陌生人，居然骂我亏待我的未婚妻。可她自己手上戴着订婚戒指却躺在这儿，搂着一个布鲁克林的送奶小子。’

“一定有人给他讲过我跟自家兄弟开了家小的牛奶场。皮尔里自己也是出生在缅因州的一座不大的农场上，不过他从不愿意让人提起这事。他俯视着我俩，笑了，然后从我俩身边迈过，朝走廊尽头走去。

“你母亲离开曼哈顿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遇见了皮尔里。当时我和你母亲在中央公园散步，莉莉在我们中间，正好看见他跟一个女的手挽着手朝我们走来，我看那女人是他母亲。你母亲和我相互笑了笑，那是两人之间的心领神会的笑。这就是你母亲说的那个‘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的女人。她这样昵称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俩朝我们走来，满脸阴沉，仿佛为了不失体面才笑已经成了他们家族的特征。皮尔里狠狠地盯着我们，好像他认出了我们，而且还猜到了我俩会心一笑的含义。我觉得，看见我跟你母亲在一起，他很吃惊。那句说她“搂着一个布鲁克林送奶小子”的猥亵话原本只不过是随便骂骂，简直没想到就是真的！

“他和他母亲从旁边经过时，皮尔里移开他的目光，大家都没说话。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好几年之后，他从圣约翰斯来到布鲁克林，而且阴差阳错地跟皮尔里交上了朋友。皮尔里并不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跟许多年前在酒会上讥讽他的那个女子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一次，弗朗西斯告诉皮尔里，他有个妻子和儿子在圣约翰斯。他告诉他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不过他相信这孩子的父亲就住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他把阿米莉亚讲的因为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的故事又讲给皮尔里听，可是他说不相信这是真的。当他说出自己妻子的名和婚前姓的时候，皮尔里知道了。这个女子为了庇护我，曾经讽刺过他，侮辱过他，他不会忘记，也不

会原谅这种事。他也记起了我的名字，他认为，那个处境卑贱的小子正是让他丢脸的起因。他想起了我们两个人，想起曾经在中央公园看见过我们，想起看见他跟他母亲在一起时我俩的相视一笑。他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了弗朗西斯。

“‘亲爱的斯特德，这不是什么谜。’皮尔里最后说，‘你老婆蒙骗世人说那孩子是你的，其实他的父亲是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斯特德，在曼哈顿的那次醉酒聚会之后库克和你老婆之间发生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很多人都知道你家里的那个男孩不是你儿子，甚至在圣约翰斯也有人知道，知道你不是他父亲。这些人一直在背后嘲笑你，已经许多年了。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作为朋友我再也无法容忍你这样被人愚弄了。当然，对于我告诉你的有关库克医生的事，我没法证实，而且假如你把这事讲给别人听，我也会否认曾给你讲过这事。’

“‘现在，你或许知道为什么皮尔里会那样对我。’弗朗西斯对我说，‘遇见他时我无亲无友，因此我崇敬他。当着别人的面，尽管他没有泄露我的秘密，但他总是取笑我，拿我开涮，开只有我俩才听得懂的下流玩笑，把我支来支去，为他和其他人跑腿。人家都知道我成了皮尔里的仆人，而我也毫无怨言地承受了这一切。’”

库克医生看了看我。“你可能会想：既然把我的事告诉了弗朗西斯，那他为什么还把我们两人都招募进他的远征队？按皮尔里的判断，弗朗西斯是个没用的乌龟王八，根本没胆量向欺负他的人复仇。至于我，当申请作为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医生的时候，我为了获得极地探险的经验，也把对皮尔里的厌恶搁在一边，因为我知道在他的带领下，我能学到很多东西。皮尔里接收了我，大概也是为了有利于远征队，他同样把内心对我的所有仇恨搁在一边。我们没有提及第一次相见的事。我认为，皮尔里觉得把我和弗朗西斯放在同一支远征队里会是件很有趣的事。看看弗朗西斯如何鼓起勇气跟我作对，这一定让人开心。他也许曾认为，弗朗西斯会公开谴责我让他妻子为我生了个孩子，因此羞辱我，还可能让我名誉扫地。我断定，他认为弗朗西斯不会有什么非常举动，危及那次远征。对于人的个性，他从来都把握不准。

“但是，坐在石凳上向我吐露真相的这个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那个任由皮尔里辱骂虐待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在表露出他知道我就是那个跟他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男人之后，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看着我。我竭



力保持着镇静。

“‘斯特德医生，我的确遇见过你妻子。’我说，‘可我们只是偶然认识。我跟她表姐莉莉更加熟悉。’

“‘库克，我是带着要杀你的意图参加这次远征的。’他说，‘我有很多次机会，不仅可以杀你，而且还不被发现。作为同事，别人常常看不到我俩，就像现在这样，有时候在某些地方，只要脚下一滑就意味着死亡。我只需把你推进哪条冰缝，然后向其他人报告说是事故。可我没法让自己这么做。我妻子在我离开她几年之后自杀了。她死了。我认为你有责任。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法鼓起勇气杀你。我签约加入这次远征，似乎就是为了把你拉到一边，把这一切告诉你。你就是我妻子的儿子的父亲，对此我不再怀疑。现在我相信了，好像相信就已经足够了。’”

“德夫林，你要知道我这是第一次听到阿米莉亚的死讯，第一次听到她是怎么死的。也许，他从我眼中看到了痛苦，那就是他的复仇。

“他的声音非常镇静，非常从容。我早该知道他只有最后一件未竟的事了。

“听到他曾经想杀掉我，我浑身发抖。虽然他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这并没让我安心多少。他能这样当面说起这些事，本身就表明他也会马上又变回来。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别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他身上好像没武器，可在我俩的医用包里各有一套解剖刀。他发现我在看着那两个包，并排着放在我俩之间的地上，用绳子缠好的两个粗麻布捆。

“‘别担心。’他笑了，好像如今在我脑子里的那想法早已在他的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如果你承诺为我保密，我会承诺为你保密的。’他把我的沉默当做了认可。的确，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他离开那堆岩石，回到红石屋。那天晚上，他走出那幢房子，就再没有回来。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跟他接近，所以皮尔里要我写了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份报告。

“回到布鲁克林，我与圣约翰斯登记出生和死亡的机构进行了联系。他们向我确认，阿米莉亚·斯特德的确已死，不过正式登记的死因是意外溺死。”

库克医生叹了口气，似乎他的故事讲完了。不过，可以肯定他没讲完，

可以肯定自从我来到布鲁克林之后他的心里还有话要说,有与他在信中的说法不尽相同的解释。可以肯定他讲的这些不是几小时前他曾提及的事情,当时,他的声音因为畏惧而颤抖,说他还有事情没告诉我,那是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能向我袒露的事情。

“我不懂,你没必要害怕什么。”我说。

“你母亲离开纽约回到纽芬兰后,还给我来了封信,不像以前我所写的那样,再没写信给我。”他说。

他把手伸进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把它展开递给我,双手突然抖动起来。纸上写道:

我最亲爱的:

我怀上孩子了,可他的父亲不是我的未婚夫。这两点我可以向你担保。除了我对你的爱,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以确定。如果你依然想娶我,你只须说是,我就会去纽约见你。因为我必须立刻得到你的答复,请用“莉莉”的名义给我发个电报,简单地回答是还是否。如果你说否,或者一周内没收到你的电报,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今后假如你给我写信,我也没办法了。请不要担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

爱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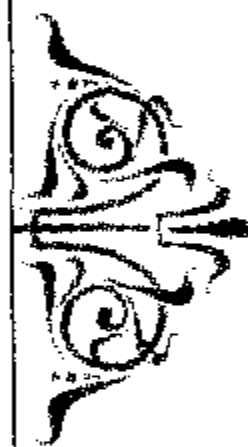
阿米莉亚

我读完信,抬起头,看见库克医生已经双手掩面了。

“这么说,中断联系的不是她,而是你?”我问。

“是的。”他回答,“‘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我知道她是说话算数的,无论如何她都会信守承诺。我的名誉,或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至少会拥有的名誉,会不受损害。为了她和我,还有你能一同生活,她几乎甘愿抛弃一切。可我不肯。我没有用上一周就下了决心,我甚至连给她发个答复是‘否’的电报的勇气都没有。德夫林,我甚至连个‘否’字都没给她。我只是照常生活,好像我们从没见过,让她别无选择,只好这样。你不知道对我自己的作为我是多么的惭愧,多么的后悔!

“我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说‘是’,对谁都不会有好处,我的背信弃义可



以得到原谅。我问自己，假如我说‘是’，我们两人还有孩子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失去了名誉，她也失去了名誉，嫁给了我这个没有前程的人，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贫穷和耻辱中成长。我有抱负，你是知道的。我也曾给她讲过我的抱负，讲过我在贫穷中长大，在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布鲁克林长大，紧邻那诱人的城市。可是，我也许会远走高飞，似乎那城市不可能有我的一席之地。作为年轻人，我决心要为自己争得这一席之地，要在某个方面成就功名，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她的未婚夫会毁掉这桩婚约，她怀孕的事会不为人知，孩子会生下，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抚养，送给别人，这样母亲和父亲都可能有希望过上好日子。

“我们赶着车到处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你母亲，我们带着莉莉也这样没完没了地转，只是为了大家在一起。我带她去过的所有地方，我也带你去了。大多数地方如今已变了样子，但它们仍然使我想起她，就像你一样。我一直将信将疑，觉得会在哪条街上看见她，坐在另一辆马车上朝我驶来，旁边坐着年轻的我。

“自从你到来之后，我随处都能感觉得到她的存在，像这样的感觉以前从没有过，即使在刚接到她的信后我在曼哈顿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只是闷闷不乐地为自己伤悲而不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

“阿米莉亚，还在大桥的这一半时，她的名字仍然在我的嘴上，可过到对面之后……也许这名字到处都写着，因为我的心中经常听到它。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抛弃她，就是为了这里，为了不在这里失去我的机会，为了不被挤出这里，可现在，与她相比，这一切似乎毫无价值。”

我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

“我妻子利比·福布斯在生产时死了，紧接着我们的女婴也死了，我想这是因为背叛了你母亲和她的孩子，上帝对我们的惩罚。”他说，“利比和孩子死了，可我没死。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死了，可我没死。我的未婚妻，利比的妹妹安娜死了，可我没死。就这样一次次我都没死，活下来了，似乎上帝对我的惩罚就是把不幸带给我珍爱的人，却让我自己得以幸免。

“我觉得在你母亲给我写最后那封信时，她其实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我的回信。那封信读起来像是在原谅我接下来的做法。

“我没法在信中告诉你是我背叛了她，或者说是我导致了她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亡，甚至可以说比我原先在信中所透露的要更加直接。我害怕要是告诉了你，你会不肯再接收我的信。我原打算永远不告诉你这件



事。可如今我们见面了……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你母亲，德夫林，好像她又回到了我身边，就像我们初次相见的那样，她就像你这年龄，而我则更加年少。

“说到为什么不让你回信，我有几个理由。我没有回复你母亲的信。因此，我的信也不要回复，这似乎最合适不过了。另外，我不忍心让你字斟句酌的回复那些误导人的信件。

“德夫林，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真爱的女人所生。玛丽，我也很爱她，跟她结婚不是为了钱，可是在我梦中出现的是你母亲的脸，那张可爱的少女的脸。要是你返回纽芬兰，要是你像我对待你母亲那样忘了我，照常生活，我是不会责备你的。”

炉火早就熄了，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

我说不出口，似乎觉得被生拉硬扯拽出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就像当初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那样。他和我母亲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的人，那么回事。

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我母亲曾经如此地爱过我，不过她还是抛弃了我。

我说：“我母亲的死因，官方说是个事故。但弗朗西斯·斯特德是对的。在圣约翰斯，人们都认为她是自杀的。”我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像谴责，等于在说：“因为你她才自杀的。”不过，这太晚了，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你最好还是走吧。已经很晚了。”我说。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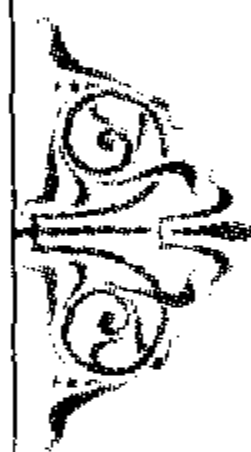
“我把母亲的信留下来。”我说，“过一阵就还给你。”

“晚安。”他说，默然无声地朝最近的那扇门走去，经过后没有把门带上。

等他的脚步消失后，我在原地又坐了一会儿。我想起了那卷书信，现在，它们已经蒙上了一层不同以往的色彩。我想起他第二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我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

虽然有些奇怪，但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失望，感到受到欺骗。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高兴。因为我似乎觉得，对他来说，他讲的这些，最坏的后果就是表露了他对我的感情。他是多么地害怕我会弃他而去！在此之前，他似乎很疏远，好像随时都会重新考虑是否兑现他的承诺，让我进入他的生活。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库克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像原先的那个人了。



信中以及在过去几周里的那个理想、完美的人不复存在了。这样的人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今晚，他向我吐露了自己最可耻的秘密。此时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想知道我会干什么。

我会留下来。

我依旧相信他，依旧信任他。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母亲写信的笔迹与她那张照片背面的笔迹做了比较。我尤其比较了两处的签名，信上签的“阿米莉亚”和照片反面签的“阿米莉亚”，她曾在反面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在我看来，两处签名完全相同。写信的那张纸因为年份久远早已起皱了。毋庸置疑，我母亲20年前是写了这封信。

我注视着床边墙上的那面镜子。“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她。”他刚才说过。可从我的眼睛里，我什么也没看到。

第二天他从外面散步回来，我经过他的书房。如今，要称呼他库克医生更难了。

“我想告诉叔母我现在很好，但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这句话更像是个要求。不过言下之意正是他所希望的。

“这个好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话时不正视我的眼睛。他看上去既兴高采烈，如释重负，又局促不安，深感自责。我想，此时此刻我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应允的。

“怎么办？”尽管我知道怎么办，但我还是问道。

“我想，可以最后一次利用你叔父。寄给他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叫他对她说是街上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塞给他的。”

“好的。”我说。

库克医生曾向爱德华保证过不会再给他去信，因此，又收到他的信，我想象得到爱德华的反应，想象得到在他看了信里的内容之后的反应。这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利用他，因为我向达夫妮叔母说过，会让她放心我的安全。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很好，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一无所求，只希望您在我身边，如今，我非常想念那种生活，但却不得这



样做。但愿过去的几周您没有太难过,但愿您不会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看不起我。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您我为何出走,不过,有些事情我得永远不予解释。希望借这封短信祝愿您和爱德华叔父身体健康。

您的
德夫林

这就是我递给库克医生的信。同时,我把母亲的那封信也还给了他。

“德夫林,这下好了,现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了。”他从我手中接过信,说道。

冬天,我开始独自一人去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帮库克医生送信,同时把别人给他的信带回来。他告诉我说,我真正在做的,实际上是去见我需要认识的人。

我继续在用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提包。我找到了一处藏信的地方:书房的那张桌子,只有我才有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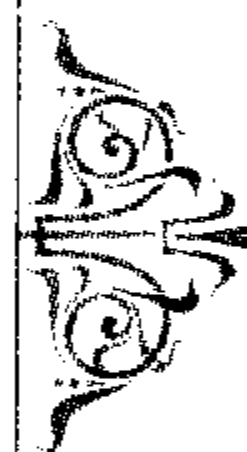
我的大部分差事都是去曼哈顿。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这座城市。在一张张脸庞上,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我都看到了希望。每天,报纸上都在说富人会更加富有,穷人会不再赤贫。有份报纸这样问道:“为何要怜悯那些搬运服装穿过街道的女人,或者孩子,要知道一年前这些人却身陷战争、饥饿和疾病?”报纸说只要这城市一声令下,那些没有光线、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廉租房就会拆倒重来,换成更好的住房。

这座城市一旦得以控制,它不可抗拒的汹涌能量一旦步入常规,一定会惠及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街头流浪儿。如今,这些人在我看来很乐意这样无法无天,他们打趣地调侃着一切,连路人也停下脚步,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在下东区,我再也看不见曾经见过的那迷茫的眼神了。我见到的是专注、果断的脸庞,看见移民们正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那是他们从展示在面前的各式各样的梦想中挑选出来的追求。

我无法让自己去怨恨那些富人,怨恨他们的豪宅或这座城市其他雄伟的建筑——大楼、大桥、巨碑、车站、雕塑、博物馆,正因为他们的金钱,这些

东西才拔地而起。看见这些建筑，你会赞叹不已，哪还有可能去抱怨它们呢？我为穷人感到悲伤，但并不把他们的贫穷归咎于富人。





第 16 章

库克医生对我说：“我相信罗伯特·皮尔里会把我算作他朋友的。我想他也知道我并没把他算作我的朋友，但他不在乎。在皮尔里看来，友谊是他施舍给别人的，至于有无回报，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我也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以前从没告诉过你这些。德夫林，想想看，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实现皮尔里征服北极的追求。”

他说自己应邀成为俱乐部的成员，出于面子，他不能拒绝。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征服北极的追求能成为这个俱乐部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他得与这里的成员们保持好的关系。

“如果皮尔里住在纽约而不是费城，换句话说，如果他出席俱乐部的会议，我是无法忍受成为其中的一员的。好在我们聚会时他几乎都不在。许多会议我都尽可能不去参加，这样不至于让我的出现过于不合时宜，因此，我要是退出，对我的名誉伤害不大。即使参加会议，除非被人邀请，我也很少认捐。”

我送信的对象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库克医生在信中经常提及的那些“资助者”，我把他们的回复和其他信件带回来交给库克医生。

他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他的雄心，或我的雄心。大家认为他对北极没有企图，他的目标是南极，再有就是攀登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北美大陆最高的山峰。他说，北极是真正值得竞争的目标，比南极更富于挑战性，因为南极是冰封大陆上的一个固定的地点，要想到达南极，你用不着去搏击游移不定的冰面、洋流，以及与你的行进方向相反漂流的冰块，因此，要想走 10 英里，你就得走 20 英里，多出来的那 10 英里在你睡觉时或被天气耽误当中抵消了。

“我不想让他们认为，在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我像是个什么间谍或颠覆者。我只是在等着让俱乐部的人认识到许多年前我就知道的结果：皮尔里



的日子快完了；如今，衣钵必须传给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最有能力完成皮尔里开始的探险。等皮尔里从本次远征回来，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从一开始，这次远征就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皮尔里是世上获得‘资助’最多的探险者。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抵达北极的事实已经让有些人在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能够征服它。我得消除这些疑虑，同时巧妙地引导俱乐部成员得出结论：皮尔里不再是他们下注的首选了。所有这些都做到，同时还不能过分得罪皮尔里和他最铁的支持者，这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指挥官皮尔里相互间的反感已经不是秘密了。甚至有传闻说从一定程度上讲皮尔里应对斯特德医生的失踪负责。在某些场合，很多人都批评他对斯特德医生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漠然。

“如今，你为我这样一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工作，其他成员也许会感到吃惊。不能让他们认为你对皮尔里抱有忌恨，或者我雇你暗含着我对他的敌视。你要装出支持皮尔里的样子，完全相信他的成功是注定的。这样会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担忧，以为你的出现将引起一场围绕那次北格陵兰远征的纷争，或者让人联想起那尴尬的往事。

“不要试图掩盖你的身份——表面上你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否则，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人们最终还是会知道的，因此，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如果你在那些资助者的面前感觉自然，他们也不会感到尴尬。”

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已经预见到我作为德夫林·斯特德将多么为难。对我来说，“斯特德家那娃”早已成了虚构，可对于其他人，他依然活着，而且永远都这样。

我很不愿意向那些俱乐部成员介绍说自己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他父亲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个傻瓜，是个对皮尔里不忠，最后自杀的倒霉的探险者。他们大多听说过我的“故事”，除了去年8月的一个下午在百老汇啤酒花园外偶遇库克医生的那件事。他们知道斯特德医生的故事，还有他妻子的故事。像“遗弃”、“自杀”这样的词语尽管没说出口，却在空中飘浮。

一个人问道：“你就是那个男孩？”就是大家都知道被倒霉的斯特德夫妇留在纽芬兰的那个男孩？

大多数资助者很快就把话题从斯特德医生跳到库克医生身上，对此我心存感激。我总是在他们的“公务间”里拜见他们，走进他们的豪宅之后往

右拐的那一个房间。在那些豪宅里,我所见到的,我预计将会见到的,就只是那些公务间。

“这么说,你就这么离开了纽芬兰,来到曼哈顿?”有个人问道,赞许地点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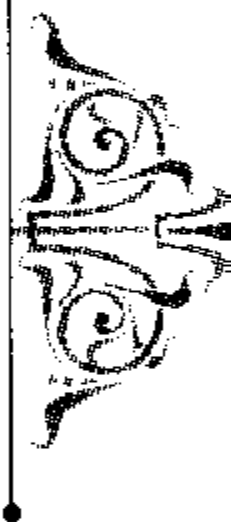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这些人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并不认为作为他的儿子会有什么发展倾向。在我来到的这座城市里,过去并不重要,这里没有过去,不仅我自己,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从头做起。那些资助者当中许多人都赞赏我没上大学,不过他们却坚持让自己的儿子上大学。大家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世纪之初成为曼哈顿的一名年轻人是无比幸运的,尤其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纪。

我真希望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来这儿是代表自己真正的父亲。我想告诉他们,库克医生雇用我或邀我住进他家,并非是因为他可怜我,或是出于对一个去世同事的责任感。

“给赫伯特·布里奇曼留下好印象,这是尤其重要的。”库克医生说。布里奇曼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干事,虽说出生并不高贵,也不富有,但权力很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助者信任他替他们做决定。当皮尔里为自己的远征多要钱时,俱乐部的成员也相信他。他说皮尔里的计划需要做什么修改就能增大成功的机会,他们就信以为真,接着便把这修改意见告诉皮尔里,仿佛是他们自己想到的。不过,布里奇曼也是皮尔里的吹鼓手。皮尔里需要他去说服那些资助者相信他的远征是值得投资的。除了远征本身的安排,布里奇曼帮皮尔里张罗了所有必不可少的事情,如筹资、宣传、巡回演讲、招募新人、采购所有装备(包括差不多每次似乎都得新购的破冰船)。布里奇曼还帮着皮尔里和俱乐部成员协调如何分配每次远征所获得的物品,如矿石、毛皮、一角鲸和海象的长牙、古物、展品(包括活生生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熊这样的动物)。总之,他赢得了双方的信任。他为皮尔里做的事情,库克医生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也能为自己做。

“我们是好朋友。他还是布鲁克林标准协会主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相信他知道我把自己看成是皮尔里的后继者,当然,我们之间没有明说。我敢肯定,只要皮尔里不再竞争北极,我就能让布里奇曼信服,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更有资格继任。”

我猜想布里奇曼有50岁,秃顶,头皮光滑,一点黑斑也没有,好像20岁起就再没长过头发。作为补偿,他鼻子底下的胡须却特别茂盛,已经开始



灰白了。他的眼睛在没秃顶之前就特别显眼，如今秃了顶便更加引人注目了，比原先更小了，审视的目光更难见到了。

“你父亲参加远征时，你一定很小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说，“实际上我记不得他。”

“我清楚地记得他。”布里奇曼说，但他没有显示出想要细说的迹象。他的眼睛似乎在问：他这样对待你和你母亲，你难道没感觉？你干吗要提着印有他名字的提包？好像我被我父亲蒙骗了，就像他被他自己蒙骗了一样。难道我这么愚蠢至极，居然把我父亲当成什么英雄，认为他的生活值得效仿？

“这么说你跟库克医生一起干啰？”布里奇曼问。

“给他干活，先生。”我说。

我能看见他的脑子在想：这孩子是不是以为结交了探险者就能理解他父亲？与他建立起某种联系？

尤其是在布里奇曼的注视下，我更加觉得自己像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代表、代理、替身。

卷三



第 17 章

一天,库克医生请我到“达科他”的客厅。他跟我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请他带领一支“救援队”去找皮尔里。此时,皮尔里和另两个美国人从费城出发已快30个月。我到纽约也一年多了。

“俱乐部跟我讲,‘皮尔里在北极失踪了,我们需要你的经验。’这话皮尔里自己绝说不出口。而且,若他还活着,即便我救了他,他也会痛骂救他的人。我觉得一个探险家是没法拒绝他们的。你也知道,自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以来,北边我只去过一回,我也一直想再去一次。”

库克医生说,探险家之间的潜规则让他得尽力救助皮尔里。此外,另外两个考虑也让他接受了北极俱乐部的要求。其中之一是,皮尔里并不知道,他离家期间,他的母亲和幼女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考虑是,乔·皮尔里和她女儿玛丽也在北极失踪了。自去年8月24日她们离开格陵兰的戈德港以来,便音讯全无。皮尔里夫人和孩子接到皮尔里一封信后离开了缅因州。皮尔里在信上说,他身体健康,本意是要让她放心,结果却截然相反。她跟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说,她要去把他“接”回来。现在还不清楚,她们是不是和他在一起。皮尔里夫人的计划是,只要安全和其他条件允许,要尽可能北上。如果无法找到皮尔里,便固守一处,等他回来。

“所以,原来那个再不和皮尔里来往的誓言得破掉了。”库克医生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我问他。

“很快。这次探险时间不会长,又在夏天,可以劝布里奇曼让你跟我一起去。我保证你会喜欢的。”他微笑着面对我。看我对这个意外消息那么兴奋,他笑了起来。我连磕磕巴巴说声“愿意”都没来得及,他便告诉我出发之前得干什么了。

“你要是回不来怎么办?”有天早上,库克夫人来办公室看他,我无意间听到了她的话。



这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可我对即将到来的探险却是兴奋远甚于恐惧。我只经历过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去世,自己的死看来还不太可能。虽说探险会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我仍然得忍受在极地环境可能遭受的磨难,我是不是太傻?我可没这样想。我觉得自己挺幸运,像被随意挑中去接受自己并不应得的荣誉。

我和库克医生坐洲际铁路到了新斯科舍的北悉尼。那儿,我们登上埃里克号。一起上船的还有几个小伙子,父辈都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这些交钱的客人付了此次行程几乎一半的费用。他们大多要在拉布拉多和南格陵兰下船,打完猎后再乘这艘船返航。他们有自己的船舱,简陋而局促的空间让他们不停地抱怨。看到我比他们年轻,又没什么特殊地位,竟可以跟库克医生共享条件稍好点儿的船舱,牢骚便更多了。

库克医生平息了他们的不满。他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很快,他们便相信这将是我唯一一次北极之旅了。这次行程会了结我多年夙愿,可以亲眼看看这块父亲失踪于此却连尸体都无从找寻的土地。现在,这些年轻人对我有了种夹杂着同情与敬畏的心情。他们和我保持距离,似乎既不愿打扰我的朝圣之旅,又不想让我看起来肃穆凝重的样子扫了他们的兴致。

我和库克医生住的是船尾的船长舱。说是船长舱,几乎没什么家具,舱顶也很低,比布希威克街670号的储藏室大不了多少。为我修的铺位顺着墙,在库克医生的对面。铺位像一只大号碗柜抽屉,侧面有护边,天气恶劣时我便会摔下地板。房里每件东西都捆着,或是绑着。一张橡木桌和一把缺扶手的椅子固定在地板上。得硬挤才能坐进那把椅子。椅子直挺挺地立着,或许对某个家伙来说,它到桌子的距离刚刚好。可库克医生要写点儿读点儿什么的时候,只能坐个椅子边。

库克医生带了一大堆书。他把书塞到舱里空间狭小的架子上。架子的横木条能拆卸,可以防止书掉下去。“你会有很多空闲,”他说,“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的都多。你有机会读这些书了,没读过这些书的人不算受过教育。”他说这些书自己都看过,现在要仔仔细细再读一遍。他告诉我,要不是有这些书,他就捱不过在比尔及亚号上的那段时光。那条船为穿越南冰洋,在浮冰中进进退退了13个月。我扫了眼书脊上的名字,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帕斯卡、霍布斯、斯特恩、菲尔丁、梅尔维尔、达尔文、托尔斯泰等。上大学时,库克医生只学了医学和其



他学科。他算是自学的，自己琢磨哪些书值得花费时间，然后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攻读。

埃里克号来自纽芬兰，是条又大又黑的猎海豹船。因事故受损后，船体用14英寸厚的橡木方板做了加固，希望抵挡得住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浮冰。船敦敦实实，猎海豹用的超长斜桅从船头笔直挺出，足有三分之一船身那么远，颇引人注目，看上去就像一只带个加长壶嘴儿的大茶壶。

船尾桅杆上离甲板100英尺处，也就在比其他桅楼正好高出30英尺的地方，有两个圆桶。圆桶里会有“看冰人”值守，他们得透过前方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观察海面的情况。

我们于7月14日离开北悉尼，穿过圣劳伦斯海峡后，沿纽芬兰海岸线到达贝尔岛海峡。7月21日，我们绕过位于拉布拉多南岸的日光角，一些猎手在那儿上了岸。接着，跨越缀有片片浮冰的拉布拉多海，我们向格陵兰的韦尔角进发了。

我们泊进了格陵兰南海岸的戈德港，剩下的猎手也都于此上了岸。这儿的丹麦总督告诉库克医生，他没有皮尔里的消息。有爱斯基摩人说，皮尔里和他的风向号已经失踪，而皮尔里夫人和她女儿都在乌佩纳维克，母女均安然无恙。

要到达乌佩纳维克，我们得穿过乌玛纳克峡湾。整个峡湾几乎不可能碰到什么厚冰，看冰的水手便从桅杆上下来了。我请求库克医生说服布莱克尼船长，让我们也爬到那些桶里看看。我的印象是他会把库克医生的任何要求都当做命令，他的回答却是，只是因为现在风平浪静，才准许我们上去。船长是加拿大人，刚刚受雇。过去10年他一直给人油漆房屋，从海军退役后，只能以此为生。

库克医生和我爬上桅杆的梯子。他等着拉在后面的我。他告诉我，要看一格格的天梯和自己的手，便不会头晕。尽管没风，船仍然随着海浪左右摇晃，在甲板上时我根本都没觉察。越往上，晃动得越厉害。横桅在收起的帆的重量下吱嘎作响。我爬的桅杆像棵树一样左右摇摆。我越来越觉得它会在我的脚下折断，会把横梁上的我摔下去。

“你的桅杆在摇晃吗？”我冲着库克医生叫道。他离我大概20英尺，可万一我有什么麻烦，那距离却像有整整一英里，根本没法帮得上我。

透过网一样的绳索，他向我安慰地笑了笑。“到桶里以前不要往下看！”他喊道。“我先爬上去，你看着我的样子做。”

桶没有门，我们得先爬到上沿，然后蜷下身钻进去。看着库克医生敏捷的样子，我只能盼望就算没那么灵活也能做到。他手脚并用绕过桅杆。有一阵子，脚下除了些绳子，没什么东西能接住他。梯子到桅杆远端时，他轻松地钻到了桶里。我能看出来，他肯定已经爬过好多次了。

“该你了。”他说道。最难的部分是从一边爬到另一边。我没像他那样手脚并用绕过桅杆，而是左手和左脚勾住梯子，右手右脚绕过桅杆。要不是因为腿长，就得像库克医生那样做，不然就得灰溜溜地从梯子上下来。我右脚先勾到横梁，然后右手也勾到了。

“快了。”库克医生说道。“放开左边。”我照做了。一下子，我两手抓住了横梁一端，要命的是，我双脚也站上来了，全身重量都压在横梁的一端。我赶忙换开手脚，抓住横梁另一端，钻进了桶里。我坐在桶里，上气不接下气。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心还在怦怦地跳。

“德夫林，”库克医生大叫着，“德夫林，你没事吧？”

“没事！”我喊道。我意识到自己正从一只桶里看不见的地方大喊大叫，他肯定会觉得我好笑。我挣扎着站起身。他肯定是先看到一只接一只紧抓桶沿的手，然后是慢慢探出的脑袋。我从桶里伸出头时，正好背向他。我转过身，想着他肯定会有些同情与担忧的样子。出乎意料，我只看到他开心的笑容。“我那样更容易些。”他说道。我们都大笑起来。

桶有我的胸那么高。我把胳膊靠在桶沿上，向峡湾深处望去。目光极处的峡湾成了模糊不清的一个点，一道黑色的印记，相隔50英里的峭壁交汇一处，如铁轨一般。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层撒落下来。

我能看到陆地上极远的地方。目光越过只有野草生长的山丘。野草每年六月从融雪里钻出，九月下雪时，又顶着积雪生长。目光越过夏季时变软的冰川，它的边沿已在几个月前成就了座座冰山。我一直能看到那些冰雪几万年前便开始永远占据的地方。

库克医生边指边说：“麦考密克湾离这儿西南方600英里处。”那是红石屋的所在地。

出发前他曾告诉我，皮尔里几乎不可能向北走那么远。在此条件下，我们也一样办不到。

“你觉得底下的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问道。我们往下看了看甲板上的几个船员。



库克医生摇摇头：“脸冲什么地方，声音就往哪儿走。”他正好冲着正前方。我点点头。

我在看风景，而他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我。只是偶尔，他的眼睛会扫过那些让我迷醉的地方，然后又盯着我。他渴望看到我的表情，渴望看到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峡湾、狭谷、冰川与冰山能给我怎样的感受。我每次看他，他便笑起来。接着，他会愉快地观赏起风景，如同我的表情可以帮他追忆起初次见识这些景物时的感受。

“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去那儿的。”他盯着北方的地平线说道，仿佛在想象远方的某个地方——是极地，是北极点，那儿会揭示我们面前所有的秘密。我无法想出何处能比得上他带我到过的地方。

“我们要第一个到那儿。”他说道。我从未从谁的声音里听到过这样的热情与渴望，甚至教士谈论天堂时都未有过。如同只有第一个到“那儿”的人才能真正见识那个地方。等到我们到过后，后面的人只能看到改变了的地方。

我们目睹了一座冰山崩裂的景象。这种冰山夏末并不多见。崩裂不是由于融化，而是因为早在晚间便已开始的冻结。夏天的融冰期，水流到裂缝处结成冰，裂缝不断撑大。如此反复，裂缝每晚都会变宽，引出的其他裂缝如叉子般分布，仿佛冰体上的树状闪电。冰山深处时不时传来炸弹爆炸般的声音，虽然每次爆裂声都好像经过消音处理，还是会引发一轮躁动，于空气中带来一丝悸动，峭壁上已松动的岩石和石板也有一阵颤动，好似一次小规模雪崩。虽说这种种不安与律动会在到达水面前便消散掉，我们有时仍能听到“嘭”的一声，有如一块岩石波澜不惊地滑入了水中。

库克医生说，这些裂缝会在明年春天，或者后年，或者十年后的春天造成新的冰山。只要冰的重量是这样压在上面，迟早它们会崩裂。

“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两个掉下来的冰山。”库克医生说道。它们或许个头不大，不是那种能漂流到南边，圣约翰斯人春季爱看的冰山。即便如此，它们也比我所见过的冰山大。

我觉得很奇怪，冰川表面和裂缝壁上脏乎乎的，灰色棕色混杂着白色绿色。我原以为冰山都该干干净净，就如每年春天漂过格陵兰的那些一样。库克医生告诉我，那是因为冰山外层在漂流过程中融化了。在这儿，冰山表面上有夏季风暴时裹挟来的沙子，从海岸群山上流下的溪水也让泥沙淤积起来。更别提各种鸟的粪便了，它们每种都有成千上万只。



库克医生说,如此暴露于空气中,加上周而复始的消融与冻结,会产生类似生锈一样的化学变化。只有在海岸边上,时间又比较长的冰才会是这样。若是深入内陆,深入北部的话,那儿的冰雪终年不化,山峰也是从冰雪中挺拔而出,表面并没有土壤,冰面看上去就几乎完美。但真正完美的冰只有在极地海域才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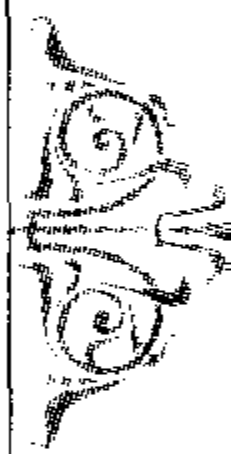
每晚,表层之下的冰都在不停爆裂,声音也因为峡湾的阻隔形成回响,仿佛两支距离遥远的军队正在作战,却都宁愿在夜间交火。爆裂也向水面送来道道涟漪,大小恰能使抛锚的船上下颠簸。水波轻拍船身,如同微风拂过一般。

夜晚越来越冷,爆裂声愈发频繁,交火亦愈加激烈,如有两支军队正向我们奔来,一支在溃败,另一支在乘胜追击。库克医生告诉我,爆裂声的频率若是降低,便说明白天冰融化得不多了,夏天差不多已快结束,我们也该离开了,除非我们想在这儿和皮尔里一起过冬。

溃败的部队似乎要进行一次最后的抵抗。有天晚上,冰川那儿传来了持续不断的爆裂声。早上,库克医生指着一大块冰说,他觉得这块差不多要掉了。

布莱克尼船长让埃里克号在看上去根本不会有冰砸下来的距离上行驶,这份谨慎很有必要。要是冰山够大,它落下时激起的层层波浪不仅能损坏船只,甚至能让我们沉没。

听上去好像有大树正被人慢慢地扭曲、折断,无数的树木都在吱嘎、刺啦、噼啪作响。噼啪声加剧起来,似乎有格林机枪的速度。冰层锯齿状的边缘冰块参差突兀,标示出冰山一侧可能的形状。巨大的冰块从顶端滑落,将水面搅成一团白色。噼啪声的间隔愈来愈短,最后变成一个声音。年代久远的冰块断裂时声音震耳欲聋,接下来的尖利声让人毛骨悚然,如同刚才断裂的只是枝枝杈杈,现在则是大树的树干了。我本以为过程仅此而已,只是巨大而缓慢的断裂,其间有动人心魄的停顿。可突然之间,整个冰块快速无声地冲入水中,好似一直维系它的缆绳被割断了一般。有那么一刻,会突然觉得似乎根本就没有崩坍,一切痕迹都给抹去了,既不曾有过溅落,也不曾有什么响动。接着,刚被击散的海水又突然喷涌而上,如同有座冰山那么大的家伙从海底被推上来,又回到水面上。眼里所见,耳中所听便只剩下水。浪涛汹涌,水花飞溅,仿佛一切平息后,如冰块般呆滞的物件是再也不会出现了。涌起的浪头如喷泉般持续数秒。随后,最先腾起的浪头



落下，激起另一波稍小些的，时间恰在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刻。冰山巨大的躯体滚动着，身旁浪花翻腾，仿佛深邃的海底潜藏有无数引擎，正悄无声息地推动着这一切。

冰山还在翻滚，表面还未全部显现，可已能看到夹杂冰块的层层海浪向我们冲来，撞击到船身上，而船就像浪间跳跃前行的烈马。每次浪头打来，我们就好似迎头撞上了另一条船一般。又如同我们正在河中穿行，而激流中密布的尽是卵石般大小的沙砾。冰块如冰雹般不停地撞上来。

海浪平息后，冰山冒出来，依然踉跄摇摆，上下跳动，似乎要朝如生锈般的一面倒去。接着，山体向后缓缓摆去，生锈般的一面浸入水中，冰山白色的下腹冒了出来。此时，冰山已不再上下跃动。它向上浮起，似要急于展示一下，经历过如此的辗转翻腾之后，它已悟得浮在水上的诀窍。一分钟前，海面上还只有埃里克号，如今，它要和这座无人驾驭的航船分享水域。庞然大物好似被海面上的倒影支撑着，它的水下部分若隐若现地隐藏在极深的幽暗处，我都觉得它一定是在海底行进了。

冰山平静下来之后，船员与乘客间响起一阵欢呼声。冰山的海面部分刚高过主桅杆，离水面约100英尺。也就是说，水下部分至少有800英尺深。

可是，有如其他迟到的冰山一样，它的寿命不会太长。阳光下它会融化，会在冰面上形成多条缝隙，雨水和海水会从山体冲下。它会神出鬼没地到处漂流，就像一艘没有船员，只有舵手舱露在水面上的海难船。形状的变化会引起重心的变化，长久以来隐没的部分会随着冰山的翻转重见天日。

我们的船并无大碍。我们绕过冰山，开始了一段峡湾里没有浮冰的航程。

在乌佩纳维克，没人知道皮尔里的任何消息。

我们起航驶向更北的约克角，8月1日半夜到达。布莱克尼船长拉了三声汽笛。没多久，爱斯基摩人的皮艇就从岸边划来了。很多爱斯基摩人登上船，其中三个曾在北格陵兰的探险中作过向导，他们曾和弗朗西斯·斯特德一道工作。库克医生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斯特德医生的儿子。他们似乎觉得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援救我父亲，于是话语中便有深深歉意，就如同他昨天才和他们分手，他们却已不知他的去向。他们盯着我，似乎要度量出我的失望和悲伤。三人中最年长的叫斯普斯，他正与库克医生交谈，语速快而柔和，仿佛在替他转达从哪儿来的讯息。他告诉库

克医生，皮尔里要么在伊塔，要么在英格尔菲尔德湾。库克医生接受了请求，让他们与我们一道去伊塔，把他们的皮艇放在了船上。

离开峡湾转入伊塔狭窄的水域后，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件事物便是海滩上爱斯基摩人的村庄。一簇簇的皮帐篷，像我在书上看到的棚屋一样。“夏天爱斯基摩人便住在这里。”库克医生说道。“海岸上面就是海象聚集的地方。”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的人从山顶跑下来，很快我就知道，他们中大部分就是风向号的船员。

伊塔是个凹进颇深的港口。平静的海面上泊着风向号。船只完好，船帆收拢，似乎几个月来没有动过。船长叫山姆·巴特利特，个子不高，是个壮实的纽芬兰人。他一直盼着有船能带个人来，一个有权让他的船和船员与皮尔里，还有他的探险解除合约的人。

罗伯特·巴特利特是风向号上的大副，也是船长的堂兄弟。库克医生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都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也都安慰了我。他们说，他们住在布鲁克林，但夏天常常在纽芬兰度过。我在思忖，冒险结束后，他们得花多长时间去把我的事儿传扬开。

船只用绳索系着，并排泊在一处。船舷上缘碰到一起时，就用捆着绳子的跳板隔开。和埃里克号一样，风向号也是捕海豹船。两船看上去非常相像，或许原本就是姊妹船。两根船首桅杆就像一对獠牙一样。

“皮尔里在哪儿？”库克医生问道。巴特利特船长指指海滩。岩石遍布的山那头儿，背风处立着顶皮帐篷。他说皮尔里身体很差，有一个月没离开过帐篷了。这段时间唯一见到他的人是他的黑人随从马修·亨森，现在就坐在离帐篷入口几尺远的地上。

说皮尔里在“睡觉”的爱斯基摩人都躲着他的帐篷，风向号的船员们也躲着。他把自己关起来的头一天，曾有人隔着帐篷问过他何时返航回家。巴特利特船长告诉我们，皮尔里平静地问答说，下一个问此问题的人会挨枪子儿。

乔·皮尔里和六岁的女儿玛丽在她们的船舱里。自打皮尔里夫人发现他和一个爱斯基摩妇女有了个孩子，她们便谁都没来看他，也没和他说过话。她是自己发现的。她碰到那个爱斯基摩女人，背上正背着那孩子。是个男孩，肯定是皮尔里的，头发和他爸爸的一样红，眼睛也一样蓝。皮尔里夫人形容那女人“几乎没有人样”。那女人却觉得，既然和同一个男人都生了孩子，她们就应该是“同事”。



皮尔里夫人原打算夏天在格陵兰岛上过6个星期，她已经在伊塔停留13个月了。从她们到达算起，她和玛丽也已经离开家5个月了。

有人在门外告诉她，说有艘来接她们的船刚刚穿过狭窄水道。皮尔里夫人答道，她已从舷窗看到了。她不愿离开下面，她想和救援队的领头单独谈谈。

“皮尔里指挥官不在时，他母亲去世了。”库克医生说道。“我觉得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皮尔里夫人还是愿意亲自把这个噩耗告诉给他。”

船长带领库克医生来到风向号的甲板下，他说医生进去见皮尔里夫人的时候，他会在外边等候。

约20分钟后，他们走上甲板，皮尔里夫人跟在后面。这大概是风向号驶离费城后她第一次出现，而脸上已是一副习惯于别人注视的表情。身上衣服很厚，像是为应付科尼岛寒冷的日子。她穿条哗叽布裙子，齐腰长的斗篷系在身前，扁平的帽子带着有斑点的面纱。她头发一定很短，全塞进了帽子，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就像没有一样。她很瘦，脸颊两侧因为没有头发，显得更加消瘦。她下巴是尖尖的V形，V形的两边连着深陷的耳后。她脖子更细，脖颈后面的中间也都洼陷了下去。

只一下，她便显出各种的疏离：一个女人与一群粗鲁男人间的距离；一位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和一群既无地位，亦不理解其价值的男人间的距离；一次需要听从船员摆布的冒险，而航海旅行史上却从没比此更糟的记录；不管她在北极生活多久，也不会变得和爱斯基摩人一样，这是白人妇女与爱斯基摩人的距离。我记起10年前，达夫妮叔母看到皮尔里夫人在格陵兰探险所拍的照片时，曾说过“她是多么非同寻常的一个女人啊”。

疏离、非凡但却不协调。好像库克医生和巴特利特船长从下面带来了个囚犯，最后她得来证明自己的无用了。

从她或库克医生的举止上，看不出他们曾彼此熟识。他们如同只曾多年前在某次晚宴上说过几句话的人一样。可他们曾于赴北格陵兰探险的途中，在相邻的船舱里生活过18个月。在红石屋的那段时间，更是被暴风雪所困，他们只有一块临时的帘子相隔。我觉得拉起那样一块帘子，不仅是为夫妻俩留点隐私，或是把探险领队与其下属分开，也是要把皮尔里夫妻和比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分隔开。看着皮尔里夫人，我不怀疑，鉴于她的性别和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便是在北极数月的长夜中，她肯定也总和库克医生以正式的社交准则保持距离。两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在她那

边更明确。甲板下相遇的一刻，他已不是带领人员救助她的探险队指挥，而又变回她的仆人。

我们看着库克医生陪着她，乘坐两个船员划的船到了岸上。她和库克医生一同向那顶帐篷走去。离帐篷还有三分之一路程时，库克医生停下脚步，皮尔里夫人独自向前走去。

她走下海滩，默默地而又不失风度地拒斥此处的原始与荒蛮——拒斥它的境况、纬度、地形、当地土著，还有她无法了解但丈夫却一直生活于此的环境。

她掀起帐篷帘走了进去，库克医生坐在一块岩石上等她。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库克医生走到她身旁。觉得皮尔里听不到他们说话声时，两人停下脚步。皮尔里夫人背向码头，两人面对面说了很长时间。她突然转过身，好像库克医生的什么话惹恼了她。他又追上她，一同走到了小船上。

他们回到了风向号上。皮尔里夫人脸色依然苍白，她回到了自己的船舱。她告诉库克医生，几个月来，这支探险队都没有医生，原来的医生戴德里克被皮尔里从伊塔赶走了。皮尔里怀疑他想破坏这次探险，觉得他有意破坏探险储备，还与爱斯基摩人一道反抗他。戴德里克医生住在海岸上面几英里外一个更小的村庄里，两人远远地僵持着，都发誓说决不会先回家。皮尔里认为要是他走了，戴德里克便会自己向北极进发；戴德里克觉得，只要他在格陵兰，便是对皮尔里的折磨（折磨皮尔里已成为他这次探险之旅剩下的唯一目的了）。长期毫无意义的荒野生涯，与世隔绝而无精神寄托，两人所剩的信念就只有看谁能耗过谁了。妻女都已到来，他也不愿从可能击败戴德里克医生而荣膺安慰奖的竞赛中退出。虽然他也不断告诉自己，雪再次落下时，他要重新踏上极地之旅。

他妻子告诉了他母亲的死讯。只过了短短几分钟，他却又开始琢磨起戴德里克。她把他母亲的死说了好多遍，每次他都会哭上一会儿，然后便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好像他不仅忘了她跟他说过什么，就连她站在这儿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马修·亨森陪伴库克医生上了岸。他走到那顶帐篷前，钻了进去。

几个钟头后，库克医生回来便去了皮尔里夫人的船舱。他告诉她，无论如何她得劝他马上回家，他不可能活得过北极的下个寒冬。皮尔里夫人答道，都试过成千上万次了，以他目前的状态，她看不出自己能办得到。另



外，既然库克医生是受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之托来接她丈夫回家的，无论如何他也应该去试试。

“时不时皮尔里觉得我就是戴德里克，然后倒霉的亨森得赶紧按住他，要不他便会冲上来打我。我给他做身体检查，他似乎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问他有什么症状，他也不理我。”库克医生告诉我。

“做完后，我告诉他不能再探险了。如果还要，肯定会失败。以他的身体条件再去探险，一定会送命。我本不愿这么直率地告诉他，但这可能是劝他离开最好的办法了。”

库克医生说，皮尔里现在既憔悴又虚弱。他皮肤没有弹性，耷拉在骨头外面，像袋子一样。因为多年前的霜冻，他只剩下了八个脚趾头，创口疼痛却无法愈合。和戴德里克的争执，他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几个星期都没怎么吃饭，几乎一年都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他只吃罐头，不吃爱斯基摩人给他的鲜肉。

“他苍白的脸色真可怕。”库克医生说道。“他眼里无神，好像知道游戏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但他宁愿让人觉得他是死于探险，也不愿让人说他半途而废。我跟他说，他没法再在冰雪上行走，没有大脚趾，就没法穿雪地鞋。‘别跟别人说我没有脚趾头，’他央求我，像个要人哄的孩子。他害怕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尤其怕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知道。他说他要在这儿再呆一年，要最后争取一下他所谓的‘世上迄今最大的礼物’。我想劝他，以他的条件，绝不可能在这儿再捱过一冬，他又把我当成了戴德里克。”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们得等。”库克医生说，“或许他会改主意。”

这样，我们开始了在伊塔并不平静的守候。



第 18 章

每天,亨森都会在皮尔里帐篷旁的岩石上呆坐几个小时。他盯着港口,双手放在膝上,好像在等另一条船的到来,船上有一位比库克医生更具说服力的人带领的救援队。时不时,他会跳起来,走近皮尔里的帐篷,好像听到皮尔里在叫他。我从没在白天听到过皮尔里的声音。他把东西拿进去又带出来,有时是几个珐琅盆子,盆里的东西他会小心翼翼地倒在山崖边岩石堆旁的小溪里。他在附近小溪里给皮尔里洗衣服和床单,洗好后铺开晾在岩石上。爱斯基摩人很尊重他,要什么都会马上给他,尤其他说那是给皮尔里的时候。

两艘船泊在一处,起起伏伏如同一艘——双船体、双甲板、双主桅的一艘船。

午后时分,纯净而湛蓝的天空上,我有时可以看到星星。我觉得可能是幻觉。我把这告诉库克医生,他说他眼睛好的时候,也能在这个时间与纬度上看到星星。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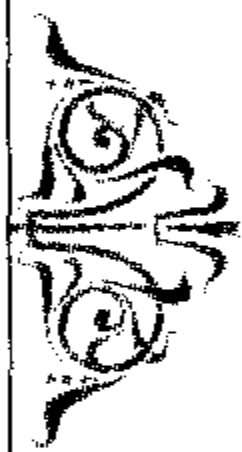
库克医生把这叫做“夏日奇景”。要是在纽约,会被人当做是初春时分。这儿的冬天有10个月,剩下三个变换迅速的季节便被压缩到两个月了。

即使是最暖和的日子,每次我吸气时,感觉都像喝了一大口冰水,寒意渗入身体的各个部分,而我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感受。

大块大块正在消融的浮冰散落在海岸边,如同一支白色船队失事后的残骸一样。

身体健康的爱斯基摩人为了过冬在不懈工作。木材在这个一无树木、二无灌木的地方尤为宝贵。这个季节,他们几乎都不会用木头生火。他们用皮毛交换木材。对白人如此重视常见的皮毛而轻视罕见的木材,他们颇为不解。有些爱斯基摩人会整日搜罗其他探险队遗留下来的木头,像是废弃的小屋或划艇,破损的桅杆,还有类似加固埃里克号船体时使用的几英尺厚的大木块。

每天,爱斯基摩人和船员便去岸上的海象栖息地,以前没下船的付费



旅客会走得更往南。整个早上跟下午,都可以听到远处的枪声。布莱克尼船长说,那些俱乐部赞助人的孩子会对每样活物开枪。他们回到伊塔时,满载皮毛和兽牙的捕鲸艇吃水都到了上缘。太阳快落山时,他们把小艇拖上岸,然后回到铺位,拿出自己带的东西吃喝起来。

每晚,在船长的小屋里,库克医生和我都会躺着谈论我正读的那些书。我总觉得,皮尔里夫人和她女儿就在离我们几英尺远的舱里。巴特利特船长把他的房间让给了她们,他的房间恰好正对着我们的。两艘船船体的厚度,用英尺或什么来表示,就等于我到风向号的距离。库克医生的铺位是在埃里克号这边,冲着另一个方向。

我想象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在风向号上的样子。寂静的夜晚,波浪轻拍船体,她们会躺在那儿,其他船上会飘过窃窃的私语声。有时,能很清晰地听到皮尔里夫人在给玛丽念书。很多时候,听上去是玛丽在妈妈的提示下背诵祷词。

怕吵醒她们,也怕让她们听到,库克医生轻声告诉我,那天皮尔里躺在帐篷里时曾说过他,或者应该说是指责过他。

他说库克医生“背叛”了他。

“斯特德医生,库克医生,戴德里克医生,命里注定医生都会背叛我。”皮尔里说道。到底库克医生如何“背叛”了他,却没有说起。

“他经常神志不清。”库克医生说。“他觉得我是被派到这里替代他的。我跟他保证,他错了,只要他同意离开,我马上和他一起回到埃里克号上来。我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到埃里克号上看看,他会知道我并没有准备在冬季航行。‘我这儿有你需要的一切,’他答道,‘我一走,你就会用我的工具。要是我进了货舱,你会立刻把门锁上。’”

“他醒着躺在那儿,透过帐篷顶上的开口盯着天空。我告诉他,读点书对他有好处,会帮助他集中注意力,可他不理我。他最后需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他有时还在记日志,但我不怀疑,他写的跟他说的差不了很多。”库克医生说道。

我想象着皮尔里仰望天空的样子。他会盯着一线晴朗的天空,看到掠过的云彩或飞鸟。夜复一夜,他会看到同样的一群星星,一个星座的同一部分。以他的天文知识,他可以想象出整个天穹的样子。看起来,他会觉得整个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了。

“可以强制性地把他带走吗?”我问道,“从你的诊断可以看出,他已经

无法替自己和家人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现在看上去清楚的事，等回去后就不一定说得清了。”库克医生答道。“皮尔里不一定能理解，皮尔里夫人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不一定能理解，甚至你我都说不清了。从家里的角度看，这儿的事没法搞清楚。只要他能证明有船员违抗他，就能被控为抗命甚至是哗变。”

除非绝对必要，除非不这样做他便会送命，不能将皮尔里强制带离。布里奇曼曾白纸黑字地把这写给了库克医生，以防有误会发生。“绝对必要——太阳明天出不出来我都不敢说。”库克医生说道。

库克医生说，皮尔里最大的恐惧是怕因失败而闻名，然后被人遗忘。“他在担心30年后报纸上他的讣告。他想象着从没听说过他的人读报的样子，他会被当做最接近到达北极的人。”

我忍不住去想，皮尔里的状态也许暗示出我和库克医生的未来。他或我会不会也有把自己关在帐篷里的那一天，不接受救助，不理会有人想把我们幻觉的沙洲中引出？

皮尔里离北极点有数千英里之遥。这次探险，尽管已有三年时间，他还没有抵达极地的海面。我问库克医生，北极点真是无法抵达的吗？

“你不该仅靠此处看到的这些，便忙于给北极探险下结论。”库克医生说道，“我从没见过哪次探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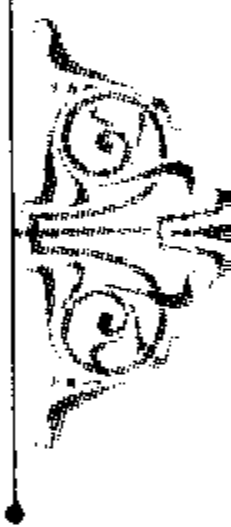
186

只有晚上我才听得到皮尔里的声音。

“亨森！”他不停地吼他的名字，喊到亨森来帐篷为止。我们大家（狗也算上）都习惯他的声音了。叫声在夜空飘荡，如同海滩远端匍匐着一群夜的生物，它们得靠嚎出这两个音节的声音以证实自己还活着。“亨……森……森……森……”第二个音节更响亮，力气也更大，随着每次重复拉得越来越长，直到戛然而终。皮尔里的声音，即使最响时，也藏有一丝无助。仿佛一个为病痛所困而凄声求助的伤者，但他知道护士不会来了。

皮尔里喊亨森的时候，我常听到风向号上玛丽喊妈妈的哭声，然后是皮尔里夫人抚慰她的声音。听到他在夜半时分这样吼叫亨森的名字，我不知道皮尔里夫人会用怎样的话语来安抚那小姑娘，怎么去让她相信父亲一切都好？

库克医生告诉我，皮尔里夫人剪掉长发是为防生虱子。玛丽不愿这么做，皮尔里夫人也没坚持。她已经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的头发染上虱子。



现在只剩下她的头发没被伊塔的环境污损过，它已经象征着她们很快要返回的那个世界了。

有时候，玛丽会出现在风向号的甲板上。她拉着妈妈的手，眯起眼睛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大海。如果说皮尔里夫人似乎与这儿的环境不大协调，那小姑娘看上去就像是个幻影。她戴顶镶褶边的白帽子，下巴下面打了个结，梳理整齐的红色卷发披在肩上。她有好几件颜色不同的及膝外套，但却总戴白色手套，拿顶合起的遮阳伞。她会用伞尖在海滩上戳东西。

每天，她们到海滩上散步的时候，玛丽会看海滩边的那顶帐篷，但皮尔里夫人让她走另一个方向，她也从未哭闹过。对父亲长久以来自闭在帐篷中这件事，她母亲所作的解释是会让她满意的，尽管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玛丽脚穿黑色长袜和系扣长靴走在沙滩上，旁边是身披斗篷拖着阳伞的皮尔里夫人。有时候，留着及肩长的蓬乱黑发的爱斯基摩人会从山顶的帐篷里下来。他们身披薄兽皮，脚蹬鹿皮鞋，会排起队跟在皮尔里母女身后。他们边说边笑，有些爱斯基摩妇女还背着孩子。这些人当中，跟其他妇女一样自然的，是皮尔里的爱斯基摩妻子阿拉卡星瓦哈，也背着那个与众不同的孩子。阿拉卡星瓦哈喜欢让别人看她背带里的孩子。而且我觉得，库克医生会有同感，他喜欢我和那孩子间某种“土著的”共同点。“我可以跟你保证，”他说道，“等他们回到美国，没有一个皮尔里家的人会提起阿拉卡星瓦哈和她的孩子。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以皮尔里的名字命名的单子上，也决不会有个带一半爱斯基摩血统的私生子。”

对于他们的出现，皮尔里夫人并不怎么特别在意。她知道些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他们也懂点儿英语，他们之间可以交流。爱斯基摩人的小孩围在玛丽身边，盯着她的头发和帽子上的褶边，皮尔里夫人面带微笑守在她身旁。要是他们摸她，她使用阳伞敲他们的手，这会让他们笑起来。

跟其他白人不同，玛丽的个头正好可以让那些孩子好好观察她的脸庞。他们仔细盯着她白色的皮肤，就好像他们觉得这只是个面具，下面还藏有一张与他们相同的脸。玛丽以同样的忘我与耐心配合他们的好奇，宛如一只听从陌生人指令的柔顺宠物。好像皮尔里小姐与皮尔里夫人是被爱斯基摩人捕获的、用做长期观察的猎物。

我在想，多年以后，玛丽还会记得多少发生于此的事情？她能理解多少？她已到此地一年，在风向号上度过了冬天漆黑的几个月。对皮尔里夫

人来说,让她能有点儿事干,能安排好她的生活,能让她不要觉得烦闷与绝望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啊。她还得把自己的焦躁隐藏起来,不让她女儿看到,否则她会觉察出她们已深陷困境。她们是怎样度过的冬天啊,整整四个月,晚上关在船上,关在满是烟熏味,点着灯笼的房子里。狂风大作的夜晚,桅杆吱嘎作响,她们没法听到彼此的说话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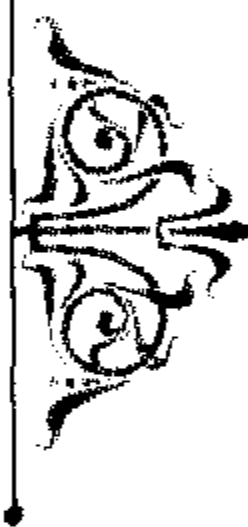
她就在那儿,这个小姑娘,从穿着看也不算很糟糕,只是肯定要比她在家瘦,可也没有皮尔里夫人那么瘦。皮尔里夫人肯定有时没东西吃,或是得比平常少吃些,这样玛丽才不会挨饿。跟我比起来,玛丽已算是久经风雨的探险队员了。

有时,马修·亨森照看玛丽,皮尔里夫人会与库克医生和我一道去山上的村落走走。她双手放在斗篷下,微微歪着头。库克指指点点的时候,她会点点头。他像一位地方总督,而她像一位君主,到自己王国里最边远地区短暂视察。她会观察与检审她最原始的臣民,而库克医生会说起如何发展与改善。

库克医生对皮尔里夫人说,我是斯特德医生的儿子。她也曾跟斯特德医生一道在北格陵兰探过险,时间长短跟库克医生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紧隔的船舱里,同样也只隔着一一条象征性的临时帘子。她只出于礼貌地冲我点点头,如同是头一次听到弗朗西斯·斯特德这个名字。我觉得她是被丈夫的探险折磨得筋疲力尽了,困在伊塔 13 个月更让她疲惫不堪。除了回家,她对其他事情甚至连装都装不出有兴趣来。刚到这儿,觉得事事还新鲜有趣,到此时她觉得没法忍受。她不会让任何事情把她的思绪从一件事上转移开——那就是很快,她和她女儿,最好还有她丈夫能够离开,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再也不要看到这片她眼中的“倒霉”地方了。

我有时会陪库克医生到爱斯基摩人的住处转转。二三十顶帐篷扎在一起——我觉得挺随意,其中的排列方式我可能并不知道。整个村落都忙于劳作。现在,如同一场持续多年的暴风雪突然暂停,天空放晴,爱斯基摩人得抢时间,暴风雪会在他们熟睡的午夜卷土重袭。男人在擦洗兽皮,有些拿的皮毛换来的匕首,有些拿的侧面锋利的石头。他们也用那些石头费力地给锯子等工具磨制手柄。女人用海象牙做的大针把兽皮缝到一起,皮线绳几乎跟我的靴子带一样粗。

跟对待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居民一样,库克医生给爱斯基摩人问诊时



既保持距离又不失关切。他缓缓走着,似乎突然或唐突的举止会把他们吓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他轻声地跟他们交谈,询问症状,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保持微笑,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回答对他们的康复来说是个好兆头。他们羞涩地咧嘴笑着,仿佛得病是由于自己品行不端,还要对给他带来的麻烦致歉。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条船上的许多船员都喜欢在岸上过夜。他们睡在帐篷里,比船上舒适得多。在船上,他们没有自己的船舱,每晚只能睡在不碍脚的地方。岸上有地方,安全而寂静,有新鲜的空气、食物和淡水。要是他们愿意,还有女人陪伴。库克医生告诉我,在性方面,爱斯基摩人没有嫉妒的观念,甚至怀孕也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仅是一个可资庆贺的原因而已。

“我觉得,”库克医生说道,“他们要是知道我们的真面目,知道我们得怎样把这种事遮掩起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意外。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他们称为“大家伙”的种族。无论这个种族的人发现什么,他们都觉得无足轻重。他们碰到第一个探险家以前,也从没听说过这个种族。对于第一个到这儿的人,他们不会觉得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不会另眼高看。我们在他们的村落,他们会照顾我们,好像他们觉得得为这儿的暴风雪负责,有义务保护我们一样。他们无法想见,其他种族身上潜藏的恶会比他们的更多。要是皮尔里在此再度过一个冬季,肯定会有人因为照顾他而死。虽然他知道,可还这样固执。无论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点,他所亏欠爱斯基摩人的,比所有他的船长、船员和赞助人加起来都要多。”

库克医生赞美当地人的性格,但晚上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虽然他们总留我们,他仍会回到船上,不住到别人家的帐篷里。晚上在埃里克号上,他会把对他们的观察记录下来,会把新学的词汇编到他的爱斯基摩语字典里。

有一天,我正穿过村庄,被群爱斯基摩妇女和孩子围住了。女人们笑痛了肚子。有两个站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向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身边架去。我抗拒着,鞋跟都在地上犁出了渠。她也在笑,既不尴尬也不犹豫。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得怎么办?我不知所措,挣扎得更厉害。

“她们在和你闹着玩呢。”我听出身后是库克医生。听到他的声音,她们放开我笑着跑走了。他拍拍我的背,从我身边快步走过,不想让我觉得



过于尴尬。

晚上,我和库克医生坐在甲板上,又想起了白天的事。我不太清楚,她们是否只和我这样闹着玩。我不清楚是否她们想让我知道,要是以后晚上我想约她出来,她一定会答应我的。

每天,我都会看海滩边上的帐篷。要不是他每晚会叫亨森的名字,我会觉得难以相信,那顶帐篷里会真的有人,而里面竟真是皮尔里。天黑后,站在埃里克号的甲板上,我看不到帐篷里有灯光,有灯笼,有营火的烟,甚至寒冷的雨夜都看不到。无论白天黑夜,我甚至都绝少见到他投在帐篷上的影子。

有些天,这次救援的使命好像都被彻底遗忘了。除了库克医生和亨森,似乎没人记得山崖下的那顶帐篷。

如同皮尔里已被隔离,我们都在等库克医生宣布他已病愈、不会传染的消息,然后便可带他回家。

库克医生每天都去皮尔里的帐篷,有时一天几次。每次出来,都是副更加焦虑的表情,总迈着忧虑的步伐离开。

有时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在盼皮尔里从帐篷里出来,而是等他死的消息。

“皮尔里知道你在这儿。”有天晚上,库克医生告诉我。“亨森跟他说的。要是皮尔里头脑正常,你在这儿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像和皮尔里夫人一样。但你现在像我们一样,正好碰到他神经错乱,他还从没见到过你。别担心,就我所知,你不是主要的问题所在。他提起弗朗西斯·斯特德要比你多得多。”

我突然想到,我也可以离开伊塔回纽约去,甚至都不用看他。听到过他在夜里的吼声便够了,或许他就只知道那么一个词。假若如此,很可能我一生都不会见到皮尔里。但这很荒唐,我走了这么远,连看他一眼都没有便得回去。我在考虑跨过那条海滩禁路,把头伸到他帐篷里看他一眼。

有天晚上,皮尔里喊叫亨森的时间特别长。库克医生跳下床,在船舱里踱起步来。“亨森到底跑哪儿去了?”他差不多是和我在耳语,唯恐把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吵醒,可我觉得她们肯定早都醒来了。“他会不会没听到皮尔里在喊他?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给皮尔里夫人和孩子带来怎样的后果吗?”



后来，喊声停止了，库克医生却睡不着了。

“我带领此次援救的动机可不像我告诉你的那么纯洁。”他说道，“要是我把皮尔里安全救回，对我自己的事业可是不小的帮助。”

“我知道，”我答道，“这样想也很自然。”

“这次救助的结果将会影响我在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地位，我会有机会组建自己的探险队。我知道他的妻女在等我带他回去，但我也在考虑，要是我把他扔在这儿，他活不过冬天，那人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他往风向号那边瞥了一眼。我们的舷窗正对她们的，窗上都挂着小帘子。

“我曾告诉她，无论有没有他，我们最后都得离开。她提醒我，派我到这儿来是为救他。‘我一直在救他，’我跟她说，‘可我到这儿来也是为带你和你女儿回去。’她想为我写书面承诺，允许我强制把他从帐篷里带出，送到船上。我告诉她，除非他愿意走，否则我们必须让他呆在这儿。两条船的船员都在等我，等我无论采取什么办法结束这次救援，然后在冬季来临之前启程返航。或许他们应该派别人来，派个他觉得不那么受威胁的人来，派个敢于顶撞他的人。”

“不能强迫他离开，你是对的。”我答道，“皮尔里夫人不该让你那样做。”

“今天我跟皮尔里说了，要是他不跟我回去，我会觉得没有尽到对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责任。‘是啊，如你所言，医生，’他说道，‘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你还没那么走运，还不是库克北极俱乐部。你在超越我之前先得救我。如果你把我带回去，他们就会看好你。谁能比救了皮尔里的人更强呢？他可是做到了皮尔里做不到的事——把皮尔里带回了家。’”

“你该睡觉了。”我说道。

“皮尔里一家身处困境，我想帮助他们。”他说道。“可我也一样，我应该能够预见到。我原以为，皮尔里要是活着，会等人救他回去，风向号会失踪或损坏了。我知道不该把自己当做这件事的受害人，可看来无论我做出何种决定，都是在冒险，得付出大的代价。如果我下令把皮尔里带出帐篷送上船，他会告诉人们，要不是我的缘故，他早都到达北极了。他便不会因为和妻女一同获救而蒙羞。他会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一道毁了我。那儿有些人巴不得有机会把他往好处想，把我往坏处推呢。他会控告我违抗不遵，甚至聚众哗变。我觉得，要是我强行带他离开，他肯定会很得意，那可能正是他一直期盼的结果。可要是我把他扔在此处，他又死了，我就会背上遗弃他的罪名，他却会成英雄。”

他看看对面拉着窗帘的舷窗，翻过身去，脸冲着墙。我知道他在盯着墙。很久很久，我看着他一动不动躺在那儿。

有天晚上，我躺在埃里克号床上，被山上雪橇狗的叫声吵醒了。我听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它们是在回应远处山下海滩上什么人的声音。我说不出是谁在喊叫，也不知道离皮尔里的帐篷有多远。喊的什么听不清楚，节奏像英语。是个男人在喊，声音里没有怒气，声调听起来像是和一个远邻习惯似地聊天。要是有人从远处海岸那儿回应他，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可唯一的回应只有萦绕的回音，就像碗里滚动的弹珠。是不是皮尔里在自个找乐呢？或是错把回音当做了回答？皮尔里在和自己的回音说话？我想去甲板上看看，可我知道没有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在伊塔只能看到星星，它们的光什么都照不见。





第 19 章

听到那声音的第二天，也是我们停泊于伊塔的第 17 天，我正和库克医生在甲板上说话的时候，几个爱斯基摩男孩向山顶的帐篷跑了过去，边跑边喊着“皮尔里索阿！皮尔里索阿！”，我们向海滩上皮尔里的帐篷望去。

亨森站在帐篷外，是在等人出来。我想是不是皮尔里夫人在里面，亨森往里瞥了一眼，又站直了。从他的动作和紧张的样子我可以肯定，他是在等皮尔里。爱斯基摩人从帐篷里跑出来，聚在山坡上观望。两条船上的船员有的上到甲板上，有的停下手头的活儿，都在看着。海滩上的人也一样。

目光转回到亨森的时候，我刚好看见皮尔里如君主般蹒跚地走到了阳光下。他的腿打着弯，上身僵直，双手背在身后，如同要到海滩上例行巡视一般。

刚开始，还有爱斯基摩人问候与庆贺的呼喊声，可他们却没像我想象中那样跑下山坡问候他。叫喊声突然停止，最初的兴奋已然退去，他们曾仔细地看过他，他现在的样子让他们有些失望。我有些好奇，他们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有些爱斯基摩人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似乎不忍心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皮尔里站在那儿望着码头，盯着两艘船看了一会儿。上一次他往这儿看时，有艘船还没来。

看来他是想要树立形象，让人觉得他虽然虚弱，却已度过最危险的时刻，身体正在恢复。他穿双冬天的软皮靴，靴沿盖过膝盖，靴底比夏天的厚得多，可以使他的伤脚站在岩石上。

他双手依然背在身后，胳膊就像一对折叠的翅膀。他踩着海滩上的石头走了起来，说是踩着，更像是蹭着，他拖着脚步的样子如同穿双拖鞋走过刚刚打过蜡的地板。他挪动双腿，膝盖处打弯。为防跌倒，他比平时走得快。

我觉得，不用走到船边两个等他的船员身旁，他肯定会摔倒在海岸的礁石上。库克医生一定也想到了，他冲埃里克号的船员叫起来，让他们放下小船送他上岸。亨森肯定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举起手，但皮尔里叫了声

“停下”，这是我听他说过的第二个词。

“好，我们等着。”库克医生说道。

皮尔里挺直身子，走在亨森身前一英尺处。亨森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旁，不时左右看看，随时准备扶住他。很明显，皮尔里跟他说过，除非有绝对必要，他不能碰他。

皮尔里戴顶黑色尖顶帽，穿件黑色双排扣风衣，一条黑色厚羊毛裤。

整个世界似乎只听得到远处他的靴子踏在礁石上的声音。从帐篷开始，他的脚划出两条弯弯曲曲的线，拖在身后。这时，我听到另一声呼喊，我看到皮尔里夫人和玛丽从海滩那一头过来了。她疾步前进，却没拉女儿，小姑娘跟在身后，尽力迈开脚步跟着。她们比皮尔里离小船远得多。看上去如同双方正在进行一场比赛，皮尔里夫人想在丈夫之前到达小艇。她要玛丽走得再快些，时不时回过头不耐烦地看看她。显然，她想在他走到小艇前拦住他，似乎她知道他意欲何为，她想阻止他告诉库克医生。

我们站在后甲板上，静静看着皮尔里一家一起走来。我们看着皮尔里，乔和玛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站起来的样子。他蹒跚地走过沙滩，像一只步态怪异的黑色大鸟，身旁跟着亨森。

他想干什么呢？我觉得很奇怪。

库克医生的双手轻轻扶住我的肩头，停了下来。他看着皮尔里，看来他会比妻女领先许多。皮尔里走得越靠近小艇，库克医生的双手便扶得越紧，仿佛是想安慰我一样。船员和从下面上来的乘客站在我们身后，三三两两地小声议论着。

皮尔里走到小艇边，亨森和另一个船员扶他上了船。船员把小艇推到水里，拼命划起来，无疑又是背朝海岸的皮尔里的命令。他妻子向他喊了什么，皮尔里头也没回，我也没听清是什么。一会儿，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站在那儿看着远去的小艇，向库克医生叫起来，让他再派一艘小船去。库克医生回应了。皮尔里的小船越来越近，另一艘小船却向岸边驶去。

皮尔里身躯僵硬，却坐得挺直，如同刚才走路时一样。他双手放在大腿上，头一动不动。

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他肤色很怪，是种透着樱桃红的褐色，我猜可能是自然因素加上营养不良的结果。他肯定刮过胡子，不然就是让亨森替他刮过。他下巴上的V形短须修剪整齐，上唇胡须也修理过，其鲜红的颜色在一身黑衣的衬托下异常惹眼。



高大身材更凸显了他的衰弱，层层叠叠的衣服也掩饰不住。即便里面还加衣物，他的外衣也太显肥大，外套的肩线盖过了胳膊肘。风刮过时，他的裤子就像两面旗子，我都可以看到他棍子般的双腿。脑海里，我在做着对比，一个正向我驶来的人和我曾常常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他正常体重大概是200磅，我猜现在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二了。刚戴上的帽子，整整齐齐的衣服——说是衣服，其实就是一堆破布。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他像一位受困许久的将领，出来跟敌人投降。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上船后，会把从亨森手里接过的东西递给库克医生，那会是象征投降的一柄马刀，或是一面折起的旗帜。

我想或许会是这样，他是出来告诉库克医生，他已改变主意，要正式结束最后一次探险。他想站在这儿，面对库克医生宣布这个消息，而不是神志不清地躺在数个月都没离开过的帐篷里说这番话。他想体面地接受失败。他曾风光过，刚才还拖着残躯蹒跚走过海滩，摇摇晃晃地炫耀了一回。他现在看着也挺风光，泰然自若，面无表情的样子可以当军人的典范。埃里克号去接他妻女的小船从他身边不到10英尺处划过，他看都没看一眼。

库克医生又扶紧了我的肩膀，像是在说皮尔里有亨森在身边，而他有我。

小船划到埃里克号的另一边，看不到了。我看两个船员转动绞盘，绳子因为负重而吱嘎作响。接着，小船又慢慢出现在视线中，上面的四个成员出现了。他们像在空中飘浮，尤其是皮尔里。小艇升起时，他没看船，只是直勾勾地，茫然地盯着前方。他或许精神恍惚，不知道船就在眼前。

亨森扶他下小船登上甲板。皮尔里转过身，面对着我们。他缓慢地同时转过头和身体，好像脖子没法动。他向我们走来，离库克医生10英尺时，伸出了手。库克医生拿开放在我肩膀上的手，快步迎上，像是要为皮尔里节省走这几英尺的力气。他握住他的手。

皮尔里笑了。他环顾四周，扬起一只胳膊，却没说话。从照片上看到这一幕情景的人一定会以为，这是埃里克号刚刚抵达伊塔，皮尔里划船前来欢迎库克医生。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自然而然，两位绅士会开心地聊起来。

库克医生跟着皮尔里的话题，如刚刚见到一样交谈起来。对这段漫长而无法避免的延迟，两人都小心地避免谈起。

“北极的夏天，”皮尔里说，“自1892年，我们就没一起到这儿来过，库克医生。”他的声音尽管有力，却在颤抖。

“从那时起，我也根本没到这儿来过。”库克医生答道。



“那么长时间不到这儿来，我可受不了。”皮尔里说道。

库克医生仔细打量着皮尔里。皮尔里还是笔直地站着，头一动不动，双手背在身后，看上去非常镇定。我却看到他的目光在茫然地四处游移，如同盲人一般，好像心里有什么声音在和他说话。因为从没休息够，失去的两个脚趾的伤口无法愈合，站立的痛苦显现在他脸上，痛意甚至从他的眼神中露了出来。但他既没退缩，也没有变换支撑脚。

“改变主意了吗？先生，您会和我们一同返航回家吗？”库克医生问道。

“我恐怕没有。”皮尔里答道。他闪过的笑容收紧了脸上的皮肤，紧绷的光泽如同打过蜡一般。“当然，你会照料乔和玛丽，送她们安全返回的。”提到她们名字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岸边，小船已经快划到她们面前了。

库克医生上前一步，抬起头看着皮尔里，轻柔地低声说道：“先生，除非您跟我们一道回去，我害怕她们会永远失去一位丈夫，一位父亲。”

“我们得再试一次。”皮尔里答道，“要是我们这次没有成功，嗯，还会有其他机会。”

库克医生恳切地看着亨森，亨森既没说话，也没移开目光，可他的眼里却没有反抗。我听到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的小船划进了水中。

“我以为你会忠诚于我，戴德里克医生。我曾以为，你会在我所有的探险旅程担当重任，会是我生死与共的伙伴。我想不到，那么小的一件事会对你那么重要。”

“皮尔里上尉，我不是戴德里克医生。”

“你当然不是。”皮尔里说道，好像他没说过“戴德里克”几个字一样，好像他不是又一次把一个医生错当成了另一个。“与戴德里克比起来，你就是一位圣人，库克医生。那家伙是个杂种。”

“我必须绝对坦率地告诉您，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说道，他几乎是在耳语了，“那不是去冒险，那是去送死。我得警告您，先生，您生着病，这不是您的错，但它却让您无法清醒地进行思考。没有人在算计您，没有人想伤害您。我们到这儿是想帮助您。我知道，很难让别人替您判断什么对您最有利，很难知道何时该把您的信任赋予别人。但我想劝告您，您得实实在在地权衡一下目前的处境，然后，请相信我，也请相信您的妻子和这儿所有的人。为了您，几次旅程中他们付出了很多。您愿意让我们带您回家吗？”

库克医生说话时，皮尔里一直在笑，好像在说这些话骗不了他。他自己说话时也在笑，如同他知道库克医生并没有听懂他话里真正的意思。



他们这样持续了一会儿。一个轻声地说,另一个不停地笑。

听到皮尔里夫人的小船在风向号的另一头被绞上来,库克医生停了下来。皮尔里还在笑,他扬着头,目光四处游移,仿佛心里的声音又开始和他讲话了。

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登上了风向号的甲板。玛丽看了父亲一眼,径直下了甲板。顾不上看脚下的绳索,皮尔里夫人踩着跳板从风向号上走了过来。库克医生急切地看着她,又看了皮尔里一眼。“皮尔里夫人……”他开始说道。

“他知道我怎么想的。”她轻声说道。她走向前来,颠起脚跟,像要吻她丈夫。她对他耳语了几句。

皮尔里微微低低头,仿佛会动情,仿佛在强迫自己别哭出来一样。但是,如同从昏迷中被唤醒一样,他又挺直身子摇了摇头。

“只有这种犯罪般的蠢行我无法原谅。”皮尔里夫人说道。“跟我和玛丽回家吧。等你恢复好了,可以再试。”

“我只是有点发烧,库克医生。”皮尔里说道,“现在烧已经退了。公正的人不会借我发烧时的言行指责我,况且现在我也记不得了。”

“您没发烧,先生。”库克医生说道。他已经没有耐心了。“您的伤痛也没消失。您已经超越自己身体和大脑的极限了。现在两者都垮了。我是俱乐部派来带您回去的。”

“是的,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你没那么幸运,不是库克北极俱乐部,现在还不是。你在超越我之前先得救我。谁能比救了皮尔里的人更强呢?他可是做到了皮尔里做不到的事——把皮尔里带回了家。”是他以前说过的话。他记住了这些话,却忘记曾说过。

或许他希望被强行带回。或许他在想,要是库克医生把他强行带走,他的所有问题便解决了。或许现在他正盼着库克医生下令,让船员抓住他,把他关在船舱里。或许是为这个,他才坚持到埃里克号上来见库克医生,而不是在海滩上。很容易就会让人想到这主意,可以诱使库克医生对他采取行动,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有多尴尬。这要比另一种情形好多了——那种景象是他被人从帐篷里拖出,一直拽到船上。那会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蒙羞,甚至包括爱斯基摩人。

“库克医生,”皮尔里说道,“我意在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国人赢得一项荣誉,一项永存于人类心中的荣誉,到达北极点是会永恒的。”

他转向皮尔里夫人。

“乔，亲爱的，你能替我在母亲墓前献上一束玫瑰吗？”

她转身朝风向号走去。她头也没回，走下了甲板。

我看着库克医生，心想他是否会心软，是否不仅会放手让他指挥探险，而且还会让他去为自己的生死负责。

库克医生伸出了手。

“祝您好运，先生。”他说道，声音大得如同在喊了。

皮尔里缓缓抬起手，和库克医生握了握。他阴郁地松了口气，冷漠中透出些无奈。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没能吓住库克医生，还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最终决定了。

巴特利特船长走上前伸出手，接着是布莱克尼船长，他们都祝福了他。很快，两条船上的船员便排起队，要和皮尔里握手。我注意到，看这动人一幕的还有皮尔里的女儿。她正站在风向号的甲板上，是她刚才独自过去的。船员列队走到他面前，说着“上帝保佑，祝您好运，先生”。好像他们是在看望一位亲人，一位注定会在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的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都像我一样，几分钟前都从没看到过他。亨森看看皮尔里，又看看排起的长队。他肯定在担心皮尔里能否站那么久，能否坚持到和每个人握完手。

所有人握手完毕后都下了甲板，只剩两个船员为皮尔里准备回去的小船。库克医生托住我的肘窝，把我领上前去。

“皮尔里上尉，这是德夫林·斯特德。”库克医生说道。这一刻，玛丽突然叫起库克医生。他转身向风向号跑去。小姑娘站在那儿，身边没人。

“斯特德家那娃。”皮尔里说着猛地抓住了我的手。我差点儿被他拽倒。他的目光不再游移，他的腔调让我想说，我不是斯特德家的，也不是孩子。他肯定看出了我眼中闪过的抗拒。

“你看过北冰洋了，斯特德先生。”他说道，“你在此过了几个星期无所事事的夏天，但千万小心别掉到它里面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我知道你们家里会出什么样的东西，斯特德先生。”他压低声音说道。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他知道我和库克医生的关系。“呆在家里吧，呆在家里吧，要不然有天你会像你的傻瓜父亲一样完蛋的。”

皮尔里调整了握住我手的力度，我的手跟他的比起来，简直像小孩子



的一样。他使劲握住我，我觉得他似乎是在借我保持平衡以防跌倒，他的脸也几乎碰到我的脸上。我轻推他，想让他站稳，我比他重40磅，他却没动。他还是紧握住我，更深地抓住我的手，一边握住我的拇指，另一边几乎到了我的手腕。这样，我们的手指和手掌碰不到一起，我几乎无法回应他的紧握。我决定不能喊出声，不能把手缩回来，也不能让亨森来帮忙，他正看船员准备小艇。我觉得自己的手会断掉，我的手骨会在他的恶意下如一袋冰棱般碎裂。我们距离很近，他的眼睛还是雾蒙蒙的，如同他内心有什么想法在强迫他，让他无法意识到，他是在握着别人的手。他深红色的脸庞上布满皱纹，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男人的脸。他的呼气不太好闻，有股薄荷油的味道。

“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你父亲也躺在坟里，埋在离这儿不远的冰里，就算他该下地狱的灵魂已经烧完，他肯定还在里面傻笑。”我的双腿变得像皮尔里的一样虚弱，在重压下轻微作响，绷得更直。

库克医生突然回来。他的手臂像斧子般挥向皮尔里的胳膊。

我们的手突然分开，皮尔里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他没瘫倒，膝盖也没弯，只是身体前倾，头一下子突然变得过于沉重，双臂还无力地耷拉着。他正对着通向下面的台阶，或许会冲过水平护栏。他6英尺3英寸的身躯会摔得很远，脸会撞到那些木头台阶的棱角上。

几件事同时发生了。在我看来，库克医生冲上前是想挡到皮尔里和甲板之间。亨森以为库克医生要打皮尔里，他猛扑向库克医生，两人撞在一起，倒退着摔倒在甲板上。我上前一步，正赶上皮尔里的身体压在我身上，他的头冲着我的头倒下来。我赶紧扭过身，他的下巴搁在了我的颈窝。有一刻，我就这样撑着他。我想伸手把他扶起来，但右手疼得厉害，根本抓不住他。我抱住他的腰，拢住他的双臂，靠着双脚使劲支撑着他。我左脚在身后顶着，右脚挺在前面，可左脚却打滑，不得以我得换一下脚，双脚保持20英寸的距离来顶起他死人般的身体。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先摔倒在船舷边上，头磕了回来。皮尔里摔在我身上，直挺挺如尸体一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跳舞，现在要在彼此怀里小憩一会儿。

我以为到这儿就完了。我想把皮尔里推推，把他从船舷边搬开，突然，什么东西握住了我已受伤的右手。我本能地缩回手来，可也放开了皮尔里。他个子很高，船舷只能挡在他腰部，他翻跟头一般从船舷处翻了下去。本

能让我伸出右手抓住了他大衣厚厚的领子，我左手和双脚也在用力靠住船舷，以防跟他一起掉下船去。他吊在两船之间，吊在跳板的旁边，神志依然不清。如果我放手，他会跌到40英尺下的海面，会在掉下去时撞到船身，会摔到船下面，那就几乎不可能再救上来了。

皮尔里在半空慢慢晃动着，全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他闭着眼睛，嘴微张着。我突然想到，要是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正悬在半空中，发现自己没在甲板上，也没握着我的手，而是吊在两船之间，命系生死之间，那会多么奇怪。他突然醒来了。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开始，目光里有的只是茫然，如同他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就像他以前醒过来时，从没有过现在的这种感觉。突然，他眼里闪过一丝警觉，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正悬在海面上的半空中。尽管如此，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意识到他是悬在一个人的手上，更别提是谁的手了。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上。我的手在上边攥着他的衣服领子，他的大衣已被拉扯得像僧侣的长袍一般。只从两侧看，不会看出下面是谁，只会以为吊在我手上的是个溺水者，我刚捞起他被海水泡过的尸体。他看着我，好像以为我正要把他扔到海里。他没有从噩梦中惊醒，却又做了一个。他伸出手，抓住我的衣领，像要把我也拽下去一样，这样只能稍稍减轻我胳膊上的力。

200

接着，他挣扎的方式变了。他不像是要把我也拽下去，而想把自己从我手里脱开。他双手齐上，想掰开我抓住他衣领的那只手。要是再过一会儿，我可能真就抓不住他了。

亨森、库克医生和另外两个船员跑到我身边。我已精疲力竭，下面的一阵慌乱我已不大清楚。“没事了，德夫林。”我听到库克医生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没松手，仍紧紧抓着他的衣领。我或许昏过去了一小会儿。我听到乘客和船员的声音。后来，我想象他们会看到什么：我在皮尔里身下，他整个扑倒在我身上，亨森和库克医生俯下身，想把瘫软的皮尔里从我紧握的双手中撬出来。我意识到我和皮尔里都已经安全，意识到那两个人是在把他从船边拖回，从我身上拉开，我放开了手。

这一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其他人肯定会猜测。皮尔里的头靠在我旁边，前额枕在甲板上，看上去只是像在休息打盹儿一样。不知道何时，他帽子掉了。帽子或许正在两船之间的海里漂着。我能看见的只是蓝



天，可我也听到了四处传来的吵闹声。

“出什么事了？谁受伤了？”

皮尔里动了动，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些什么，好像还在小声侮辱我。他一只手扶着自己坐起来，亨森、库克医生和其他几个人把他拖到了一边。

“您不该这么快站起来，先生。”亨森说道。皮尔里摇摇头。别人扶我起来的时候，他也站直了。我在喘气，右手疼得厉害，几乎动不了。我看见皮尔里甩开了亨森扶在他胳膊上的手。

我想张开手弯弯手指，看看有没有哪儿断掉，却感到一阵由肩膀到指尖的剧痛。我无法张开手。我用左臂弯弯右臂，是小臂部在疼。我的腿还站不稳当。我想我是受伤了。

皮尔里握着刚才被库克医生打过的右前臂，闭上眼睛。我看着库克医生，他好像准备把这一切说个清楚。他盯着皮尔里，他看上去好像又要昏过去了。

“这儿出什么事了？”巴特利特船长问道，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说着，深吸了口气，可马修·亨森却打断了他。

“皮尔里上尉昏倒了。”亨森说道，“他就要跌下船时，这位斯特德先生用一只手拉住了他，然后我和库克医生赶过来把他拽了上来。”

巴特利特船长看看皮尔里，他还是刚才的样子，闭着眼睛，身体在轻晃着。船长没机会询问皮尔里出什么事了。他看看库克医生。

“我们……亨森和我……我们在救皮尔里上尉时撞到一起跌倒了。”库克医生说道。“德夫林先赶了过去。他掉下去时德夫林抓住了他的衣服领子，他一直拽着他，然后我们两个过来帮忙把皮尔里上尉拉回到了甲板上。”

“斯特德先生，是这样的吗？”巴特利特船长问道。

“要不是斯特德先生，皮尔里上尉会伤得很厉害，甚至会更糟。”亨森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看着四周，似乎有些害怕除这几个人外，还有别人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是有人看到了，但不是那两个准备小艇的船员，他们看来和别人一样迷惑。看到的是玛丽·皮尔里，她还在风向号的甲板上静静看着。皮尔里夫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们两个受伤了吗？”库克医生问道。

皮尔里弯着胳膊，摇了摇头。

“你怎么样了，德夫林？”巴特利特船长问道。他以前可从没只叫过我

的名字。

“我想我把手扭了。”我答道。

“我会看看斯特德先生的手的。”库克医生说道。

“那么,很好,”巴特利特船长说道,“皮尔里上尉欠你一份情,斯特德先生。我敢肯定,等有一天他恢复正常以后,他会亲自感谢你的。”

皮尔里的眼中又闪过一丝躁动。呆在家里吧,呆在家里吧,要不然有一天你会像你的傻瓜父亲一样完蛋的。这听起来既像威胁,又像警告,还像是一句预言。

库克医生带我离开了。走过皮尔里身边时,我歪过头看了他一眼。皮尔里双脚没法交叉,只能挪动细碎的脚步转过身。亨森守在他身旁,比以前更近。两人向小艇走去。

皮尔里和我就像刚刚结束一场决斗,两人都身负轻伤,被副手照看着。

尽管刚才发生了这些事,尽管我的手受伤了,我还是想看皮尔里是怎么回到他的帐篷。在小船上,他还是那样坐着,僵硬但直挺挺地背对着我们。

他差点儿摔在海滩上,但用双手撑住了自己。他的肩膀弓起,仿佛在积聚剩下的力气。他在亨森的陪伴下向帐篷走去,亨森没有面对他的脸。他甚至都没有想把脚抬起来走路,只让他的皮靴在海滩的碎石上一路拖曳。亨森掀起帐篷帘,皮尔里深深弯下腰,弓着身子钻了进去,样子像在给里面的人鞠躬一样。看到这儿,库克医生摇摇头。我没能看到皮尔里躺下,亨森便拉上了帐篷帘。

库克医生带我到埃里克号的甲板下,给我做检查。他轻轻用手指触压我的胳膊和手,我一退缩他马上便注意到了。

“手两边主要的骨头裂了,手腕上的也是,不过不太严重。回家之前,我也不敢十分确定。”他说道。

他做了只吊腕带,又拿些冰块替我消肿。他把裹布绑好,里面有个装冰块的袋子,正对我的手背。

“回去的路上你不能再爬桅杆了,”他说道,“也不能报告浮冰了。至少这次航程不能了。”

“谢谢你帮我。”我说道。

“我要是看见的话,会早点过来的。他弄伤你的手,是个老把戏——这个我敢肯定他知道你不太清楚。如果你知道怎么握住别人的手,他就缩不回去。”



“我很诧异，他原来那么强壮。”

“他现在也很强壮。关键是得知道抓什么地方，而不是用多大力气。就算一个孩子，如果知道怎么做，也能让皮尔里疼得跪下来。”

“我希望你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不会的。亨森帮了我们，尽管我知道，他只会替皮尔里做事。要是皮尔里能活下来，他要么会坚持他今天的说法，更有可能他会说什么都没发生。”

“玛丽看到了发生的事。”我说道。

“我知道。”库克医生说道。“但是，除了她父亲有危险的那一段，我不知道她能明白多少。”

“她可能看见你打皮尔里的手臂了。”

“她看见什么，怎么跟她母亲去说都没关系。亨森说的足够应付。”

“你听到皮尔里跟我说的话了吗？”我问道。

库克医生摇摇头。我逐字逐句地说给了他，就算再过40年，我肯定也会记得这么清楚。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

库克医生转过脸坐到床沿上。“他发烧了。”他说道，声音变小了。

“他说我父亲埋在了冰里。”我说道。“他肯定知道你才是我父亲。他跟弗朗西斯·斯特德说过你是的。”

“当然他是很怀疑的，”库克医生说道，“但我从没和他说过这事。”

他猛地站起身，双臂搂住我，在我受伤的手臂能承受的范围，抱住了我。我也用左手回抱了他。他退后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你是你母亲的孩子，”他说道，“但也是我的。”

那天稍晚时，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去皮尔里的帐篷里呆了很长时间，她们给他拿去一些礼物，告诉他在圣诞节前不要打开。她们回到风向号上时，很明显玛丽曾哭过。她眼睛红肿，但脸上和她妈妈一样，仍是副肃穆的表情。

晚上躺在自己铺位上，我在想皮尔里的话，他的用词。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他肯定不知道，我母亲下葬时穿的什么衣服。

“知道吗，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库克医生说道，“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对别人承认，甚至对自己都不会，但他欠你一条命。”

“这样就结束了我第一次探险，真奇特啊。”我说道。

“所有的探险都有奇特的结尾。”库克医生说道，“因为它们最后都回到了文明世界。你会懂我的意思的。在你眼里，我们要回去的那个世界跟你刚离开时已经不一样了。”

听到玛丽在风向号的哭声，我们停下来了。我们又听到皮尔里夫人喃喃的安抚声，可比平常要小声得多，似乎连哄玛丽时，她都无法放下自己的心事。

我做了一夜的梦。手被握住的情节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每个梦里。我跟一排手腕有力的人握手——有皮尔里，爱德华叔父，弗朗西斯·斯特德，库克医生。他们都祝我好运，似乎他们都相信，再多的好运也救不了我。梦没有停。我从船边向下望，看到水面上浮着的一具尸体。他的衣服漂在水上，外套半绕在头上，头向后仰着，似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他仍把头伸出了水面，要仰望天空。接着，我又梦到我母亲，她沉到了水下。我看到她时，她的脸却十分平和。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她，或者不得不放手让她去时，梦境又变化了。接着，我面对面地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站在一起，他突然想把我从船上推下去。我们打起来，结果他掉了下去。可是，他马上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次是我掉了下去。我还没掉到水里，梦却醒了。

等最后醒来时，我甚至比没睡觉还觉得疲惫。

库克医生最后到爱斯基摩人的帐篷那儿走了一圈。他跟他们道别，把他能给的药品都送给了他们。

204

他告诉我，皮尔里和亨森，还有些爱斯基摩人会很快往西北方向去，去皮尔里冬天的营地。查理·珀西是风向号上的乘务，也是船员里懂得最多医疗知识的人，他会跟他们一起去。戴德里克医生和皮尔里一样固执，一样无趣，他会留在格陵兰，一直到明年夏天。但他计划和他们保持距离。

等到冰雪条件具备，他们会从冬季营地出发，穿过极地海域向北极点进发。这至少是他们的计划。库克医生说，要是皮尔里离开他的冬季营地，他便活不过一星期。人们在用牺牲性命来满足幻想，他们会以为皮尔里够强壮，他能到达北极点。亨森、珀西和几个爱斯基摩人会跟他在一起。所以，他最后的日子，死亡降临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已经失败的时候，他不会孤身一人。

刚过中午，两条船上的所有人便都上了甲板。水手收起架在埃里克号和风向号之间的跳板，解开了缆绳。我望着海滩，除了皮尔里的帐篷，还有亨森那顶小些的，便再没什么东西能说明，这是哪个世纪、什么白人曾经踏



上过的土地。海滩上没有船员，没有他们的工具或设备，没有拖过沙滩的小船，没有晒在礁石上各种颜色的衣服。美国的、加拿大的、丹麦的、纽芬兰的旗帜都被收了起来。看上去都觉得不太可能，玛丽·皮尔里曾跟她妈妈走过这片海滩，曾学她的样子转阳伞。有那么一个温暖的日子，我也曾靠在阳光下一块平整的礁石上，读库克医生让我看的书。

查理·珀西爬上小船准备上岸时，玛丽·皮尔里说道：“照顾好我爸爸，查理。”珀西是个从布鲁克林来的小伙子，个子很高，性格腼腆。亨森请他留下时，他马上便答应了。

我手里感到的不仅是疼痛，还有皮尔里握过后留下的魂灵。要是我听到他的死讯后还能有这样的感觉，那会有多奇特。

两艘船分开了。风向号装备的是柴油发动机，首先向峡湾驶去。布莱克尼船长在埃里克号上拉响三声汽笛，向我们告别。巴特利特船长也鸣了三声汽笛回应。爱斯基摩人聚在海滩上，看着我们离去。他们挥着手，叫喊着。查理·珀西也在他们中间，但没有看见皮尔里或是马修·亨森。

我们跟爱斯基摩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乔和玛丽一直呆在甲板下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斯特德先生？”返航途中，一位名叫克拉伦斯·维科夫的年轻人问起我。他咧嘴笑着，仿佛在说我们都知道不是库克医生和亨森说的那回事。我知道维科夫和他父亲都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刚握完手，皮尔里上尉便昏过去了。他倒向一边，我抓住了他，就这么回事，跟亨森说的一样。”我说道。

“你知道吗，会上报纸的。”他说道。“我会做的。赫伯特·布里奇曼也会这么做。你救了皮尔里的命。等我们靠岸时，会有记者等我们的。那儿总有记者。”

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下子达夫妮叔母会马上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了。

卷 四



第 20 章

在船舱里，库克医生告诉我：“你没必要跟那些记者说什么。说实话，要是你那么做，布里奇曼会很生气。我们两个去见他，把亨森那一套告诉他，探险结束后总是这样。北边看来很清楚的事到纽约会被搅混，最后就没人能说清了。”

库克医生和我见到布里奇曼之前，纽约的报纸上已有我的报道了，不是醒目位置，是补充在库克医生援救乔和玛丽的报道旁，目的是告诉人们探险进展如何，让人们再对探险乐观一点。我被说成是把“近况不佳”的皮尔里从濒死的境遇中救了出来，在此过程我“胳膊严重受伤”。

报上大幅引用了船员和乘客的证言。他们说起发生的一切，如同亲眼目睹一般。他们说我强忍剧痛，一边大叫一边用断臂把皮尔里拉了上来。

“那些故事是布里奇曼搞出来的。”库克医生说，“他想要把注意力从探险失败和皮尔里的身体状况上转开，也更是想回避和戴德里克的矛盾。”

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绝不要对媒体说他们在夸大事实。

其他报道也出来了，加了很多乱编的细节。人人都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曾跟随皮尔里，我去探险是为看看父亲的安息之地，故事就更引人入胜了。那已不再是报道花絮了。

用库克医生的话说，这些叫做“歪曲报道”，正是媒体追求的效果。

我被好几个记者采访过，有一个形容我“谦逊礼让，沉默寡言”。

他的笔下这样写道：“由他冷静镇定的个性人们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刻，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是如何沉着地帮助了皮尔里上尉。”

我想低调处理自己被认定的英雄行为，只是不否认曾帮过皮尔里，可是记者却不答应。凡是上了报纸的我的照片里，挂着吊腕带的胳膊都特别显眼。我告诉记者我只是手受了伤，他们还总说成是“严重受伤的胳膊”。

“你为什么不接受自己应得的荣誉呢？”库克医生问道，“就是你救了他的命啊。”

“那是因为他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答道，“还因为他曾跟弗朗西斯·斯

特德说你是我的父亲。我不愿意让人们说我救了这样一个人的命。还有，要是没你和亨森，我也救不了他。”

“告诉那些报纸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坏处。用你的话，说你干过的事。你有没有想过，这也许会对我们有利？虽然我没把皮尔里从格陵兰带回来，布里奇曼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那些成员也没责怪我。要是皮尔里死了，情况就变了。”

我心软了。就像《纽约时报》写的那样，我成了一个“最后才出现的人”。我详细告诉时报记者皮尔里昏倒后的每个细节。

报道里面还有我一个简短的生平。生长在纽芬兰。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子。弗朗西斯·斯特德则是“皮尔里上尉的前同事、医官，不幸于北格陵兰探险途中失踪”。来曼哈顿并无所求，结识库克医生纯属巧合，后者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此次援救探险领队。库克医生也曾和皮尔里及弗朗西斯·斯特德一道参与过前往北格陵兰的探险活动。“对于斯特德先生而言，前往他父亲失踪了的、冰雪覆盖的北方大地无疑是一次朝圣之旅。1892年，德夫林·斯特德刚刚12岁，他父亲便和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前往了格陵兰。不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与皮尔里和库克两位探险家一道踏上他父亲曾经走过的土地，成了斯特德先生长久以来的梦想。谁能预见到这样的梦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这位早已在格陵兰失去了父亲的年轻人，却救了另一位与他父亲共事过的伟大的探险家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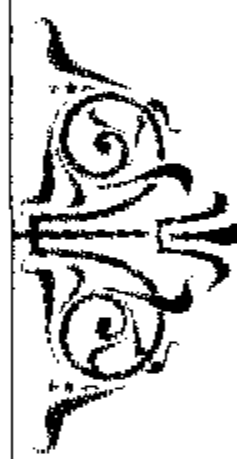
210

几乎每天都要添些新内容：离开伊塔的前一天，船员们曾排队与皮尔里握手并祝他好运；尽管已精疲力竭，皮尔里还要和他们每人都“聊上几句”；我们交谈时皮尔里突然昏厥过去，他掉下船舷时我抓住了他，我拼命地叫“救命”，但死也不肯放开一个体重比我重得多的人。

对于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抛妻弃子，还有他的死，报纸只是含糊地一笔带过。他们没有提到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只说她死时我年仅6岁。只有几处提到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说他们是“养育了斯特德先生的叔叔和婶婶”，这话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有很多自己的孩子得养一样。如同我是生长在他们自己孩子生活的环境中，不得已得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变得既性格顽强又思维敏捷，唯有如此才能在格陵兰帮得了自己和皮尔里上尉。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无论斯特德先生在哪里，库克医生总在身边照看他。知道他们的人会说，一开始便是这样，他们之间有种熟悉而平等的

气氛,但他们却只是刚刚认识,这真让人费解。对此,库克医生解释说,他和斯特德先生的父亲非常熟悉,偶遇他的儿子后,他感到他们似乎已友好交往多年了。什么样的父亲不会对这两人的亲密心怀嫉妒呢?他难道不希望自己儿子也会像斯特德先生陪伴库克医生那样,恭敬地顺从自己吗?”





第 21 章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

您可能已经从圣约翰斯的报纸上知道，我参与了赴格陵兰援救皮尔里上尉和其家人的探险活动。现在我要将行程与计划详细告诉您。

与皮尔里上尉奇特的偶遇之前，我也仅是此次探险队领队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的客人而已。到纽约后，我成了他的私人助理。

如您所知，我父亲是在1892年赴北格陵兰探险时失踪的，那次探险皮尔里上尉与库克医生均曾参与。皮尔里上尉担任指挥，库克医生为队中同僚。

库克医生与其妻玛丽热情地安排我住在他们私宅中无人居住的侧楼，他们家是在布鲁克林的布希威克街。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好，我什么都不缺，只是这些日子没您陪伴，我有些想念。

我知道，因为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事，您肯定会对我参加极地探险、与探险家交往，甚至自己也想成探险家的想法感到痛苦和不理解。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很难宽慰您，因为您和我一样，也非常清楚极地探险所意味的风险。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并非因为我父亲曾经做过，也并非是我想挽回他的声誉或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之所以和库克医生共事，并非因为他认识我父亲，或曾参与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探险。虽然，某种程度上我乐意承认，是库克医生点燃了我的梦想。可是，若我并非为成为探险家而生，他也绝无可能办得到。

即使写1000封信，我也无法跟您说清，库克医生给我的善意与教导有多重要。我曾与库克医生提起过您和爱德华叔父。他让我向您保证，若没有他认可的充分准备，我不会参加任何探险活动。



离开家时间不长,但我已有所改变。有些问题我不得不回避。您了解我,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尽管有些后悔,但也无从选择。

我知道,不大可能收到您对我所择职业的祝福。

您会认为我不知恩图报,或难以信赖,但我希望能够走自己的路而不要您的帮助。的确,我必须坚持这点。这么长时间以来,您是我的唯一。要是没有您,我会变成一个别人眼中的那样的我。您的爱让我心中残留的希望没有逝去,让我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也会爱我。我变得太依赖您,除非能彻底离开您,不然过多长时间,我也无法独立。是我而非您的天性使然。若是您在这儿,我会天天看到您的脸庞,听到您的声音,甚至您和我经常通信,结果也会是如此。尽管不是您的本意,由于我的缺陷与问题,此种结果都无法避免。

当我可以克服掉这些缺陷,可以把您的感情还给您而不会伤害到您或我的时候,我会让您知道。请相信我,我盼望着这一天。我真希望,正在写的这封信就是我将来要写的那封。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再见面,也不能再通信,这对我来说很痛苦。我期待您回复这封信,也期待能再给您写信的那一天。请相信我在这件事上的判断,也请相信,我对您的爱不会因此而减少。

爱您的
德夫林

我亲爱的德夫林:

我一直在期待,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你的下落。但我从没想过,我竟然得从报纸上看到你离家后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

报上登了几张你的近照。我原本以为,分离这么长时间后,照片上的你会显得更亲近,结果却正相反。你看上去那么遥远而陌生,似乎你并没有过去,或者你有你的过去,但其中却没有我。从你的样子可以看出,你经历的远远不止15个月。15个月没有见过你,又突然看到你的照片,真有些不太习惯。我关注你的探险,

陌生的人们也关注你的探险，但两者并不相同。这些报道和照片如同启示，告诉我你永远不会给我写信了。

你能想象得出，接到写有你姓名和回信地址的信封时，我有多高兴、多宽慰吗？啊，我是多么想你，德夫林。我多么希望你就能在我身边，我可以把你抱在怀里。我不想因为我的话给你带来任何烦恼，也不想因你做了自觉正确的事而指摘你。但是，如果不在信中告诉你我的想法，这封信便毫无意义了。

从你信中可以看出，离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你改变了很多。无论好坏，我只能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库克医生的影响，因为在报纸上所有写你的报道中，每一段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很高兴听到你近况不错，我还是失望于你所选择的职业。在我看来，那可能是世上所有职业当中最不可能吸引你的了。的确，如你在信中所言，我对你的职业选择感到不安。而且，难道真如你所想，你的选择真与你父亲无关吗？你的新同事曾与你父亲共事，也曾参与你父亲失踪的那次探险。这些难道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吗？

我猜你是对的。是有很多事情你必须放下，可我也在担心，你不可能忘记过去，也不可能改变它。对于你想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抹去的想法，即便这种想法只是暂时的，我也不十分明白，也不理解你为何会觉得这种做法能成功。可是，我也能感觉出，要求你改变想法，或者要求你做出详尽的解释只能无补于事，而我的想法是将我们再见的时间间隔缩到最短。如果这种间隔可以确定下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既不明确又无期限，那即使拖得长一些，我也能接受。因为我不得不担心，这种无法确定的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我因你而骄傲，对你冒生命危险去救别人而不计报偿也丝毫不觉意外。你可能会觉得，这种不纯的念头来自某个曾经并不完全信任你的人那里。但是，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全然的信心。

我并不想夺走你新近找到的自信。我也不想让你怀疑自己，尽管对我而言，人们常把真正的自知之明错当成了自我怀疑。我在担心，你过于急切地想放弃过去的生活。你也还没有做好在纽



约生活的准备，没有做好成为探险家的准备，也不该与库克医生这种人交往。“库克医生这种人”到底怎样，我也不知道。

得知你身体健康，被人照顾得也不错，我非常高兴。但我对这位库克医生心存疑虑。你毫无保留地崇拜他，你们的关系也这般密切。从报纸和你的信中判断，他对你投入的感情似乎不少于你对他的感情，这或许是我关注的一点——他是成年人，应该已经过了可以因一时冲动而投入感情的阶段，而他竟然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和你如此亲密。如果你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与你的同龄人这样相处，我也会担心，但却不会感到奇怪。

或许，你会把我的担心嗤之为纯粹的妒嫉，某种程度上我也愿意承认。他可以有你为伴，我却没有。你或许还会认为，因为我并不认同你的梦想，我便会拒绝接受任何一个能鼓励与帮助你实现它的人。再一次申明，你没有全错。或许你会认为，我对你的关心过于直率，就如同我在说我无法想象，你竟会如此迅速地从某人身上激发出了这样的感情。要是这样，你就全错了。

如果你还不知情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愿意知道，虽然过去人们觉得你是个“羞怯”的人，但地方上的报纸上却丝毫没有提到。现在，每个人提起你的时候，神情都像是他们早都知道你会干出大事一般。突然，每个人都开始跟我谈论你，都想知道你近况如何，何时返家——现在你倒是很受欢迎，可你却不在我身边了！一切看来都颠倒了。

写这封信我总在跑题。我觉得我得把每件事都塞进去，这可能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想到这也许是我唯一一次可以替你准备出发的机会，我的笔几乎都僵住了。

我没法不去猜测，库克医生是出于何种目的要劝说你过那种生活。他知道那种生活并不适合你，你出于本性也并不会喜欢。或许他仅仅只是将一时的冲动付诸于实践，而以他的年龄本该可以抵制住这种盲目。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他的动机并不高尚。假如，因为这些道出的顾虑，我把自己变成了你必须离开的令你窒息的保护人，那也只能如此了。如果我不告诉你，他与你迅速结成的这种关系并不正当，那我就失职了。

除了知道报纸说他有“受了损”的名声之外，我并不了解库克

医生。可他们在说，他不允许你单独接受采访，他会像母猫看着猫崽一样看着你、保护你。如果某个问题不能只用一个词回答，他会替你作答，会把问题引开。即使只是需要回答一个词，你们也得交换眼神，得到他的许可后，你才能讲出来。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如此尊敬的一个人会不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讲话。他觉得这样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他觉得你应该受保护，可是在防什么呢？

看起来这个人对你意味着一切。他是赞助人、保护人、导师、监护人、朋友。有些报纸上，他被认为是你的“经理”。我不喜欢这个词。我想说的是，除非他曾在你尚未因机缘巧合而救人、而为人所知之前也一直保护你，那他就是在为自己捞好处。

我告诉自己，或许库克医生仅仅是想要帮助一个年轻人成就事业，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位年轻人事业受阻并非是他本身的过错。或许我还应该心存感激，要是你不离开家，这位敏锐的人还无法发现你身上蕴藏的才能。报上用的词是“敏锐”、“冷静”、“缄默”、“深思”、“警觉”，还有“很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对自己的成就寡言少语”、“可爱而心胸开阔，很吸引人”。找不到一个批评他的词。可我并不信任他。

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他照片的缘故。第一眼看上去时还没那么糟。你或许会觉得我很荒唐，竟会从照片中看出什么，竟会因为某个人的照片而斥责他。可是我从那些照片里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而我从他眼中看到的神情你眼里却没有。我盯着他的眼睛在想，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只能通过警告或建议给你我对这个人的评价。

我给他写信是不会有意义的。如果他能回信，我也只能收到一封花言巧语、含糊其词的答复。

我觉得我应该雇人到纽约把你强行带回你本属于的家。可又一想，如果我如此干涉你的生活，那你可能就会永远离我而去，这个结局我承受不起。

我必须对你说点什么，我必须这么做，不然接下来的日子便会比刚过去的15个月更加难熬。

毫无疑问，你时不时地给我写封信不会对你有什么坏处，只



用告诉我你的去向和计划就行。否则，除了报纸上的消息外，对你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自问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如此对待我。

我并不喜欢这封信的语气。我不能让它听上去更像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跟你说话。我无法在一封信里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会害怕你。你还太年轻，德夫林。尽管不是你的错，但你比自己的年龄要小。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希望——我亲爱的德夫林——我能说服你不要去你现在想去的地方。求求你，回家吧。爱你、了解你一生的人的建议肯定会强于你从那个库克医生那儿听来的，他根本不如我了解你。

小心一些，德夫林。不要仅是为了有人想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或者你怕拒绝他后他会看不起你。任何时候都要听从你自己的心灵。它并非绝无谬误，但它是你的。

真希望这封信我能永远写下去。知道你会读它，我觉得好像在和你说话一样，好像你就在身边但却随即便要出发，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后你才能再回到我身边。

想着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如果你愿意，我永远都会倾听着你；如果你记得，我永远都会回应你。

永远爱你的

达夫妮

217

开始，我因达夫妮叔母对于库克医生的不信任而吃了一惊。但我告诉自己，太多的事她都不知情。如果她知道，她会理解的。

羞怯。大家那时真的是这样想我的吗？我也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的确很“羞怯”，若是这样，整个过往，还有我的童年，便都会变成一个被拖延了的误会。如果我回到家乡，我会被庆贺的人群所包围，他们曾经一直认为我唯一的缺点仅是“羞怯”。

我告诉库克医生我给她写信了，但来往的信件并没有给他看。我只是告诉他，我跟她说我们之间的联系应该暂时中断一阵。我说我会让她知道我的行踪和计划，这样她就不会一直担心了。



第 22 章

纽约把库克医生和我当做相继出现的英雄而盛情款待。库克医生救了皮尔里的妻女，我的故事则是“斯特德先生邂逅皮尔里上尉”。

“无法抵御。他们选你做这个，他们喜欢这种故事，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救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老人。”库克医生说道。

“说起来好像我很喜欢皮尔里一样，我并不情愿。”我答道。

“听着，你不用跟他们撒谎。跟他们说爬上桅杆站在瞭望桶的事，讲讲冰山，讲讲峡湾和冰川，讲讲峡湾和冰川在晚上的声音，讲讲海象和独角鲸，他们愿意听。记住：你无法控制好运来到你身上，但要拒绝就太傻了。”

我们收到一份邀请。库克医生、他妻子和我受邀参加每年一度于哈得逊的范德比尔特家举行的秋季舞会。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夫妇居住在这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豪宅中。舞场一直延伸到海德公园，可以俯瞰哈得逊河。

库克医生说，不仅所有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会出席，比他们更有名的人物也会到场，“绝对是纽约的上流社会”。

库克医生的妻子告诉他，对这些“见面之前已有看法，现在只想用我的言行证实自己观点的人”，她不愿浪费时间。她让库克医生替她给范德比尔特夫妇写封信，说她在此时正好要去华盛顿看姐姐。

库克医生领我去裁缝店，给我做合适的“白色领结和其他饰品”。说是白色领结，其实是香草色的，可以跟底下的白衬衣搭配。我蛮适合穿香草色的马甲，还有带可拆卸白色丝绸衬里的帽子，加上一条白色长丝绸围巾和一双白色丝绸手套，至少从服饰方面我已经可以去见范德比尔特夫妇了。

我们驾马车去范德比尔特家。库克医生担心富兰克林牌汽车不可靠，会中途坏在范德比尔特家的车道上，会坏在只把汽车当玩具的客人面前。

尽管马蹄声让我和库克医生的交谈不容易听清，我们伴着嗒嗒声还是聊了很久。我们雇了位车夫。库克医生跟我解释说，在我们要见的那些人面前，自己驾车前往肯定很不合适。



“人们都知道，北格陵兰的那次探险前，你的父母已经分开了。”库克医生说道。“没人会对你说起这些。几乎不会有人跟你说起你母亲。他们至少会希望在这种事上，你也能表现得圆滑些。你父亲就有些不同。他们不希望由你来提起你父亲，但如果他们谈起他，他们会请你说说的。”

“其实是你自己故事背后的故事——这种故事永远不会登在报纸上。你在场时，他们不会提及——这会让他们很入迷。他们不仅会把你看做报上那个身体强壮、头脑敏锐、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还会觉得你是位神秘、有点厄运缠身并且家世不幸的年轻人。你竟会选择一个给你父母带来如此厄运的职业，这让他们迷惑。你现在是那种他们觉得值得好好看看的人。我曾经也是。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对我感兴趣了，而是说，从很多方面人们会觉得，我已不太可能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不太可能做出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事，只能在二流的探险者中有一席之地。我还得说，别的探险者，或是密切注意探险活动的人可不会这么看我。”

“站在头排的美国探险家只有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皮尔里。历史上从没有其他探险家能像他那样得到那么多的财力支持。军方把他当成探险家中的佼佼者，给与他享有终身荣誉的位置，从没想过有人能超越他。”

“会有人很快超越他的，无论承不承认，他都在走下坡路——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我们晚上也不要提及。对于皮尔里的状态，一个字也不要跟他们说。要是他们问你，皮尔里到达北极点的机会有多大，你就告诉他们，要是有人在北冰洋呆了三年还有去北极的力量，那也只有皮尔里能做到。”

“即使是对皮尔里的很温和的批评也不能有。我们应被人看做是仰慕他的对手，有绅士风度的竞争对手。”

“他们会观察你，德夫林，并不全是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是看生活把你塑造成了什么样子，看在你身上发生了些什么。”

“我原以为在这儿可以有个新的开始。现在看来，纽约和圣约翰斯的人都是一样看我的，都觉得命里注定我会走我父母的路。”我说道。

“不，不是，恰恰相反。他们不知道你命该如何，这儿的人大都不相信命运，并不怎么真相信。美国人，甚至是那些不仅重视社会地位，而且认定社会地位业已固定便无法改变的人，都不怎么相信命运。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也没人非让他们承认。美国人喜欢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国家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无数机会。我们不能既信奉这个又听从命运。”



“我觉得你夸大了他们对我的兴趣。”

“没有，我跟你保证。目前的兴趣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得看你自己的。但他们会一直看着你，看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他们喜欢有你我这样的客人——不仅走进他们的房子，而且走入他们的生活。但我们永远只是客人。记住这点很重要。”

“我倒情愿有一天可以融入某个地方，而不是被人当成个怪人。”

“不要想融入这些人当中。不用想做到‘举止得体’。不要因为你不知道上流社会的规则而变得不安。你将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早都认为你本来便不懂那些规矩。你要是懂得的话，他们会失望。他们可不愿意你和他们一样。”

“他们想看到什么样的我呢？”

“你自己。”

“但我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我。”

“也许不全是。但你的锋芒比你知道的要更锐利。你很快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现在你吓住我了。”

“他们会喜欢你的口音。”

“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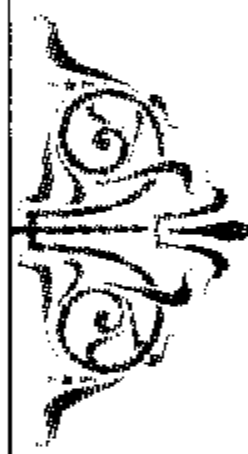
“亲爱的小伙子，你的口音这么重，可以把屠夫的刀磨钝了。”

驶过灯火通明，两旁长有巨大橡树的车道后，在层层叠叠犹如婚纱裙裾般扇状铺开的大理石台阶下，我们把车停到了其他车子后面。我们下了车，走进一座两层的门廊，两侧均有两根巨柱支撑着顶盘，中心部分就在我身后的上方，我却没看出有多大。

刚进门，便有人替我们拿围巾、手套和帽子。门里站满沉默的男仆，他们在等人把衣服递过来。要不是和库克医生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该在哪里站住，该把什么给谁，自己该留下什么。

离开门廊的一刻，我得拼命让自己不要突然向右转，我知道那儿有洗手间。

一位个子矮小面色红润的管家领我们穿过门廊到了入口厅，上台阶后进入一个巨大的接待厅。圆形大厅在屋子中央，四周有门通向其他房间，现在都关起来了。走上青铜雕饰的楼梯时，我伸出左手想摸摸扶手，马上



又缩了回来。扶手外边裹了层天鹅绒，光滑的一面好像从未被触摸、从未被清扫过灰尘一样。我看到我的手在上面留下的印记，是整段扶手上唯一的污点。我抵御住想转身回去把它抚平的念头，快步向上走去。

库克医生和我加入了一队等候被接待的客人当中。看到人群中有关拉伦斯·维科夫和其他一些搭乘过救援船的乘客，我舒了一口气。

我们等了几分钟，队伍缓慢前行。维科夫转过头看到了我。

“库克医生和勇敢的斯特德先生。”维科夫叫了起来。他身前身后的人都向这边看过来。在他带领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库克医生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他微笑着弯弯腰，如同维科夫是在戏谑地开玩笑一样。我也照着做了。

“胳膊怎么样了，斯特德先生？”维科夫问道。胳膊，那只救了皮尔里上尉的胳膊，那只我们在报上读到，听人谈论了这么多的胳膊。他可能就是要问，因为我不再吊着吊腕带，人们看到我时便不知道到底哪只才特殊。

“好多了。”我答道。我本能地弯弯右臂，所有的目光便集中在我的右臂上。人们点着头窃窃私语，好像他们觉得，若没有亲眼见到便无法相信，这样一只胳膊怎能救得了皮尔里上尉的性命。

这一刻真让人觉得奇怪。皮尔里还在北边格陵兰的某处，面临的困境与匮乏连库克医生也才开始理解。皮尔里几乎是在等死，我却在曼哈顿，因为替他找回些本也不多的时间而受人赞美。我们在这里，一边等候见到范德比尔特夫妇，享受他们奢华的招待，一边轻松地谈论起皮尔里上尉。此刻，虽然有马修·亨森与查理·珀西在身边，他可能已经死了。

库克医生曾见过范德比尔特夫妇。跟别人闲谈几句之后，他过来准备介绍我。没等他说出我的名字，范德比尔特先生便把手放在了 my 左臂上。

“这位肯定便是斯特德先生了。”他说道，仿佛他未曾听到维科夫好似待客管家一般的唱名声。

“您好吗，范德比尔特先生？”我边问候边伸出手。他双手握住我的手，轻轻握了握。

“很好，年轻人，很好。”他说道。“我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握过曾救皮尔里上尉一命的手了。你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很了不起。”

“谢谢您，先生。”我答道。

他把我介绍给他妻子。她微笑着，掌心向下把戴着手套的手向我伸来。



我迷惑了一下，才明白我得吻她的手，便吻了。库克医生吻她手的时候，我肯定是眼睛看到别处去了。我从没吻过女人的手。是该弯下腰去吻，还是该把它捧到嘴边再吻，或者两者同时？我决定同时做。没有怀疑的喘息与不安的眼神，我知道我没做错。

“我们都为你骄傲，斯特德先生。”她说道，“你或许不是生在纽约，可只要住在这儿的人做出了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厚起脸皮说他是我们纽约人。”

我们答应他们，晚上找时间给说说那次救援探险。然后，范德比尔特夫妇招呼我们后面的客人去了。

库克医生和我受邀进入了接待厅的主厅。

大厅里点着一排一模一样的球形吊灯，每隔一段相等的距离便有一盏。我后来数了数，共有六盏。从我站的地方向上望去，它们合成一个巨大的玻璃柱，闪着光从天花板垂直吊下。除了几尊希腊塑像的仿制品，普通房间里会有的装饰这儿都没有。雕塑矗立在墙壁凹进处的龛位中，墙上镶嵌的桃木面板。

沿墙摆放着无数不带扶手的椅子，红色长毛绒的椅面，挺直的木质靠背。椅子几乎都还空着。我想象着坐满了人的样子。一群人围坐在豪华大厅的四周，静穆地看着其他人走过，仿佛这不是舞会，而是要讨论许多重要事项的多回合会议一般。

大厅的每一面都有镜子，可以看到那一半的情况。从对面门进来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对面的双开门。门两旁同样是爱奥尼亚式的大理石柱。对面尽头的门关着，门前微微突起的台子上，乐队正在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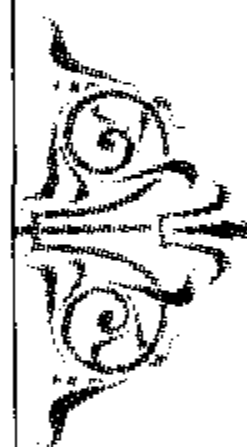
库克先生把头靠向我，我觉得他想跟我说点什么。没等他开口，一位女士从等候的人群中走了过来，她向他伸出手，他吻了她的手。

“真高兴遇到你，库克医生。”她说道。

“我也是啊，弗里克夫人。”他答道。

我猜这位弗里克夫人差不多 55 岁左右的样子。她头发上插根长长的绿色羽毛，肩上是条上年纪的妇女青睐的仿露肩披风。似乎她们觉得直接袒露肩膀的穿着已不再适合她们这种年龄。她的披风呈半透的肉色，胸部处被黑色礼服撑起来。我们介绍过后，她扶住了我的手臂。

“我在想是否能借用一下你，年轻人。”她说道。“人人都想见你们，我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看到你们两个，所以我们得把你们分开。我敢肯定库克医生可以保护得了自己吧？”



库克医生微微一笑，点点头。弗里克夫人转过身时，他又对我笑了笑，好像是要我放心一样。

她双手放在我上臂上，领我穿过人群边缘，领我经过装满樱桃、柠檬和橙汁的大酒杯。我们看到的是像世界食品博览会那样的展览，甚至还有一座用整条鲑鱼做的海神塑像，上面还有水从罐子里喷出来。这鱼的下面肯定有个喷泉，可是在哪里我也没看出来。

她带我去最近的椅子处，我们坐下来。她还抓着我的胳膊，坐在我身边，眼睛看着地面，似乎这样可以帮她想想该说什么，帮她听懂我的回答。她说她希望我没有经常得“忍受”这种场合，我还没来得及对“忍受”两字表示异议，她便告诉我，她计划尽量让我减少在这样的夜晚会有的痛苦。

“我会带你走走，把你介绍给那些你不会觉得很无趣的人。如果你想跳舞，当然也可以——”

“我喜欢跳舞，我会非常乐意的。”我答道。

“这么说，你以前跳过舞了？”她问道，眼睛看着我，好像觉得最好到了舞场再评价我。

“是的，很多次了。人们还觉得我跳得不错呢。”我说道。

“那太好了。”她说道。很明显她在怀疑，我说的跳舞和她说的不是一回事。

她把我介绍给很多人，不让我在一处停留稍久，领我避开已经介绍过的，我都不记得曾见过他们。环顾四周，我都不记得见过什么人了。我敢肯定，弗里克夫人一定在做记录，就算这屋里有 5000 名客人，她也不会把我重复介绍给同一个人。

一次次地，人们因为我救了皮尔里上尉的命而祝贺我。

离墙不远的地方，几位看来没人陪伴的年轻姑娘围成了个半圆站着，七嘴八舌地同时说些什么。看到我在看她们，她们停下来，冲我微笑。

弗里克夫人领我走过去，把我依次介绍给她们。她们的年岁跟我差不多，可身上的轻松与自信连弗里克夫人似乎都没有。

“德夫林·斯特德，那个你们听说了很多的小伙子。”弗里克夫人说道。

“您好，斯特德先生。”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我问好，然后我便一只接一只地吻了她们带手套的手。手一只只向我伸来，重复得让我觉得有点可笑，她们却没露出半点尴尬。

“斯特德先生说他舞跳得不错。也许你们可以把他加到你们舞伴的卡



片上。”弗里克夫人说道。

想起一阵同意声，然后是一阵笔在卡片上划过的沙沙声，那些卡片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又一下没了踪影。

除了晚礼服的颜色，这儿的女士穿得几乎像绅士们一样别无二致。都是低领露肩的裙子，领口开得低到胸口之上。到处是妇女裸露的脖颈、胳膊和后背。

她们穿得似乎都是一样剪裁合体、柔顺如皮肤般的织物，这样才能在范德比尔特家的舞池吊灯下最好地显出自己的优点。

看到露出的颈和肩，我想到的却是锁骨和肩胛骨一类的医学术语。形容这些女孩子当然有精巧与柔弱的词，远比骨头什么的合适。

许多妇女都带颈饰，用领针在脖子前面的凹处小心地别着。几乎所有妇女都束腰，腰部有小巧的网状袋子用金属制搭扣紧紧系在一起，银制的和金制的都有。前额中间，有些女人还炫耀似地留着发卷，好像是用来吸引花花公子的。

“走——走——停，走——走——停。”我不断对自己重复。我为什么这么傻，明明多年没有跳过，还要吹嘘自己娴熟。有段时间，跳舞就像我的第二天性，只用比走路多一点的力气，多一点的注意便够了。我知道达夫妮教我的那种舞步，可能除了纽芬兰，其他地方100年前都不跳了。要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发明了一种新舞步怎么办？

乐队的演奏让我长出一口气，正是我熟悉的四分之三拍乐曲。

弗里克夫人曾给我介绍过的一位年轻女孩向我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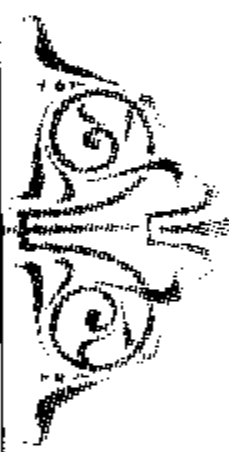
“斯特德先生。”她说道。

“萨姆尼小姐。”弗里克夫人说道。

“谢谢你，弗里克夫人。我只用记几个名字就可以，可怜的斯特德先生得记几百个。”萨姆尼小姐边说边向我伸出双臂。我拉起她的手跳起舞来。

萨姆尼小姐。多年来无人陪伴，一下子面对这个张开双臂的年轻女子，我有些头晕。可能是作为某种抚慰，人们派她来和我跳舞。她脸上的笑容似乎在说，我曾被误解，我该让过去的过去，过去的事无药可救，我不该让过去影响我的将来。

我曾挣脱束缚进入这个世界。是在信号山下，我跳进小艇的那一刻。从那一刻起，我的确走得越来越远。可是在这里，我才碰到正式欢迎我的人——不是库克医生，不是克拉伦斯·维科夫或范德比尔特夫妇，而是这



位姓什么我都不知道的年轻女子。她也肯定和其他客人一样，或许包括库克医生在内，都并不知道这个仪式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就像长久以来，我都被当成罪犯，我自己都已相信自己的确有罪时，我突然被宣布是清白的。多种思绪一下涌上来——宽慰、自怜、感恩、怨恨、好奇、觉醒——我差点忍不住哭了。我希望自我抑制情感的样子没有暴露出来。

我不太习惯跳舞时被别人盯着，更别说被其他跳舞的人包围，可我马上就适应了。刚开始，萨姆尼有点像因为生气有些变样的达夫妮叔母。她好像有点走神，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安，我的情绪也很快就过去了。除了达夫妮叔母，我以前从未和女性如此近距离接触过，从没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裸露的胳膊、脖子、肩膀和后背。只有她和我说话时我才说话，或者是她问我问题的时候。她不断提问，好像话都让弗里克夫人说完，只有提问才能让我做出回复。我感觉好像是在接受采访一样。我并不介意。我试着去回答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格陵兰是什么样子啊？”而对诸如“你胳膊断的时候疼不疼？”的问题，我也避免只说是或不，要详细解释。

她是我一生中与我跳舞的第二个女人，是第一个不是我亲戚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我从没如此接近过的女人。她的脸、眼睛、鼻子、嘴唇快碰到我，犹如奇迹。她的香水味，头发的气味。我手掌下她柔滑的后背，前面是她的左胸。真是一个奇迹。在舞池里与一位姑娘共舞，她柔顺地与我共同移动身体。

她看上去如此自然，身体露出的各个部分根本看不出羞涩的红晕。我要是兴奋的时候，身体便不是自己的了。身体好像会嘲笑我，好像女人对我来说，只能从远处呆呆盯着，只能是幻想的对象，不可能有实际作用，似乎身体知道，这些激发我的女人是怎样看待我的。

刚刚从长时间的独身中回来，我无法相信，在萨姆尼小姐之后，又一个女人和我跳了舞，然后又是一个——我被人追求了。

我觉得，以前的我是困在一间囚房里，虽然现在还关在里面，我还不能获得自由，但至少我有访客了，整队的人挤上前来想要见我。

很快，我可以判断出每组旋律之间女伴们的差别了。有些人跳得很好，但绝大多数都好像只是在机械地练习一项痛苦却必不可少的社交技巧。

在我看来，这些年轻姑娘向我张开的手臂中，有坦率、慷慨和热情在等着我。

前一位姑娘的余温在我手中还未退去，我又握住了另一个姑娘的手。



肩膀依然还停留着前一位舞伴的手给我的温暖，下一只手又放上去了。整个过程便又开始。看到一双新眼睛，一张新脸庞在我脸边，一个新声音从双唇中吐出。我没办法不盯着那嘴唇，没法不去想亲吻它们。除了跳舞，男性和女性无法在公开场合如此接触，无法如此交谈。跳舞万岁！它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奇妙而美好的例外。

有时候，要是太长时间地盯着其他舞者，看到的便只是女人们赤裸的上身，如同一队大理石雕像一般，墙上的雕像好像全部复活了。她们走下神坛，在舞池危险的亲近中滑动脚步。

那些女人觉得既迷人又有些许奇怪：一个看来没有什么教养，看来连社会礼仪都不一定全部知道的人，竟然可以这么精通于其中的一种。我看出她们的迷惑，她们不知道该怎样问我，怎样既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又不会伤害我的自尊。

我在想，明天报纸的社会版将会刊登这次秋季舞会的报道，当然还有我。报道者会是舞会的客人，也介绍给我认识了，可能就有弗里克夫人。在他们署名线下面，按照跳舞的顺序，罗列出每个舞伴的名字。人们会指点说这是谁家小姐，她们又会有怎样的关系。她会把我描述成一个“寡言但却沉稳的年轻人，看来是库克医生教他的；舞跳得极好，举止将会成为他美丽舞伴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给人以瘦弱甚至纤细的假象，但眼睛却不是，是那种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眼神”。

226

舞曲之间，我不知该跟围在身边的年轻姑娘说些什么。我想要造成一种谦逊少语的印象，就像我并不是不会说话，只是想让身边的崇拜者感觉出，救皮尔里上尉一命的事已经被谈论得够多了。

我很快便认识到，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她们这么热切地想见到探险家，她们早已认定他肯定是会非常有趣，所以只要成为能够第一个见到他的人，她们便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了。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好像我在这次援救之前早就是探险家，碰巧救了皮尔里上尉而出名，救他也只是最出名的一项成就，肯定不是第一个。

时不时，我看见库克医生在看我。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和赞助人交谈。他会从谈话中抽出眼神担心地往我这边望一眼，碰到我的目光后，担心会变成微笑。他没跳舞，他肯定是想给那些赞助人留下印象。

“探险者会经常遇到危险，彼此帮助实在太平常了。”我听到自己在说着。这话却遇到了以弗里克为首的一致反对。她听起来有些生气，好像觉



得我在她的看护下不该说出如此失礼的话。

“可是，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救了像皮尔里上尉那样的人，便一点儿也不平常了。”这句话是一位看起来很尊贵的中年男子所说。他一直站在围着我的人群外边。

“我叫莫里斯·杰瑟普。”他说道。其他人让开路，他伸手过来。“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主席。年轻人，你不仅救了他和他的家人，你也救了我们的国家。皮尔里上尉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要不是你，我们已经失去他了。有充分理由证明你该为自己的行为获得正式奖赏。为推荐你获得哈丁勋章，我已向海军方面寄去了几位证人的证言。哈丁勋章是海军为表彰为国服务的功臣而颁发的最高荣誉。”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掌声，好像杰瑟普已经把哈丁勋章挂在我胸前一样。随着杰瑟普的话在人们之间传开，人群中有了更多的躁动。

杰瑟普看着我，似乎在说，要是轻视我的英勇行为，便等于轻视皮尔里上尉一般。

我环顾四周，想找库克医生，却没有看到他。我觉得，尽管他们都认为我是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但我模仿他们谈吐的举动还是很傻。我不该在杰瑟普这么重要的人物面前如此明显地故作谦逊，他对于库克医生的梦想来说是那么重要。他所处的地位可以让他比别人更轻易地感觉出我的荒唐，如同我是探险者之间兄弟之情的最好体现，如同他们每天都会彼此相救，就像穿衣戴帽一样不值一提。

“斯特德先生，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三代表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这种事怎么算，你呢？”

“我不记得我们见过啊。”这就是我能想起来的，跟我一起跳舞的一位年轻姑娘所说的话。

她笑起来。“我们当然见过了。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跳了。”

是萨姆尼小姐，我的第一个舞伴。

“萨姆尼小姐，真抱歉，我——”我说道。

“克里丝丁·萨姆尼。莉莉·多佛的女儿。多佛是她婚前的名字。”她说道。

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是和库克医生信里和谈话中谈到的莉莉在跳舞。因为这个莉莉，我母亲才遇到了库克医生。他们坠入爱河时，莉莉还是他

们的女伴。有她作为第三人耐心而频繁的出现，才引开了人们的注意，没有让别人知晓她身后其实已有了一段恋情。有一阵子，好像我母亲又在近前了，仿佛我只要看看周围，便能看见她站在库克医生身边。他们两个没有接触，在看着我和莉莉的女儿跳舞。

“你好像走神了，斯特德先生。我会生气的。你跟别人跳得那么好，跟我跳却摔在地上，人们还以为是我的错。”萨姆尼小姐说道。

“对不起，我只是没想到今晚会遇到……一个亲戚。”我说道。

她笑起来，好像我身上什么好笑之处给暴露了，而我自己却不知情。笑容美丽而自然。克里丝丁。我总算记住了一个名字。

“我母亲曾到过你家，就在这儿，曼哈顿。”我说道。

“噢，我都知道。她那时已经订婚，马上就要结婚。我母亲一定要请她在成家之前到曼哈顿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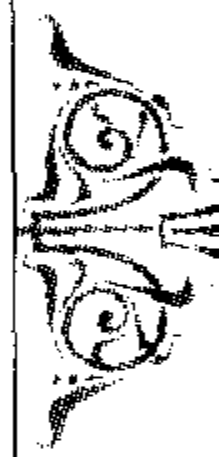
我等着她告诉我其他的事。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莉莉不知道我是他儿子，可我母亲曾写信告诉过她，说她改变了对库克医生的看法，还要把和斯特德先生的婚期提前。我常在猜测，莉莉·多佛会猜出真相吗？她会猜出婚礼为何要提前，为何我母亲会在不久便宣布怀孕了呢？要是她猜出真相却没法证明，要是她写信给我母亲，我母亲会否认吗？或许不会。要是莉莉匆忙得出结论，那便会是我母亲之所以要提早婚期，是因为她在遇到库克医生之前就和另一个不知名的人有了孩子。库克医生好像从没在意过莉莉，从没在乎她可能知道或怀疑什么。

我在想萨姆尼小姐知不知道，她母亲有没有告诉过她我母亲和库克医生的事，还有她自己在他们短短的秘密情史中的角色。

“你母亲跟你说过我什么没有？我很小母亲就去世了，我几乎都不记得她。我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说道。

“她说了她的很多事。特别是现在，你成名人之后。她叫你‘阿米莉亚家的孩子’，好像你还是个九岁的孩子一样。‘报上还有另一篇阿米莉亚家孩子的报道呢。’”

莉莉。阿米莉亚。我想起库克医生坐在客厅炉火边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提到过这些名字。又一次，我觉得我母亲似乎就在眼前。作为莉莉的客人，她也受邀参加了秋季舞会，跟库克医生一样。看上去没什么特殊的三个人，库克医生会和她们轮流跳舞。莉莉没有订婚戒指，可以追求，人们会认为库克医生对她感兴趣。



库克医生的目光从房间的一边看过来，惊醒了我的幻想。他点点头，却没有微笑，这让我有些怀疑他可能知道我正在和谁跳舞。

“你母亲见过库克医生吗？”我问道，可马上便后悔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呢？”萨姆尼小姐问道。

“没、没什么，库克医生、库克医生曾在布鲁克林住过一阵子。”

“不是每个住在曼哈顿的人都认识住在布鲁克林的人。”萨姆尼略带嘲讽地说道。

“不是，当然不是。我还是以圣约翰斯的方式考虑问题呢。在那儿，人们都认识。”我答道。

萨姆尼小姐点点头，玩笑般地笑了笑。

我想象着萨姆尼小姐会告诉她母亲，告诉莉莉我提的古怪问题。莉莉会猜到库克医生已经跟我说过什么了吗？她从我伴在一起的样子大概就能知道什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萨姆尼小姐问道。

“我有点儿累了。”我说道。

“你是看上去有些疲倦。有人开始离开了。”她说道。

我们分开了。

“希望还能见到你。”我说道。

她笑笑，看上去似乎保持不住她惯有的沉着了。

“是的，我也希望如此。”她答道。

我重新回到弗里克夫人那儿。我们找到库克医生。他在墙边，四周围着站成半圆形的青年男女。

“有人说探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走过去的时候，听到有位妇女在问。“他们说我们还没到达的部分是怎么也到达不了了，所以世界上没什么好发现的了。”

“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探险，无论多困难，竟然能被人永远放弃。”库克医生说道。“我无法想象，人类竟会满足于地球上某个地方没被发现，人类能满足于知道却没见到，却没踏上自己的足迹。”

他身边的人群中响起一阵同意的低语声，年轻女士们点着头，互相微笑着，仿佛库克医生刚才这番并不常见的雄辩之词道出了她们长久以来的信仰。

看到我，库克医生举手向他的听众道了晚安。

“来，德夫林，我们加入离开的队伍吧。”库克医生说道。

我走在他身边，他抓住我的胳膊，侧过了头。

“你怎么样，德夫林？”他小声问道。

“我很好。”我边说边看着他，好像要证明给他看。他看上去却并不怎么放心。我想起来，舞曲中间的时候，弗里克夫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没说出来。从她关切地看我的样子，她大概以为我可以猜出点什么来。我一直也没想出那会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我突然意识到，突然感觉到了我的处境。我知道，既然这个从未有过的夜晚快要结束，我的身体也得应付它带来的副作用了。我开始有点放松，自己没把舞会搞得一团糟，身体也开始放松警惕了，已经过了极力掩饰自己压力的那一刻。我担心的却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过去的几个小时。从我现在的样子可以感觉到，我肯定是表现得糟糕透了。我头上的血管在跳，好像和心脏换了地方。我浑身上下都在悸动。库克医生随便碰到哪里都可以替我量脉搏。那种悸动与颤抖的感觉就像刚刚搬过重物。成串的汗珠从太阳穴两侧滴下来，流到脸颊两侧，流到胸前背后，狭长而冰凉。我觉得自己要是靠在哪儿，夹克和衬衣一定会马上湿透。

我这样有多长时间了？两个手腕因充血而呈深红色。脖子和喉咙处肯定也是如此。我都不敢找面镜子看自己的脸。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见到，等我看到自己因充血而陌生的脸庞，看到自己深陷的眼眶里鼓胀的眼睛，看到自己泛着铅色的双颊，看到这样一张面孔对着自己，我都可以想见那一刻的惊惧与逃避。别人看到的我不愿再看到，他们看我这副模样看了整整一晚上，可能以后也会永远看到我这副样子。我盯着自己的手，上面全是汗。我肯定把舞伴们的手套和礼服都弄湿了，可萨姆尼小姐还是跟我跳了第二次，还曾关心地告诉我我看起来很疲倦。委婉的关心。

“我们回家吧。”库克医生说道。我看看他。在旁人听来，他关心我不是因为我很疲惫，或是我已给了别人如此的印象，而只是一句想照顾好我的得体问候。我没法想象我还会有头脑清醒或脸色正常的一天了。

“可怜的斯特德先生，我让你遭了多大的罪啊。”范德比尔特夫人说道。“你看上去因为我的招待受的罪要比你在格陵兰呆的所有日子都多。看来对一位探险家来说，呆在北极要比让他呆在海德公园某处漂亮的房子里自在得多。”

“不、不是的。我玩得非常开心，范德比尔特夫人。”我答道。她笑得那



么热情,就好像她终于从我身上盼到她期盼已久、毫不掩饰的热情。

“如果我们不久再邀请你,希望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她说道。

“我会非常乐意再来的。”我答道。

她转过身跟库克医生说了些什么,库克医生的答复很长,我却一个词都没听清。

沿着弯曲且饰有天鹅绒的楼梯往下走时,我突然有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只是象征性地瞥了一眼,我会知道它位于何处但却无法前往,今晚就像是我得到的一种奖励,但也仅有一次而已。

对于跟我们一起走下楼梯的那些人,类似于秋季舞会的场合业已平常,我和库克医生影响了他们的举止。他们不会觉得,有一天会接不到邀请他们到这种场合的请帖。我们等待仆人递过手套和围巾,不远处就是即将走出的大门,我们会像其他那些知道自己还会再走进来的人一样随意走出,走上台阶踏上无数通往这所房子的道路。我看看库克医生,很显然,他头脑里不会有这些想法。

“今天晚上进行得不错。”他说道。“虽然只是一部分,但知道皮尔里真实状况的人比我想象得多。就算他们相信他或许会成功,也清楚这次是他最后一次了。很多次,别人都问起我自己的计划。有位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还把我称作‘美国探险家里的摄政王’。有些人听到了,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我们甚至都不用去摘苹果,等着苹果掉到手里就行了。”

他听起来这么开心,谈起未来又如此从容镇定,我也高兴起来了。他可能早都不记得曾在信中或当面对我倾诉过的烦恼和折磨了。

这个夜晚进行得很顺利。克里丝丁。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是不是就该这样称呼她?我没跟她说过我叫德夫林。肯定她知道,但不一样。我想象库克医生第一次遇见我母亲后回到布鲁克林的样子,想象他如何不愿参加那个为毕业医生举办的豪华晚会,却最终坠入了爱河。

“太美好了,我原本不知道会是这样。”我说道。

“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的话,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访客,只是过客。不仅仅是钱的原因。”他说道。

“我跟莉莉的女儿跳舞了。萨姆尼小姐。”我说道。

“克里丝丁·萨姆尼。”库克医生说道,“是位不同寻常的姑娘,跟她母亲很像。”



“我或许犯了个错。”我说道，“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你曾见过我母亲。我问她，她母亲是否见过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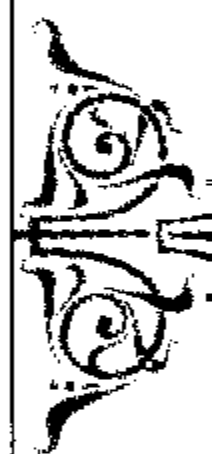
库克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如同在思索我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

“没事，我敢肯定。”他说道，“我要是你，会把这些都忘掉。”

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说话。

我还能感到那些跟我跳舞的女人，感到她们碰过我的地方有种不一样的温暖，还记得她们的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样子，我希望这种记忆永远不要淡去。

后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仍觉得似乎有只戴着手套的手还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搭在肩膀上。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还在跳舞，感觉重复的动作已经刻到了我脑子里，并不理会我一动不动的身体，继续在头脑里跳动，还盼着我的脑子能跟上节奏。我想到克里丝丁，我的手在她手里，她的在我手里。我跳得越来越快，如同喝了酒一般，整个房间、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我却滴酒未沾。我不得不睁开眼坐在床上，让它停下来。



第23章

“达科他”有什么东西让我不安，不是周遭那些看起来阴森森的家具，也不是那些无人居住的空房间。

几乎每天深夜，都能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有几次我大着胆子走出门，却看见客厅的门关着。有时候从门缝下边可以看到光线，我知道是屋里壁炉跳动的火光。有时候，尽管能闻到库克医生雪茄的味道，却看不见任何光亮。

有天晚上，离我最近的客厅门关着，另一扇微微开着。一道斜射的光跳动着洒在走廊上。我能听见壁炉里木头的噼啪声。

记得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只要是开着的门，便可以当做是他对我的邀请。我刚准备进去，却听见库克夫人难过的声音。她是在责备什么。虽然还有好几英尺，但中间并没有什么东西阻隔，我可以听清她在说什么。

“斯特德先生什么时候会搬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可能永远跟我们住下去。他是个成年人。他难道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属于自己的生活吗？”

“亲爱的，他是从那种小地方，那种跟纽约大不相同的地方来的，他还没有准备好在这里闯荡。”

“那他什么时候会准备好？”

“我不知道。你见他还没有一个月，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都一个月没见到你了，因为他的缘故。”

“你在夸大了。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些疏远，那千万不要责怪斯特德先生。”

“如果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疏离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明显。从他到这儿以后，你就不是以前的你了。”

“不是这样的，我一直都这么忙。”

“从他来这儿以后，你就像着了魔一样。”

“那跟斯特德先生没关系。斯特德先生来后不久，探险活动最后有个间歇，只是巧合。你知道我，计划探险或刚刚归来时就是那个样子。”

“计划探险，出去探险，探险归来。除了跟斯特德先生到处游荡，就没见过你干其他事。”

“求求你了，玛丽，小点儿声。”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不再有丈夫，我的孩子不再有父亲了。”

我觉得自己是在听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之间的争吵，好像我又回到了德文街，还只是个他们觉得什么都听不懂的婴儿。

“结婚前我就告诉过你，我会常常不在的——”

“你不在家时我是一个人，可你回来以后我还是一个人。没人理睬我，都在躲着我。你的话还得让仆人转告我，就好像我们不住在同一所房子一样。”

“我以前从没有过助手，这次不一样，很自然得花些时间跟助手在一起。”

“我还以为问题只是你得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呢。可你对我和孩子的态度都变了。你原来很风趣，也很温柔，现在你却变得这么刻板，这么冷淡，只是在应付。我早知道你不会像喜欢第一个福布斯家的女孩那么喜欢我——”

“亲爱的玛丽——”

“我曾以为，你对我的感情还挺强烈，或许有一天你会爱上我。”

“玛丽——”

234

“我可不知道，这位斯特德先生能这么快就把你变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就是他，不管你觉得我是不是理智。我真希望你从没遇见过他。但就是现在也是可以很容易地补救啊，比如说给他找份工作，找个地方住。这样的要求难道过分吗？为了你的妻子和你的家庭，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玛丽，这很荒唐。我不会让整个纽约和半个世界的人来猜测，猜我为什么和我勇敢的被保护人分道扬镳，报纸上就是这么叫他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那你为什么不证明给我看呢？我们可以找到新助手，一个不用跟我们一起住的——”

“不，我不会让这么能干的年轻人走。不能仅仅为满足你奇怪的妒嫉，就剥夺他喜欢的工作。”

“我只是不理解，弗莱德里克，你以前总是那么听我的，就算我有时不对，也是那样。可就在这件事上你不愿让步，尽管他让我这么不开心。我的幸福对你已经下重要了吗？”



“肯定重要啊。但我不愿为你这种毫无理智的厌恶开先例。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头脑一热或任性,觉得某人不合适,或者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就把什么人从我身边赶走。”

我替她感到难过,也为自己在这儿感到内疚。利比·福布斯是库克医生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以为他是因为还记着她才会像现在这样,以为她才是他真正所爱的人。

“晚安,玛丽。如果你愿意,我们回头再说这件事,可现在——”

她离开时他还在说什么。沉重的大门向外打开。她肯定是用双手推开的门,要不是有那扇门,她便会看见我。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沿着走廊下去,头和肩膀都不满地向后仰着,好像她觉得库克医生在看着她一样。

我等库克夫人消失在视线外,等到远处传来开门和关门声。

我去了仍然开着门的客厅。库克医生弓着腰坐在沙发边,胳膊支在大腿上,左手拿根没点着的雪茄,正盯着炉火发呆。他怒冲冲地抬起头,还以为是妻子又回来了。一看到我,他笑起来了。

我进了屋,把身后的门关上。我坐在一定是库克夫人坐过的椅子上,椅子还是温的。我想着她在这儿的樣子,隔着几英尺的距离在求他。

“我听到了,不是故意的。”我说道。“我看到那扇门开着。等我知道了你和你妻子的时候,我没有退回去,我怕她会听到我。”

“我早该告诉你。”他说道,“万一她要是找你,这一阵子,最好你和她保持一些距离。”只有库克夫人不和我保持距离的时候,我们才会碰到一起。可我没这么说。

“如果我在这儿让她不开心——”

他摇摇头。“就算你现在搬出去,也没什么不同。我是说对她没什么不同。她还会觉得我不是她曾经嫁的那个人。她说我心不在焉,是在委婉地说别的事。”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麼,但没说出来。

“我一直在躲她。”他说道,“我也没打算永远这样,可现在——”他耸耸肩。“我脑子里——我脑子里只有你母亲,德夫林。我脑子里装不进别的,只有你母亲,还有我们的事。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她。”

“我觉得这样不对。”我说道,“这样责备你不公平。你那时还年轻,比我现在还小,如果换成你,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你不会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能为弗朗西斯·斯特德或者我母亲的行为负责。人们会按自己



的意志行事。”

库克医生一下子站起来，好像他没法再听下去一样。

“我不仅责备自己，还替自己感到难过，为自己得承受这些后果而难过。我不能和你母亲结婚，我和玛丽结婚了，我喜欢她，可要是她没钱，我也不会和她结婚。”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意思。”我说道。“你能原谅每个人，容忍每个人，理解每个人，可就没有你自己。你说起自己时所流露出来的轻蔑甚至多过说起皮尔里。你背叛的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还活着，你和我，对我们来说还不晚。你是我父亲，这对我比任何事都重要，即使没人知道我是你儿子也没关系。”

他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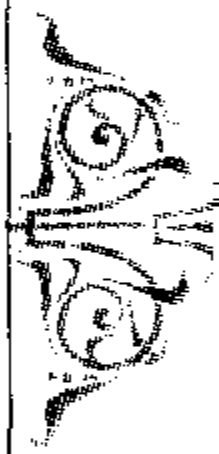
“有关系的。”他说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那很重要。”他走向前来，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你跟她越来越像了。”说完他快步离开了房间。

“达科他”。空房间里可能还曾有过另一种生活，一种库克医生时不时来看过的生活。仿佛我母亲就在“达科他”，因为有库克医生，即使我和库克医生都不在的时候，她还在这里过着她死后的生活。

我只要回到“达科他”，便会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似乎她在另一个“达科他”，另一个不太能让人看清的“达科他”，另一个曾有很多人住过的“达科他”过着与我们平行的生活。那儿房间里的家具没有蒙着单子，那儿房间里充满欢声笑语，有她的声音，库克医生的声音，我的声音，还有我弟弟妹妹们的声音。

晚上，库克先生在客厅而我在睡房的时候，参演这另一种生活的三分之二的演员便已到场。“达科他”似乎已被削弱与剪裁过了的那另一种生活所占据，是那种生活模仿而变形的片断，是一个受了伤却沉默不语的幻想。

有时我忍不住会去想，似乎我到这儿来不是我自己的原因，而是被带来扮演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库克医生给我写信的时候，便有这种念头，他预见到在“达科他”的这些夜晚，有他曾经离去的可能的另一种生活。而我，一个成年人，睡在他的房间楼下，像个孩子一样不能去敲关着的客厅门。我一直在提醒他，她不在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更心痛地明白，她已经不在了。



有时,我会听到他的声音,好像他又在和库克夫人争吵。开门出去,却看到通往客厅的两扇门都关着。他听起来好像是在轻微地争辩什么,声音太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听见你昨晚在说什么,门关着。”有一天,我告诉了他。

“我在想问题。”他答道,“我觉得把想的问题说出来可能更好。”他笑了。“也许有人不开心,以后我尽量不要声音太大。”

“那时你在想什么呢?”我问道。

“噢,探险啦,地图啦,给养啦,就是那些事。”

那些事。我知道他总是静静地做那些事,沉浸于他的研究之中,仔细看那些地图、图表、日志什么的。他不太会把那些东西从书房拿到客厅,客厅没有那么大的桌子让他把材料都铺开。但我什么也没说。

开始,我以为这些在客厅里的独白是说给我母亲听的,可很快就意识到不该是这种声调。他总是轻声地与人争辩什么,跟我第一次听到时一样。如果是和一位你希望得到安慰、保护或原谅的失去的恋人,你是不会和她那样说话的。或许他是从两方面考虑问题,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是想问题的时候把坏的方面大声说出来给自己听。或许他是演练和那些赞助人的重要会议,和莫里斯·杰瑟普,和赫伯特·布里奇曼,还有那些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

有天晚上,他的声音每隔几分钟便大一些,最后终于喊起来,仿佛要好好训斥自己,要细细把自己做过的错事历数一遍,要痛骂自己一顿。喊声听起来像是对什么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忍无可忍了一样。

他常常整夜睡在沙发上。“打个盹儿。”离开客厅碰到我,他会对我这样说,像除了想问题之外,他也不愿在客厅呆那么久。

他还穿着前一天的那身衣服,胡子没刮,衬衣皱巴巴的,头发也都竖着。他会去房里很快地冲个澡,换身衣服。半小时后,他会到自己的诊所里接诊。

有时,走在从“达科他”到我办公室的路上,我会看到鲁思。她会站在客厅另一头的门那儿,阴沉地盯着我。我冲她挥手或打招呼,她会转身离开房间,跑下楼梯。

她会怎么想我,这个不断出现在她自己家的人呢?这个她母亲害怕与讨厌的人呢?我没法想象。她母亲不愿我呆在她家里,我却还在。她父亲坚持我留下来,在我这边花的时间要比在她们那边多,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她的多。她一定会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 24 章

1902 年夏天，皮尔里上尉、马修·亨森、查理·珀西、戴德里克医生从格陵兰回来了。

皮尔里拒绝所有采访，也从没在公开场合谈论过戴德里克对他的指责。戴德里克说他不愿给为他工作的爱斯基摩人提供食物和药品，其中有人没能熬过冬天。皮尔里去了华盛顿，然后被派到海军造船厂去了。人们相信，他会在那儿的船舱里拖着受伤的双脚了结他的事业。他几乎没法走路，更别想去北极了。

人们在说，为躲避华盛顿夏日的暑热，他要去缅因州海边老鹰岛上的科德。他在东海岸的报上发了一封感谢信，提起我救他的事，还把一份报纸直接寄给了我。

斯特德先生：

去年夏天于格陵兰在带我妻女撤离的船上，本人遇到了险情，而正是得益于您的帮助，我才化险为夷，我谨对您表示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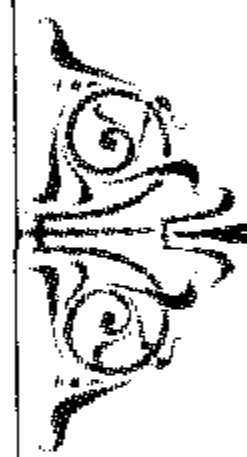
我得承认，某种突发疾病导致我当时神志不清，仅能依赖旁人讲述事故过程。据旁人所言，您冒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我，并因此身负轻伤。很高兴得知您的伤已痊愈。

我将永远感谢您，并祝您未来一切顺利。听说您也选择了探险作为您的事业，而世上没有比此更伟大的领域了。未来，我们的道路还可能再次相交。

您忠实的

罗伯特·皮尔里上尉

“这就是皮尔里。”库克医生坐在客厅，手里拿着那张登有皮尔里信的报纸。“他很聪明，等到完全清醒才写这封信。他真以为人们会相信，北极



的四年时间里，他所遭受的就只是‘某种突发疾病’吗？他什么都不记得，所以也没责任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之所以谢你，只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他知道他不在的时候，你在纽约获得了种种荣誉。他得公开谢谢你，不然人们会觉得他粗鲁，不懂规矩。他希望人们认为，这就是探险者写信的方式。他们更重行动，不会用言辞表达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啰嗦。因为他们得忍受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他们感谢别人的时候也会少言寡语。通过向你致谢，他在暗示说他会领导未来的北极探险。作为一个探险家，他的日子还远远没有结束。好啊，公众或许会信他，但是圈子里的人知道他不可能了。皮尔里永远也不会公开承认，说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也不会有人替他宣布。甚至公众看到火炬已经传过来之后，都不会发生。看到报上的这封信，知道人们都在读它，看到人们都相信上面的话，却没办法回答它——”

他停下来，转身对着炉火。看到他生气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

“我不觉得有谁会被这封信骗了。”我说道。

库克医生没有答复。他慢慢把手里的报纸撕成碎片，一片片地扔进火里，仿佛他在烧的皮尔里的来信只有这唯一一封，仿佛这种仪式会防止人们信以为真。

我私下给皮尔里写了回信。在库克医生要求下，我也尽可能写得和皮尔里一样婉转，说能“帮助”他我很荣幸，特别是因为他和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是“同事”。



第 25 章

有时,我们走过大桥,风里隐隐闻到海的气息,似乎在提醒我第一次从纽芬兰到新斯科舍的旅程,提醒我曾经的童年随着每一天的逝去而变得越来越缥缈了。

有段时间,刚获得的名声让我沉醉。现在,我开始留意这座城市。

曼哈顿似乎没什么当地人,即使熟知它的人也不得不停下来为这座城市惊叹。人人都好像是从其他地方刚刚到此,他们为这座城市设定了步调,这座城市也以此不断重塑自己。

正在进行的不仅只是一场改造。曼哈顿也不仅只是一座城市,它是数十个城市交错在一起。简单一瞥,你对其中一个有点印象,脑海里刚开始想象它一年后的模样,它的蓝图便因有更新的出现而被抛弃。建到一半的建筑被摧毁。街区的建设者似乎脑子里并没有概念,他们似乎不知道从这堆废墟上崛起的会是一座怎样的建筑。

高高的钢梁上行走的工人愣愣地看着远处,看着很多街区以外另一座正在建设的更高的大楼,他们惊呆了。这有些危险。距离太远,他们无法看清正在工作的工人或设备,看上去就像一座大楼自己在建设自己,自己往天空上攀登。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从布鲁克林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曼哈顿的轮廓在变化。我已熟悉的那座建筑,那带银边而显眼的黄色条石会在某天突然消失,缝隙会很快被另一种颜色填满。从地平线的剪影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在随意安排这座城市,把建筑物移来挪去,把它们的顶换上尖尖的顶子。它们高高地挺向天空,就好像世界上只有它们自己。

晚上,库克医生和我会驶过建筑工地。蒸汽起重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机械长颈鹿一般。巨大的蒸汽铲也静悄悄的。起重机上的大梁不工作的时候,停在那儿就像伸向天空的手臂,高悬在我们头上。有些铲下还满是砖石碎片,如同这座城市早上时不是慢慢醒来,而是突然变活。停止工作的每台机器,每个人,都像被按了电子开关,会立刻动起来。



几小时前消失的机械的喧嚣声还在街上回响,很快就又会开始。库克医生说,对于城市来说,黑暗是种反复发生来回循环的不便,是强加在行动与进步之上的间歇,是一个未来肯定会因某种发明而被解决掉的问题。他跟我解释钢架结构如何为建筑业带来革命,如何改变城市的面貌,钢架和电梯如何可以造就比原来高出三到四倍的新建筑,我却不再听了。

看来,曾让我为这城市感到不安的那些事现在已让我放心了。吸引我的是不断被抹去的过去,还有一个未知的、并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那些人,那些看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可不管怎么说,也就是人而已。他们会像孩子般因探险家和冒险而激动。他们不是恶毒的暴君,也不是剥削别人穷凶极恶的大亨,他们的讽刺漫画出现在所有报纸上,他们也常出现在报纸社论和印制的布道词里。

现在,替库克医生跑腿的时候,在曼哈顿的豪宅里,我不再是被指一下大门进去“右边的房子”了事。我会被邀请进会客厅,有时还会是书房或起居室。在那些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们的家中,他们给予我的不仅是赞许的微笑。

库克医生一直在城市里四处活动,跟人谈话,发出告诫。因为皮尔里对北极四年无功而返的探险,人们现在相信北极点无法企及。

只有皮尔里才有权威书写探险经过,没人知道只完成了那么一点点。库克医生说没关系。要是人们知道那是怎样彻底的一种失败,没人再会把钱,哪怕是一分钱投入北极探险中了。

人们在谈论南极,库克医生说他对此不感兴趣。南极点是一个固定的点,位于冰雪覆盖的大陆中间,因此,相比处于地球另一头“顶”上又不断变化的北极,去那儿要容易得多。

对于皮尔里探险的时间,人们说了很多。“四年啊,即使花四年时间皮尔里都没能到达北极点。”人们会这样讲。似乎是说皮尔里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我一直都清楚,他的成功就意味着我的失败。”库克医生说道。“可现在看来,甚至他的失败也意味着我的失败。四年了。人们不知道其间他为到达北极做了多少努力,不知道他在帐篷、小屋和爱斯基摩人的住所呆了多长时间。他已经绝望,死神先来还是救援先到他都麻木了。要是人们知道这些该多好。”

“现在他退出竞赛,却热心于到处宣传北极不可能到达。他似乎对获

得这种安慰奖心满意足了。奖项证明北极无法到达,他因此被人铭记。”

“就算我愿意,从玛丽那儿拿到的钱也不够装备一支到北极的探险队。赞助人现在对北极失去了兴趣。那些名字还没被用来命名什么海角、海湾、小岛的赞助人,也被皮尔里的蠢行搞砸了。我跟自己说,过段时间,他们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的地方,他们对北边的兴趣会恢复的。”

“我知道听起来很尖刻,有些挖苦人,但正如我在范德比尔特家时所说,让我永远离开北极,让我只满足于知道北极在那儿,却永远只能面对而无法到达,我是无法忍受的。还有,加入皮尔里的探险队,却遭遇如此的挫折与失败,同样难以想象。潮流的指针会转回我们的方向。有一天,指针会再次笔直地对着北方,德夫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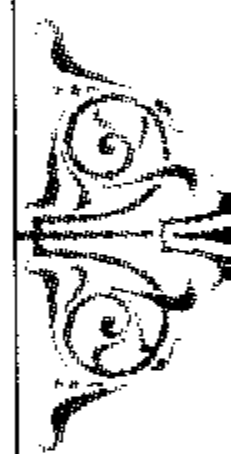
“当下,我给我们找了一项不那么艰巨但仍具难度的目标,会让我们保持赴北极的状态,还能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并且放在赞助人面前。不久前,阿拉斯加有座山峰测出高20300英尺,是北美洲大陆的最高点。我想在你的帮助下攀登它。我想做第一个登上麦金利山顶峰的人。只用一个季节就够了,我不会像去极地探险那样,离开玛丽那么长时间,这也会让她好受些。我们还能学点东西,对实现那个更伟大的目标会有帮助。”

库克医生和我还受邀参加了其他舞会和社交聚会。每次,他都得为玛丽的缺席编些理由。我觉得这些都没范德比尔特家的那次豪华,也许是我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场合,已经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欢迎,应该有人陪在身旁,好像我过去不曾渴望过别人的陪伴,好像我不曾失去过别人的陪伴一样。

任何一个聚会上,如果没有克里丝丁,我便会失望。只要她看见我,便会冲我微笑,然后我们会从人群中穿过,走到一起。我们整晚一起跳舞、交谈,所以经常有人拿克里丝丁开玩笑,说她独占了我。“她很喜欢你,斯特德先生。”克拉伦斯·维科夫说道。他凑到我跟前说:“上帝啊,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谁的脸会变得这么红。”

我经常受邀出去,也开始经常碰见一些曾经见过的人,有年长的男女,也有年轻的。他们看到我,高兴得似乎我们是初次见面一样。

如果他们感到皮尔里的信缺乏诚意,或是没多少谢意,或是听起来有些不合适,他们也不会说。他们会说,那是多么大的荣誉啊,皮尔里上尉这样的人物竟对我曾救了他而公开致谢;又是多么大的遗憾,皮尔里上尉竟



不住在纽约，因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呆在“可怕”的华盛顿。要是他和我能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别人问起我和库克医生下一步的计划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攀登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是北美洲最高峰，最近才被人“发现”和测量，还没被人严重“骚扰”过，尽管阿拉斯加的印地安人几个世纪前就知道它了。

“但北极怎么办呢？”有人会问，“真的无法到达吗？”我让他们放心，库克医生和我从没放弃过要到达极点的想法，但攀登麦金利山一个季节就能办到，我们用花在格陵兰岛的一个夏天就能办到。像库克先生说的，这对我是很好的训练，会比我直接从极地探险开始我的事业要好得多。极地探险会花费数年时间，我在生理和心理上可能还没完全准备好。

我以前登过山吗？只爬过那些居住在纽芬兰的人必须攀登的高度，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但他们都会当真。每个人都点头，似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好像从我生长的地方便可看出，我能很熟练地攀登。

我告诉他们，我会爬到库克医生允许我爬的地方，或是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怎样都行。我会学库克医生的话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实现更伟大目标途中暂时的一段弯路。”

我跟人们描述库克医生的准备工作，他们会用赞叹与敬佩的目光看着我。我没提到这次探险库克医生主要会用他妻子玛丽的钱，没提起诸如皮尔里任主席的美国地理学会和其他许多机构，没提起他们已经拒绝了他要求资助的请求。我也没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只是做了个象征性表示，他们给的是一支度量海拔的无液气压计和一支袖珍六分仪。

1903年5月26日，我们离开纽约乘火车前往太平洋西北部地区。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位惯常的“绅士探险家”，他们的父亲付了钱，让库克医生带上他们。

我是第一次见识美洲大陆的广阔。大部分地区无人定居，似乎会永远保有现在的样子。我们乘坐的圣安娜号蒸汽船越过温哥华岛，进入内航道，绕过阿拉斯加一带荒凉的岛屿，在朱诺、努特卡、亚库塔德停留。库克医生说，去克朗代克河淘金的人也曾走这条路线。

6月23日，我们到达泰翁尼克。我们把驮马放下水，任它们游到库克水湾。它们上岸后非常疲乏，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都没用了。

经历两个月危险而缓慢的行程，穿过阿拉斯加荒野上浓密而遍布蚊虫

的灌木丛,8月21日我们在麦金利山脚下搭起了基地帐篷。

攀登本身并无惊险。两个星期时间,我们7个人只走过些陡峭的山崖,便到了约7000英尺处,上面是山上最大的冰川。库克医生和一位名叫罗伯特·达恩的记者接着往上爬去,到达了11300英尺的高度。因为有无法攀爬的冰墙阻隔,他们撤了回来。

9月底,库克医生和我回到布鲁克林。库克医生告诉记者,他或许还会爬一次麦金利山,也许就在下一个夏天。

对我来说,这次经验只能算做一次长而劳累的野营。与极地探险相比,爬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就这么跟库克医生说了,他只是让我要耐心些。

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报纸在为我们攀登麦金利山的行为而庆祝。库克医生跟我说,不要小看这次攀登,也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罗伯特·达恩在一本叫做《野外》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文章坦率,未加渲染,途中成员内部的拌嘴不和也给登了上去。

刚开始,库克医生认为他的名声会因此受损,可公众关心,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经受的艰辛和克服的障碍。乘木筏漂流过一条没有标注的冰川河流成了关注的热点。库克医生和达恩在前面领航,我们其他人轮流划桨,湍急的水流会随时让人掉下筏去。我曾掉下两次,冰凉刺骨的水流让我没法喘过气。好几次,我把其他人拽了上来。每当我记起自己掉进冰凉的绿色河水里的时候,便会想起我母亲。我能体会到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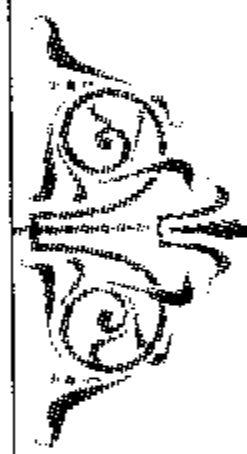
达恩没有把我写得特别勇敢,没有把我写得跟其他人有何不同,他只说我“奴隶一般地忠于库克医生,凡有争议,必站在库克医生一边。对于库克医生的命令,无论其他人觉得多么愚蠢,必忠实执行”。

我写信告诉了达夫妮叔母,我们要攀登麦金利山。回纽约后,又给她写了一封。

库克医生在“达科他”过夜的时间比他去麦金利山以前更少了。一天晚上,他到客厅,告诉我他妻子已有四个月身孕了。

库克夫人生了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海伦。让我诧异的是,海伦两个星期大的时候,我也受邀去看了她。库克夫人在起居室里,婴儿睡在她膝上的篮子里。她身上裹着格子布,只能看见红润的小圆脸。

“她真可爱。”我小声说道。



第一眼看到我的第一个同胞，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真动情了。我轻柔地跟她说话。库克医生似乎在提醒我该小心些，他退过身坐在房子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库克夫人用从未有过的笑容看着我。

“你觉得她像谁？”她问道。

我想说“她看起来像我”。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面回响。她还太小，还是婴儿，实在看不出来像谁。我还是说，她看上去更像她母亲，而不是她父亲。库克夫人温柔地对我笑了笑。



第 26 章

“我看出你和库克医生有些不一般。”萨姆尼小姐说道。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惊讶流露出来。

“你们之间有种奇怪的尴尬。”她说道。“对方在场的时候，你们看起来并不自在。比起其他人，你总是站得离他更远一点儿。我见过男孩子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他们无人陪伴，让别人以为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只是凑巧站在旁边。可你们两个分开的时候，你们总会不停地看着，找着对方。最奇怪的事是，你从来都不称呼他。你只是看他，然后便说话，就好像你只记得他的脸，却不记得他的名字一样。而且，好像是为了补偿，他却太多次地叫你的名字，有时一个简单的句子里面能用两次。德夫林，德夫林，德夫林，听着都不自然。每次你们碰到一起，你看来总在躲着，不愿和他握手。”

她肯定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们。她观察力如此之强，发现了这么多。她身上有种让人熟悉的感觉，一种吸引人的自以为是，与这种社交聚会并不合拍。这种情况下，我缴械了。

246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我在想，谁还会这么仔细地观察我和库克医生呢？

“我没注意到任何库克医生和我之间的尴尬情况，萨姆尼小姐。以后或许会有。”我答道。

“噢，我的天，我担心我讲话是否太鲁莽了。”她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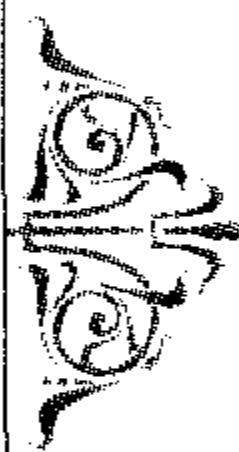
“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如此吗？”我说道。

她笑了笑，抬起眉毛玩笑似地回应我的话。

“你没有鲁莽。我只是觉得你搞错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尴尬的。”我答道。

“我得承认，今天晚上我一直在看你和库克医生，因为我母亲跟我说了些事情。”她说道。

她专心地盯着我，好像在盼望她的话可以让我激动，让我可以允许她



做什么事情一样。

“你脸红了。”萨姆尼小姐说道。

“我常常脸红。这么近距离地看我的人应该知道。”我说道。

“我问过我母亲，她是否见过库克医生。”她说道。“我没跟她说我为什么要问，我没告诉她，你曾经问过我她是否见过他。如果你原谅我的话，我是有点心眼，不想那么直接，不像你曾经的那样。我告诉她，说她应该见见你和库克医生，因为她曾经认识你母亲。我说‘当然你肯定见过库克医生了，你认识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很难想象你们竟然没见过’。然后我母亲就说了些让我非常惊讶的话。她说她是见过库克医生，但那是他们还没在一个社交圈里活动之前。她说她很多年前就见过库克医生，用她的话说，那时‘他比阿米莉亚家的男孩还要年轻’。她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也不愿让跟他相遇的那一幕再出现。现在你怎么想？”

“我无法想象，一个曾见过库克医生的人，会不愿意再见他一面。或许你母亲错把其他什么人当成他了。”

“我母亲刚50岁。”萨姆尼小姐说道，“我得说，她还没有那么老糊涂。”

“我没法替你母亲回答。很抱歉，不知为何她会对库克医生有错误的印象。”我说道。

“她说，他们是在同一个社交圈，但都很小心，不愿碰见对方。她说既然你跟库克医生那么亲近，她最好还是不要见你。然后，她就不愿再说任何这方面的事了。你能想象吗？她……她勾起我的好奇，却坚决不肯再多说一个字。‘要是你不把事情说完，那你干嘛要开始说呢？’我问她。她退缩了。她说她说了些傻话，说她在夸大事实。‘我希望你把我们的都忘记。也别跟阿米莉亚的男孩说起这件事。’你能想象吗？‘我想让你忘记。’好像我能忘了一样。好像我有可能做到一样。当她谈及她碰到库克医生的时候，有些激动。要是我不知道，要是我不知道我母亲的父母曾阻止过他们，我发誓他们一定曾是恋人，然后他抛弃了她，找了另外一个女人。他们之间肯定有过某种不愉快。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

我摇摇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对我来说，一头是你奇怪的问题，一头是她奇怪的答案。”克里丝丁说道。“你们两个都快把我逼疯了。现在你站在我面前，脸上红一阵紫一阵什么颜色都有，要是你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是不会这样的。”

她忽然转变语气，提高了声音，羞怯的玩笑变成夸张，我知道她是真有

些紧张了。我四处张望,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声音。有几个人在往我们这边看,但我没有看到库克医生。

“我无法想象,我会意外地发现些什么,为什么你和我母亲都要这么神秘,就好像有什么事,有什么秘密必须瞒着我一样。”她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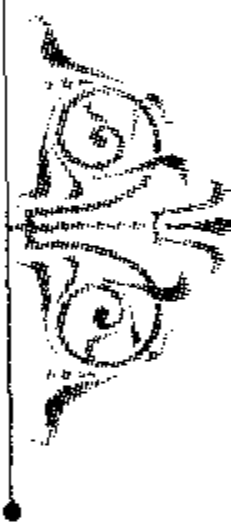
“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必须瞒着你的秘密。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母亲和库克医生见面的任何事。在范德比尔特家,我之所以要问这个傻问题,是因为我总得找点话说。就这么回事。我也可能问你,你母亲认不认识皮尔里上尉,或者她认不认识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

她笑了。

“我不相信你,斯特德先生。”她说。“尽管你的确有时候是找不到什么话说。我们别说这件事了。要是你还不烦我的话,我倒是非常想你能再邀请我跳上一曲。”

我们跳舞了,我也没有烦她。我告诉自己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的话——记住,你只是她世界里的一个访客。我会只是她的一个访客吗,一个访问她的胳膊,她的手的客人吗?为什么她的手搂我要比平常紧得多?我的手只是在访问她的背。我的眼睛在访问她的眼睛。我在想,要是我的嘴唇也访问她的嘴唇会怎么样。

我没有告诉库克医生她跟我说的话,没说她母亲都说了些他什么。可她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也不理解。据库克医生说,她相信是我母亲提出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为什么她会不理库克医生呢?或许她开始的时候并不赞许他和一位订了婚的女人约会,但又是她帮助他们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许现在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所以不想见到库克医生,担心又想起往事吧。



第 27 章

我们攀登过麦金利山之后，怀疑极地探险有无价值的流言依然不减。没有受此影响的探险家似乎只有皮尔里一人，靠自己资格老，他已在海军谋得高位。这位海军指挥官对那种认为极地探险对海军于国家均无益处的说法嗤之以鼻。

库克医生从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得知，皮尔里已被选为另一艘北极探险船的指挥，会在 1905 年夏天开始新一次北极之旅。“你想想，上一次没让他成功的原因是风向号。”库克医生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看上去他很坦然地接受了对他来说这么大的挫折。

“人们都觉得，不能让那次耗费四年时间却一无所获的探险成为他的最后一次。”他说道。“人们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不是让他去北极，而是让他挽回自己的颜面，再去一次让人们好方便地谈论他。他把那些出钱的人又愚弄了。他把那艘船命名为‘罗斯福’号。总统相信皮尔里能代表美国的男子汉，是甘于受苦的典范，当然总统自己更好些。在皮尔里进行他注定失败的北极之旅时，我要征服麦金利山的顶峰。我的胜利和他的失败会并排放在一起，不会再有疑问，谁才是美国最伟大的探险家。”这话听起来空洞中带着绝望。

1905 年夏天，皮尔里从史密斯海峡出发，向谢立丹角驶去，他打算绕过格陵兰东北端，然后乘雪橇前往北极。很快，他便处于覆盖广泛的电报站点之外，没人知道他还有没有在前行，到底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库克医生开始计划他第二次的麦金利山之行。他计划的出发日期是 1906 年夏天，皮尔里启程赴北极的整整一年之后。

库克医生和我跟一整队新成员向麦金利山出发的时候，皮尔里的确切位置还是无人知晓。我们这次的登山队里有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的教授，名叫赫歇耳·帕克。行程还是库克夫人资助的，另外还得到一部分《哈珀斯月刊》的预付款，他们要库克医生答应由他

们来独家报道我们的行程。

我们还是一样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沿同样的克朗代克河航线坐船到达泰翁尼克,经历了同样的艰辛,克服了同样的障碍。我忍不住去想报上登出的赞助人的话,有人问他“把钱给探险者,让他们再重演一次失败”到底有何意义。

我们走过因冰川融化而泥泞不堪的小溪,最后像上次一样,抵达了7000英尺处的山崖。到这儿,真正的登山开始,谁才是真正的登山家也一目了然了。

我对麦金利山没多大兴趣,所以库克医生告诉我说我不在登顶人员名单中时,我没觉得失望。

我们的成员威廉·阿姆斯特朗刚看到麦金利山上的积雪,便说他“宁可从布鲁克林的桥上跳下,也不愿爬到麦金利山的雪线以上”。

听到库克医生说登顶的机会微乎其微,帕克教授也退却了。我们还留在山上的时候,他早就坐在往东的火车上,离纽约只剩下一半路程了。

从剩下的人里,库克医生挑选了威廉·巴里尔作助手,两人将从雪线以上向顶峰进发。8月27日,他们离开极地帐篷,走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期待会成功,但9月22日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消息却是他们成功登顶了。秋天,我们回到布鲁克林不久,一张巴里尔站在麦金利山顶峰的照片便登到了《哈珀斯月刊》的封面上。照片是库克医生照的,巴里尔站在雪里,身后是一串向下的脚印,手里举着美国国旗。赫歇耳·帕克对库克医生的成就并不以为然,他说那“只是需要些耐力罢了,并没什么科学价值”。

库克医生还是被当成了英雄。皮尔里还在北边,具体方位不得而知。

一下子,库克医生成了会场和晚宴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也一样。报上把我称为他“宝贵的伙伴”。不管他在那儿,不管我们去了哪里,他总是说要是没有我,他根本没法到达麦金利山顶峰。作为跟他一起爬上去的唯一登山队成员,巴里尔却什么都没说。

跟上次一样,我觉得只是参加了一次时间较长的郊游。但我知道,如果把我自己的作用说得太轻,便会有损库克医生的成就。因此,对于他对我赞扬,我只能用我惯常的“生性寡言而谦逊”的方式接受了下来。尽管我怀疑自己可能会在中央公园里迷路,我答应过由库克医生对我行使的监护权却还没有开始。

我急切地想开始我认为的真正的探险，一次不用攀登的探险，一次库克医生会有时间给我讲解他的方法与策略的探险，而我也能真正成为他的助手。

经历了又一次失败之后，皮尔里回来了。因为损坏严重，担心会在返回纽约途中沉没，罗斯福号停在了费城。





第 28 章

库克医生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说国家地理学会将会于12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年度餐会,我和他都受到了邀请。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外,出席的还将有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各国使节。

“你觉得他们会挑选谁为主宾?”他笑着问我。“你觉得谁会得到历史上第一枚为探险所颁发的哈伯德勋章,谁会得到那只雕有世界地图的三英寸金盘子?”

“肯定是你啊。”我答道,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是啊,肯定是。”他说道,“如果说谁该得到的话。可不是我,得到的人会是皮尔里。他得奖的时候,我们还都得在场看着。”

我们赴华盛顿参加国家地理学会的餐会,第八届世界地理大会也同时联合举办。库克医生提交了三篇论文,他是唯一一位受邀提交超过两篇论文的成员。皮尔里被选为大会主席,并在闭幕宴会上被推为主宾。

大片大片潮湿的雪花直直地飘落到华盛顿,让这座城市看起来有点像另一个有趣的北极。雪花为代表们助兴。男人们有的穿件薄大衣,有的根本没穿,他们打着伞,脚上蹬着夏天的鞋子,从人行道的一小块干地上跳到另一块上。

这是我曾到过的第二座大城市。所以,大会开始前,库克医生领我转了转。城市遍布纪念馆和巨大的塑像。面容严肃的林肯坐在那儿,手抓椅子柄,像在恨别人学他的模样。托马斯·杰弗逊和林肯的雕像都有几层楼高,被围在三面是墙的建筑里。这种建筑是按合众国成立后那段时间的式样建起来的,后来流行起来。还有白宫。还参观了附近乔治·华盛顿当总统时简朴的住所。还有国会山的圆顶。穿过缓慢流动的灰色的达拉维尔河,我们到了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第一眼看上去,我还无法从雪里辨认出那些白色的十字架。无数的十字架标志出在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的墓地,有独立战争,有记忆犹新的南北战争。库克医生出生那年,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我们回到华盛顿,白雪覆盖的整个城市似乎在纪念什么,



我却说不清楚。

纽约是纽约，是美国神话的图画书，华盛顿才是真正的美国。库克医生这么说，我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美国尽管很年轻，却尊重自己的英雄，而不是宗主国里见也没见过便早已死去的那些人。美国自愿从另一个帝国里独立出来，这个新国家里，只有几个人知道那个帝国对她的看法，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一块白板。美国把这块板子擦得干干净净，又重新书写。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快便成长得如此伟大。

“这很伟大，或者很可怕。我也不知道。”库克医生说道。

我们到新威拉德饭店时，我脑子都昏了。大会在此召开，大部分代表都在此下榻。我的房间在库克医生的隔壁。

皮尔里住在华盛顿，要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却捎信说他病了。赫伯特·布里奇曼替他讲了话，东拉西扯说了一大通，主要是总结皮尔里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就。

有人说皮尔里没有生病。尽管他是大会主席，也只打算来大会一次，就是在他被推举为主宾的闭幕宴会上。有人在猜测皮尔里为什么要躲起来了。

有传言说，有人看见他妻子扶着他在自己家周围慢慢走动，他穿件晨衣，看上去要是没有妻子帮忙，连路都走不了。

很快大会便充满传言。人们说闭幕宴会上皮尔里接受哈伯德勋章之后，便会宣布从极地探险中退休。也有人说，选皮尔里任大会主席是为表彰他在探险活动中的卓越表现，皮尔里在几个月前就通知大会，在他一生声誉卓著的经历之后，他要退休了。

有人说几个月来皮尔里一直在准备他的讲话稿，想找到恰当的说法宣布他将永远退出探险活动。哈伯德勋章会颁发给皮尔里，这一点据说皮尔里已经在几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面前私下承认了，那几个人包括莫里斯·杰瑟普和赫伯特·布里奇曼。

“在他事业的这个阶段，为皮尔里颁发一个新勋章只能有一种意义。”挪威探险家奥托·斯维尔德鲁普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

甚至还有人说，皮尔里会说出他认为最有可能第一个到达北极的美国白人，他这样做就等于宣布自己的后继者，这个人也会被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接受。



库克医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不理睬这些传言。我们在大会所参加的每次演讲前后，其他代表都会围着我们，甚至还有像安培托·卡格尼这样的意大利探险家。1905年皮尔里的北极之旅曾超过他一小段。

“你怎么看，库克医生？”第一天下午卡格尼问道，“皮尔里会因为他保持着记录而就此放弃吗？”

“皮尔里指挥官绝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库克医生说道。“如果我要退休的话，我不会在自己担当主席的探险家大会上来说。你会吗？要放弃时会审慎一些，尽量不要张扬，不要在自己的同事和对手面前，不要在公众面前屈尊般地炫耀，也不要招来不想要的同情。”

“你怎么看呢，斯特德先生？”卡格尼问我，“你有力的臂膀曾救皮尔里于生死一线之间。你怎么看这件事？”

“皮尔里指挥官是我眼里最具坚强决心的第二人。”我答道。“有一天他会退休。他最近的一次航程可能便是他的最后一次，但我们将永远不会从他自己嘴里听到这几个字。”库克先生看了我一眼，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在公开场合批评皮尔里。

“说得真像个被保护人一样。”卡格尼拍着我的背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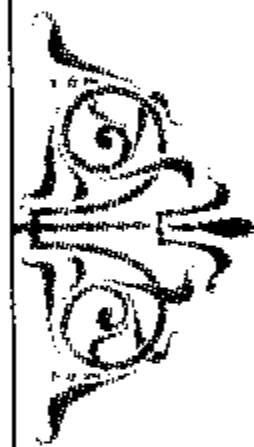
但是其他那些代表，他们很多从没见过皮尔里，却怎么也不同意，坚持说他们是从皮尔里北极俱乐部里得到的消息。

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曾和库克医生一起乘比尔及亚号赴南极探险，他便是那些认为皮尔里会宣布退休的代表之一。

“我认为皮尔里指挥官的妻子已经说服他。”阿蒙森说道。“这样做是最好的。不——你的那话是什么来着——毫无含糊。没有猜测。怎么会是炫耀呢？炫耀得越多，喧闹也就越大，他的退休也不会看上去像是一场失败了。”

库克医生笑起来，仿佛是在回忆许多事背后的动机。阿蒙森这种对人性持有过于天真与大度看法的人，是无法理解那些动机的。

“我亲爱的朋友，皮尔里指挥官不会在这种事上听从他妻子的意见。他的天性也不会让他承认失败，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其他地方。甚至是在伊塔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关在帐篷里的时候，当他神志不清到我觉得会永远丧失理智，甚至会丧命的时候，他都没有提起过失败或是退休，更别提他妻子的愿望了。要是都听从妻子的愿望，我们现在会马上从探险中退出来，难道不是吗？”



每个人都笑了。可传言还在继续。随着会议一步步地推进,我和库克身边围着的探险家、记者、外交官、政客也越来越多了。

有代表告诉我们,有人从赫伯特·布里奇曼那儿听说,皮尔里正在家里练习他的告别致词,正在妻子和几个好友面前练习,其中还有位知名作家在帮他修改。还有人说,有记者已经拿到皮尔里演说词的副本,但答应不会在皮尔里本人演讲之前把它刊登出来。

“他们说演说词里多次提到你的名字。”阿蒙森告诉库克医生。“他们说你将会被皮尔里挑中,他们说他们挑选你做他的后继者。除你之外他还能选谁呢?哪一个美国人更配得到这项荣誉呢,特别是你曾救了他的妻女,斯特德先生曾救了他自己的命。”

库克医生只是笑着摇摇头,就好像即将到来的晚宴致词无论会怎样让其他人大吃一惊,对他都没有悬念。

“皮尔里不在这里肯定有原因。”卡格尼说道。“我觉得他是想造成这种戏剧气氛。他想让我们做我们此刻正在做的事,整日谈论他,猜测他,到最后,重要时刻一来,他便会最终出现,拿他的奖章,跟我们说再见。”

大会第三天晚上,晚饭后库克医生请我到了他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他却走向窗边,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街道。

“看来好像是真的,德夫林。”他说道。

“皮尔里完了?”我说道,有点盼着他告诉我不要显得可笑。

“布里奇曼亲自给我看了皮尔里的演说稿。”他说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他笑了。他的脸红了,他声音听起来很含糊,像医生在安抚病人。

“我知道,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库克医生说道。“就连布里奇曼都惊呆了。看来直到大会开始,皮尔里除妻子之外,也没告诉任何人。就连莫里斯·杰瑟普都不知情。我们也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他的演讲中,皮尔里推荐我作为他的后继者。所有北极俱乐部的成员都跟布里奇曼表示过,他们会全力支持我。”

“那太好了。”我说道。

“布里奇曼已经说服大会,调整一下宴会演讲的顺序,让我做最后的闭幕陈词。布里奇曼说,我至少要象征性地表示接受,我的讲话会成为我的就职演说,得表现出对我离去的同事充分的致敬。终于,所有等待都已结束,德夫林。我觉得轻松多了,也很开心,但也有些害怕。我生命中的主要



任务就要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没机会练习了。没有麦金利山了。我知道我不想去南极,所以即使失败,也不会……可现在,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什么时候遇见布里奇曼的?”我问道。

“晚餐时我离开了饭店的餐厅。你那时正和阿蒙森说话。”

“你最多只离开了15分钟啊。”我说道。

“是的。15分钟。要是比我伟大的人物,改变他们的命运可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库克医生说道。

“你当时还那么肯定地说他们都错了。”我笑了。“那么肯定地认为一切都只是传言。”

他向我伸出手,我站起身握住他的手。

“恭喜,德夫林。”他说道。我笑着拥抱了他,为这不期而至的果实有些目眩。



第 29 章

新威拉德饭店餐厅的木质吊顶上挂满半卷着的红、白、蓝三色旗。400位客人坐在12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旁，桌上水晶餐具、银制刀叉和白色瓷器在一组吊灯下闪闪发光。库克医生和我坐在离主桌不远的6号桌旁，离皮尔里将要发表演说的讲台中心只有20英尺。

那天早上的报纸已登出“皮尔里对探险生涯说再见”、“皮尔里将于探险家晚宴上退休”、“皮尔里：北极无法到达”等消息。所有报纸都说消息来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内无法透露姓名的人士。大标题下面简短的文章中，没提到库克的名字，也没有皮尔里会推荐曾救过他妻女的人作为后继者的传言。

阿蒙森告诉我，除了库克医生，布里奇曼肯定还把皮尔里的讲稿给别人看了。库克医生行事谨慎，不会告诉他人，我也没告诉过别人，但看来阿蒙森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了。皮尔里只是名义上的主宾，很快人们便会知道真正的主宾是库克医生。

我跟库克医生不一样，我无法按捺自己激动的心情。我看上去那么期待，那么一副青年人热切期盼的样子，看到我的人都会忍不住笑起来。我不知该干什么，看起来肯定好笑，而库克医生却神情内敛，不苟言笑。站在他身旁，我就如同一幅他内心另一个自我的写照，他以为他已经把它藏好，可它却如同一个木偶般到处跟着他，尽管他还不知道。

皮尔里好像还没来，其他的客人几乎都到场了。客人里还有20多位参议员，40多位众议员。

“还有很多谈论你的话，德夫林。”阿蒙森说道，“头一次皮尔里和曾救过他的年轻人在公开场合遇见。”

我有些焦急，因为不知道皮尔里会不会出现在我身边，会不会在周围惊讶的目光中再次和我握手。我想准备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再次握起我的手，我会想起第一次他使劲想把我手捏碎的样子。他谈起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时，就好像盼着他们的厄运也降临到我头上一样。我准

备了一些轻松的话,准备只要我们还在交谈,就要微笑地面对他。

随着宴会即将开始,某种重要时刻就要来临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了。

“就像卡格尼船长说的那样,”阿蒙森告诉我们,“皮尔里计划以一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方式出现。我敢说他现在一定是在饭店的什么地方,他要等到最后一刻。”阿蒙森仔细盯着库克医生,希望能在马上就要宣布的时刻,承认传言都是正确的。库克医生摇摇头,笑了。“我觉得这件事上你跟皮尔里肯定是一伙的。”阿蒙森说道。

一群小号手吹响小号,宴会马上要正式开始。可还没有皮尔里的影子。

赫伯特·布里奇曼走向主桌,他站在台上宣布,因为无法抗拒的原因,皮尔里指挥官得晚到一会儿,他坚持要大家不要等他。人群里响起一阵抗议声,很快代表和客人便走向自己桌子旁的位子。

宴会开始后,库克医生坐在那儿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对跟他说话的人点头微笑。

“这个悬念也扯得太远了。”卡格尼说道。“皮尔里是大会主席,又是宴会主宾。他能有什么事呢,库克医生?”

库克医生笑笑,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一个小时后,主桌上还有四个空位子。客人们看看主桌,又看看布里奇曼,然后摇摇头,似乎在说他们不仅感到奇怪,而且觉得皮尔里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可为什么有四个空位子呢?两个是留给皮尔里和他妻子的,另外两个呢?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和他夫人坐在空椅子右边,一位资深参议员和他妻子坐在左边。看来除了皮尔里没人能解释了。

有几位客人走到主桌旁,很快地跟赫伯特·布里奇曼说了些什么。布里奇曼微微摇摇头,极力压抑自己的窘迫。他看来是真没办法了。

跟我和库克医生坐在一起的人们在揣测,皮尔里没到场的情况下,哈伯德勋章该如何颁发?有人猜皮尔里真是病得很重,病得甚至比以前不到大会时还严重。我疑惑地看看库克医生,他微微耸了耸肩。

最后一道甜食也快吃完,看来人们也不再把眼睛盯在皮尔里身上。突然,宴会厅的大门被两名戴白手套的侍者庄重地打开了。一位穿猩红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

“女士们,先生们,”他高声叫道,“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第一夫人。”

如同有支铜管乐队从白宫跟总统到了饭店,却没进入宴会厅,只得在外面吹起了欢迎的乐声。



特迪·罗斯福和他妻子如幻影般出现了。他们手挽手,身旁是一群助手和两个人的仪仗队。身材壮硕的总统穿着燕尾服的样子并不自在,好像是被塞进去的一样。屋顶上的灯光反射到他的单片眼镜上,好像胸针一样闪着光。他妻子穿身白色长裙,滚边处向外微微鼓起。她丰腴的身体被紧身胸衣束得紧紧的。她肩膀上搭条白色围巾,长得几乎拖到地上。她扁平的黑色帽子看上去像头发一样,看上去就像帽子有御寒的耳罩一样,就像她和身旁的人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冒雪走到这儿来的一样。

皮尔里夫妇跟在罗斯福夫妇身后。皮尔里身着整齐的海军制服,体重可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看上去跟在伊塔时截然不同。他帽子夹在腋下,红色头发和亮眼的红胡子刚刚才修剪过,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和彩带,相比之下,后背便显得过于光秃秃了。皮尔里夫人的表情像是在说,最后一次的探险终于带回了她衷心希望的东西了。她穿着一件不知什么材料做的亮闪闪的礼服,脖子上有一条透明的蕾丝,袖子宽大而透明。裙子边拖到地上,下面也有蕾丝花边。衣服上还有一条宽大的腰带,一支小袋子,一个带银链的提包,悬在腰带最低处还有一支细细的长柄眼镜,就好像她会从主桌上仔细观察到会的客人,如同去看戏一样。

皮尔里步履蹒跚,如同脚趾被压到了脚下面一样。也许正是皮尔里特别而痛苦的步态打破了人们看着四个人进来时的沉默。客人们纷纷起身向总统致敬,身边响起一片椅子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大家脸上的表情好像是说,不管如何无法置信,终于来了。

不知什么地方爆发出一阵掌声,大家都跟着鼓起掌来。“向总统和第一夫人致意,向大会主席和他的第一夫人致意。”回头有家报纸肯定会这么写。

我们鼓着掌,看着这一队人隆重地穿过桌子走向演讲台。许多眼睛转向了库克医生和我。

奥托·斯维尔德鲁普、阿蒙森、卡格尼都在微笑,好像在说罗斯福的出席不仅是给皮尔里的荣誉,同样也是给库克医生的荣誉。皮尔里曾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了他的最后一艘船,罗斯福也曾要求议会为他最近一次的探险拨款,他会亲眼目睹探险的火炬传到库克手里,也会为此祝福。很显然,他们不仅是为库克感到高兴,比起皮尔里,他们也更喜欢库克。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皮尔里的告别演说。

好像全宴会厅的人都在看他一样,库克医生有些脸红。仿佛刚才门迎



宣布欢迎的是他，刚才如雷的掌声也是为他响起一样。

看上去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了，只等皮尔里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声音洪亮的再会了。

罗斯福夫妇和皮尔里夫妇落座后，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威利斯·摩尔走向演讲台，向新到主桌的客人致了欢迎词，欢迎词明显已练习过很多遍。很多人在点头，好像在说知道是什么事情耽搁了皮尔里一样，好像早都知道皮尔里不会让他的年度会议草草收场。就在刚才，结果好像还并不乐观。

摩尔邀请主桌上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讲几句话。他说这位贝尔博士曾是学会创始人，也是第二任主席，因此比任何人都要胜任下面的任务。

贝尔博士讲了一会儿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在说库克医生。库克医生的脸更红了。他现在真成了目光中心。

“与我们在一起的，有我们衷心欢迎的皮尔里指挥官，他曾探索过北极地区。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美国人当中唯一一位曾赴世界两极探险的库克医生。现在，他又登上了美洲大陆的顶峰。这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也是世界的顶峰。”

这儿有一个故意的停顿。“世界的顶峰”，贝尔博士说，这种说法是通常用来形容北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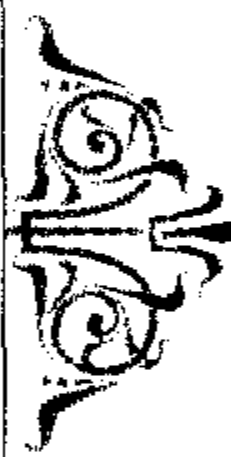
好像突然一下，人群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抹去这个错误的用词，这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甚至比刚才欢迎总统进来时还要热烈。

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库克医生也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鼓掌，库克医生却没有。他突然看上去那么镇定，向四下鞠躬，接受别人的掌声。

接着，如同演员会向观众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认可他另一位表现出色的同事，库克医生伸出手，仿佛在说“我向诸位介绍斯特德先生”。掌声更响了，我听到阿蒙森和卡格尼在高声叫着“这儿！这儿！”，如同裁判会拉起获胜拳手，阿蒙森高高举起我的手，把我转了个圈。他的另一只手还在招呼周围的人们，希望他们的掌声更响亮些。

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主桌上的皮尔里。他也在鼓掌，却没往我这边看。他的眼睛看着人群远处，仿佛被屋子后面什么有趣的事吸引住了。

阿蒙森放开我的手，在我背上拍了拍。贝尔博士又讲起来，人们也都坐下了。我的心跳得飞快，太阳穴也在向外突突地跳着。我看看库克医生，



他的笑容很温暖。这个夜晚也属于我们，不仅仅属于他。

“我希望邀请库克医生和斯特德先生讲话。”贝尔博士说道。“但后来得知，他们会有更适合的时间。”听到这些话，大家都在交换理解的眼光。

贝尔博士讲话完毕后，威利斯·摩尔邀请罗斯福总统将哈伯德勋章颁发给皮尔里。

总统没有背演讲稿，他即兴说道：“文明的人们，”他扫视一眼在座的客人，仿佛要说他们是文明人中的佼佼者。“文明的人们生活得如此轻松，我们会有一种趋势，艰苦条件下的美德会萎缩。但皮尔里指挥官向我们证明了，至少在某些人当中，忍受艰苦的美德并没有丧失。”

我看了看皮尔里夫人。她比上一次我看见她时健康多了。我记得她细瘦而青筋暴起的脖颈，短发遮在帽子里，好像没有头发一样。无论她和她丈夫在伊塔是怎么样分手，他们现在看来是和好了。她就坐在他身旁，公开支持他。看来她比库克夫人能忍受得多。

我不知道我看了皮尔里夫人多久，后来我意识到她也在看我。她笑了，开始我以为是为了我们心里都知道的事情，就是皮尔里一会儿要说的话，因为库克医生和我将从中受益。可接着，我看出那笑容还有别的意味，似乎在对我说，斯特德先生，这儿离我们上次分手的地方多远啊，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多么不同，对于那个世界来说，这个世界的人又是多么健忘啊。好像我们在分享一个笑话一样，我也冲她笑了笑。过了一两秒钟，她的目光转到了别处，可还在微笑。

“有所成就的民族性格必须建立在敢于战斗的勇气上。”罗斯福总统说道。“无论是在和平或战争年代，都要显现出来。皮尔里指挥官，数月乃至数年，你都要面对危险，冒着巨大风险，克服巨大困难，那样艰苦的环境就如同战争环境一般，而你显示出了和平时期的勇气与激情。你生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汇期，几乎到达北极点，比其他人走得都远。如果可以，我愿意说，你带领骑兵团的士兵登上了探险家的圣胡安山。我向你颁发第一枚哈伯德勋章，以此来表彰你为你的国家、为世界、为全人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人群中响起一阵热情却不激烈的欢呼声，仿佛还是在为皮尔里的绝唱有所保留。

皮尔里在妻子和威利斯·摩尔的帮助下站起身，如同一位穿着拖鞋的病人，挪到演讲台前。他握握总统的手，总统拥抱他的时候，他得尽力保持住平衡。



我为他感到难过。现在，我没法再对他唤起恨意。不是因为我爱上的伤，不是因为他曾在我耳边说过的那些话，也不是因为他不敢承认他所欠我的情。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还要恨他呢？他的日子已经到头了，马上便一去不复返了，他现在正处在这一时刻的边缘。

之前他坐在那里，不停地捋自己的胡子，站起身后便无法这样做，他得抓住点什么东西保持身体平衡。总统放开他以后，他身体靠向讲台，双手也紧紧扶住讲台。

他站在那儿。过了几秒钟，讲台还在轻微晃动，就好像他要压住它，却没办法做到一样。有那么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便如同他在我手上吊着，在埃里克和风向号之间晃动时一样。他的右手时不时动一下，好像要抬起手捋捋胡子。

我看得出来，皮尔里想找个办法不要太痛苦地站到那儿，不要让受伤的脚承受太多重量。他穿双正式的皮鞋，前头是圆的，圆到这种场合可以接受的程度。他体重恢复到了正常的200磅，虽然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对他的脚可没什么好处。双脚几个月前在极北处的荒原里支撑着他，现在又要支撑他增加的体重了。有传言说，他总是呆在狗拉雪橇上越过冰雪的障碍，由现在没在场的马修·亨森为他驾驭。

最后，他不再把体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他开始了演讲。话语间的节奏与停顿，好像能使他好受一点，或者让他暂时忘记痛苦。大约每隔15秒，在句子之间，他得咬咬牙，脸红得如同生气一般。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正在发怒，好像只有愤怒的吼声才可以保证他的声音不会破掉。

他回顾了自己的成就。每次，他从讲台上撤出一只手去拿开读过的一页，都会让人心悬起来。他摇晃地站在那儿，我不由得想，为什么不找人站在身边替他翻页呢，或者为什么不干脆坐下来读呢。

他的每项成就都赢得一阵掌声。我也跟着库克医生的样子鼓起掌来。皮尔里提到了1892年北格陵兰的那次探险，就在那次探险中，全世界都认为是我父亲的那个人丧了命。我鼓了掌。即使他在添枝加叶地讲述最后一次前往北极的失败经历，我也鼓了掌。

对他不熟悉的人不会猜出，他今年只有48岁。他的皮肤就像在北极圈里呆过两年，昨晚才刚刚从格陵兰来的船上下来一样。他比库克医生年长不到10岁，看上去比库克医生的父亲都要老。他的脸不像其他探险家，探



险停顿时会变回正常。在他脸上，长时间的日照、寒冷和冰冻的损害已造成了永久性的后果。

在我看来，他在伊塔身体几乎完全垮了的那段时间，却有一种伟大甚至崇高的意味在里面了。他如同一座纪念碑，可却无人记得此碑立于何时。我对他比以往更宽宏大量，更愿意原谅他做的那些错事。结局处的李尔王得到的更应该是怜悯而非责备，还有那个普洛斯彼罗，莎士比亚正是通过他来向自己的世界道别的，而他也是在最后退场时，因年纪与阅历增长，可以颇具风度地一鞠而退。这就是我脑子里的想法，尽管并不适合当时的场合。

最后，皮尔里的声音高起来，似乎准备要引向他伟大的宣告了。他说自1891年起第一个连续两年，就是在1903和1905年间，他没能到达北极圈以北。

“到过那儿的人才能理解，我有多么想念北极。我回忆起没踏上北极前的生活。那是普通的生活，虽然有些探险，但没有被未完成任务困扰。这任务曾有无数人试过，未来肯定还会有人去尝试。不管我多么想抵御住它，多么想永远摆脱它，却无法再次平静下来。其他探险家会理解我。”

他停下来深吸了口气，压抑住自己，不要失声痛哭。

“是什么让我撑到现在？”皮尔里说道，又顿了顿。

宴会厅里有阵骚动。伟大的宣告就要来了。

“大家毋庸置疑，我坚信已经开始的探索，并且也坚信，在转向新目标之前，它仍然值得探索。”

人们纷纷点头，又响起一阵掌声。宴会厅里的人们开始站立起来。很快，每个人都站起身来，静静期待着。

“真正的探险家从事探险并不是为了报酬或荣誉。”皮尔里说道。“难以置信，像阿布鲁齐、卡格尼、南森、格里利、皮尔里这样的名字，已被镌刻在距北极点不远处的白色圆盘上。北极探险是最有力的证明，说明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友好竞争。北极点的周围，插满各国旗帜，他们中有人会有到达北极点的那一天，只能为自己的旗帜增光，不会让其他的旗帜失色，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羞辱。”

“但是今晚，总统先生，星条旗离那个神秘的地方最近，是它在飘扬，在飞舞。如果上帝允许，我真希望您能看到星条旗可以插在北极点上。”

我猜这差不多就是他退出的前奏了。

“应该为这个国家的荣誉和声望去努力。”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看面前从世界各地来的代表。

“这是一件我应该去完成的工作。”他叫起来。“这是一件我必须去完成的工作，这也是一件我将去完成的工作。”

大厅里一片寂静。我觉得我们都可能听错了，我觉得他可能会说点更正的话，消除一下因说错话而造成的后果。

皮尔里收起讲稿，一步一挪穿过演讲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皮尔里夫人站在那儿。

我看着库克医生，他在盯着桌布，嘴微微张着，两只紧握的拳头撑在桌子上。我看到阿蒙森的眼里满是泪水，却没有擦，任凭眼泪滴落到他脸上。卡格尼无法相信似地摇着头，他看着库克医生，似乎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没让他倒下来。我环顾四周，看到许多人也在看库克医生，也在看我——有人震惊，有的脸上是不加掩饰的同情，还有人在微笑。

我们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仅仅几秒钟以前，事情还绝不是这样。

我伸手去拉库克医生的手，他的手却移开了。他开始鼓起掌来，大声但却缓慢，就好像400多位客人当中只有他一个明白需要对皮尔里的讲话作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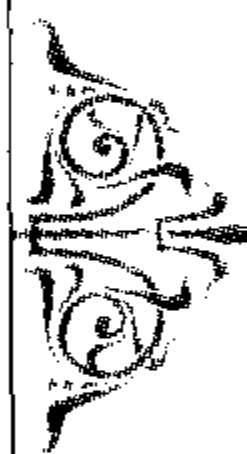
突然一下，响起的欢呼声让我脚下的地板都颤抖起来。人们用拳头砸着桌子，杯子碰在一起，勺子跳了起来。各种不同语言的赞美声响成一片。有些长者跺着脚，双手举过头顶，拼命地鼓着掌。

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也想加入鼓掌的人群。“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羞辱。”我被皮尔里话里的反讽刺痛了。

我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看出来，我在极力控制自己，极力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觉得自己很傻，如同自打我一到宴会厅，心里想的就都被其他代表听去了一样。

在我看来，在皮尔里的讲话中，如果说他不是故意针对库克医生的话，他也蔑视了那些做了他觉得没意义的事的探险家，那些“这个开始之后”便“转移到下个目标”的人。就像麦金利山。就像南极。皮尔里对北极的野心一直没变，一直如此。库克医生更加多变，追求更加多样。我觉得，库克医生的多变收到报偿了，他跟一群探险家一起，被一个拖着脚步走进来的人羞辱。

我在想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布里奇曼要对库克医生说那番话，



他到底给库克医生看了什么样的讲话稿。会不会是布里奇曼想要愚弄库克医生呢？为了什么呢？

我知道，库克医生三年前在格陵兰岛诊治过的那个人，即使有可能恢复，也不可能到达北极。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从宴会桌走到演讲台都步履维艰的人，会有朝一日到达北极呢？我希望我能站起身大声喊出口，北极俱乐部的人并不知情，他们正在皮尔里身上浪费金钱，而他们会从库克医生和我这儿得到回报。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们，皮尔里所否认的东西，在所有探险家眼里都很明显。可库克医生和我还得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

掌声仍然高涨的时候，库克医生停止了鼓掌。他把手放在桌子上，这次是手掌向下，头却不自然地昂着，好像要压抑住身体想要抗议的冲动。他开始鼓掌，又停住了。再一次，他把手扶在桌上，像在抵挡一阵突然涌来的头晕或不适。

皮尔里结束讲话的一刻，库克医生的期待显得夸张而荒谬了，可宴会厅里的每一个人曾分享过他的期待。每个人都在看他，好像是他在误导他们，让他们以为他会接替皮尔里的位置——好像一周以来是他在散布传言，说他已经被选为皮尔里的接班人，要不然他们才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呢。

阿蒙森站在库克医生身旁，两人没有看着对方，但在交谈。库克医生点着头，好像还挤出些笑容，像是在造成一种印象，让别人觉得他们和大家一样都在谈论皮尔里的讲话。

掌声最终低落下来的时候，我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我知道。”库克医生说道。“可我原来准备的讲话一点都不适用了。”

“用不用我告诉大家说你身体不适？”阿蒙森问道，“要我替你来讲吗？”

“不，不用。”库克医生说道。“我必须讲话，不然他们会看出来，他们就会知道了。尽管他们可能都看出来了。”

“你身边的都是朋友。”阿蒙森坚定地说道。

代表们坐下了。贝尔博士邀请库克医生做最后的闭幕陈词。包括阿蒙森、卡格尼在内的一部分代表拼命鼓起掌来，想掀起另一波兴奋的浪潮，却很快消散了。库克医生站起身，向主桌和讲台走去。

他目光低垂，从总统和总统夫人开始向主桌的客人致敬。他感谢了贝尔博士曾经的贡献，感谢了国家地理协会和本次大会的组织者。最后，他抬起眼睛。

“多么非同寻常的一个夜晚啊！”他说道。“伟大的探险家或他们的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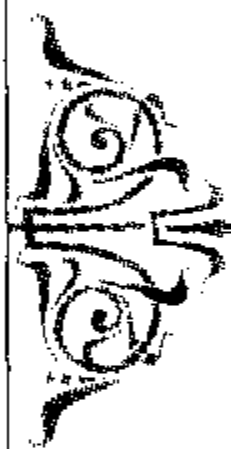
表齐聚此处。我本人也曾与你们一同探险。我得说那真是荣幸。我将永生不忘。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伙伴情谊。谢谢，谢谢大家。再见，我们下次聚会时再见。”

这一次，大厅中响起了礼貌而困惑的掌声。看不见的乐队奏响了乐曲，掌声便停歇了。罗斯福夫妇和皮尔里夫妇随乐曲声离开席位，向门口走去，身边挤满了向他们致意的人们。

库克医生拉起我的胳膊向后门走去，一边看着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跟着库克医生和阿蒙森绕过桌子。突然，我们遭到无数手臂的夹攻。有人握库克医生的手，有人握我的手，还有人拍我们的背。我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可我一句也没回答。都是些好意的人，一些充满同情的话语。但我觉得，整个大会都在向我们致哀了。我们好像要永远离开这些人了。我虽然只有24岁，已经在接受别人于我们失败的安慰了。

走到门口时，我觉得还是要活下去，我得马上冲出去。

我没管库克医生和阿蒙森，只戴了帽子和礼服便匆匆走了出去。外面雪下得很大。我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要是一般路人看到我的话，会看见一张脸庞，上面写满了轻松与愉悦。



第 30 章

回布鲁克林的火车上，我们面对面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他神情忧郁，似乎刚从北极失败而归，也知道这已是最后一次。原先，即便眼前只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土地，他也显得温和而风趣。现在，那样的表情消逝了。

几个小时，我在不停想办法，想让他振作起来，哪怕惹火他，我也会高兴。可他只是盯着窗外，盯着路边白雪覆盖的村镇一个个闪过，好像要责怪它们，要让它们为我们刚刚的经历负责。他的言行无可指摘，但已变得遥远而陌生，要淡出记忆了。

“无可否认，刚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库克医生说道。“他们看到我跌倒，看到我跌到谷底。那一刻，所有男人都不会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我是那么脆弱，无法回击轻蔑的嘲笑，也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同情。我彻底让人愚弄了。曾经，即使所有迹象都指向成功，我也在做失败的准备。我一直相信‘酒杯到口，还会失手’这句老话。从不贸然假定，也从不公开庆祝，以免在愿望落空时被人嘲笑。

“可这一次，自以为胜利在望，却在大家面前自取其辱。德夫林，接近胜利却无果而终是种不祥的预兆。离胜利咫尺之遥却无功而返的人，他将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普遍的法则。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出，在赞助人眼里，我算是厄运缠身了。

“就算皮尔里再来次探险，当他因失败而最终放弃后，我也不会被选为后继者。昨晚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我的神情。即使我对发生的事无可指责，即使并不是我造成的后果，也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被他们推到高处后又狠狠摔了下来。

“昨晚我跟自己说，我能忍受有人在我们之前到达北极点，只要那人不是皮尔里。昨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一遍遍地大声说道‘只要不是皮尔里’。多么荒唐啊。我已经自甘于跟一个命中注定会失败的人讨价了。我知道他无法到达北极点，可我还是担心他能办到。”

“这并不是我们的结局。”我说道。“要是皮尔里都没有完，想想我们可

以做多少事啊。”

他摇摇头。

“我们并没有输得一干二净。”我坚持着。几个小时，我在极力克制，不让眼泪流下来。昨夜，我在房里却无法做到。早上我们遇见的时候，我红肿的眼睛明白地告诉他，昨夜我是如何度过的。那一刻，他拥抱了我。“我们可以做些原计划中没有的事。”我说道。“没什么的。”

“我很抱歉，因为我的事让你承受了这么多。”他说道。

“不是因为你，”我答道，“是因为……我不知道该责怪谁。”

“你该知道的。”他说道。“你觉得是谁开始传播的流言呢？我又是被谁误导的呢？”

“你可能没被人误导。”我说道。“有人说那些传言是有根据的，布里奇曼给你看的那篇稿子也不是伪造的，可皮尔里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部分原因是总统让他那么做的。”

“他们什么时候说皮尔里改变想法了？这些人是那些传播第一批流言的人吗？”

“他们说，他是在到达前几分钟时改变的主意。就算坐在旁边的乔·皮尔里都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你也听了那演讲，快到结束部分，听上去他是该说再见了。也许他只修改了最后几个字。”

“如果知道是皮尔里唆使布里奇曼干的，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可如果布里奇曼并不知道皮尔里改变主意了呢？如果皮尔里并不知道你看过他的演讲稿，而布里奇曼也不知道他改变主意了呢？可能大家都没有错，只是一个意外。”

“那绝不是意外。”他说道。

我脑海里又显现出皮尔里拖着沉重的脚步，耷拉着肩膀走向座位的样子，他妻子在那儿等他。看来他只是做了件众人期待的事。他看来是累坏了。他赢得的掌声也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一样。高昂热烈的掌声是为了在职业生涯中屡创功绩的探险家。他宣布了自己最终的追求，准备把未竟的事业交给年纪稍轻的人。皮尔里的意图还未完全显露出时，我看到库克医生也在微笑，也在鼓掌，似乎皮尔里已不再是竞争对手，没有必要再做保留，理应加入对这位年长探险家致敬的人群中。我们曾是多么接近布里奇曼让我们期待的结局，真像一场噩梦一样。

我忍不住在想，要是当时皮尔里跌倒时，我要是慢了一秒钟，没抓住他



会怎么样。他肯定早已被人遗忘了。库克医生肯定早已接替了他。库克——我们——肯定已到达北极点，现在已经回来。库克医生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在宴会上成为主宾。是他，而非皮尔里，会赢得第一枚哈伯德勋章。是他，而非皮尔里，会跟随罗斯福总统步入宴会大厅。

我感到羞愧，自己竟然可以这样想。库克医生未来的痛苦我可以预见，却无力改变。我无法想象，如果他注定要面对失败，我们会变得怎样？如果不再从事探险，还有什么可以维系我们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所有的秘密、伪装与密谋？如果他不再希望挽回因背弃我母亲而造成的后果，他又会怎样对待我呢？

可是，我现在又怎能怀疑他呢，这对他是多么不公啊！

“我该做什么呢，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我们曾计划一起前往北极。我也该教你，让你为自己的探险做准备。可我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玛丽不能再帮我们了。她支付了我们赴麦金利山的费用，别说一系列北极探险，哪怕只是一次，她也很难承受。或许你该申请参加别的探险队。如果我们开口，我敢保证，下次阿蒙森去南极时一定会带上你。”

“没有你的探险我绝不参加。”我答道。“也许我们都该加入阿蒙森。你可以帮他获得成功的。如果南极之旅成功，赞助人会对你另眼相看的。你还会在这个圈子里，我也能向你们俩学习。”

“我不能再回过头跟别人走了。”他说道。“甚至跟阿蒙森都不行。要是我加入一支挪威探险队到达南极，我便会成为一个不受纽约欢迎的人。我上次参加的比利时探险队并没有在纽约为我赢得几个朋友。”

“没有无可挽回的事。”我说道。

“我们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德夫林。”他说道。“尽管我曾答应过你——”

“可也没人能保证那样的承诺就一定能成功。”我说道。

“那么，你是在怀疑我了？”他说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并不是要故意违背诺言的。”我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要故意背叛你？”

“我就没想过背叛这回事。”

“为了这个诺言，我投入了一生。”

“也许你对我投入太多了。”我说道。“你的妻子……还有你其他的孩子……”

他摇摇头，退缩了，好像在说：“如果你能理解，你是不会提起他们的。”

“注定我要毁在这件事上面。”他说道。“如果说成功对皮尔里很重要，那么我的失败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问道。他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句：“他的失败和你的成功一样重要吗？”

“我们的成功。”他说道。“永远不要忘记，是你和我的成功。我和他不一样。我和他的动机不一样。他曾做过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我以为他睡着了。

“德夫林，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也许我以前就该告诉你，可我当时还不希望你知道。也许我没有其他办法让你理解，为什么不能让皮尔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同我第一次在客厅里见到他一样，我感到同样紧张。

“我告诉过你，北格陵兰的探险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有一天早上曾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讲了他的事，还有皮尔里跟他说过些什么。他说他妻子就是为我而背叛了他，我就是他妻子儿子的父亲。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别的事情。”

“我们坐在‘长凳’上，是离红石屋远些的一块岩石的背上。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吸着雪茄。跟我以前告诉你的一样。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差不多两年后，他离开了她，到了布鲁克林。”

270

弗朗西斯·斯特德用假名登上了开往圣约翰斯的蒸汽船。他用拍卖会上得来的东西改扮了一下。有一出戏演不下去，道具都拿出来卖，有粗眉毛，粘在嘴唇上的胡子，浓密的络腮胡，还有一套20年前还算流行的衣服。他不用化妆，因为就算在那个时候，他的脸也已被北边的日子磨砺得够可以的了。

那是三月末的时候。冰只化开一条窄缝，仅够汽船驶向纽约湾海峡。停泊之处，所有港口码头不是有别的船，便还冻结着。那儿离驶向德文街的船停泊处不远。

走在去最近的旅馆路上，弗朗西斯·斯特德会拉拉帽檐向路过的一两个人致意。圣约翰斯是个海港，街上总有很多陌生人，很多样子奇怪的陌生人。没人注意他。

用假名登记后，他直接去了自己家。是下午一点半，他知道学龄的孩子不会呆在家里。他们从没请过佣人。看上去好像他妻子不在，院里除了



她的双轮马车，没有别的车辆。他认出那是她的，知道她不大可能有客人。或者她一个人在家，或者房里没人。要不是她出来开门，他可以装做搞错地址，回头再想法接近她。

他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是她。在他眼里，她还是离开时的样子，甚至穿的衣服都一样。他叫她的名字，她没认出他。“是我啊。”他说道。她打量他很长时间，然后退后几步，双手扶住门，好像要用门把他们隔开，用门把自己保护起来。有那么一阵，她没看出他改扮过了。她似乎是在揣度，以他现在的模样看，他们到底分开多长时间了。

开始，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房前的椅子边上，看着炉火。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消失这么长时间后又出现在门口，打扮成这副样子。

“德夫林很快会从他叔母那儿回来。”她说道。

他说他们应该分别到信号山上去，在那儿可以不被打扰。“我知道你肯定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人知道我来看过你。”她没说什么。他跟她保证，不会让孩子和他叔母等太久。

“你想和我说什么呢？”她问道。

他告诉她，到信号山以后，他才会跟她解释。

她上了楼，换件出门的衣服后又下来了。他告诉她，20分钟后坐马车去山顶。他告诉她，若在山顶碰见什么人，或者回头有谁问起，就说他是一个来访的亲戚，或是她丈夫在纽约的一个熟人。她没说话，他觉得她同意了。

他走出门，迈开步子上路了。一阵刺骨的寒风从西边吹来，他全力走着，并不觉得冷。快到山顶时，她超过了他。她看他一眼，可他直直地看着前方。

她在车里等了差不多5分钟，他上来了。山上没有别人。碉堡那儿也看不到他们，从山脊处飘过的青烟可以看出，那儿有人住。

他上了她的车。

“就连皮特也不记得你了。”她说道。是真的，马要是闻出他的气息，或听出他的声音，它会摇起头来，不管那意味着欢迎还是不满。“你想干什么，弗朗西斯？”她问道。“看来你不打算呆下去，不然你不会装扮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的笑容在一霎间惹恼了他。“装扮成现在这个样子。”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他，她不想取笑他的样子。

他们在车里，风吹不到，耳旁也只有车盖的声音。他跟她说起皮尔里，

说皮尔里已经告诉他孩子的生父是谁了。这时，她惊了一下，看着他，可很快便转过脸去，好像她觉得他在虚张声势，想骗她说出那人的真实身份。他说着，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开始还没意识到，后来他看出她是因恐惧而无声，他是在向她吼，在声嘶力竭地吼叫。

他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只要承认你对我撒谎，”他说道，“只要你承认撒谎，就行了。我不会强求你告诉我他的名字，也不会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只要你承认撒谎，我连为什么都不会问。”要是她当时说出来……可在他看来，她虽然害怕，却并没把他当一回事。

“我告诉过你真相。”她说道。“我不会再说了。”她说得很坚决，他知道再追问也无济于事。他抓住她的胳膊，靠上脸想吻她。

她推开他，跳下车，沿着去城里的路跑起来。他追她，挡住她的路。她转过身向碉堡跑去。他又追上她，拦住她的路，却没有碰她。

“你在干什么？”他说道。

她尖叫起来，从山那儿刮来的风把声音也带走了。

她沿着山向海边跑下去，以为那样会安全。她肯定记错了，她知道有条小路，可在惊恐当中，她没能找到。离下面还有一段距离，长满野草的陡峭山坡让他没法跑得跟她一样快。山的这一面，由于春天的雨水和风，已经没有积雪。她没法再跑，不然会从野草覆盖的岩脊跌下去。她停下脚步，喊起来，似乎意识到跑下山是犯了个大错。

她转过身面对他。他们都在喘气。“我想跑回房子。我知道，这就是你的用意。我告诉自己，你不会这样做。可是，你只是在屋子里下不了手。弗朗西斯，想想那个孩子吧，他只有我一个人啊。”

“你在说什么？”他说道。“你觉得我把你带到这儿是要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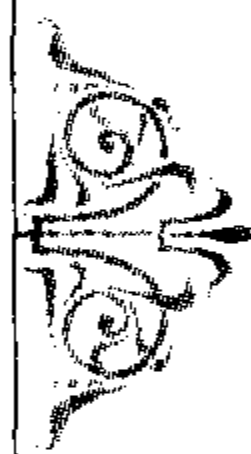
他从没在一个人眼中看到过这样的恐惧。她身后大约15英尺的下面，混浊的海水从冰下泛起，拍击着海岸。

“如果你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就让你走。”他说道。

她想绕过他，可他抱住她的腰，把她拽到了悬崖边。“告诉我他的名字，不然下一个就轮到你儿子了。”

“好吧，我说。”她说道。

“别想跟我撒谎。”他说道。“如果我发现你跟我撒谎，我会回来找那个孩子的。”



她说出了名字。

“放开我。”

他没法相信，她竟这么强壮，这么有力。两三次，她挣脱他，她打他，咬他，还抓他的脸，块头小点的男人还比不过她。他觉得，要是她刚才跑过去，回山顶的路上他肯定抓不住她。

他拦腰把她抱起，把她扔了下去。她没吭一声便消失在海里，再也没出现。一次都没有。

他爬上山，从另一面走了下去，路上没碰到人。他也没想要逃跑。尽管也曾想法躲避人们的注意，他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用。他觉得他不在乎是什么结果。

他回到旅馆，呆在那儿等着，敲门声却没有来。从第二天的报上他看到，人们在信号山的山顶找到了她的马和马车，在水底发现了她的尸体。看到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探险家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妻，其人已居纽约布鲁克林数年。”这就是所有跟他有关的文字。这些字看起来是说，因为被丈夫抛弃，她自杀了。“死因不明。”报上如是说。

他订了船票，两天后到港。船到的时候，整个小城都在谈论“可怜的斯特德夫人跳海了”，而官方的说法是“意外落水”。他从没想过人们会怀疑她是自杀。不是怀疑，几乎是肯定了。很明显，她一直被当做那种“怪人”，人们说她像个隐士。

她的名声掩护了他。看来他可以不受怀疑地离开了。

船到港了，他回到了布鲁克林。

“我知道这个已经很久了。”库克医生说道。“我没想到，把它说出来会让我这么痛苦。”

他手捂住脸，抽泣起来。我也在哭，在看着火车玻璃上我的样子。

“我没法去想，为了我她那样死去了。”他哭着。“独自一人死在了山脚下，死在了因为我而发疯的男人手里。德夫林，是我把她赶走了。三个星期。我认识她三个星期，每天我都在想她，我真希望我当时有勇气回复她的最后一封信，跟她说‘是’。”

“她的死让一切都结束了。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甚至都没有想。在此之前，我从没真正感觉出她是不是在我身边。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她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之



深、之重，不仅是寻常意义的悲伤了。如果我是站着的话，肯定已被这种痛苦压得瘫倒在地了。

我想着那个已经无法记忆的午后。我坐在房子里，独自纳闷。天已经黑了，可母亲还没有回来。她平日是会在门口等我的啊。

“她告诉他我的名字，德夫林，是想要救你。她知道，等他这儿一完，他便马上会去家里找你。也有一丝可能他不会的。我敢肯定，她挣扎得那么厉害，不仅为了逃脱。她是想把他推下去，或是拉他一起掉下去。”

一阵憎恶袭过我全身。天黑了，我一个人坐在母亲房里期待的时候，弗朗西斯·斯特德正坐在不到100码外的旅馆房间，他也在等，等他们来抓他。

库克医生看着我。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完后，我问他会怎样对我。‘没什么。’他说道。‘我加入探险本来是为杀你。但我改变主意，什么也不想干了。’他转身向红石屋走去。可他又回过头来，说：‘我把一切都告诉皮尔里了。几个小时前刚说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告诉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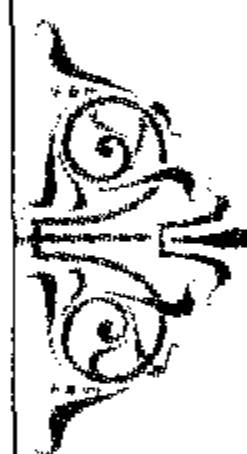
“那一夜，他离开了红石屋。从那时起，就再没人见过他。”

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了，就好像是刚刚听到她的死讯。

有十分钟时间，我们都看着窗外，听着火车与铁轨间的撞击声。

“接下来的几个月，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不断传到我耳里。”他说道。“比如他讲述你母亲挣扎得很剧烈，她身上肯定会有瘀伤，能证明她曾挣扎过，那些认为她是自杀的人应该能注意到。她的前臂，特别是手腕部分也会有瘀伤，他为阻止她打到他而抓过。她的脸上，特别是嘴上肯定也有，因为她曾咬他。她的衣服肯定也是非常凌乱，肯定扯破了，有些可能还掉了。可她的死还是很快被当做事故处理了，自杀的传言没人制止。

“我很困惑。探险完了一年后，我去了圣约翰斯，自己去调查。我发现在你母亲死的时候，圣约翰斯没有验尸官。后来警方要求做了尸检，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医生做的。我看了你母亲的死亡证书，上面说意外溺水，是你叔父签的名。我不是想说他卷入了你母亲的死。他或许能猜到，或者会意识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可能有嫌疑。他并没有跟弗朗西斯联系过，便自己把事情掩盖了起来。尽管有些不可能，我觉得事情可能是这样，警方同意他来做尸检，因为他们曾合作过，比较方便。考虑到你母亲的处境，警方会认为是自杀，你叔父也会这么想。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应该谨慎处理。



你叔父可能问过，作为家人能否让他来检查尸体，这样可以防止流言再扩大。可是，发现谋杀的证据时，他也吃了一惊。他把证据隐瞒起来，倒不是为了庇护弗朗西斯·斯特德，而是不想让人传闲话，让人知道他兄弟的妻子竟死于谋杀。在当时的圣约翰斯几乎很少有人被陌生人杀害。我在圣约翰斯跟人聊天时听到有这方面的传言。我没证据说这些传言有任何根据，可你叔父或许曾相信过。尽管他可能也会认为这些传言毫无根据，他大概也会知道人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她可能是被曾经与她有过交往的某个品行不端的男人杀害的。在公众心目中，她是被谋杀的消息肯定会证实这些传言，特别是案件无法侦破，特别是他会想到并没有什么嫌疑人在场。我猜你叔叔决定，最好还是为了家族名声把这事掩盖起来，为了兄弟的名声，为了阿米莉亚的缘故。

“我写信给他，告诉他弗朗西斯·斯特德已经坦白了杀害阿米莉亚的罪行。我当然没跟他说我是你父亲。我没有明确表示，没有提到死亡证书，没说我认为他是同谋。弗朗西斯常提起你叔父。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弗朗西斯·斯特德理解的人。他理解他兄弟比自己都好，尽管他们是那么相像。

“如果阿米莉亚是被谋杀的事宣扬开，如果我告诉大家，弗朗西斯·斯特德曾跟我说过什么，你叔父在死亡证明上意外溺水的签字——人们会怀疑他掩盖兄弟妻子被杀的真相，那他的前途就全完了。

“所以我的要求他都照办了。我告诉他，要把我的信完好地交给你，就是火漆没有拆开的。我让他以为，我曾告诉过你，让你知道如何判断信拆开过没有。我还让他以为，我有某种办法，能让你知道他是不是把信扣下而没给你。我敢肯定，他从没读过那些信。你可能觉得我的做法像在讹诈，但我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拿走任何他觉得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我不得不这样做。跟一个成人保持秘密联系都已很不容易，要是没有这样的安排，就根本不可能跟一个孩子这样做。”

如我猜测的一样，爱德华叔父并不知道库克医生是我父亲。

“我该早些告诉你她是怎么死的，但想想我的困境。你一直都以为你母亲是自杀的。我能忍心再伤害你，让你知道她是被她丈夫谋杀的吗？”

“你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我问道。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皮尔里要为你母亲的死负部分责任。因为他，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弗朗西斯·斯特德。皮尔里知道我

恨他，尽管我们从没谈起过此事。他知道他有罪，他、我，还有弗朗西斯·斯特德。他瞧不起我。我怎么看他的，他都知道。现在你明白了吗，你必须知道他的天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的胜利。”





第 31 章

纽约的报纸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大肆渲染库克医生遭遇的耻辱。报上以前没提到库克医生会是皮尔里“传位”的对象，所以也没明确提到皮尔里改变计划之后对库克医生的影响。《纽约时报》说，皮尔里“毫不含糊地宣称要继续向极地进军”，还说他热切希望能够在罗斯福总统的任期内达到此目标。报道还说他的说法让很多人很惊讶，“包括当晚的主宾候选，登山家库克医生。”

我还在猜测曼哈顿的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毫无疑问，这儿的人肯定知道，探险家大会在皮尔里讲演前曾为库克医生铺好了红地毯，他、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已经在想，库克医生会身披皮尔里丢掉的斗篷，从他的城市胜利返回。

“或许我们不要着急接受邀请。”库克医生说道。我告诉他，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刚开始，似乎我们在别人眼里没什么不同。没人提起华盛顿发生的事。接着，每句话似乎都在挑起我们的回忆。

我不知道该不该谈华盛顿。无论话看上去有多假，我想让人们以为那儿没出什么事，只是探险家习以为常的小挫折，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经历过的要比这糟得多。我还想暗示，跟皮尔里的友好竞争远没有结束。但我没把握能不能做到。

“他们好像根本不在意出过什么事了。”有天晚上，从圣诞晚会回家的路上，我说道。

“当然他们在乎了。”库克医生说道。“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乎。我们可能比以前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有趣的一章刚刚写完，可要知道结尾是什么，还太早些。要不是有你，他们不会邀请我的。”

我告诉他，他是在乱说，人们还是更喜欢看到他。他没说话，好像我无力的辩解恰好证明了他的论断一样。

“我想我还是喜欢让他们放过我。”他说道。“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参



加这些聚会。他们觉得你很有趣,可很快就知道我不是了。”

我觉得,这样评价以晚餐与舞会招待我们的人并不公平。他们对我们充满同情,跟他所说的并不相同。

“我就像根火柴一样,他们用我当个话头,用完就扔了。”他说道。

我又辩驳起来,不久我便发现,他说的也不无几分道理。

人们没有躲他,或故意不理睬他。相反,比起以前来,更多的人来接近他,跟他讲话。

一天晚上,有位女士问他,人们会先到达哪一个极点。

“南极点。”库克医生答道。“南极洲的冰雪之下是大陆,人们不用担心洋流。北极本身并非固定,冰块总在漂移。北极探险者所追逐的只是一个幻象。”

人群摇着头,响起一阵反对的咕哝。

“可是,库克医生,”一个靠造钢制铆钉发财的人问道,“如果了解洋流,洋流便可以为人所用啊。不要逆洋流而上,而应顺其道行之,不就可以节省时间了吗?”他却没看着库克医生给他答复,而是朝着对面一个就此番言论阐发自己想法之前而不住点头的年轻人。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在说什么,但很显然,库克医生的发言是不受欢迎的。库克医生若愿意,也可以成为饭桌上争议的话题,可那却违背他的个性。他默默地坐着。

整个晚上,他就是这样引起话题,说上几句后便自愿或不自愿地呆在一边。没有人问他,也不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很明显,人们对我的同情要比他多得多。

在我看来,打我们从大会上返回后的第一次聚会,人们便会鼓励般地多握一下我的手。他们的语调比原先更热切,似乎想让我知道,提到华盛顿不是想让我尴尬,那只是运气不好,我只是碰巧倒霉坐在库克医生旁边,他们不会因此轻视我。

看来,现在的曼哈顿社会要一致行动,要把我从库克船长的海难中打捞出来。很明显,人们关心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所依赖的那个人,他的幸运星已经陨落。我有时甚至怀疑,这多握一下是想告诉我,或许我该为自己考虑未来,库克医生也曾这么对我说过。

从华盛顿回来的两个星期后,我看到了克里丝丁。我问她是否听说发生了什么,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却说我们还没熟悉到可以直呼其名的程度。“您应该在讲话之前先称呼,而不是像您和库克医生之间一样,可以看



到便说。”她说道。我告诉她我们可以直呼其名。

“那我会先叫你的名字。”她说道。“这样,你可以不用花五年的时间来找机会叫我的名字。你觉得怎么样,德夫林?”

“我没问题。”我说道。看到她期待般地扬起眉毛,我赶忙改口。“我没问题,克里丝丁。”

“不是很困难吧?”她说道。“你看,德夫林,名字就是做这个用的。可以让别人知道你还记得曾经见过他们,你没有把他们当成别人。要么就是你觉得除你以外,身边的人都叫‘你’。名字可以帮我们分清楚,谁在和谁说话,我们又是在说些什么。比如一下子有十个人同时要回答问题,名字可以让我们不把他们搞混。名字可以帮我们从远处叫人,而不用打扰大家以后又指着他们说‘喂,不是你,不是你们。’我是不是玩笑开得过火了?问题是我喜欢名字。我喜欢叫别人的名字,也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从别人怎么称呼彼此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好多。你想让你喜欢的人知道你,却又不叫他的名字,这能行吗?”

“克里丝丁。”我说道。“克里丝丁,克里丝丁,克里丝丁。”

第 32 章

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到客厅的脚步声。他不再开灯，不再大声说话，也不再踱步。我只能从门缝下看到炉火微弱跳动的影子。我只能听到炉火的声音。

有时早上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客厅的门还关着。我如果不敲门把他叫起来，他会赶不上去办公室了。“起来了，起来了。”他不情愿地喊道。我赶紧走开，不想让他被人看到而觉得尴尬。

整个例行公事般的圣诞节庆祝期间都是如此，甚至圣诞节当天也不例外。库克夫人邀我参加了圣诞晚宴，我也是第二次见到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海伦。

库克夫人知道，丈夫是为华盛顿的事不开心。她也知道，丈夫的探险生涯快结束了。因此，对我在她家里，她也没像以前那样讨厌了。

要是库克医生的心情不那么抑郁，我们或许还会很愉快地度过这一天。我感觉他在看着我们，看着我和库克夫人聊天，还时不时地看看鲁思和小海伦在做什么。

“有位约翰·布拉德利想要见我。”有天早上，看完我给他拿去的信后，库克医生对我说道。“他想让我带他去北边打猎。他想猎海象，如果可能，还想打头北极熊。”

经常会有人请库克医生，他把这叫做去北边“包租猎杀”。对这次打猎请求他似乎显得特别兴奋。

他告诉我，布拉德利是百万富翁，拥有棕榈滩的海滩赌场。“他在曼哈顿也有公寓。”库克医生说道，“西 67 街，很雅致。”

“你去过那儿？”我问道。

“不，没有。”库克医生说。“我只是说曼哈顿的那一片是那个样子。”

他回来后，没跟我说谈的结果如何，只说布拉德利先生长得什么样子。他跟这位穿着入时的布拉德利先生单独用了午餐。他肩方腰细，跟我们平



常在街上看到的花花公子一样，只不过年纪比他们大许多。

布拉德利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留着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库克医生说他的衣服领子又高又硬，没法低下头。他还穿件前胸也很硬的衬衣，活动更加不便。他只能站着，看着身后。

几天后，我们乘第三大街高架铁路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桥，准备换车去布希威克街。这时，他宣布了他的决定。

“我决定接受布拉德利的开价。”库克医生说道。“的确很慷慨。将来某一天我们会利用这笔钱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说道，尽量表现出能受雇于布拉德利这种人而去北边的那种兴奋。

“春天。”他说道。“这样一次行程你也能学到东西。但我得先告诉你，北边可没有‘打猎’这回事。只有用四足动物进行的瞄准练习，甚至都不是那样。拿麝牛来说，你到它们跟前它们都不会走开，将是血腥的屠杀，我也得参加。你就不用了。”

过桥的时候，我记起第一次穿过曼哈顿去见库克医生的那一天。我两手捂着一只医生用的箱子，里面放着一卷信，非常害怕会被人偷去。

库克医生盯着车窗外，仿佛是第一次过桥去布鲁克林。他入神地看着水面，西边是工厂和库房投下的一片倒影。他转个身，歪过头看着冬日斜阳照射下的曼哈顿。

我突然为他感到一阵辛酸。我跟自己说，他是我父亲，我却不能叫他父亲，他也无法接受。如果没有我在身边，他会孤独，甚至比我那时候还孤独。

我们身边的人群，无论是火车上的，还是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两个街区之间的，好像只能反衬出他的孤独。我觉得自己该伸出胳膊像儿子一样挽住他，然后告诉他，就算他剩下的时光只能带领人们去北极圈打猎，凡事总有一天也会变好的。

从马萨诸塞的格洛斯特，库克医生替他的雇主买了艘捕鱼的纵帆船，重新命名为“布拉德利”号。彻底检修过后，船重111吨，船前后均加了支架，首尾用钢板做了防护，两侧用橡木块连扣了起来。索具和帆也换掉了，又装上台55马力的洛丝尔汽油发动机。

库克医生说，它比不上罗斯福号，可“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也足够了”。

船上修了船长、大副、布拉德利、库克医生和我的船舱。跟以前的救援时不同,这次我们一人一间。放吊床的地方容得下五个水手和一位厨师。船长叫摩西·巴特利特,是曾驾驶风向号的那个巴特利特的亲戚。

库克医生从格洛斯特回来后,客厅的门几乎每晚都不关。我们坐在炉火前,一坐便是几个小时。我觉得他看起来有些虚张声势,想跟人说话,想让人听他说话。

“有人说皮尔里准备一年后再去北边。”终于我有机会打断他了。“有人说他已经筹得10多万美元……”

“我们明年也要去北边。”他说道。“我们要从布拉德利这次捕猎之旅中赚到去北边的钱。皮尔里会气疯的,会觉得我们在抢他的风头。我们不会走他的路,我计划的线路跟他的大不相同。”

“我们什么时候能负担得起?”我问道。

“有布拉德利的钱,有玛丽的钱,加上曾答应过我的其他渠道,我们能支付得起探险的花费。到北极去用不了皮尔里计划的那么多。德夫林,我知道该怎么办。多年来,探险家们总是走错路。我们会像登上麦金利山一样到达北极点。等我们超过一定高度后,比尔·巴里尔和我便不停地爬,必须睡时才睡一会儿。你可以看出来,那样我们没有被装备和给养压倒。到一定高度之上,总是这些讨厌的东西会让你慢下来。”

我不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智慧。我从没有在极地旅行过,也没有在北极圈里过过冬。我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该不该采用什么策略。虽然并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能不能筹得到钱,但我依然忍不住很兴奋,想着明年春天就可以出发了。

“请别和玛丽说这次打猎的事。我跟她说我是一个人乘布拉德利号去研究爱斯基摩人,给他们照相。她听说过布拉德利,不同意我和他来往。我觉得她也不该同意。她知道我会在九月回来,可我计划去北边也让她很生气。她觉得,我还没有从攀登麦金利山中完全恢复过来。跟以前去探险前一样,她总在不停地问:‘那么,要是你回不来怎么办?’我除了不停地跟她说,结婚时我就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告诉她,我当然会回来。我跟她说,我们不会离开船。要是需要下船,也一定是踩在干实的土地上。德夫林,你夏天的时候去过北极。这次甚至都比不上那次有风险。就像在信号山上度夏一样。”

卷五



第 33 章

1907年7月3日，我们从格洛斯特出发了。在纽约，库克医生和玛丽还有两个孩子道了别。我和克里丝丁在希望公园道了别。我告诉她，我要去北边，她同意见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见面。“我希望你不要走。”沉默地走了一段，她对我说道。在去高架铁路车站的路上，我们已走了一个来回。到那儿，我们就得各奔一方了。她飞快地在我嘴唇上吻了一下，我没来得及回吻她。“到这儿吧，别说再见。”她上了站台的台阶。

库克医生准备了4个月的食物，再加上够一年用的储备，以防有搁浅或船难发生。他订购了5000加仑的汽油。他订购了所有的设备，精心处理每个细节。

船上呆了一个星期，我便开始希望一觉醒来之后，两个月已经过去，我们正在返航，正在向克里丝丁驶去。我希望这就是极地之旅，就是几年前他曾邀我参加的极地之旅。

狩猎行程差不多结束时，库克医生交给布拉德利一封信，让他转交库克夫人。她会在一个月后接到此信。他让我先看了信。

我最亲爱的玛丽：

尽管我担心你可能一下子没法完全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兴奋，我还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发现，现在是赴北极点的大好机会，因此我觉得要留在这儿一年。

她会无法相信自己读到了什么。我坐下来，又看一遍，还是不敢相信。我还以为我们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回家了呢。我曾盼望回家，现在却丝毫没有失望。我们要向北极进发了。不是明年，就在今年，跟我曾有的幻想一样。我拥抱了库克医生，他笑了，双手拍着我的后背。



我从没见过这儿有如此丰富的猎物。爱斯基摩人告诉我,即使他们的最年长者,这也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狩猎季节。他们预计明年情况肯定不如今年。他们还预计,一旦北极的长夜过去,乘狗拉雪橇前行的条件便会很完美。如果在此过冬,我们会会有很多鲜肉。等太阳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强壮,完全能够抵达北极。

我知道你会多么惊讶与失望。但机会就在眼前,我必须抓住。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条件了。我不是一个人,德夫林和我在一起。你应该赶快告诉布里奇曼,要在他私下从布拉德利或其他人那儿知道这件事之前告诉他,说我已经向北极进发了。消息肯定会引起震动。我希望无论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多么恨我,最后你还是会全力帮助我。请大家放心,我离开格洛斯特的时候是打算在九月份返回布鲁克林的,只是因为发现格陵兰的条件实在太理想,才决定要去北极。

请不要太想我。我知道你有宽广的胸怀,你会理解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替我吻海伦和鲁思。

爱你的丈夫
弗雷德里克

286

这次旅程的厨师来自布鲁克林,名叫鲁道夫·弗兰克。他是个德国小伙子,他接受了库克医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探险。

我写了封短信,请布拉德利带给达夫妮叔母。我告诉她,我们的计划有变动,我们要去北极,所以时间要比原计划的四个月长一些。我还请他帮我带封信给克里丝丁。“我一直在想你。”信中写道,“或许我不该在信里和你第一次说,可是,我爱你。”

船离开前的几天,库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我,早在船要离开格洛斯特之前,他和布拉德利便计划要进行北极探险了。

“我们见面那天,布拉德利便同意支持这次探险。”库克医生说。

库克医生告诉我,午餐吃到一半时,他放下刀叉问道:“为什么不试试北极呢?那比你的计划只多个8000到10000块钱。”

“我不去。”布拉德利说。“你想要自己去吗?”



库克医生说不知道哪一个让他更惊讶,是听到他自己脱口而出的问题,还是听到布拉德利毫不犹豫地答应支持他。

“我们会为你的北极之旅做准备,”布拉德利告诉他,“但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们不想让报纸知道。皮尔里正在准备出发,我们不想让他先抵达伊塔,把最好的狗都挑走。我也想一路上打打猎,不愿意匆忙出发。我们这么办,如果到伊塔看到那儿的爱斯基摩人都身体不好,或没有足够的狗,或其他情况不好,我们就只说这次行程是为打猎,然后回家。”

库克医生说,布拉德利当场给他签了张10000块钱的支票。“这是为北极。”说着便把支票递给了库克医生。然后,他又签了一张数目更大些的。“这是为我的行程。”

布拉德利向他问了库克夫人和我的情况。

“我会尽量晚些告诉他们实情。”库克医生说。“毕竟我们还不一定要去北极,没必要让她担心。撒这个谎没什么害处,可以让她几个月不用担心,也不会让德夫林失望。”

“去吧,要回来!”船载着毛皮和兽牙离开时,布拉德利说道。他把手放在库克医生的肩上,还冲我眨了眨眼。

布拉德利的样子让库克医生的北极之行看上去有如颇具风险的商业冒险。库克医生经历风险,布拉德利期待收益。这一点,他倒是和其他赞助人很相像。可是,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他不停地鼓励地看着我们的样子,让我有些不安。

“你们有可能办到的。谁知道呢?”布拉德利笑着说道,好像他刚刚买了彩票,来支持什么既有价值又有意思的事。

“他到北极的计划是怎么做出的呢?没有合适的装备,也没有船。”巴特利特船长问我,他说他没能从库克医生那儿问出个所以来。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库克医生打算怎么办。

“可你的命也系在他身上啊。”巴特利特船长说道。

“我肯定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我说。

“没人会从格陵兰,会从离北极这么南边的地方出发。”巴特利特船长说。“船该把你们送到伊塔北边几百英里的地方再回来。库克医生得靠雪橇走过这多余的几百英里。而这样没意义,也做不到。”

我们的基地帐篷是否太靠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跟这些布拉德利



号船员普遍认为的不同,我们的装备并不差。库克医生告诉了布拉德利北极往返途中需要的一切,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天,布拉德利和其他船员北上,准备到史密斯海湾继续猎海象,库克医生、弗兰克和我从船上卸下了一大堆的装备和给养,都是在格洛斯特时便秘密装上船的。其中有库克医生设计的几架雪橇,几支指南针,一支六分仪,一支温度计,一支可以度量走过距离的计步器,一支记时计,一支风速计,还有一支可以度量气压与海拔的无液气压计。

我和库克医生与弗兰克一道站在海滩上,看着那艘船,看它消失在视线中。

我曾多么想离开船长、布拉德利还有其他人。可是,他们真走后,这地方却看起来如此陌生。没有皮尔里,没有他的帐篷矗立在山崖的一端,这样的海滩看上去真陌生。我从没看到过伊塔的港口没船停泊的样子。海边甚至连爱斯基摩人的独木舟都没有。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把船抬回山上。

有船停泊的港口才自然,没船便预示着冬天快要来临。船只是刚刚开走,我却有了被抛弃的感觉。以前,隔在我和家之间的是时间和空间,现在,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了。

港口和小山还是上次我们来救助皮尔里时的样子。我们不在时,还是一般模样,不该看上去陌生。我觉得自己同它们一样,固定了。是种奇怪得让人压抑的感觉,特别是库克医生说“真正”的天气已经到来时。

我看看山上的爱斯基摩人和他们的帐篷,想确认一下。他们可以证明,在北极圈过冬是能活下来的。看似漫不经心的爱斯基摩人也在准备,带着几分欢快地迎接另一个如常一样能安然度过的冬天。

我却并不放心。我最害怕的是长夜。

爱斯基摩人在修整半地下的小房子,那至少有百年历史。我们得在类似红石屋的房子里过冬。我们把它叫做盒子房。

我们用包装给养的包装箱做成墙,在屋里隔出13乘16英尺的空间。我们把盒子盖挂在屋顶,用草皮把东西隔开。一根立在中间的柱子支撑屋顶,周围做了张桌子。

我们花了8天盖房子。我们把给养放在一旁,上面盖着布拉德利号上废弃的风帆。我们安装了一只小炉子,得随时照看,不然会熄灭。

库克医生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年夏末便可返回布鲁克林。他说



我们最多会用15个月时间。他安慰我说,我们不会像皮尔里那样毫无意义地在冰原上浪费时间。我们只试一次,没能到达北极点便回家。等再次准备完毕,我们会再尝试。这样的北方不可能让身体复原。

盒子屋的第一个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睡袋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几个月。小时候,只要能拿到的写北极的书,我都看过,可都写得平铺直叙,少言寡语,仿佛如果生动地描述一下这儿的美丽或探险的艰辛,便会有违于探险家的行为规范。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对这样一个突然转向北极的计划,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对库克医生所说的“没有预见到的有利条件”,我也仅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要是这些“条件”真存在,那真是我们走好运了。他是这么告诉他妻子的,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条件我们才呆在这儿。听到这个我很高兴,因为我曾不住地想,只靠时运流转,便把一次捕猎变成前往北极的探险,这样的结果可能只是失败。



第 34 章

9 月中旬开始下雪了。布拉德利留给我们的十几艘小船放在海滩上，几艘底朝上放着的已经被雪盖住了。

在港口冻结很早之前，雪就下起来了。除了灰色的海水，一切都是白色的。两者间昏沉的对比似乎可以把库克医生都催眠了。黄昏时分，他会站在水边看着涌向岸边的海浪，似乎从冰雪包围的水中看到了什么难于破解的启示。

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后，港口消失了。海水已经冻上，雪落在冰上。以往开阔的海面现在成了一片平坦的雪地。

港口开始结第二层冰的时候，冰便都挤到了海滩上。低潮把冰块留在海滩，冰块却不会化掉。港口完全冻结以后，这些冰块看上去就像一堵墙一样，就像我们为抵御敌人侵略而筑起的第一道防线。日落时分，爱斯基摩妇女会站在这道墙后，盯着港口的海面，听着海浪的声音，就像库克医生看海水时一般着魔。她们都悄无声息，两个两个沿墙排开站立，脸上满是泪水。这种风俗库克医生以前也曾看到，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爱斯基摩人也不愿意谈起此事。

我们不必打猎。我们从爱斯基摩人那儿换来肉和衣物，这样可以节省体力。库克医生预计我们得靠体力熬过北极几个月长的黑夜。我们用香烟、步枪、子弹、饼干和肥皂跟爱斯基摩人交换（不知为什么，爱斯基摩妇女会用肥皂擦洗从脚往上的身体部分）。

交换时，爱斯基摩人拿来狐狸和兔子皮做的外衣和袜子。女人用男人猎到的驯鹿皮毛帮我们做睡袋。缝睡袋非常吃力，她们得用牙咬着针，手脚并用地缝制。她们用海豹皮给我们做成皮靴，还有雪橇上用的鞭子。

雪橇是库克医生花费很多时间用山核桃木做的，木头是从他兄弟的农场里伐来的。他先烤制木头来做雪橇的冰刀，然后把木桶挡板压直。他做了七架雪橇，拴在一起立在屋子外面，以防被积雪压坏。他做了山核桃木的雪地鞋，脚趾部分向上翘起，他认为这样可以更便于在极地海域的冰雪



上行走。

最后，他做了一架大雪橇，可以把他在布鲁克林做的帐篷拉上。等我们无法修起一座像样的爱斯基摩式的小屋时，我们可以住在里面。

我们冬天呆在盒子屋的时候，用的燃料是煤。布拉德利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硬煤，要比软的那种强。硬煤燃烧后不会到处是煤灰，也不会堵塞火炉烟囱。

已经变短的日子短得更快了。从盒子屋一盖好，爱斯基摩人便从山上下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喝茶。他们三三两两地，中午过后便开始下来。随着冬天临近，人来得越来越多，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们的到来让小屋总是很拥挤。

让人难过的是，爱斯基摩人似乎跟我们一样害怕快要到来的极地冬夜。他们不愿离开。告诉他们得回自己山上小屋的时候，他们还很不高兴。

最后，一“天”变得只有一个小时的光照。太阳只是从东边爬上平坦的地平线，然后便落下了。

我们的头脑还是按惯常的日照方式运转，还以为这是一天中的黄昏，而太阳横跨天空，现在日落了。我们就像人们在日落时常常会的那样，脑子里开始遐想起来，想过去的事，也想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每一天都有几个小时，我们会忍不住把黑夜当成白昼之间的补充，这还颇受人欢迎。可想想真正的情况，便让人气馁。这儿没有白天，只有日复一日的黄昏，中间是永无尽头的黑暗。

看起来，遥远处的光好像是过去的遗留，是曾经所记录或记忆的事，历史和记忆正在淡去，很快除了黑暗便会一无所有。不单是我有这种想法。有一次，库克医生说了句“过去日子的光”，他说是在引用《帕尔格雷夫英诗集粹》里一首诗的头一句。他说他第一次形容如此暗淡的日光，还是在红石屋的那次探险中。

有一天，太阳根本没滑过地平线，只露一个角，便慢慢落下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太阳出来得越来越少了。十分之九，四分之三，一半，三分之一。太阳开始变成一团红色，然后是月牙状，然后像镰刀。最后，我们扔掉手头的东西再看时，看到的只是帽檐一般升起的一牙红色。红色消失后，从10月25日起，几个星期里我们便只能从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看到一片微弱的光。后来，这样的光也逐渐淡去，变得毫无规则，就像一支蜡烛放在一个毛玻璃做成的盒子里，而我们还觉得那是太阳。

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还会等着太阳，看着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等待它会不顾季节而升起。

北冰洋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随着日光日渐稀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我。与伊塔肯定还不一样。现在看到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库克医生注意到我的疑惑。“你会做得很好，德夫林。”他说。“我们不会挨饿受冻。需要忍受的只有黑暗。我们有工作做，有书读，过了圣诞节后会有很长的路要期待。”

每天，他都说这样的话鼓励我。“骨子里你就适应北极的黑夜。”他说。“你有耐心，脾气又好。你适应孤独。”

库克医生让我相信，呆在盒子屋里便不会冷，甚至外面也不会。可我还需要一点亲身体验来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皮尔里握住我手的一刻，其实已经告诉我，尽管我在格陵兰南部的海滩上过了一夏，对北冰洋其实仍是一无所知。每晚睡在装备齐全的埃里克号上，我觉得伊塔的夏天要比信号山好过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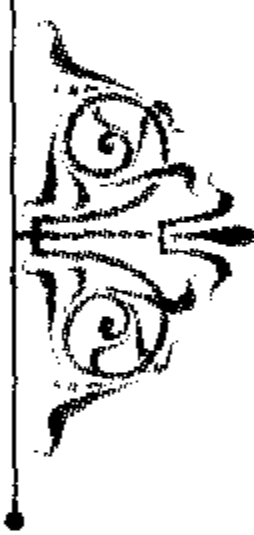
我想到冰沟，就是比尔及亚号上的船员为丹柯上尉挖的坟墓，他是南极探险中唯一的牺牲者。他们挖了6英尺深，好像以为冰会像土，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杀死丹柯的不是寒冷的天气，而是无尽的黑暗。

我还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北极探险队里的成员。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只要有一个缝隙，风便会尖叫着进来，风会让北格陵兰的探险队员不敢再说话，会尖叫起来，会请求宽恕。我担心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几个月的黑暗与禁闭，我会不会成为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北极探险家。

我在想，北极是怎样让壮硕而坚强的皮尔里变成了那个样子。我记得他吊在我手上，在两船之间时的脸色。我是多么自以为是，竟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皮尔里这样的人承受过的一切。

我想抵挡住这些想法，它们却越来越重地压在我身上。最寒冷的时刻到来后，再坚定的天性恐怕也难于抵挡。库克医生为我们想出了各种户外活动，有扔石头比赛，有用鹅卵石玩的弹球游戏，有三条腿竞赛，就是我们组成两人小组，跟那些无法忍受生活毫无生气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赛。

我告诉库克医生，巴特利特船长曾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开始得太靠南了。库克医生说，从南边开始会让我们在冬天有更多鲜肉，还有没用过的狗。我们的线路的确比皮尔里的多400英里，可我们会穿过猎物大量出没的地方。



我没想掩饰自己的怀疑。

“想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吧。”库克医生说道。“你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过些，只要你自己装作感觉好就行。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有多温暖，阳光有多明媚吗？那天你在我屋外的阳光下站了好久。记得我给你的那杯好喝的橙汁吗？”我试了他的办法，想到阳光普照的日子只能让我更加渴望阳光。

我变得不愿讲话，不愿让字母随意出来，似乎说话会让我失去什么，似乎跟其他东西一样，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短缺，我不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份。

库克医生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刻表，他说如果我和弗兰克不想生病，就得照做。我们6点起床，6点30分吃早饭，看书或写东西到10点，喝杯咖啡后到户外锻炼，做的是库克医生设计的体操，是他最初为比尔及亚号上长年在船上工作的船员设计的。如果是阴天，四处便是一片漆黑。要不是我们在小屋周围点起的灯笼，都看不到自己在雪地上的脚印。

中午我们吃午饭，然后便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干，很多爱斯基摩人会来做客。他们带来兽皮做的鼓，敲着鼓，唱着歌，在小屋里跳起舞来。动物油脂的蜡烛冒出的黑烟，加上雪茄和香烟的烟，会让小屋里几乎无法呼吸。爱斯基摩的舞者，还有妇女，会把衣服脱到腰部，会跳到身上流满汗水。每个人都喝茶，吃风干的海鸟蛋，他们的海鸟蛋似乎永远也吃不完。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東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他用面粉糊堵住房



子里的缝隙，面粉糊干后，比水泥还坚硬。爱斯基摩人排队进到暗房里，去看红色的光，还有影像魔术般地从水里泡着的纸上面显现出来。“诺维噢”，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也时不时总可以从那间屋子里听到“诺维噢”。

他们把库克医生称为“塔塞所”，“大药人”的意思。他们从以前的行程中记住了他，包括北格陵兰的那一次。他们非常详细地回忆这些探险的细节，比他记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他曾为他们治好过的病。他们还和15年前一样对他心存感激。

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紧密连接的，无法理解我来格陵兰是为了寻找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只能让他们强化这种看法，他们也总是很失望，从他们的陪伴中我似乎得不到什么安慰。

每天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演哑剧似地装出找寻的样子，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难过地摇摇头。他们跟我保证，当时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的时候，他们曾尽全力寻找过他。

我发现自己对库克医生会和鲁道夫·弗兰克商量事情而生气。他是个厨子，没有在北极呆过的经验，我们也只认识他几个星期而已，而他竟享有我花了几十年才享有的荣誉。

弗兰克比我高，也比我更强壮。他英语不好，所以不太说话，我们也不大交谈。他和库克医生说德语，库克医生用他并不流利的德语下命令，弗兰克会嘟哝出几个德语词，然后去干他以为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我在想，他是否对我没信心，所以才请弗兰克作候补。也有可能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他便对我有些失望，但又没有说出来因为怕伤害我。他做这些也许只是不想破坏曾给我许的诺言，想让我成为探险家的诺言。我觉得弗兰克夺取了我的地位。或许弗兰克在出发前便知道我们要去北极。他和库克医生一样，是在布鲁克林的德国人。库克医生或许早就认识他。我没办法抵御这些荒唐的猜测。

为抵挡黑暗带来的烦恼，我几个星期没跟可怜的弗兰克说话。要不是他，我不会这样，库克医生原本不该怀疑我。

我知道，有时探险家会觉得不再需要助手协助，会让他们在途中提早回去。库克医生或许正打算让我回去，想救我的命。我发誓我绝对会拒绝他，除非和他一起回去。

最后，冬季的暴风雪让爱斯基摩人都不敢出来了，即便是从他们的住处到我们小屋这样的距离。我们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黑暗中到户外做运动



了。

躺在温暖的睡袋里，我觉得自己来参加探险真是可笑，真希望库克医生把我扔在身后。我觉得库克医生肯定觉察出我身上有致命的弱点与重大缺陷，一些斯特德家孩子身上的通病，我还以为我把这些问题在若干年前就统统抛弃了呢。

整日整夜，除了咆哮的风声就再没有其他声音。偶尔可以听到爱斯基摩人的狗在叫。它们闻到干肉饼的气味，从山上跑下来，爬到屋顶上，不停地刨屋顶上的草皮，连续不断地敲着，好像以为如果它们不叫，我们便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库克医生觉得可以给它们一块肉饼的时候，便扔一块出去，它们会跑开一会儿。可是，他得不断把肉饼扔出去，不然它们会不停地用爪子扒屋顶，用爪子扒下上面的草皮，然后跳下来在门外等下一次的奖赏。

我总感到很疲倦，总觉得自己应该睡觉，我无法抵抗带给我温暖与安全的睡袋。不管库克医生怎么催促，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睡袋。可有时候，无法入睡的夜晚过后，我既睡不着，也鼓不起勇气爬出睡袋。我闭着眼睛躺在铺位上，似乎所有的能量都从身上跑到了脑子里。有时候，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库克医生会让我站起来，这样睡袋就会滑落到我脚下。他们会让我在小屋走动，直到完全清醒为止。库克医生也会分配给我一些工作，比如把雪橇的冰刀部分刨一刨，或者往炉子里添些煤。

库克医生和弗兰克也没法躲过这长时间禁闭的影响。不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想把我从睡袋里弄出来。

12月初的时候，天气有所缓和，库克医生决定到黑暗中去试试他做的雪橇和冰鞋。他说他会在两个星期内回来。他走几天后，我便开始发烧，他回来很长时间以后，我都没有恢复过来。

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达科他”，梦见库克医生没有带我参加这次探险，梦见自己在等他从北极回来，等着听他是否还活着的消息，等着他的信。我觉得一切似乎发生在多年前，他出门探险，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收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的下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还会不会来。

我梦见他在伊塔给我写信，就像他给库克夫人写信一样，他解释为什么当时不能和我说实话。而我也像从前一样，无法给他回信，无法问他信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等我下次有他的消息时，肯定还是一封信。

时不时我会从高烧中醒来，发现库克医生在量我的脉搏，他的手拿着

我的手腕。“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他冲我微笑，却不说话，要不就是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着。弗兰克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固定，库克医生的听诊器在我裸露的背上移动。

我神智完全恢复是在节礼日。“冬天的午夜已经过去两天了，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太阳该回来了。”

暴风雪最强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们又可以出去了。我知道我们会在二月向极地进发，也就是说，我得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里康复过来。

我想尽力表现得优秀些，分外的工作也干，他们两个做完体操后，我还要再多做好大一会儿。库克医生又警告我，要小心旧病复发。

每天早上都有那么几分钟，东边的天空会闪过光亮如银河般的云朵。库克医生告诉我们，那是太阳快要出来的迹象。

“可能没有够我们三个人吃的食物。”库克医生说道。几个星期以来，我都盼着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完全恢复，可我知道，看到我在探险初期便成了这个样子，库克医生肯定会非常担心，会担心我可能死在赴北极的路上。往好处想，他可能会觉得我会耽误他的计划，会导致探险失败。

他对我笑。我想他是要准备告诉我，他知道把我扔在后面我会很失望，可他希望我能理解，的确有必要这么做，他也希望我拿出风度来接受这个坏消息，因为这也是我的天性。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弗兰克不跟我们去北极了。”他说道。

我扑向他，抱住他，像爱斯基摩人一般围着他跳起舞来。

库克医生告诉我，从请他跟我们一起呆在伊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在我们达到目标或自己返回之前，要早早把鲁道夫·弗兰克送回去。

“我们需要他帮忙修建小屋，我们也应对他的陪伴心存感激，他从布鲁克林来，陪我们度过了北极的黑夜。这听起来很残酷，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或许会让他先走的。”

在太阳回来以后，库克医生告诉了弗兰克他的决定。他们用德语交谈，弗兰克指着，很明显是在说库克医生对他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整个冬天都靠人照顾的病人留下。

他们争论时，库克医生从没提高嗓门，只是告诉他有人得留下照看小屋和其中的物品。争执延续数日，弗兰克最终屈服了。



第 35 章

我们装了 11 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 12 位跟我们一起走。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出发时，我们有 103 条狗，有替换的狗。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



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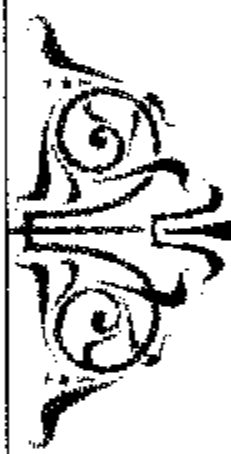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他好像从不睡觉。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漆,就算不曾下雪,回来时也不会找到了。我们一路走过时的冰会融化,位置和形状也在不断变化。

有时候我们感觉最好不要在某些地方扎营,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在移动,而是我们在被移动。看起来固定而坚实的表面上,我们感到自己是在无助并且无目的地漂流。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着身后,跟昨晚的样子不一样了,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儿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夜停下时看到的前方,也和现在的不一样了。

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库克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他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他说我们在哪儿,尽管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我们的位置的。

他用工具持续度量天气和冰的状况,计算海流,记着日志,每天不同的时间记下我们影子的高度。我嫉妒他会用这些仪器,可以把数据收集起来用到地图上,可以在白色的海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爱斯基摩人也是第一次到看不到大地的地方来,他们吓坏了。他们不习惯让别人领航。他们没法理解地图上竟然没有大地,他们也许在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担心库克医生带错了路,我们估计都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两个没有对库克医生表现出任何敌意,可有一天赶完路时,他们之间小声说了些什么,又难过地摇着头,好像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时不时库克医生会照几张像,他想在帐篷里面冲洗,可是我们没法让帐篷里变得够暗,所以相片上只有几个微弱的光点。

风暴过后的天气里,冰上会形成的一个人宽的裂缝,在气温骤降时会碎裂。有天晚上,我们睡觉时,下面便裂开了。等醒来时,帐篷已经被分到两边去了。我们刚刚有时间爬出来,没有直接掉到下面的海水里去,或是

掉在裂缝里,等它再次冻住时被挤碎在里面。

库克医生说,极地的海和南美洲与南极之间的海不一样。冰虽然在不停移动,但却更久远、更厚、更硬,也更致密,压缩得更厉害。南极因为在大陆中心,会穿过更多的大地而非海洋。知道脚底下是土地也比知道脚底下是海水要踏实些。你在极地海面行走的时候,不会感觉脚下的冰在动。我有时会觉得底下并没有水,下面一直是冰,就像100万年前一样,冰就像是

从地球中心喷出的白色岩浆。

我们也会偶遇冒着水雾的一条水带,如同幻象一般。冰才刚刚分开,水已经开始结冻了。在零下50、60、70度的严寒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冻结的过程。开始,冻出水晶般的冰花来,然后一条蒙着纱巾般的冰带从这边延伸到另一边。通过这条新而多孔的冰区,雾气像蒸汽一般冒出来,很快便会冻住,犹如灰尘一样掉到冰面上,慢慢多起来,冰面开始不再透明。库克医生会去取海藻样品,可通常根本没有海藻,只有海水。

一次,为躲避西边的风暴,在这样的水带还没冻结前,所有的雪橇和人都被迫穿越了一次。冰在脚下噼啪碎裂,如同半碎的玻璃。库克医生让我们尽量把腿分开,以分散重量。我们成功地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放开了的狗好像发现了什么猎物,可赶上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只是在嗅一个早被丢弃的海豹或北极熊的洞穴。最后,我们离大地实在太远,已经不可能遇到其他生物了。

300

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最后的一缕阳光变成了拉长的黄昏,然后是日落,最后是午夜时分都有太阳。冰看上去好像着火一般,橙色,蓝色,紫色,好似不用燃料的火焰,可以永远燃烧下去。午夜都有太阳,我们在夜间行进,因为太阳在最低处,可以躲开灼人的日光,那样的阳光我们的护目镜都无能为力。我们白天睡觉,尽管看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我们把小屋或帐篷里想象成黑夜的样子,其实外边却很亮。我们渴望北极的黑夜。现在是白天太多,用不完了。

有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屋被雪埋住了,是风把雪吹过来的,是晚上我们在睡袋里装作没有听到的风声。我们知道白天到来,只是因为看到微弱的光从四墙上透了进来。

每天早上,爬出温暖的睡袋得花好大力气。我们多想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多想永远也不离开它。睡袋给我们安全的幻象,诱惑我们,让我们忘记给我们温暖的其实只是自己的身体。我们把彼此踢醒,每个人都盼着别人



会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去外边把狗从雪里面挖出来。到早上，它们露出来的部分只有结了霜的鼻子。

躺在睡袋里，我为自己的体温感到惊讶。我会抽出一只手，等它感到寒冷后回来摸我自己的脸。一只冰凉的手，却能让我觉得自己很温暖。

有段时间，极地洋面上总是泛着蓝色的微光，好像是晚冬午后，正在完结却似乎永不完结的一天。时间好像在这凝思的悲伤一刻被冻结，好像回家已经虚无缥缈，不可企及了。

一天行程结束会非常疲乏，没法盖起小屋，只能睡在小帐篷里。只要不动，马上会睡着。我们都精疲力竭，会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们穿着皮衣、皮帽、雪地鞋和手套，没工夫点小炉子了。

我和库克医生的头发都长得跟爱斯基摩人一样长了。脱下帽子，头发会披到肩膀上，低下头时，会披散在面前。库克医生说最好不要剪它，因为可以保暖，还像胡子一样，可以保护脸部不受霜冻。这是我们比爱斯基摩人具有自然优势的一点，他们脸上不长胡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跟我们前来。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支持着，到此处有我们的原因。可是，除了我们请求他们来这里，并对我们忠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所谓的“报酬”（对他们来说，呆在家里打猎也要比我们给他们的多得多）。有时候他们也实在太累，几乎抬不起胳膊挥动皮鞭，也没法提高声音来叫狗前进了。

有一天，阿瓦哈一遍遍地唱了起来“Unne Sinig pa——so ah tonie I o doria”（无法忍受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该惧怕死神）。从那时起，库克医生就不像原来那样和他们依次驾雪橇了，他开始走在前面。因为他知道，爱斯基摩人会把他的行走当做一种挑战，他们会更尽力，更有决心，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暗下决心，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能让他们为帮助我们两个白人到达北极点而死去。我们把最弱的狗杀了，给我们留了一些肉，然后喂了其他的狗。后来，我们得拿我们多余的睡袋喂狗了，它们得把这种驯鹿皮做的睡袋嚼上半天。

“我们离北极点还有160英里。”有天晚上，库克医生从外面走进帐篷跟我说道。“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到达，我们回来的路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给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这是南极，我会让你们三个留下来以节约食物，我自己会去走完最后一段。可我们要是在这种浮冰上分开，我将再也找不到你了。风险这么大，我不能指望别人听我的命令。你们三个投票决

定我们该怎么办。我弃权。”

我们三个投票决定继续前行。

风总是直直地向我们吹来，逼我们弯下腰去，看着冰面，根本不知道前面马上会有什么东西。库克医生靠他的指南针指挥雪橇，每只雪橇狗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在走。

我有时会想，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没到北极。如果我们没法回去，尸体要是能被人发现，也不会在北极附近，早不知道随冰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跟以前那些夜晚不同，我不做梦了，不管是走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我现在走路时都可以睡着。我已经睡着，身体还在习惯性地向前走。我会被我自己的脚步声惊醒。我常想起克里丝丁，会想当她看到我给她写的信，看到我说我爱她时，她会怎么想。我也想起达夫妮叔母。想起在库克医生延迟了的南极探险时，我会期待他的信。我现在太清楚不过他们两个当时的心情了。

“早。”随着库克医生的一句话，一天便开始了。到第二天时，他又会用同样一句话叫醒我，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其余的几个人根本不说话了。

1908年4月19日，库克医生告诉我们，离北极点只有两天路程了。

“我们快到了。”他笑着，好像他刚刚观察、测量得到的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惊喜，好像他总觉得我们一直是离北极很远，刚才注意到原来以前算错了什么地方，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快要到了”。

以前为了防止我们过于失望，他也总是这么说，可只是在不断重复，告诉我们快要到了，其实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距离”。

“我们有两天的距离，还可能更近。”看到我脸上的怀疑，他又说了一遍。他告诉了爱斯基摩人，他们马上便兴奋地说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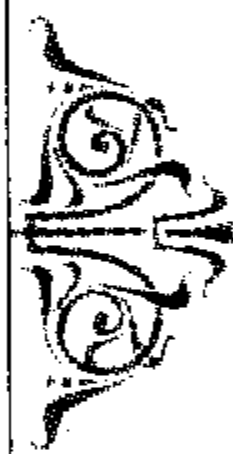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到达了。”第二天，他随意地说了一句。

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三架雪橇跟在他的后面。我看着眼前的雪景，盼着能突然有什么变化，盼着能突然进入什么极地地带，一块在中心地带带有明显标示的地区，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儿是“极点”。我驾着雪橇跟上了他的。

“我们到了北纬89度。”库克医生说道，好像是要给我一直要找的那种确定的感觉。

我们那一天却没能到达，第二天也没有。

“今天肯定到。”库克医生说道。“一定会，德夫林。”



狗似乎也感到了我们的兴奋，它们狂吠起来。不用人赶，它们比平常都要跑得快。我没法觉得北极点是旅程的终点，只觉得它是半途而已，好像那儿会有固定的宿营地，有充足的食物。

我们穿过一片罕见的平坦冰地，以为这儿就是北极点。我期待地看看库克医生，他笑着摇摇头。

这样疯狂地走了三个小时后，库克医生拉住了他的狗。他取出指南针和六分仪，一边看着六分仪，一边开始大步踱起来。

他走得更慢，还看着指南针。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冰在他的雪地鞋下的响声。他停住了，把指南针放进兜里，抬起头看着太阳。

他指着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尽管在我看来哪儿都差不多。

“德夫林，我想让你直直走过去，我让你停你再停。”他说道。

我走着，心里却想着能躺下，能睡在地上。看上去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走得太远，别人说话已经听不到了，要是那样，我转过身可能也看不到他们了。

“停！”我隐隐听到库克医生的喊声。我站住，转过身看着他在100码以外，还盯着指南针。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就算这个距离，我也看得到他在笑。

“你到了！”他喊起来。

我四下看看，想找点线索好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在北极点上了！”他喊道。“你是第一个！”

等他开始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阿瓦哈和埃图克述克也催着他们的狗向我跑来，其他的狗虽然没人驾驭，也跟在后面跑了过来。

库克医生上下跳着，使劲挥舞胳膊，舞成了一个圈。

那一天是1908年4月22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

我不敢相信，库克医生竟然会让我在他和其他人之前，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

“北极点，德夫林。北极点，北极点！”他边喊边向我跑来。我觉得我也该向他跑去，可我没法让自己离开极点了。

库克医生和雪橇一下子便到了跟前。狗都昂起头来，几乎同时狂吠起来。库克医生搂住我的腰，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北极点！”他大叫起来。“终于到达北极点了！我们到了！德夫林，我们到

了！孩子们，我们到了！”

我抱着他，跟他一起舞起来。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也跳起舞来。

我们第一次尝试便到了北极点，而皮尔里和其他人试了那么多次都没能成功。

感觉就像是站在冰雪的源头一样。

这个所有子午线相交的地方没有时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一步便能从地球的一半跨到另一半，一下子便可以从子夜变到正午。

这儿，在极点上，每年也就只有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每个方向都是南。没有北了。

“最后是我们的。”库克医生环顾四周，我也意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再来了。“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三个世纪以来的荣誉，看起来是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一个地方。”

“最后是我们的。”我说道。

“祝贺你，德夫林。”库克医生边说，边从皮帽子的毛边下抬起眼看着我。

“也祝贺你，先生。”我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称呼他。儿子们常常会称他们的父亲为“先生”。我很惊讶，以前怎么从没想到过。

“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说道。

“为我们两个，先生。”我说道。过了很长时间，他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他点点头，转过身去。他跪下身，脸埋在了手套里。他跪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向导也跪在了他身边。

我也跪在他身边。他一只手搂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搂住阿瓦哈，阿瓦哈的手搂住埃图克述克。我们四个跪在那儿，似乎在为拍照摆姿势。在这没有其他生物到过的地方，只有永远的晨曦。

我们毫无意义地插了一面旗帜，然后在雪中埋了一个锡罐，里面有库克医生写的一封信，说明到达的人员和日期。似乎第二支探险队到来的时候，便会知道我们已经来了。这样其实和在大海里扔下一面旗帜和一个铁罐差不多，可好像也还是必须这样做。



第 36 章

我们返回了。

我们被暴风雪困在帐篷里很长时间，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漂流得太靠西，已深入到古斯塔夫王子海。这儿到处是水，没法去阿克塞尔·海伯格岛，我们在那儿埋了最近的食物。我们只能随冰向南走。库克医生希望能到达兰开斯特岛，在利奥德港等待苏格兰捕鲸船，那样便会比我们去格陵兰要近。9月，我们到了巴芬湾，食物、燃料、弹药都没了。

我常感到他们中有一个不见了，可看看四周却能看见他们三个，前面、旁边、后面都有。有时，我觉得如果我抬起头，会发现只剩我一人了。睡着时我已走失，或者被其他三个抛弃了。

最奇怪的事是有时我觉得还有第五个人在我们身旁走着。有一次，我敢肯定我看到他了。他跟库克医生肩并肩地走着。有时他会和埃图克述克或阿瓦哈一起走，像他们那样低着头。他的帽子却很光滑，尖尖的，有点像修道院里的烟囱。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他没有，也不敢问，我害怕他们说看到他在我身边。

我想那肯定就是死神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幻觉，对我来说，是末日来临的先兆。他却总和他们一起走，不和我。为确认，我便左右看，要是看不到他，我会看自己的身前身后，然后长舒一口气，他原来没有选我当伙伴。

有一次，我从走着时的睡梦中醒来，看到他们三个在我前边。在我身边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有一个我不敢抬头看的东西在和我同步地静静地走着，是唯一没有雪橇的一个。我想和别人一样，不理睬他，希望他自己消失。我打起盹儿。醒来以后，那不知名的第五个人还在那儿，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别人的长，似乎死神已选过我们四个，最后挑中我，最年轻也最虚弱的一个人。

看来他大概不会离开我，我决定面对他，说服他，让他知道我的时间还没到。我抬起头，他也抬起了头，我们都转头对着别人。

之前是顶尖帽子，现在却是一块面纱，后面是张女人的脸，看上去比我

年轻，也一点不像阿米莉亚，但我知道她是我母亲。她的脸不像是参加过探险的脸，没有因自然条件或匮乏而受损。是苍白得几乎半透明的脸，眼睛是蓝色的，此外没有别的特点了。

她笑了。“你不必怕我。”她说道。

我肯定是睡着了，我记得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我太疲乏，无力去想这个幻觉。我不停地走，只在脑海里能看到她。我记得她的声音，听起来离我这么近，跟我自己的一样，在告诉我不必害怕。

我们走到斯巴布角的西头，决定在洞穴般的小屋过夜。岩石的凹进处有所百年历史的石头房，有草皮和鲸鱼骨的房顶。阿瓦哈说他的祖先曾建造这房子。我们找到一艘船的舱门盖和一些宽木板，用这些做了鱼叉打猎。我们用麋牛和北极熊的皮铺垫到屋子里。幸运的是，打猎很容易。即使在牛群中杀了头麋牛，其余的也还得赶才走开。

库克医生有个习惯，是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探险时养成的。他劝我跟他一起这样做。晚上风平的时候，我们会躺在地上，透过睡袋上的呼吸口看天空，呼出的空气会一阵阵从那儿冒出去。有一次，我看到埃图克述克在房子入口窥视我们。他们一定在想，这两个人疯了。我只是睁大眼睛躺在那儿，看天上的星星。

有时，月亮很圆很亮，我们会出去走走，聊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这也让爱斯基摩人感到不安。我们回来后，他们会仔细看我们，好像我们身上丢了什么东西，刚刚出外寻找去了。

我很快就不想北极了。我觉得想任何事都很困难。甚至在梦中，我被霜冻坏的手指也会疼起来。在梦里，天堂阳光灿烂，一片温暖，其他地方尽是寒冷。

天气变坏，我们没法出去。在白天，这会是极地大暴风雪。在晚上，连雪都看不见。

我们的房子面对南边，风从东边刮来，门开着雪也进不来，只能听到雪在外面不断飘落的声音。我把手伸到外面，抽回来便冻得通红，也都湿了。有时，听上去好像整个房子都被埋住了。外边的世界只有听上去才存在。

几个星期无事可做，只能睡觉。我和库克医生会读书，写东西。带的几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风声淹没了所有的其他声音，反而变得寂静，一种单调的咆哮。不可能说话，只能用手交流，指指点点，做个姿势，在空中比画。



最后，我不能读，不能写，吃东西都没力气了。

有一天，我醒来时，风好像要停了。我仔细听着。声音很闷，好像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一样。我看见库克医生走向“门廊”（其实只是地面和悬下来的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隙），想推开门（其实也只是吊在鲸骨下面的皮帘子）。我看到出口已被积雪堵住。他使劲推，可只推出了一个凹痕。埃图克述克从睡袋里爬出来，把鱼叉递给他。库克医生把它全插进雪里，还是没能弄出一个空气口来。

遥远而沉闷的风声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埋了有多深。太深了，没法挖出去。库克医生只动了几分钟，便精疲力竭。阿瓦哈和我一样，还躺在睡袋里，无动于衷地看他们费力地挖着。库克医生说，没什么办法，只能回自己的睡袋里躺着，除非绝对有必要，不要动，以节省我们不多的空气。

一天后，我们还都清醒，我知道肯定有空气可以进来，尽管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维持多久。我在想鲸骨的屋顶能不能撑得住。我看看手表，每次上表我都担心它不会再走。我得靠它计算天数。

风声越来越小。我在想，到底是把我们埋在下面的雪越积越厚了，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四个整日都昏沉沉的，抵挡不住阵阵的睡意，只想闭上眼睛，却也总是突然惊醒过来。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在想，等我什么都听不到的时候，末日便到了。我使劲地听，好像声音便如宝贵的空气，正慢慢从雪中渗入。好似只要我们能够听得到，便能呼吸一样。

一天，我醒来时，声音没有了。躺在我身边的库克医生握住了我的手。“不要害怕，德夫林。”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不要害怕，我的儿子。睡觉吧。”

风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同时醒来了。我们大叫起来，好像有人正从上面走过，不知道我们在下面躺着一样。我们觉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可以让他把我们挖出来。

声音逐渐大起来，一分钟比一分钟大，风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使劲地刮，只是变了个方向，雪被吹走了。听到风声，我们从没这么高兴过。我们庆祝风的归来，像庆祝重新又有了光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埋了我们几个星期的雪便被吹走了。

新鲜的空气一下便涌进来，如潮水般让人无法呼吸。我们咳嗽，感到窒息，可还是像孩子般开心地彼此笑着。如同是自己粗心身陷险境，但纯粹的好运却让我们扬了名。

风平息后，我们设法出了屋子。狗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们曾经中断的叫声。它们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被谁当成野狗，我们便永远不得而知了。

从斯巴布角出发，4月中旬我们到达了伊塔。一位名叫哈里·惠特尼的猎人住在我们的屋子里。皮尔里前个夏天向北极进发时，他被扔在这儿。

小屋。伊塔。山上小屋里的爱斯基摩人。这一切怎么还会在此？如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却发现一切还是你出发时的模样。

库克医生和惠特尼闲聊起来。惠特尼对皮尔里很不满，说皮尔里对他不好，他从皮尔里那里获取的报酬与他的劳动付出极不相称。

库克医生用一堆笔记本记录我们的行程，说这是我们曾到达北极点的科学证据。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碎。支离破碎，肮脏不堪的笔记本用胶水和驯鹿皮做的绳子固定在一起。我们不必和惠特尼一起等皮尔里，他决不会让我们上船。最近的港口是乌佩纳维克，我们得步行到那儿，得走四个月。库克医生说，如果步行这么远的距离，笔记本肯定会成碎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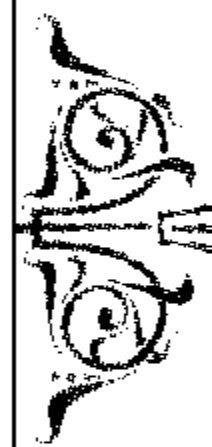
“我必须把这些笔记本留在您这里，惠特尼先生。”他说道。“或许我该信任您，您会把它们安全带回纽约交给我妻子？不然，它们很快就毫无用处了。”

惠特尼说他会照顾好这些笔记本，也不会跟皮尔里说起它们。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尽快到乌佩纳维克。没有消息说皮尔里何时会从北边回来，也不知道他已走了多远。

我们在乌佩纳维克与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分了手。我们和他们拥抱告别，尽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来，他们被我们的举止搞糊涂了。他们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便转身向伊塔走去。

我们上了艘名为汉斯基号的丹麦船。它应驶往哥本哈根，但中途拐到了莱威克，是苏格兰最北端城市，设得兰群岛首府所在地，也是最近一处拥有无线电设备的港口。丹麦人告诉我们，如果直接去哥本哈根，就可能让皮尔里首先宣布他的胜利。他们更喜欢我们，不仅因为他们可以载我们回归文明世界，而且还可以带我们去他们的国家。那儿会成为第一个欢迎我



们,为我们庆祝成就的国家。

从莱威克,库克医生给布鲁塞尔的科学院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于1908年4月22日到达了北极点。发报日期是1909年9月1日。我们回来整整用了16个月的时间。

我给克里丝丁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安全无恙,即将返家”。我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会不会在乎我的安危。库克医生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给纽约《先驱报》发了封2000字的电报。他简要介绍了我们到北极点的经历。《先驱报》将此登在了9月2日的头版上。

“虽有斯特德先生与两位爱斯基摩人陪伴,我仍深觉孤单。如此一处毫无生机之地,竟成多年来人之梦想。处处紫雪,无生命,无土地,冰霜之地千篇一律。我等仅为冰雪世界中脉搏跳动之生灵而已。”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这样一条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路真让人难以置信。我刚从极地到了欧洲。到了丹麦,到了那些曾打败英格兰人的部落中,到了那些英格兰人的祖先中。老丹麦。老哥本哈根。库克医生、爱斯基摩人和我如同一个四个人的部落,刚刚穿越时空隧道。我们曾到过斯巴布角的石器时代,曾在那儿身住洞穴,手持自己制作的骨制武器捕食猎物。

汉斯基号驶进哥本哈根港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曼哈顿的情形。刚经过昨夜的风雨,湛蓝的海水衬着天空。港口布满小艇,很多都插着星条旗。汽笛与喇叭声响成一片。乐队开始演奏,每声号响会带出不同的乐曲。我能听出的只有一首“看到远征的英雄归来”。

从我们到北极起,生活似乎变成了一系列的发现。在发现之前,斯巴布角、乌佩纳维克与哥本哈根似乎并不为外界所知,一切于我如此陌生。库克医生说,自我们坐火车从曼哈顿到格洛斯特算起,已经过去了27个月了。数字、月份对我都没有意义了。用数字来计量时间或者距离看上去如此荒谬,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会持续多长时间。

The Navigator of New York



第 37 章

到达了哥本哈根港，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库克医生和我穿的是七种破烂不堪的动物皮。码头上，丹麦王子跟我们握手，脱帽向我们致意。他们在船上帮我们做了清洗。前一天，我和库克医生一样，头发及肩长。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脏，好像不管多少肥皂和水都没法把我洗回正常的肤色了。可是并无人介意。

成千上万的人到了港口，想看我们一眼。没人知道怎样的赞美才合适。有些人唱丹麦国歌，有些人唱美国国歌。我们被介绍给神父，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召唤来。第一天结束时，我们的手疼得厉害，再也不能握了，为了提醒民众，我们进门出门都戴起手套。

与经历过的无边的空旷相比，哥本哈根看来如此反常与纤细。在我的眼中，哥本哈根人没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包容了他们的黑暗之中。城市如同大海，容得下每艘沉船。楼房、桥梁、马车、汽车、电灯，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310

库克医生曾尽力让我在最后一刻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但看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这次探险还是他的。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



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我们。一次,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群姑娘便围住我们献花,还和我们拥抱、亲吻。她们跟着我们的车在街上跑过,边跑边喊:“我们爱你,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刚开始我们还无法适应现在的豪华。我们在床上没法睡觉,只习惯于躺在床边的地上。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离开地板睡在床垫上面。

我们访问了博恩斯托夫城堡,与丹麦的玛丽公主和到访的希腊公主喝了茶,她们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口音。我们所作客之处的大多数人都如此。

看起来是多么奇怪,离开文明世界两年半以后,回来时却发现我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一样。爱斯基摩语也没像丹麦语一样让我觉得这么不习惯。

我觉得很奇怪,这儿的报纸看来就跟家里的一样,我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看着很熟悉,却都歪斜着,好像我受的磨难已经摧毁了我的认知系统,好像哥本哈根无所不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丹麦语会退化成英语,街道、建筑物会变成以前的形状,人们也会穿上以前穿的衣服,就像我刚开始看到他们时一样。

我茫然地跟着库克医生,还有我们的主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我们周围的人都讲英语,可周围却都是不知所云的说话声。有时,我会因为还没恢复过来的疲倦而感到头晕,几乎都站立不住。我觉得自己还跟在雪橇后面,好像刚刚从一场到北极的梦中醒来。醒来后却发现,这个世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变了样。尽管这个世界的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却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因为我们去过北极,出于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便总会被当做陌生人。

库克医生似乎从没为此烦恼过。我跟他解释这种奇怪的疏离感时,他

只是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背。

“会过去的。”他说道。我猜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早期的探险过后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与丹麦王室一同进餐。介绍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王族里有位8岁的小王子和10岁的小公主，他们也没法驱散我心中的疏离感。

他们把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放在一边，来听我们的事，好像我们的经历要比他们一天的生活更值得讲讲。这就跟童话一样超出了现实。两个纽约来的探险家，刚从北极回来，从北冰洋上回来，在这儿与丹麦的国王和王后共进晚餐。我们在空间上的行程似乎不亚于在时间上的，似乎返回了以前的世纪，那时有城堡、国王、王后、王储、皇家天文学家。看过的城堡和堡垒我几乎没有印象，只记得那些放着古董的架子，架子本身就是古董。

库克医生是探险的领队，丹麦人给了他很多荣誉。他在皇家音乐厅接受了弗雷德里克国王授予的丹麦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我站在他身旁。奖章刚挂到他脖子上，他便取下来挂到了我的脖子上，听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热烈的掌声。



第 38 章

世界上很多报纸的社论都在怀疑，库克医生到底有没有到达北极点。丹麦报纸转载了这些社论。

纽约的报纸如《先驱报》一样，有节制地表示了祝贺。英国的报纸说，看到库克医生的证据之前不会加以判断，要等到相关问题得到回答。

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很快站出来为库克医生说话，有刚从南极洲最南端回来的欧内斯特·谢克尔顿，还有阿道夫斯·华盛顿·格里利，他曾领导过那次不太光彩的“格里利探险”。

“一位绅士探险家的话本身就是足够的‘证据’。”阿蒙森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库克医生这次的话。”厄内斯特·斯维尔德鲁普向公众表示，他不会库克医生和我曾到达过北极点有半点怀疑。

可是，在所谓的“提沃利事件”之后，就只有阿蒙森一人会公开表示支持库克医生和我了。

在提沃利赌场的舞厅里为库克医生和我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金色的墙上挂着玫瑰花编成的花环，向我们表示敬意。

庆祝过程中，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大厅后面走到主桌，像传达法律文书般地递给库克医生一张纸。库克医生看了一眼，递给了我。纸上写道：“皮尔里称星条旗插到了北极，北极是他的了。”有人把纸从我手中抢去了。

库克医生的表情突然变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协调，与脖子上戴的花环不协调，与白色桌布上摆的雪利酒与香槟酒的酒杯不协调，与举杯庆贺的快乐的丹麦人也不协调。他像一块融冰制作的雕像，而另一个到达北极的故事摆在面前了。

拿那张纸的人说，皮尔里已经宣布到达北极，他说可以证明自己，而库克医生则不能。皮尔里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暗示，在宣布到达北极这件事上，库克医生不仅是犯了个错，世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库克医生两旁的丹麦人一下子心情忧郁地舒口气，似乎长久以来预测要爆发的战争最终终于打响了。

库克医生恢复了常态。他笑着,举起一杯香槟,让我很吃惊地说道,发现北极是如此一种荣耀,他并不介意与皮尔里分享。

提沃利赌场的事发生后,每天都有新消息。有人告诉我们,纽约报纸上头版上已经开始挤满了这方面的争论。

我们得知,在我们从北极返回的途中,1908年夏天,皮尔里乘坐罗斯福号离开华盛顿驶往谢立丹角。据8月中旬的报纸报道,他抵达后不久便遇到憔悴不堪、身患坏血病的鲁道夫·弗兰克。报纸上说,库克医生曾跟心怀不满与怨恨的弗兰克说过,如果他还要往北走,他要么会死,要么会“毁掉”这次探险。库克医生跟我保证,他绝没说过那样的话。

报上说,皮尔里碰到他时,弗兰克说他非常高兴能被库克医生送回去,因为他担心北极的冬天很难度过。弗兰克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库克医生时,他身体还不错,正要和斯特德先生、爱斯基摩人还有一组狗向北进发。库克医生的用意是在靠近北极的时候,让其他人都在身后,自己第一个走上前去。可库克医生并未按计划于1908年夏返回伊塔。到那年秋天,库克和皮尔里两支探险队都不知下落了。

根据《先驱报》报道,次年8月,皮尔里从北极返回途中于伊塔碰到了哈里·惠特尼。他看到惠特尼手里有些日记,是库克医生让他带回纽约交给库克夫人的。皮尔里说,如果惠特尼想把任何库克医生的东西带上船,他就会把他扔在北冰洋的岸边。据报道,在皮尔里授命下,惠特尼和皮尔里的大副罗伯特·巴勒特把库克医生的笔记埋在了伊塔,没人知道具体埋在什么地方,甚至连惠特尼和巴勒特都不知道。

“或许我不够明智,不该将如此重要的材料交给跟皮尔里有关系的人。”库克医生对丹麦媒体说道,“我真该自己照看。我步行走过格陵兰,不敢把笔记带在身上,是因为怕它们会烂掉。”

我证实了库克医生的话,告诉他们那些笔记本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惠特尼是当时唯一的希望。

“没有那些笔记,我只能靠另一次探险,一次完全按照原路进行的探险才能绝对证明我曾到达北极。”库克医生告诉记者。“几个世纪来,极地探险家都是靠言辞证明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呢?皮尔里的证据不比我多,可他的话却有人相信。即便美国人民不相信,至少媒体相信。”

皮尔里的支持者用自己的话进行回应。他们说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



证据太过简单与模糊,即使是孩子也能编出来,没法确认。

他们说,库克医生对自己如何到达北极的说法每次讲的都不同。如果他曾用过指南针和六分仪,两者也不吻合。他描述的赴北极途中经过的地方与其他探险家的描述均不相符,别人要更加详尽,更加能科学地加以解释。在他对自己到达北极点的描述中,唯一前后相符的证据是他的指南针曾指向正南90度方位。可众所周知,只要在北极地区,指南针都会指向90度正南方向。

他们说,天文学家不认同库克医生对北极点影子的描述。他没有记录,至少现在手头没有地球磁场变化的记录。如果他曾靠近过北极点,变化会显示在他的指南针上。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份记录,即使科学家不能预知这些数据的价值,也可以让未来的探险队加以确认。皮尔里曾答应要在探险过程做类似记录,却也没有做。

皮尔里的支持者认为,在仅有的库克医生公布的数据中,他没能将地球曲度计算进去,这意味着他眼里的地球成了一块平地。他们说,他的两个爱斯基摩人向导开始时曾承认跟随他去过北极,接着却否认了。他们说,在被问到是否和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一起去过北极时,两个爱斯基摩人承认,他们在极地海域行进途中,从没遇见看不到土地的时刻。

库克医生的支持者说,皮尔里同样没有记录,他的描述同样和以往的探险有所出入。至于爱斯基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拿白人寻开心,他们可以同意任何说法,肯定会前后自相矛盾。

皮尔里对于海流对冰的作用的描述,对于天气状况的描述几乎和库克医生的一模一样,库克医生虽公布在前,皮尔里却无人质疑,库克医生的每个细节却被人仔细盘问。

库克医生指出,皮尔里的探险队中,唯有一个人充分了解指南针与六分仪,他可以证明皮尔里是否到达过北极点,他却把那人送了回去。皮尔里说他把鲍勃·巴特利特船长送回的原因是,他从未参与过一次北极探险,没有分享这种荣誉的资格。据皮尔里说,马修·亨森和几个爱斯基摩人跟他一起到了北极。对于他们,因为不是白人,皮尔里把他们叫做“次等种族”,也没资格享受这种荣誉。

皮尔里的支持者也说,库克医生也把唯一一位可以证实他是否到过北极的人送了回去,他就是鲁道夫·弗兰克。

库克医生的支持者说,弗兰克是位厨师,第一次到北冰洋,并不懂得航

海知识,不能和经验丰富的探险家鲍勃·巴特利特船长相提并论。他们接着说,“库克医生并没有把他一直的助手德夫林·斯特德送回来。”皮尔里的支持者对此不屑一顾。他们不认为斯特德先生能解决纠纷,他没有航海知识,而且盲目追随库克医生,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会支持。

争论变得噩梦般复杂。我在担心,外行人怎么会相信,是库克医生领先于皮尔里到达了北极点。

“我希望我懂那些科学知识。”我说道。“如果我懂,我会尽我一生的时间用证据来争论,来保卫你,而不仅是替你的诚实发誓。你不能浪费时间了,你必须替自己辩护。把你还记得的都告诉专家,让他们为你证明。”

“没有专家能证明得了我说的话。”库克医生说道,“也没人能证明皮尔里的话。没人能理解有关于此的科学。对于此事,科学太过原始。每个领域都有其专家,专家们也不见得相互了解。就跟我对媒体讲的一样,要证明我的话,就只能沿我记忆的路线,踩着我的脚印再走一遍。谁会进行这样一次探险,只为证明别人曾在他之前来过北极?”

他摆摆手,似乎要把保护自己以免被皮尔里和他的俱乐部打败的想法挥散。我决定暂时不提此事,等我们回家前再说。

争论进行时,庆祝仍在继续。

316

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里,库克医生会见了校长托尔普教授与皇室天文学家斯姆格伦教授。对斯姆格伦教授的技术性问题,库克医生的回答让他非常满意。他们决定授予库克医生名誉学位。大会议堂里的听众也听说了库克医生所受的怀疑,听说了皮尔里认为库克是在欺诈。库克医生告诉他们,和我们一同去的两个爱斯基摩人会证实他的话,他的观察记录尽管现在不在手头,很快就会有的。

讲台上的天篷越过栏杆。库克医生站在上面,如同站在船头。

“我不再说什么,我不再说什么。”库克医生伸出双臂,“请看我的双手,请看我的双手。它们是清白的。”一阵欢呼声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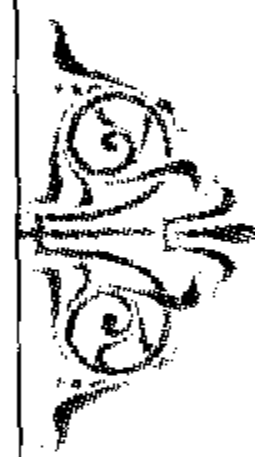
那个晚上,他接到黎塞留将军的一封电报,说:“红眼的嫉妒正在害人,库克医生,但我们相信你。”

我们听说,丹麦诗人诺尔曼·亨森博士要和新闻界的一个家伙决斗,因为那个家伙胆敢把库克医生的说法称作“一个童话故事”。

我们再一次在夏洛特恩郎德宫与丹麦王室共进了晚餐,我们坐在弗雷

德里克国王的右首。

如山般庆贺的电文堆积在我们旅馆的房间中，还有就是邀请我们去访问、进餐、去简单“出席”一下的邀请。我们不再提起皮尔里，甚至相互之间也不说。





第 39 章

照安排,我们乘坐丹麦—美国船运公司的旗舰奥斯卡二号返回家乡。送别我们的人群中有大学和各种地理学会中的官员。

我们站在围栏边,与岸上成千上万送别的人群挥手告别。我能想到的只是我们的艰苦旅程曾在哥本哈根告一段落,现在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知道,我们将向西南方行驶,横穿北大西洋到达北美。等意识到很快又看不见任何陆地时,我才又感到惊诧。

奥斯卡二号的横跨之旅并不孤独。

好像一个镇子的居民都被派到了船上,要陪伴我们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发现北极是此次行程的唯一主题。

无论是在餐厅、舞厅,还是在甲板,都有人向我们鼓掌。我有时会觉得,我们是在 10 年前发现的北极,现在我们受雇来娱乐众人,是丹麦—美国船运公司雇来的名人。

聚会为我们而举办。航程如同一个聚会一般。蜜月夫妇,退休游客,准备到纽约演讲的教授都说相信我们。我希望航程永不完结。

“我不知道怎么会总遇到这些。”一天晚上,库克医生说道。他举起胳膊,四下看看,似乎他的船舱里又挤满了庆贺的人群。

“你做了你出发时要做的事。”我说道,“这些是你应得的。”

“丹麦是个伟大的民族。”他说道,“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如果我们是丹麦人,我们的国家就决不会与我们为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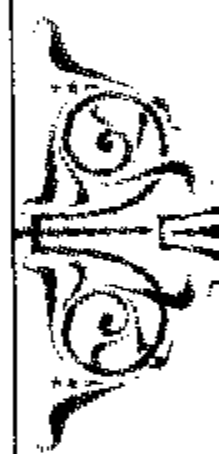
“没有人会与我们为敌。”我说道。

他轻轻地摇摇头。

“太多了。”他说道,“你不觉得吗?为两个人就有这么多的庆贺与崇拜,我受不了了。两个人的成就不该对别人有这么多意义。”

“我们打败皮尔里先到了北极。”我说道,“你曾写信告诉我,你不愿让不值得获到这个荣誉的人获胜,你做到了。”

“北极对我来说似乎隔了一层纱。”他说道。“那儿没什么东西能让我



记得,我的脑海是一片空白。我能记得的只有到达与返回时的痛苦。我觉得庆祝已经足够了。丹麦人为我庆祝得太多了。我希望我能让他们停下来就好,只想跟他们说‘够了’,让我独自度过余生就好。历史会记住我们的成就。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因为一起共同做过的事而被记住。”

“你累了。”我说道,“这几个星期你该好好休息。”

“我希望很快就有时间休息了。”他说道,“我已经不想再探险了。从现在起,我只想做个父亲,做个丈夫,做个医生。”

如果不再探险,他会做谁的父亲呢?我心里想着。从今以后,我在他生活中会是什么角色呢?

“对我来说,地球的另一极,其他大陆上没有标高的山峰,所有有待完成的壮举与发现,都没有意义了。我已经完成了终生的目标,尽管现在看来犹如鬼火一般。我想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梳理自己做过的,我还欠那些因为我不在而不得不承受的人们。受奖,出书的合同,一年,最多两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然后我们就永远回到布鲁克林。我无法想象,在离开北极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还得再花那么多时间呆在人群里。”

“德夫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岩洞里的那些日子。我们在斯巴布角的岩洞里呆了100个晚上。”

“德夫林,我很难跟你解释,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有种陌生与疏离的感觉,我觉得什么地方都不属于我,不管我去那儿,都觉得很陌生。”

“我也有同感。”我说道。

“我们经历了北极荒芜的日日夜夜。那里空旷得犹如大海一般。可那儿对于灵魂的震动,要比纽约所有的奇迹,所有的壮观美景都大得多。”

“有一天,我独自躺在岩洞里,等你和爱斯基摩人检查陷阱回来,我觉得看到了你母亲。”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道。

他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突然一下,也是第一次觉得我们没法活着回去了。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死了。我觉得我又一次背叛了她,也背叛了你。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怎么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呢,德夫林?”

“我会永远帮助你的。”我说道。

“我们没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哥本哈根也在这种变化的边缘。哥本哈根搅起的事到了纽约恐怕要沸腾起来。我们

离开纽约有多长时间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体力不支了。“28个月。”我说道，“我们是在1907年夏天离开的。”

“1907年夏天。”他说道，“现在是1909年秋天了。这么长啊。”



卷六



第40章

9月20日下午3点,奥斯卡二号在上纽约湾的火岛抛了锚。与皮尔里的北极俱乐部不同,美国北极俱乐部承认库克医生到达了北极,他们希望我们的船能在第二天早上再沿东河向上驶来,给他们准备好迎接库克医生的时间。应俱乐部要求,我们的船已在波士顿港外的沙角抛锚过了一夜。库克夫人派人送信来说,她身体不适,得到早上才能来见她丈夫。

曼哈顿的河边停满了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船舶博览会的船只。多彩灯光勾勒出每艘的轮廓。黑暗来临之后,布鲁克林的码头上却如常般寂静冷清,与白天缤纷的色彩对比鲜明。

城里同时在举办好几个庆祝活动。今年是亨利·哈得逊“发现”这条河300周年,河也因他而得名。今年也是罗伯特·富尔顿发明蒸汽船100周年纪念。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无数电灯将纽约街区照得灯火通明。有消息说,维尔布·赖特将驾驶他的新飞机从总督岛飞往自由女神像,接着再飞回去。有人预测,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涌向纽约。库克医生和我也要搭乘奥斯卡二号到达这些活动的中心。

库克医生派人叫我到他的船舱去。船上有支乐队在演奏。乘客们手拿香槟在甲板上散步。

领路的是位年纪与我相仿的丹麦人,英语流利,但有很重的丹麦口音。他用力敲了两下库克医生的舱门。

“你可以进去了,先生。”他说道,“请把门关上。”他扶扶帽子向我致意,大步走开了,似乎在奉命行事。

我推开舱门。开始,我以为房里没人。房间很大,只在舷窗边点了两盏老油灯。

我只能隐约辨识出房里豪华的摆设。六把长毛绒的椅子放在牌桌旁,右边墙角有两张沙发,木质镜框里镶着可以翻转的镜子。左首有一扇门,里面还有一间大房。我慢慢向里走去,刚要叫库克医生的名字,他先叫了我。

他坐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腿向前伸出,椅子的两条后腿着地。他的

手扶在脑后，靠在墙上。他叫我的名字，似乎我来了让他长出一口气。他的样子和反应，房子里的昏暗灯光，让我在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在探监，是在看望一个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的犯人，看守便站在门外。他慢慢让椅子倒下，松开双手，站起身舒了口气，仿佛在说尽管很高兴见到我，但仍希望不是在此地。他的脸比离开哥本哈根时瘦，轮廓、线条更加清楚。几天前他曾承认，因为担心到达纽约后的事，茶不思，饭不香。

他的姿势和表情也隐约影响了我。离开他的船舱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如同他最后又变成了我们见面前我想象中的那个男人。他的眼睛谦卑而放任，有种伟大的孤独。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手，所以对所有人能投去温柔而包容的目光。与此同时，还有种看透世事的戏谑，一种万事均无所谓，甚至连自己也不算什么的洒脱。

他站起身，手搭在我肩膀上，跟我保持一臂的距离，似乎在看离开纽约两年多后我有什么变化。我从没如此急切地想称呼他，想叫他什么。可是，尤其是现在，我不能让自己叫他库克医生。父亲，这个词在我脑子里，或在我舌尖。他可能感觉到了。他扶我转过身，手搭在我腰上，把我让到沙发上。

尽管很疲乏，在这样私下的场合，他看上去还是很冷静。或许，这就是人突然意识到奉献一生而取得了伟大成就时的感受。等你长久以来期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后面会有什么呢？再接下来呢？

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影响他的情绪，如同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一个欺骗了全世界的人。有人现在就在说，说他到达北极是在欺骗。如果人们知道我们的关系，那他的说法会变得多么令人质疑啊。

“我担心未来的几个月可能无法忍受。”他说，“除非我信任的人能站在我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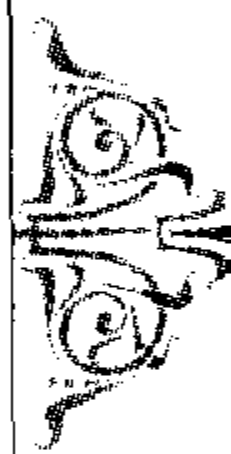
“你信任的人就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刻也不用怀疑。”

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不必担心。”我说，“船上的人说，几乎每个在纽约的人都相信你，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要比相信皮尔里的人多得多。只有那些支持皮尔里的人才会怀疑你。就算他真到了北极，他们也知道你比皮尔里要早一年。人们都知道。”

他点点头，笑了起来。“除非我错得太离谱。你怀疑我还在瞒着你什么事。”

我说没有，可他抬起了手。



“听我说，是有些事情。”

这一次，我没像上一次他告诉我时那么害怕。我是他儿子。我们一起到了北极。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了。

“德夫林，救援队刚到伊塔的时候，亨森告诉皮尔里，他神志不清时曾说过一些话，他不想让别人听到。皮尔里吩咐亨森，他恢复之前让别人离他远点儿。亨森很担心，要是得不到治疗，皮尔里会死的。”

“皮尔里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知道，我给他的身体做检查时他跟我说的一切，我都不会告诉别人。皮尔里想得到什么时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告诉你他知道你会给他。我告诉他我会保守秘密，这些年我也一直如此。”

“皮尔里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他说，‘库克医生，那能做到。我仔细想过了，我肯定那能做到。’”

“北极吗？”我问道。

库克医生点点头。“我觉得是，他觉得自己肯定能办到。所以，我得先带他妻子和女儿离开，把他留在这里。可下面几天，他却说起完全相反的话了。‘库克医生，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没办法做到。’我觉得他不怎么肯定，有些动摇。所以他只要一说‘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我便告诉他，他是对的。等他说他已经仔细考虑过，觉得肯定能做到的时候，我便说不行，还催促他赶紧和我们一起离开，救他自己的命。”

“这样持续了几天。有天下午，他看来挺清醒，其实神志不清得更厉害，我发现自己一直都错了。我误会他了。他说‘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他已经下了结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到达北极。‘北极将永远无法到达。’他说。‘我到不了，也没有人能到。’”

“等他说‘我已经仔细想过，我肯定那能做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能想出办法来欺骗别人，说他到过北极了。‘要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能够蒙混过去的。’他说。‘库克医生，他只是病了。’亨森这么跟我说。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但我肯定，皮尔里清醒的时候，肯定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过程有多长，我没法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那样去做。风险太大了。”

“可在他最后一次探险时，你觉得他都——”我说道。

“我很肯定。”库克医生说道。“就像我会记得，他也会记得在帐篷里他

跟我说的话。如果他不记得，亨森也会告诉他。我觉得，他清醒的时候，不会记得神志不清时说的话，可他会从我眼睛里看出来，看到我已经知道了。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恐惧。他害怕我，害怕他神志不清时所说的话的后果。”

“你一直很肯定他到不了北极。”我说道。“你一直不怎么在意。可你怎么能忍受呢？你知道他会趁你没有到达北极之前，便假装——”

“我觉得如果他假装自己到过北极，我会证明他是在作假。我知道他不敢作假，因为我曾亲耳听到过他曾说过的话，我会查看他的纪录，会查看他伟大壮举的证据。”

“所以，你现在要去证实。”我说道，“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你真正到达了北极。”

他笑了，难过地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没错，时机一到，我会这么做。”他说道。

“什么时候呢？”

“现在晚了。”他说。“你得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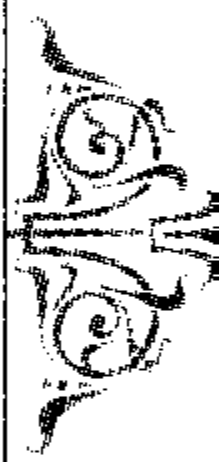
我觉得他还有话要说，可他已经没有多说的勇气了。

“欢迎仪式的组织者马上就要上来了。”他说。“我同意意见见他们。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在国人面前做从北极回来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了。有几千人在等着看我。我有些厌倦，德夫林。我害怕那些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仪式。我得有优雅的笑容，得向人们挥手致意，他们觉得我是个被迫害的圣徒。嗯，我得做这些必须做的事，我们都得做这些我们必须做的事。去睡一会儿吧。”

早上9点，水面上还有一层薄雾的时候，我们乘拖船到了伟大共和国号上，这是美国北极协会租下的一艘带侧轮的蒸气船。船两侧从头到尾插满了美国和丹麦的国旗。有的地方，两种国旗混在一处做成一面大旗，一半星条，一半红底白十字。前甲板上有幅标语，上边写着库克医生的名字，下面还有小字，清晨的薄雾中，我认不出来。

在伟大共和国号上，库克医生又见到了自己的妻儿。看到我站在她丈夫身边，库克夫人皱起了眉头，仿佛我们若不是被陌生人围着，她便会上前指责我一番。

纽约来了数百名付了钱的乘客，想抢先看看我们。乐队奏响《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他们从甲板下走了上来，伟大共和国号的汽笛声响彻整条



河流。

几个人把库克医生抬起来架到肩上，在甲板上巡游。他觉得他们太过热情，他们却认为他太过谦逊，人群更激动了。

伟大共和国号的四周围满气船，上面站着很多报社记者，都在忙着写。这一幕看来真滑稽，记者围着船，如同上下起伏的哨兵。有些船上的人拿着照相机，他们一齐照起相来，样子仿佛是得到命令开火一般。

一位年轻姑娘开始向库克医生献辞，她手持白色香水月季编制的花环，却没人在听。她赶忙追过去，那些男人还把库克医生抬在肩上，她也把花环戴在了他脖子上。

库克医生被抬到了顶甲板，他喊起我的名字。我赶快上去，身前是库克夫人和她的两个小姑娘。

“欢迎，库克医生！”一位戴顶高帽子的男人说道，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他大声介绍自己，说他是布鲁克林区的区长。他私下告诉库克医生，纽约市市长已经婉言拒绝了要求他任欢迎委员会主任的邀请。

这时，船只都在鸣笛。人们听不到下一位发言人，也是美国北极俱乐部主席施莱将军的话，也听不到库克医生的答谢辞，只能听到他开始时说“丹麦人向其他各国保证，我们已经征服了北极”。

伟大共和国号驶过布鲁克林桥，数以千计的人们从桥上向我们抛撒五彩纸屑，桥上所有交通均停了，马车、汽车、火车都一样。司机和乘客张大嘴向下看着这艘满载乘客的彩船。

库克医生挥着手，送着飞吻。

我们顺东河而上，过曼哈顿桥，到达还没竣工的威廉斯堡，那儿的工人吊着钢丝冲我们挥手叫喊。我抬头看去，那建筑仿佛是艘大船，因为体积过于庞大，得在空中建造。

伟大共和国号在河上转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威廉斯堡南第四大街的船坞边。旁边糖厂的阴影下，库克医生曾度过他的童年。

河边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欢呼与尖叫声响成了一片。伟大共和国号曾在他们身旁驶过数次，并未停下。港口里准备参加海军巡行的战舰也鸣起了汽笛。很快，糖厂也鸣起了笛声。人们从糖厂窗户里伸出头，挥舞着双手。

我们下了舷梯。库克医生把海伦放在肩上，一边一个牵着玛丽和鲁思。我紧跟在他们身后，如同一位关系不明却无法或缺的亲戚。

约 100 名警察在周围拉起警戒线，护卫我们上了敞篷汽车。我坐在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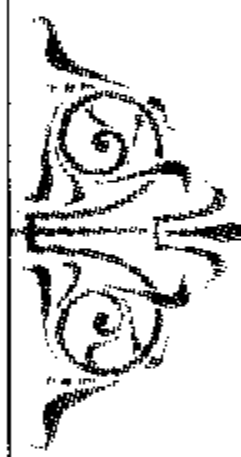
机旁,库克家人坐在后面。库克医生坐在后排中间,海伦坐在他腿上。

200多辆汽车在我们后面,紧跟的是辆大型平板卡车,上有乐队演奏,其他车上的司机也按起喇叭来。轮船的汽笛声,糖厂的厂笛声,汽车高高低低的喇叭声,乐队的奏乐声,还有人群的欢呼声混在一处,打破清晨的静谧,让人什么都听不到。我回头看看,库克夫人和孩子们都闭着眼睛,手捂着耳朵。库克医生站在后面,挥舞双手,比我期待中的更热情。

五英里长的巡游路线上,据说共有10万人参加了庆祝。人太多,庆祝的队伍太长,有轨电车无法前行。库克医生依然戴着花环,像乐队指挥般鞠躬致意,挥舞着礼帽。人群笑了起来,好像他们知道他本来就会有如此滑稽的动作。

贝德福德大街的每栋房子都挂着美国国旗。我们过了牛奶仓库,库克医生和他兄弟上学时就曾在此工作,共渡难关。牛奶仓库的屋顶有只巨大的白色牛奶桶,上面刷着公司的名字:库克兄弟。路边停满了一辆辆拉牛奶的车。

在默特尔大道和威洛比街交汇处,离布希威克街670号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座巨大的凯旋门,是帆布与木材搭建的,如铁路桥一般横跨两街,比高架铁道的桥拱还高,上面缀满月桂枝和花环。还有一个巨大的地球模型,北极上插着美国国旗。凯旋门装扮得很艳丽,上面画着北极景色,还有仿制的冰柱,像是孩子眼中的北极。阳光下的彩灯看不出在闪烁。凯旋门中央挂有一幅巨大的浮雕,是库克医生的画像,上面还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你”。每个字都有6英尺高。我们从下面经过的时候,放飞起了一群白鸽。



第 41 章

我在曼哈顿散步。库克医生去波士顿演讲。我决定不和他一起去。那次游行之后,我觉得该休息一下,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另外,我也可以跟克里丝丁有机会相处。在中央公园又见面的时候,我们分开几乎 30 个月了。我们拥抱亲吻,全然不顾周遭陌生人异样的目光。“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说。她给我看了那封写着“我爱你”的信。“我每天都看,我希望能给你写回信,告诉你我也爱你。”她说道。我告诉她,不管她母亲如何看待库克医生,我都会很快去见她。

到处都有报童叫卖报纸,头版总是库克医生或皮尔里的照片,总是两人的并排放在一处,仿佛他们因某种没有解开的阴谋而联系在了一起。我自己的照片也在报上,尽管常不在头版,我还是经常被陌生人认出来,他们叫我斯特德先生,告诉我他们想看我和库克医生。

我心里没什么目标或终点。沿着百老汇大街,我走到联合广场,坐在凳子上休息。马拉车和汽车一起在街上源源不断地驶过。

凳子上坐了没一分钟,便听到旁边坐着的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过头,那人给我的感觉像是曾经光景不错,可今后却没什么发展了。他摘下小圆礼帽,想让我看看他的满头银发,似乎要说他不是个怪人。他自我介绍说:“乔治·邓克,卖保险的。”

他告诉我,罗尔德·阿蒙森的老友,挪威船长奥古斯特·鲁乌斯在访问纽约期间正好住在他家。邓克先生说,他和鲁乌斯船长都相信,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说法“不仅真实,而且有办法可以证明”。邓克先生说,库克医生的说法只是没有充分地用“航海术语”表达出来,这一点鲁乌斯船长恰好可以帮上忙。邓克说,他原打算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去见鲁乌斯船长,却在公园长凳上看到了我。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他家里坐坐?

我有些怀疑,可又觉得至少该见见这位朋友的朋友鲁乌斯船长。我跟他上了车,到了格若莫西公园。邓克把我带到前厅,说他马上带鲁乌斯船长过来。他关上前厅的门走了。我环顾四周,觉得这座雅致的住宅不可能



属于邓克先生。

门开了。站在那儿的不是奥古斯特·鲁乌斯船长,而是罗伯特·皮尔里指挥官。邓克先生没有再出现。

“我被骗到这儿了。”我说道。“我得马上离开。”

“我只占用你几分钟时间。”皮尔里说道。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据财产登记看,是赫伯特·布里奇曼的房子。”皮尔里答道。我以前总在布里奇曼的办公室见他,从未到过这里。

从衣着看,皮尔里也是客人,他身穿套头衫和羊毛裤子。在船舱里,或是在家休养不愿有客打扰时,他也会穿成这样。尽管刚从极地探险中归来,他看上去更像我上次在华盛顿见到他的样子,而不是伊塔时的那副模样。他精力充沛,和我上次看见他的样子差不多,没胖也没瘦。

他拖着脚步走过来,如同在伊塔的海滩与华盛顿的讲台上一样。看他费那么大力气才弯下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我忍不住想去帮他。他一边向后挪,一边喘气,最后才一下子坐了上去。有一刻,椅子翘起两条前腿,微微向后倒了一下。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渴望,甚至有种凄凉,仿佛刚听说了什么令他非常失望的事。我很快意识到,这会是他永远的表情了,倒不全是因为失望,更像是一个人知道除了探险将不再会有自己的生活,更像是他曾为探险牺牲一切,尽管可能成功,却也无法享受由此而来的利益或满足了。他已退守到自己孤独的执著中,其他事情都已放弃。他可以一个人站在极地海域的冰面上,眼睛看着冰原,下定决心不再回家。

“斯特德先生,你救过我的命。”皮尔里说。很简单的一句话,一句对事实的确认,一种承认。我想这就是他所能表达的感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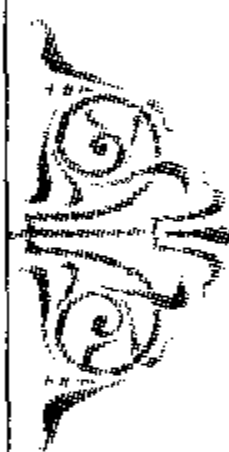
“现在想救你自己还不晚。”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被库克医生骗了。”他说道,“到现在,你的错也只是太容易上当而已。但情况会变的。”

“我没有被骗。”我说,“我曾跟库克医生到过北极,我不会怀疑这个。”

现在,你连走过这间屋子都几乎办不到,去探险之前你也几乎办不到,你竟敢向全世界说你到了北极。我克制住自己,没讲这番话。争论他说话是否诚实没有意义,只能是重复他的批评者针对他的上百遍的责难。



皮尔里好像知道我们终归会有这样一次会面。突然，他笑起来，我开始觉得他笑的样子似曾见过。而后我想起，库克医生曾跟我描述过，他的笑里没有快乐，但也没有轻蔑与恶意。他张开嘴，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又闭上嘴，后牙喀哒作响，仿佛什么机械装置被安放到了位置上。

“不该由我来证明库克医生的事，特别是在这种场合。”我说道。

“我知道你母亲，斯特德先生。”他说道。

“我知道。”我说。

“我曾见过她一次。在曼哈顿一次医生聚会上，她也见到了库克医生，我们大家就是在那儿见到的。”

他顿了顿，似乎要看看他的话对我起了什么效果。

“我知道你知道，库克医生是你父亲。但库克医生还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跟库克说，如果他不告诉你，我会告诉你的。”

“你只是想让我怀疑他。”我说，“我不会跟他说任何事的。”

“那可不一定。他没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你，他都几乎说服自己了，可我也不会多说了。去面对他，面对你父亲吧，他会告诉你的。我不会讲述他的故事，我自己的部分不值一提。他肯定会歪曲事实，就让他那么做吧。我倒宁愿你从他嘴里听到那些肮脏的故事。去面对他，跟他说我告诉你的话。如果你对他的答复不满意，来找我。或许等你知道真相以后，你会变得绅士一些，你会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你会知道你和他的那些荣誉原本是属于我的。”

我没法去想，也说不出话来。

“库克会跟你说的。”皮尔里说道，“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再见面了。”

他微微在椅子上挪了挪。我想他是要伸出手来和我握。我不知道如果他要和我握手，我到底该不该和他握。再一次握他的手会多么奇怪啊。他的眼睛不再是蓝色，而是黑色，闪烁出的光如同井底的水。他眼里涌出的两行泪水流到了脸上。

“我不会再让别人把它拿走了。”他喊道，表情还没有变。“我不会和库克那样的杂种分享。我不会让他们怀疑我，不能怀疑。只要有人怀疑，它就被毁了。人们记住我是因为我做过这件事，不能是因为我可能做过。不能有争议。必须把它解决，彻底解决，不然库克也会被人记住。”

过了一阵子我才意识到，他这样的长篇大论不再是对我说了。他没看着我，他在看着门旁的什么人。



我转过身,看到乔·皮尔里。皮尔里停止喊叫,也不用手捶椅子扶手了。

自华盛顿以后,我便没见过皮尔里夫人。我觉得她跟皮尔里一样,身上都有了些变化。从她眼里似乎能看出,探险过后便没有生活了。我想她肯定很早也就想过,得等他在年轻时达到目标或是放弃目标之后,他们的生活才会开始。他把生命中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前往北极的途中,现在他得花时间证明自己曾做到。

皮尔里夫人看着我。

“或许你该离开了,斯特德先生。”她冲我微微笑着,告别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不善与恶意。毫无疑问,她和她丈夫都知道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她听起来,看上去都很超然。我想她要为他 and 他们的余生保留出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不会再让他全部控制她,她的幸福不会完全维系在他身上。她的目标不再是让他幸福,因为那样办不到。她会在他身旁,支持他,同情他,而她的内心却会与他保持距离。



第 42 章

你被欺骗了，我们都被欺骗了。有些库克医生的事你并不知道。跟库克医生说，如果他不告诉你，我会的。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些不过是濒临崩溃的人听说的疯话。返回布鲁克林的高架桥上，它们却不断出现在我脑海里。皮尔里说的话让我无法摆脱，他只跟我讲这些话，我便去和库克医生重复。

库克医生从波士顿回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他坐在“达科他”的客厅里，盯着炉火。跟在哥本哈根时一样，他在波士顿也与无数的人握手，现在他的右手肿了起来，不得已得用绷带绑着吊起来。他坐在那儿，绑绷带的手从吊腕带抽出来，掌心向上，搁在沙发扶手上休息。

回来以后，他已经精疲力竭，我没指望他能来客厅。我留心听着他的动静，听到地板传来的咯吱声，我还以为是幻觉。我起身到过道看了一眼，发现客厅的门开着。

我看见他倒在沙发里，眼睛闭着，憔悴得跟刚从北极回来时一样。听到我进来，他睁开眼，让我把两边的门都关上。我关了门，也坐在沙发上。

“有人跟我说，公众支持我和支持皮尔里比例是 35 比 1。”他说道。

“那太好了。”我答道。

他耸耸肩。“我领先是因为我首先宣布，而且我比皮尔里早返回纽约。我是第一个接受祝贺的，起码这些无法改变。现在看来，不会有为皮尔里而举行的游行了，纽约肯定不会再有。否则那样会很荒唐——”

“我见过皮尔里了。”我等不下去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问道。

“我得说是他设计把我骗去的。”我告诉他在联合广场碰到邓克的事。“皮尔里说他知道你是我父亲。他看到我并没惊讶，又跟我说你有些事我还不知道。他说如果你不告诉我，他会告诉我的。”

库克医生如同痉挛般突然坐起来。他站起身，左手抓着脖子后面，绑绷带的右手垂在那儿，似乎忘了那只手受了伤。

“我曾以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说道。

“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已经绝望了，德夫林……哦，上帝，我曾以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什么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记得几天前的晚上，你曾说过没人会转过身来与我为敌吗？”

我点点头。

“你错了。”他说。“许多人会这样做，许多和我很亲近的人都会这么做。你曾许下诺言，可就连你也可能与我为敌。”

“我不会，永远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发生什么吗？”

“是的，可是……”

“我得告诉你所有的事了。这一次，是所有的事。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秘密。这会多么轻松，德夫林，如果你愿意听我讲完。等你听完所有的事，你会理解的。”

他的话听起来却没什么信心，我感到害怕，比我们去北极途中的种种时刻更感到害怕。库克医生有些事你不知道。我觉得时光回到了从前，他要告诉我他曾欺骗我，他要告诉我他并不是我父亲。

“等我告诉你皮尔里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得跟你说点别的。有些事是我错了，皮尔里是对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道。

“我碰到布拉德利，和他去狩猎之前我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是碰到布拉德利后才下的决心。”

“下什么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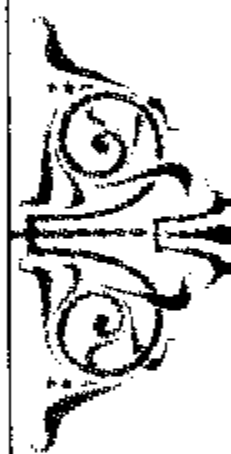
“我们从没到那儿，德夫林。我们从没抵达北极。”

“什么——”

他向我伸过手，我躲开他。他又站起身。

“我下了决心，用皮尔里的话说，我是个知道他如何行事的人。记得在伊塔帐篷里的事吗？‘要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能够蒙混过去的。’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我跟你在一起啊。”我说。“我们都跟你在一起啊。我们四个人，我们是一起去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做了从没有人做过的事。你问过



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说不要。我了解你，你不会做皮尔里那样的事。”

“德夫林，是皮尔里做了我做的事。麦金利山就是个样品。你知道吗，德夫林，我从没到过麦金利山顶峰。我做了假。即使被人发现，也只是个诚实的错误，人们会觉得我真认为自己的确到了顶峰，并不是要故意欺骗，可没人发现，人们接受了我宣布登上麦金利山的事。从那时起，我就在想皮尔里说的话，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后。我想先想好，到底能不能办到，就在这间客厅，我一夜一夜地想。要是后来我们能早点回归文明社会就好了。”

“你用三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就是为了一个你设计好的谎言吗？”我站起身，忍不住要哭起来。我转过身，背对着他。

“我不想用任何人的生命冒险。在我的计划中，没什么大的风险，但洋流情况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很多探险家都做过相同的洋流记录。不太可能他们会犯同样的错，可他们却都犯了。”

“你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我问道，“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要是全部听完，便会理解的。你能否等到最后再来评判我？”

我说不出口。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这些事仅仅是因为我想做。如果还有别的路，我不会选择这一条。我不能让皮尔里那样的人获胜。”

“过去的几周是怎样的一种折磨，我没法让你明白。每次有什么荣誉授给我，每次有人拥抱我，每次有人和我握手，每次有人告诉我他相信我，我所犯下的错便又加剧几分。为何我要背叛这么多人对我的信任，我想把真实目的告诉大家，可这样也不能让我好过一点。最糟的还在后面。有些开始支持我的人已经开始反对我，皮尔里身后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势，他们会不择手段地诋毁我。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争议存在便足够了。皮尔里如果没碰见我，也会碰到像我这样的人，人们会尽其所能证明他没有到达过北极。”

他神情激动，样子和声调如同身旁没有别人。他曾在这间房里这样做过，那时我躺在大厅对面自己的房间。我只能努力去想他疯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因为太过劳累。

“皮尔里说过他必须拥有这些荣誉。好吧，我也要做我必须做的事，那样才会觉得幸福。另一个原因是皮尔里不能得到这些荣誉。为什么我必须这样做，你也不能完全理解。这倒不全是因为皮尔里把我的事告诉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道，还在哭着。“你没必要这样做。你不是那种人。你善良，诚实，大家喜欢你，欣赏你。你是医生，人们生病时需要你的帮助。每个知道你的人，每个真正了解你的人都会发誓捍卫你。你对待爱斯基摩病人就像你对待布鲁克林的病人一样。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都讲不完。我不理解，我不相信。你说的不是真的。”

“德夫林，听我说。我觉得我背叛了你，就像我背叛了你母亲一样，并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回复你母亲最后的话，可我没有背叛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母亲。”

库克医生在我面前蹲下身来，好像我是一个孩子，他想告诉我一切事情，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能理解。

“那天下午，弗朗西斯·斯特德跟皮尔里说了他的事，也跟我说了，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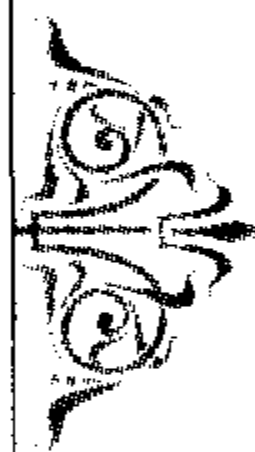
皮尔里叫库克医生跟他一同出去，去找一块爱斯基摩人告诉他的“星星石”。他们穿着雪地鞋，从红石屋出来。他们默默走了几英里，一直从麦考密克湾海湾走了上去。

突然，皮尔里停下脚步，眼望冰原。

“斯特德跟你说过了？”他问道。

“是的。”库克医生说道。

“回纽约后，他会跟每个人说他为什么杀了他妻子。”皮尔里说道。“你我都会被她毁了。没人会资助我们。我一点儿都没夸张。莫里斯·杰瑟普是我最主要的赞助人，他也是社会栋梁。他是纽约市行旅传教团的成员，美国星期日学校联盟副主席，反对罪恶与色情十字军的主要成员。你能想象，要是斯特德把他跟我们说的事告诉当局，这个人会怎么想我们吗？斯特德让我相信，他能证明自己就是杀人犯。他能告诉警方她死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用什么样的假名上的船，住的旅馆，这些都可以证实，别人是办不到的。另外还有些信件。我住在费城时斯特德和我有时通信。要是人们知道他杀害他妻子的事，再去看这些信，看这些话，‘除非你找到她，让她告诉你真相，你不会有一分钟的平静。’我有一次这么写信告诉他。他是个有趣的傻子，我从没想过他会去做什么。另外，我很小心，没在信里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比如说，提到你的时候，我只说‘那位医生’或‘那男孩的父



亲’。我看完他的信后便都毁了。可斯特德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信都复写了一遍，他的信里有你和其他人的名字。因为我的信都是对他的回复，放在一起看，会让我有危险。”

“你说起话来，好像她的死只不过给你带来些不方便。”库克医生说道。

“我又不像你那么了解那位女士。”皮尔里说。“我并没做错什么，只不过看错了斯特德。”

库克医生走到一边。

“你难道不关心那孩子的安全吗？”皮尔里喊起来。库克医生走了回来。

“斯特德说要对那孩子怎么样？”

“他说他要去看看那孩子。”皮尔里说，“他还说了些别的打算。”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

在红石屋里，晚餐后探险队成员惯常地喝起了白兰地，抽起了雪茄。

那晚，如常一样，弗朗西斯·斯特德睡在库克医生身旁。看起来似乎他们并没有早上的那段交谈。

半夜时分，库克医生从时断时续的梦中醒来，看到斯特德的睡袋是空的。他觉得斯特德肯定会在他身后。他翻过身，双臂交叉在面前，觉得自己应该看到一把步枪的枪口，或是高高举起的一把斧头。他都要喊救命了，但身后却没人。屋子里只有其他人的呼吸声，他们看来睡得都很香。

他往另一间“屋”里望去，看到皮尔里抱着煤油炉，衣着整齐地站在帘子一边。他的脸和身躯被炉里冒出的微弱火焰照亮了。他开口想说话，皮尔里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皮尔里没有进去，也没拉帘子。他看看斯特德的空睡袋，又看看库克医生，几乎无法察觉地点点头。然后他看看旁边，从帘子那儿走了出去。

库克医生轻轻爬起来穿上衣服，从墙上把大衣取下来。门没上闩。他正要开门，听到帘子那儿传来一阵沙沙声。

库克医生拿起一盏灯，轻轻开了门。夜色平静，没有寒风吹进来。库克医生点上灯，发现外面在下大雪。雪花直直飘落下来。他关上门。跟斯特德出来时一样，狗都站起身来，看到他并不是出来喂它们，又都躺了下来。

看不到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脚印。转身向后看，他自己的脚印也很快被雪花填满了。这样也不错，他想。雪会把一切都遮起来。

他向岩石处走去，很快便看到了斯特德。他远远坐在“石凳”上，身旁也有一个灯笼。



库克医生马上熄灭了自己的灯笼。

他离斯特德还很远，看不到灯光下雪花飘落的样子，能看到的只是斯特德的身影照在一片朦胧的灯光中。

他向他走去。夜色漆黑，他只能听到，感到雪花在落下。虽然帽子有边，雪还是会轻轻飘在脸上，接着便化掉。雪很凉，他觉得前额有些疼。水顺着脸颊流到嘴边，流到胡子上，结成了冰。

很快，库克医生可以看得更清楚。斯特德坐在石凳上，双手抱膝。只能看到他头上的光晕，好像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一般，好像雪花只飘落到这一堆岩石之上。

夜色黑暗，四周寂静无声，很难相信红石屋就在不远处，更别提还有乡镇与城市了。

离弗朗西斯·斯特德50英尺时，他停了下来。视线的正前方，斯特德可能一动不动坐了很久，身上的雪已有几英寸厚。雪落在皮衣上，让他看起来大了一圈，也模糊了他的脸，像一只体格健壮的白毛猩猩正蹲在岩石上。

他绕过去，慢慢接近他，站在了他身后。

他想起下午和皮尔里的最后一段话。

“我想让库克杀了我。”斯特德曾和皮尔里这样说过。他还对皮尔里说这件事该如何去做，还有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像杀他母亲一样杀了他。”斯特德说，“等我回到纽约，我也会毁了你们两个。”

除了他自己、库克医生和皮尔里，斯特德在所有晚餐后的酒里都下了鸦片酊。库克医生该在斯特德出去时保持清醒，他却睡着了。皮尔里得把他叫醒。

现在，他在斯特德身后，近得可以闻到他的烟味。除了吐出蓝色的烟，他还会很快吐出白色的霜气。尽管一直坐着，他还是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肩膀和胸部剧烈抖动。

库克医生离斯特德很近，可以用手触到他，斯特德把雪茄拿起又放下，手在颤抖烟头闪闪发光。他微微叹口气。

库克医生想，他知道我在这儿，就站在他身后，他知道快发生什么了。

雪下得很大，地面上有种筛面粉似的沙沙声，仿佛雪花一落到地面上就会立刻融化掉。美丽与宁静的一个夜晚，如此的夜晚在这种纬度并不常见。

库克医生有点怀疑，除了乙醚是斯特德的主意外，他会不会自己来做



这些。乙醚是用来保存动物皮革的，防止拿回去之前坏掉。他口袋里有两小瓶。

他拿出一瓶，倒在一块布上，自己躲开冒出的气体。斯特德突然动了一下，似乎要转过身来，可接着又面朝前坐着。他呼吸急促起来。

“一口气做完，看在上帝份上，一口气做完。”他心里说道。

库克医生等他放下雪茄，因为担心烟会引燃乙醚。他把雪茄放在膝盖上时，库克医生一手放在他头后面，一手捂住了他的嘴。斯特德一下子倒了下去，从岩石上瘫软了下去，那块布还在他嘴上。

他点燃灯笼，走到离最近的冰山裂缝一半的地方放下了灯，然后回到岩石旁。他把斯特德向裂缝处拖去，他的靴子在雪地上拖出两条印痕。

按着岩石那儿灯笼的指引，他走到另一个灯笼处。到这以后，他把它当做指路标志，拖起斯特德接着往前走。等觉得脚下出现下坡的时候，他停下来，把斯特德脸向上平放在雪地上。他把匕首插在冰里做牵引，左手抓匕首，右手紧抓他的前胸推着他。

觉得前方的冰有明显突起时，他停下来。他把两瓶乙醚和那块布装到他的鞋子里。他几乎看不出斯特德的样子，他的脸上和身上全是雪。

他慢慢把斯特德向前推了几英尺，他的尸体开始慢慢滑下去。他不能再往前了。他希望这条裂缝不会太浅。很快，尸体就翻滚了下去。

斯特德既没说话，也没尖叫。库克医生听到一串闷响。听上去这像是个无底的裂缝，声音响过很长时间之后才平息下来。

他依然用匕首慢慢爬上来。他先看着远处的灯笼，然后是远处岩石上的另一只。很快，他可以安全地站起身了。

他向灯笼走去。他的身体在颤抖，牙齿也打着战，好像突然从温暖进入寒冷中一样。就是为了那个孩子吗？他问自己。

他拿起自己的灯笼，吹灭了它。在岩石那儿，他点燃自己的灯笼，吹灭了斯特德的灯。他的雪茄还丢在雪里。他用脚把它挑出来。岩石和周围地上还有乙醚味。他知道，雪下得这么大，到白天什么都不会有了。

他把雪茄烟头装在自己兜里，穿过大雪覆盖的岩石向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走去。他叫醒几个爱斯基摩人，他们说从下午起就没见过斯特德医生了。他回到小屋，告诉大家斯特德不见了。

其他人都已起来，正在吃早饭。他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斯特德医生。

“你没有找到他吗？”皮尔里问道。



他摇摇头。“你派我出去后，我一直在找他。我不知道那是几点钟，4点15左右吧。”

“好像是4点45了。”皮尔里答道。“这个傻瓜能跑到哪里去呢？”

4点45。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前。时间不够做库克医生做过的事。这个时间不会让人怀疑，他怎么用这么长时间才回到屋子里。

“看来他好像失踪了。”库克医生说道。皮尔里对此很生气，他跟他们强调说，除非有他的命令，他们不可以独自到小屋外去冒险。别人劝他，说斯特德会回来的，皮尔里大发雷霆，吼叫起来。

斯特德的计划不错。他没让皮尔里和库克医生两个人都跟他出去。要是那样，万一有人从鸦片酊的作用下醒来，发现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也许会出来找他们几个。

“这些是我找到的，在岩石那儿，有他的灯和——”他伸手在兜里掏了掏。“还有这个。”他给他们看了雪茄烟头。“我找到的时候已经凉了。他肯定是几个小时前便离开那儿了。”他说。

找寻持续了三天，一无所获。爱斯基摩人证实了皮尔里说的话，证实了库克医生出门寻找的时间。

在小屋里，库克医生找到了弗朗西斯·斯特德装笔记本的帆布袋，但里面是空的。他不知道斯特德都写了些什么。他祈祷能让他和皮尔里先找到那些本子，却没找到。或许皮尔里已经把它们毁了，或许是斯特德自己毁的。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说话。”返航途中，皮尔里把库克医生叫到自己的船舱，跟他说：“从今往后，我们最好彼此保持距离。”

库克医生觉得，皮尔里认为是他做了坏事，玷污了自己，他却没有。这种情况下，皮尔里想要故作清高起来。

“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忍受，自己竟和这样一个人是同谋。弗朗西斯这件事上，我们曾经是，以后也是同谋。我们一起参与了无法见人的谋杀。对于皮尔里，他的梦中又会有怎样的记忆呢？”

“在伊塔帐篷里的下午，亨森不在身边时，我们会谈起她。还有你和弗朗西斯·斯特德。他说我杀斯特德的原因和他希望斯特德死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保住自己的名誉，保住自己的前程。‘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杀他甚至都不是为了报仇。’皮尔里说道。‘你一点都不在乎他杀的那个女人。’



如果你在乎，你那时就不会离开她。至于那个孩子，你甚至都不认识他。杀斯特德的时候，你都没看到过他。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不停地说‘我们杀他的时候’，皮尔里却不断摇头。他甚至都已经让自己相信，他跟这件事无关。他还没碰斯特德，他就死了，是他的运气好。”

“皮尔里让你来找我是希望，等你听到这一切以后，你会转过身与我为敌，背弃我，甚至会说我们从没到过北极。看上去他好像赢了。他把我们分开了。我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

“不是的。”我答道，“你是为我才做这些的。”

“我要是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就好了。德夫林，我很早以前便背弃了自己。我编造了谎言，却不会因此失去什么。你却不一样。如果还跟我在一起，你会失去一切。我不会让你毁掉的，不管是被你自己还是你的敌人。”

他捂住脸，摇摇头。

“我从没想过，我第一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没法去想我竟然要失去你。我的确要失去你了。”

“你从没失去我。”我说，“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父亲，永远不会变。”

泪水从他脸上滚落下来。他拥抱了我。

我觉得自己一阵疲惫，而这种感觉会永远陪伴着我。“我得走了。”我说。我还没站起身，他已慢慢地走出了客厅。

这种感觉真奇怪。事隔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人救过，更奇怪的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境况了。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我也从没见过我的人会为我而互相算计。

在距我遥远的地方，在我不会怀疑斯特德是我父亲，不会怀疑我母亲是死于自杀的时候，有个我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的人救了我的命。那人竟是我父亲。



第 43 章

库克医生又离开家几天了。我没敢看报纸,我知道上面都会是北极的争论,库克和皮尔里两个人会彼此指摘。我每天都起得很晚,到“达科他”后会告诉仆人不要让人打扰我。我想好好想想,可办不到。我想看看书,却发现自己总在句子的一半处停顿下来。

收到克里丝丁母亲的邀请时,我觉得是种解脱。她请我去她的公寓。她说不会有别的客人。她在守寡,克里丝丁去费城看亲戚。她说如果不方便,我也可以换个时间。

她们母女二人住在一所公寓里,是萨姆尼先生去世后不久买下的,可以看出来生活得不错。有电梯直达房间入口大厅,脚下黑色菱形大理石的地板上,铺着一张东方格调的地毯。大厅悬挂一盏巨大的银色电灯,厅里一片光明。起居室和客厅的墙壁包有橡木墙围。整个环境看来简洁而高雅。墙上没有贴金,没有华丽的希腊罗马雕塑复制品。大多数画作和像片都来自纽约,有未完工的布鲁克林桥,工人们叉开腿坐在建筑钢梁上。有幅曼哈顿的画,像是 1650 年的景色。都是新世界的造物。

“克里丝丁常说起你。”她说,“她遇到你以后,别的邀请都不愿意接受了。她说她不太喜欢她遇见的那些年轻人。我倒没觉得奇怪,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知道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也差不多。我已故的丈夫便是世家子弟,钱都花完可名声仍在。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大愿意出去,人们会觉得我蛮实在。自从克里丝丁遇到你以后,她却变成了社交场上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没出现在那些讨厌的聚会上,她便有些魂不守舍。你不在的时候,她很不开心。”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我很想念她。”我说。

很明显,克里丝丁是从她这儿继承了讨人喜欢的直率风格。她不忸怩作态,也不去想自己会在他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我没法想象,寡居的她有时竟会陷入郁郁的思索中。

“见到您很开心,萨姆尼夫人。”我说。



“我想让你叫我莉莉。”她说。

她的年纪会和我母亲一样大了。

我感到轻松。我甚至都没想过她是萨姆尼夫人。我常想起她，听库克医生把她叫做莉莉。她看着我的脸，眼里闪着光。

“你的眼睛跟你母亲的一样。”她说，“你眼里的温柔跟她的一样，没错的。”

“谢谢你。”我答道。

我也看着她的眼睛，好像想知道她知道多少我和库克医生的事。她微笑起来，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和你母亲还在上学时便互相写信了。”她说。“我告诉她曼哈顿的事，她告诉我圣约翰斯的事。”我在想我母亲第一次到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终于可以看到一直以来的笔友了。

“德夫林，我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你父亲。”她说，“我也相信你知道你母亲和库克医生的事。我想他应该告诉过你了。”

我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她说，“我也想不出你到纽约会有什么其他理由。你不仅仅是他儿子，你也是阿米莉亚留给库克医生的所有了。”

“是的，他也常常这么跟我说。”

“那时候，我真不该带她去那么多的聚会。她来曼哈顿以前都没喝过酒，但她总在我身边，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我常常想，我那时应再仔细一点，把她照顾得再好一点。她被纽约搞昏头了。”

“你没有任何责任。”我说。

“回圣约翰斯以后，你母亲常给我写信。”她说。“跟她来这儿前一样。我们见面之前，这种通信友情便保持了多年。我喜欢她的信。她跟我说她也喜欢我的。我们见面时都已相当熟悉，已经是最好的朋友。”

“你不太喜欢库克医生，是吗？”我问道。

“我喜欢你母亲。”莉莉说。“我知道他对她做了那种事，我还怎么能喜欢他？我曾喜欢他，可能就因为阿米莉亚爱他的缘故。我也说不清。”

“他那时还是个孩子。”我说。“现在不一样了。他后悔没回复我母亲给他的信。他说那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

我看到莉莉脸上充满感情，开始我以为是气愤。她的眼里满是泪水，若不是在笑，可能早已流下来了。

“他们是那么相爱。”她说。“或许就为了这个，我无法原谅他。我从没



见过那样的爱。跟他们在一起时那么奇怪,又那么美好。好像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需要我来翻译。有时,他们几个小时都不说话,也不和我说话。而我总在说,说我们在公园看到的人,说我的父母,说纽约的变化有多大,都是些闲话。好像我都在说暗语一样。跟她说他觉得怎样,跟他说她觉得怎样,帮他们掩饰,帮他们计划。他总是轻声细语。你母亲跟库克医生在一起时,可能因为负罪感吧,她也很害羞。我们常常说起她的未婚夫。至于我……他们说我很活泼,可能就是话匣子的礼貌说法吧。

“每天活动结束的时候,我都特别累,精疲力竭的。他一离开我们,她就想跟我说话。说他,说弗朗西斯·斯特德。要是库克医生求婚,她该不该和他解除婚约?问我他觉得他会不会求婚?我只能听着。这样持续了三星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经常不去工作。他说他在卖牛奶,送报纸,在公司里上班,好像是房地产一类的。好像他同时在做好几个工作。可他还还会为她,为我们挤出时间。要是他们每天能有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你母亲走的时候,他们便会觉得彼此间已经有了某种承诺,没有……没有必要需要什么物质保证。”

物质保证。对我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她做了个手势。看到我的反应,她退缩了一下。

“我的意思不是想后悔。”她说,“我感肯定,你想到事你母亲都没想过。”

“我母亲的信是什么样子的?”我问道,“那些她结婚后写给你的信,我出生以后写的。”

“信里面都在写你。”她说。“她很少提到弗朗西斯。她告诉我弗朗西斯找到理由可以不住在家里,但还和你母亲保持婚姻关系,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就算她来纽约之前,她也不太提起他。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可以看出,她并不爱他。但这也不奇怪。女人常常会嫁给她们不爱的男人,反之亦然,尽管弗朗西斯爱她,起码开始的时候是的。

“正如我说的那样,她常在信里提到你。说你长得有多快,说你眼睛的颜色在变化。你让她很开心。她几乎每天都写,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是隔一天才回一封。她有时会跟我打暗号提到库克医生,主要是把你比作他。这比她写上十页纸说想念他还要让人觉得伤心。

“对她的信我得特别小心,我从不在我的信中提到他。可她的来信里时不时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一打开她的信,甚至还没读,便会注意到。我会先扫过每页纸,找到那个名字,弗雷德里克。这名字那么显眼,好像是用



不同颜色的墨水写成的一样。

“她是那种不会被悲伤压倒的人。这是我为什么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她绝不会那样做，我知道人们说她是自杀的，我从没相信过。你叔父爱德华写信告诉我，说她意外溺水，我从没想过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我母亲听到些流言。我听到她和我父亲谈论阿米莉亚。我跑到客厅里，问他们怎能相信这些事呢，怎么会发生在阿米莉亚身上呢。我从没相信过。

“我在担心，有一天这些流言会影响到你。我不想让你去想，你知道……让你为发生的一切感到内疚。我在担心，你或许会觉得她是因你才死的。

“像她那样爱孩子的人是不会失去生活的勇气的。她不会认为自己或是所爱的人的命运是场悲剧。她对以后的生活有自己的计划，就像她跟他说的。她还爱他，她希望他能幸福。如果他可以没有她也能找到幸福，尽管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她，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她很开朗。她没什么缺点，要是有的话就是她也会认为别人应和她一样开朗。她以为弗朗西斯是这样。我怀疑她决定和他解除婚约的时候，她可能不知道这会给他造成多大伤害，多严重的后果。当她没有从库克医生那儿听到回音后，她改变了主意。她还以为弗朗西斯可以忍受抚养一个自己妻子和别人生的孩子。她觉得他能做到，因为她知道自己能做到。

“我曾想过要给你写信，要告诉你那些流言都不是真的，或者写信给你叔父，让他告诉你我的话。后来我一想，让一个孩子接到这样的信会多奇怪。一封信去否认所有的传言，而你可能根本没有听到过那些传言。我没办法一边让你相信你母亲，同时又不告诉你很多事情。”

“小时候我就开始接到奇怪的来信。”我说，“库克医生写的，他告诉我他是我父亲。”

“你叔父叔母知道这些信吗？”

我摇摇头。

“我没法想象，库克医生会冒这么大风险给小孩子写信。如果人们发现她已订婚，他还求她嫁给他——”

“我母亲的事你说得对。”

“我很高兴你这样想，德夫林。”

“我也有话要告诉你，莉莉，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就像你说的一样，我

母亲不是自杀的，她是被人害死的。”

莉莉把手放在脖子上，好像我已告诉她我母亲是被人掐死的一样。

“噢，不，可怜的人儿。我希望……你知道，德夫林，我常常想是会有人伤害她。我是说那种环境。我常常想那不太可能会是意外，她不太可能把马和车放在那儿，走那么远到山下边去。”

“弗朗西斯·斯特德杀了她。”我说道。

莉莉双手捂住脸，只有眼睛露在外边。她盯着我，好像我是弗朗西斯·斯特德，正在向她坦白罪行。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道。

“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了库克医生。”我说。“在北格陵兰探险的时候，弗朗西斯说，如果母亲告诉他我父亲是谁，他就放了她。他说如果她对他撒谎，编一个名字骗他，他就会回来，把我们都杀了。”

“哦，我的上帝，怎么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哦，我可怜的阿米莉亚，我可怜的朋友。我曾想过会是别人杀害了她，可我从没怀疑过是弗朗西斯。一方面是因为他住在布鲁克林，一方面是觉得他无关紧要。如果他突然出现在圣约翰斯，人们会注意到他，听到她的死讯时会想起看到过他。哦，我的上帝，我觉得好像才听到她去世的消息似的。”

“很抱歉，或许我不该告诉你。”我说道。

她站起身，绕过桌子，手向我伸来。我站起身，把她搂在怀里。我觉得她过来是想让我安慰她，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早从我眼里看出来，需要安慰的人是我。

从来没人像莉莉这样谈论过我母亲，库克医生都没有，这让我觉得母亲鲜活起来。我刚刚告诉莉莉我母亲的死，不是库克医生的阿米莉亚，或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阿米莉亚，甚至都不是莉莉的表亲。莉莉跟我谈论的方式，让我觉得我记住了她，让她看起来更熟悉，如同我在她描述的女人中认出了我自己，我心里的她终于站在了面前。

我哭了。莉莉也哭了。

“不要告诉克里丝丁，我想自己告诉她。”我说道。

克里丝丁回到曼哈顿后，我告诉了她。我有些担心，我离奇的故事，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我母亲的死等等会把她吓跑。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就像我跟莉莉说的一样。我提到弗朗西斯·斯特德是死在库克医生手上，库克医生承认自己没到过北极。我也说皮尔里。我没有要求她们保守秘



密，我知道她们会的。我已下了决心，我们之间不该再有秘密。克里丝丁用力抱着我，一边抽泣，一边拥抱，还小声喊着我的名字。

我跟她说了“斯特德家那娃”的事，说了达夫妮叔母。我告诉她我在信号山的那一夜，我愚蠢地跟达夫妮叔母闹翻了，我觉得她肯定不会再对我有信心，她会和别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斯特德家的男孩”。我还告诉她，我是怎么离开圣约翰斯，又怎么到纽约见到库克医生的。我告诉她我在“达科他”的生活，在布鲁克林那座伤心的房子里，那些落满灰尘的家具。晚上我和库克医生在客厅里交谈。伊塔。皮尔里。华盛顿。哥本哈根。库克医生的坦白。

我常常去她们家。我尽量不去想库克医生。我们几乎不提他。

有一次，我正和她们吃晚饭的时候，莉莉不断找借口要到楼上去，要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她时不时会上楼几分钟，然后下来，也不说她去干什么去了。

可能是莉莉第五次上楼的时候，克里丝丁挪过椅子，坐在我的身边。我们的腿挨在一起。她的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

“你得让我母亲再上几次楼才会向我求婚吗？”她问道。



第 44 章

亲爱的父亲：

最后，是我给你在写信了。我要走了，可这封信却不是道别的。儿子总得离开父亲的家。

我知道，尽管我不会远离，有人也会用这个当借口指责你。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会说我离开你是因为不再相信你，不再相信我们曾到达过北极。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背弃你。皮尔里没有到达北极，你是对的，尽管说起来有些荒唐。就像我说你更有权利指出他在作假一样。

除了你，我不会再和任何人说起北极的事。我得告诉你，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莉莉和克里丝丁了。你不必担心她们。

并非是因为皮尔里的缘故我才要替你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要见皮尔里。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我可能也会做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来。我无权评判你，甚至都无权提出建议。

我能给你的只有爱和谢意。你给了我生命。在我们见面之前，在你知道我们会见面之前，在我还没有听说过你的时候，你救了我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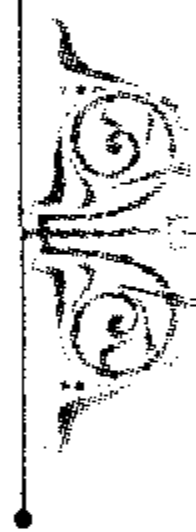
再见面的时候，我会有很多很多话要对你说。这一刻很快就会到来了。

爱您的

德夫林

我把信放在他书桌上的第二天，他和库克夫人离开了。我起床去了书房，想和他道别，想告诉他今天我要走了，他却不在那儿。客厅的门开着，壁炉是冷的，沙发上也没有人。我的桌子上有他给我的一封信。

我希望他们还在家。我去了他们那一半，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房间。后



来我碰到一位佣人，她正在前厅往家具上盖防尘布。

“他们走了。”看到我后她说。“没人知道去哪里了，没人知道要走多长时间。他给你留了一些钱。”她递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厚厚的。

他们很早便离开了。他们给每个佣人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他们的报酬，让他们离开了。

“他让我不要叫醒你。”她说。“他告诉我要等你起来，这样屋子里就不会太显得空空荡荡的。我很抱歉，斯特德先生。”她又盖起一把椅子。很快，整个房间就像“达科他”一样了。

后来才知道，库克夫妇和两个孩子坐船去了南美，他们用的是“克雷格夫妇”的假名。

第 45 章

最好是把故事的后记放在结尾之前。

库克医生回到纽约。几个月后，丹麦科学院在哥本哈根开会，决定重新考虑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宣告。他们的结论是结果“无法证实”。

“皮尔里的也无法证实。”库克医生对记者说。他还指出，丹麦人没有收回他们授予他的任何一项荣誉。他的支持者指出，在“无法证实”和“虚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皮尔里说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说自己获胜了。

曾与库克医生攀登麦金利山的比尔·巴里尔站出来，说库克医生没登上麦金利山，而是用“精明的摄影”造假。他们认为，库克医生把爬上麦金利山的假照片登在杂志上。布拉德利领导的库克医生的支持者也反击他们。

虽然有许多事存在争议，美国海军于1911年承认皮尔里曾到达北极。皮尔里的支持者觉得有必要继续跟库克医生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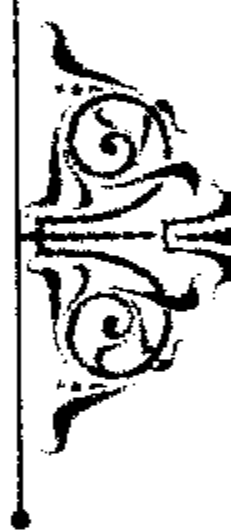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年的争论都有完整记录。可即使你读过所有的资料，也很少能见到我的名字。

离开布希威克街 670 号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和克里丝汀订婚后，有一阵子记者包围了我们，很快他们就离开了。如我所料，报上是这样解释我离开库克医生的原因：我觉得库克在撒谎，我被“蒙骗”了。跟两位爱斯基摩人一样，我不知道库克医生到底带我们去了哪里。

丹麦人宣布他的话“无法证实”之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想去库克医生的新居看望他。门房进去传话，库克夫人出来告诉我，她丈夫不想再见到我。“永远不见。”说完便关上了门。

我肯定，迟早我们总会见面。在此之前，我该给他写信，或许我们该相互通信。住的距离只有两英里远，却只能靠通信联系。过条河，信就到了。

我给他的信却没有回复，我们连偶尔也没碰到。从南美回来的几年后，他永远离开了布鲁克林。



我给他写了上百封信,他没回复过。好像现在是在我在跟他进行单向的交流,他曾这样把我从纽芬兰吸引到纽约,到了他身边。

我给他写信,我想他一定会读。我告诉他身边最近发生的事。我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告诉他,原本我的生活中应该有他。

我想象他会像没有访客的囚犯一般期待我的信。我写信想说我原谅了他,可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我的谅解,他从不接受。

他离开纽约到西部寻找石油的时候,我还在给他写信。我想他在1920年皮尔里死后可能会给我回信,但却没有。

在缅因州海边老鹰岛上,皮尔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他为证明自己到达北极已经垮掉了。有人说,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他卧在铺着麋牛皮的长椅上,静静地看着海湾,一躺便是好几天。

要不是皮尔里死后不久库克遭受的厄运,我可能会一直因他能读到我的信而感到满足。

库克被控在怀俄明进行石油欺诈判入狱14年,成了堪萨斯里温沃斯监狱的囚犯。北极的争论还没完结,很多人认为,库克医生是恶意,或者起码是过度嫉妒的牺牲品,皮尔里的支持者参与陷害了他。

这时是1923年,库克夫人宣布和他离婚,他也没有再娶。我无法忍受他独自在里温沃斯,便去监狱看他。那儿的人告诉我,听到访客的名字是斯特德,他摇了摇头。

我回到纽约,在信中乞求他回复我。我告诉他,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心理状况。

他既没回信,也没退回我的信。我觉得没法再承受,便写信给里温沃斯监狱,让他们问问库克医生是否看到了我的信,是否希望我继续给他写信。

我期待狱方的回音。六个星期后,我又给他们写了信。这时,我收到一个有我名字和地址的信封,是铅笔写的,左上角明显是空白。信封里只有一张纸,一张白纸上的中间用铅笔写了一个字:是。

这是库克医生给我写的唯一一封保留下来的信。我把它钉在书桌前。字迹泛黄而模糊,旁人无法理解。

1940年8月,库克医生去世后不久,我从他女儿海伦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他要感谢我“长久以来一直忠实地给他写信”。

很明显,她觉得他一直在给我回信。他把我的信都攒了起来,现在信在她那儿。她说所有的信都在,她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诉她那些“模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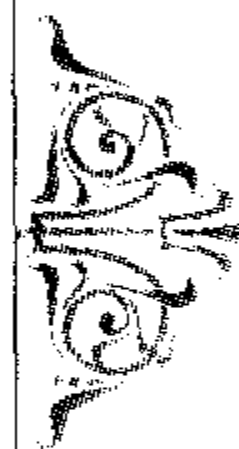


隐晦的人名和事情”。她依然相信他曾到达过北极，她也以为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过再也不会公开场合谈论探险的事，她说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希望我作为她父亲共同探险的伙伴，作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我能和她一起证明她父亲的话。她为此行动了数年，她希望这项行动能够“从或许已经听说的最新进展中获得新的活力”。

我听说了。“名声受损的探险家死前被总统赦免”，《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这样写道。收到海伦的信前我便看到了这篇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总统原谅库克谎称自己到达了北极。有一阵子，我都不记得库克医生只跟我说过这件事。报道是说，总统赦免了他的石油欺诈案，那时大家都认为这个案子公平。报道很简短，没提到我的名字，但说库克医生策划了探险史上最无耻的谎言。报道说尽管这个谎言很快便被人揭穿，却阻碍了真正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尔里指挥官获得他赢得的荣誉。其他报纸则说，到达北极是“仍未解决”或“永远无法解决”的事。

只有《纽约先驱报》还依然坚定，他们认为我和库克医生是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他们还严厉指责皮尔里和他的北极俱乐部长期以来破坏库克医生名誉的行径。

给海伦的信中，我祝她好运。为证明自己父亲曾到达北极，她一直在努力。我说由于个人原因，希望保持沉默。她给我寄回了没有拆开的两封信，是我写给库克医生的最后两封，他已经没能看到了。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收到过她的信。



第 46 章

关于我母亲，库克医生曾说过：“她的死法让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了结了。”事实并非如此。生活没有因为她的死而结束——随后而来的时光中，没有一刻不是如此。

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我既没理由，也没办法在结尾到来的几年前结束这个故事。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得写出结尾。

那天，不知为何，我的房主（库克医生）和他的孩子们用假名离开了布鲁克林。当天晚些时候，我走到第一次库克医生招呼我进他家的那扇门旁，一扇自那时起我就没走过的门。

第一次，我走下十年前我上过的台阶，我感到从大门打开的那一天，从我进屋后就从没离开过这扇门。

我看着布希威克街街道的另一边。我曾在那里等候。1901年8月的大热天，没什么地方可为我遮凉，只有一顶帽子。到曼哈顿我还穿着家乡的衣服，那里要比这儿凉得多。看到自己的样子，我没有感到奇怪。一个担惊受怕的男孩，担心自己的未来，显眼地站在那里，两手还抱着一个医生用的小提箱。

提箱上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字母缩写。把一卷卷的信放到客厅壁炉里烧掉后，我把箱子也扔到了那儿。

我穿着衣服在客厅里睡了一夜。我很奇怪，自己竟能睡得着，竟会一夜无梦。

我决定离开房子以后，到曼哈顿走走。我从默特尔大道走到布鲁克林桥，走在高架铁道的阴影里，走在光与影当中。

我走到默特尔大道和威洛比街的交汇处，有库克医生像的凯旋门已经拆掉，木制的绞手架还在，好像要马上修复一样。

街上陌生的路人会对我招手，会对我说“早上好，斯特德先生”。还让我替他们向库克医生问好。

穿过盘旋的木楼梯，我走到接待室。楼梯上有很多友善的陌生人会指着。有些人注意到了这儿的躁动，他们偷偷看我，好像已经认出我来，却不记得我为何会这么有名。

桥两边的人行道上有很多观光者，有些是第一次到纽约，有些是第一次到桥上的纽约人。经过隔音处理，下面车辆通过的噪声已经不大，有高架铁路、汽车和马蹄的声音。

我想起第一天乘高架铁路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情形。到桥顶时，两边乘客都把窗户打开，一股新鲜的风灌进车厢。那时，我也像现在一样闻到了大海的气息。

很快，风大起来，什么都听不见了。两位年轻女子张开嘴无声地笑着，她们亲密地靠在一起，空出的手抓着帽子。

我母亲第一次到纽约乘船顺河而上的时候，大桥还没合龙。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运河桥，挺起双臂，让船从中穿过。

我想到斯巴布角，那儿的风好像要把屋檐如地毯般卷起，风会把草地也卷起，最后在我们和风暴间剩下的只有残垣断壁。

河床下面，一趟城际火车正从两个街区间穿过，如同刚到曼哈顿的第一个早上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样。报上说晴朗的日子里，火车从河底下穿过时，会在上面的道路上产生共振，这样你不仅能看到火车从一端驶向另一端，还能感到它的形状，就像它在河面上还拖着影子一样。

我曾觉得，报纸预测得夸张和天真，但其实却总是缺乏远见，过于保守。到1909年，8年前没人梦想过的东西现在都出现了。

走到步行道的高处，我停下脚步，看着河面。

我想探险的事。尽管有谎言，但很多部分并没有受影响，绝大部分都没有。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我曾在小屋里等待高烧退去。我躺在那儿，痛苦地躺在睡袋里，为自己的病痛不会再恶化而狂喜，也为能多恢复一会儿而惬意。我从没到达北极，但我曾在永远不会静止的极地洋面上漫步。我比那些冬天的冰山走得更北，比那些每年春天漂过纽芬兰的冰山还靠北。我曾以生命冒险。

极地洋面上曾有过一些时候，我敢肯定库克医生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了，忘记了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看到冰山分裂。冰山的壳慢慢显露，一条嶙峋的海沟，绿色海水上的幻影。

我知道库克医生会回到布鲁克林。这次的不知去向只是另一段将要



消失的故事开端——另一个他会重新开始的故事，他会在没人知道他的地方获得新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有的话，他会待在那儿吗？

他会回来，会住在布鲁克林一所看得到曼哈顿的房子里。

或许从现在开始，曼哈顿会让他想起我。我决定要住在这里，要住在我父母相遇的地方，要住在孕育了我的地方。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坚持说，我们永远不要再见了。

我将永远不在公众面前谈起探险的事。

但我也不会从皮尔里和他的俱乐部成员面前逃走。我既不会帮他们，也不会阻碍他们。如果他们跟踪我，如果他们来找我，如果他们坚持让我再去见皮尔里或是其他什么人，那就随他们去了。我知道真相。他们很快会发现，纠缠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可以去上大学。我有足够的冒险经历，名声也可以很容易让我找份工作。我能预见报上会登出，或橱窗里会提到，某家公司里的年轻人曾是库克医生的探险伙伴，曾参与库克医生饱受争议的北极探险，也曾在若干年前救过他的敌人和竞争对手罗伯特·皮尔里。我是在库克医生这里结束探险生涯的，我也不愿谈起自己的探险历程，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人们愿意这样看我，我可以成为“神秘的斯特德先生”。

我可以证明，尽管这一切不会彻底忘记，但却会逐渐淡忘。我可以努力成为德夫林·斯特德，某个曾经跟“库克和皮尔里的争议”有关的人。起码这是我的希望。好像我并没有选择。无论我去何处，种种讨论总会跟着我。

可是现在，可是今天，我没什么计划。我会在纽约东区闲逛，碰见的会是从没听说过我的人。他们没报纸，只从远处看过曼哈顿。他们没走过曼哈顿桥，永远也不会。我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我跟克里丝丁的生活。

或许我该去哈得逊码头，在那儿看移民乘坐的渡轮从埃利斯岛开来。或许我该乘上高架火车到最南边，去看看还有没有简陋城镇的痕迹。

我母亲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里。我知道，她生命中三个星期里发生的故事比她一生的都多。她在这里只有幸福。

莉莉记得我母亲。

在他的头两封信里，库克医生也记得我母亲。



第 47 章

我说过要回去见达夫妮叔母，我做到了。莉莉和克里丝丁和我一起去的。我想让莉莉和我们一起回去。她 30 年前曾参加我母亲的婚礼，到过圣约翰斯。我想让克里丝丁看很多东西，特别想让她从信号山看大海。

船沿海岸行驶，总能看到陆地。在波士顿和哈利法克斯停泊后，便一直向东北方驶去，到了库克医生说起过的“真正的大海”。克里丝丁到过美国很多大港，也曾坐火车横穿大陆到过旧金山。可她从没远离过大陆。陆地早已不在视线里，她还在眺望，脸上挂着又惊又喜的表情，是我曾在无数个第一次被大海包围的人脸上看到过。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对她的爱意。没什么比大海更能让你看清，生活的真正敌人不是死亡，而是孤独。我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近。她把头靠在我胸前，因为有雾，她的头发有些湿。雾很小，既看不见，也无法在空气中感受到。

我母亲曾乘坐这样一艘船从纽约回到圣约翰斯。她一定在想，她的生活刚刚开始。她可能还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我。看起来多奇怪啊，我会跟她一起回家。她一个人去的曼哈顿，却带着我回到了纽芬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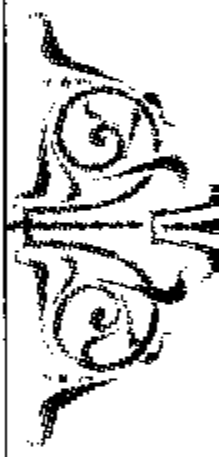
远处看上去是风暴欲起的乌云，其实是纽芬兰东南沿海的土地。

“就在那儿。”我说。克里丝丁和莉莉疑惑地看着，似乎远处并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陆地。莉莉笑了起来，她们几乎同时指向那里。

船靠近峡湾时，我们三个站在前甲板的栏杆旁。“信号山。”我边说边指着右前方。我离开时开始建的石塔已经竣工，旁边的碉堡显得矮小了许多，上面飘扬着许多旗帜，其中有的正指向我们即将停靠的城市。

克里丝丁和莉莉抬头看了一会儿，很快像我一样低下了头，看着悬崖下面海浪拍打的礁石。我猜她们是在找，弗朗西斯是从哪儿把我母亲扔下海里去的。可从这个角度看，悬崖的一面是平的。天上无云，峡湾外边的海水是深蓝色的，与记忆中天气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里一样。海岸一侧的小山在阴影下，不像是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犯罪的地方。

我们离海岸很远，听不到海浪的声音，听不到海水冲上岩石又退去的



声音。那声音曾让我觉得山是空的，如同一个大贝壳，里面有许多灌满海水的河流。海鸥沉默地聚集在山顶，盼着船上挥手的人们会丢下一些食物。我估计离最后一块冰漂走已经有一个月了。

靠岸的时候，我在达夫妮叔母看到我之前而先看到了她。她被等候接船的人群簇拥着，却是孤独一人。她正寻找着轮船的栏杆，因为我在上面。她的眼光曾扫过我几次，但没有丝毫停顿。我摘下帽子挥舞着，大叫起她的名字，她却并没有认出我。我现在知道，自从她最后一次看到我以来，我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她也变了，但不全是年龄，还有多年来等待的关系。我到北边探险的时候，还有很多我去向不明的时候，她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还活着。我刚在伊塔碰到皮尔里后，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圣约翰斯的人谈起我来，好像我唯一的缺点只是有些羞怯。我不清楚是否人们也会对她另眼相待，或者这十年来，她还是被人当成是有个古怪侄子的古怪婶婶。人们会说我古怪，也会说她是她丈夫的祸根，说两个斯特德医生都让他们的妻子给整垮了。

她的目光里充满关切与焦虑。尽管我曾发电报给她，告诉她我们要回来，她却还在忧虑，担心会有不幸发生，担心见不到我们了。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岸上很多人在喊我的名字，都想见我。写着“报社”的牌子从帽子之间突显出来。摄影师给我拍照，码头上有相机的灯光和烟雾。一切和我想象的回家一样，甚至都有点难以置信了。到处都是旗子和横幅，到处都在宣扬我的成就，家乡的人们唱着我的名字。我听到他们在喊“我们相信你，德夫林”。一下子我都没想起来，他们是为我到达北极而在此迎接我。好像全城的人一致承认，他们曾错误地对待了我，现在，他们要为称呼我“斯特德家的男孩”一事做出补偿。我有点想承认，有点想接受他们的庆贺，如同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誉一般，就像库克医生回到布鲁克林时那样。我毫不怀疑，如果在这儿不愿对探险的事发表评论，肯定会被人认为是过于固执。人们或许会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支持，我会改变主意。他们希望我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好让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人在去北极的竞赛中获胜了。回到这些人当中，回到这些认为弗朗西斯·斯特德永远都是我父亲的人当中是多么奇怪啊。在这儿，他的自杀永远是个谜。这些人同样认为，我母亲是为我父亲的离去伤心过度，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达夫妮转过身，问旁边的一个男人，那人立刻指了指我。目光相遇的



一瞬间，她用手捂住了嘴，好像不愿让我看出来，我的外表变得让她有多震惊。我肯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从她脸上我看出来，尽管我曾离她而去，尽管我曾愚蠢地认为她会怀疑我，她还是一直爱着我，即便我不在她身边，爱也未曾因之丝毫减少。

她看见了我。她放下手，微笑着向我送起飞吻来。舷梯刚放到位，她便挤过来。莉莉和克里丝丁跟在我身后。在码头上，我见到了她，泪水在她脸上自由地流淌。她从我眼里仿佛看出了歉意，她微微摇摇头。我们拥抱，又分开，又抱到一起，一句话都没说。最后，她才叫出我的名字。

我把她介绍给莉莉和克里丝丁。我们都哭了。

“德夫林非常想念你。”克里丝丁说道，“从我们见面的那时，他就总提到你。”

“你好，亲爱的。”莉莉说道，她和达夫妮叔母挽起了胳膊。

爱德华叔父没有同意离婚。她离开他，给几个孩子做起了家教，有几个家长需要她的帮助。从那时起，他们分居好几年了。爱德华叔父说她“丢人现眼”，不断想给她多一点钱，想让她永远离开纽芬兰。

“你可以跟我们到纽约，达夫妮。”晚上吃饭的时候，莉莉说。“我们会很开心的。”达夫妮看着我们三个，似乎不能相信，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还会有幸福。

358

“到纽约生活对我来说会是个很大的变化。”她说，“可如果你们真想让我去，我会跟你们走的。”

但她不会从爱德华叔父那儿拿一分钱。

我在圣约翰斯的一周得躲着记者，或者干脆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总跟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布拉德利那次航行的独家报道。有些人甚至说，只要愿意对“你是否到达北极？”说“是”或“不”，他们就能付钱给我。

我常在街上被人认出。我敢肯定，北极的争论和我不表态的行为肯定会让人们好奇。他们会觉得，我没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改变过来，可他们还是会和我握手，祝贺我是第一个驻足北极的人。对于这些，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点头致意，微微笑笑。

我们在我母亲的坟上献上鲜花，请人一个月去换一次，请人照看好她的坟墓。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看到了。



我们驾着达夫妮的马车上了信号山。这车我母亲曾驾过。那天，弗朗西斯·斯特德步行上山，她却死了。

我想让克里丝丁看到一切，看大海，看我曾被逼过夜的碉堡，看我在树林里读库克医生第一封来信的地方。

驶过德文街时，我想顺便去看看爱德华叔父。他肯定知道我回到圣约翰斯了。我希望能在他早上下楼梯的时候给他一个意外。“你好，爱德华叔父。”我想象自己说话的样子，仿佛正从膝盖上摆的一本书上抬起头来。走过他的房子和诊所，我向窗口望去，那是我曾经读信、抄信的地方，他那时会等我，还是没人住、没有灯的诊所。爱德华叔父的房子亮着灯，我却看不见他。

山顶上面朝大海停着几辆车，其中一辆是带折叠篷的汽车。虽然刮着风，车里的人却都被景色迷住了。我想起小时候曾和达夫妮叔母来过这里。我给克里丝丁指着方向，告诉她纽约、伦敦、拉布拉多和格陵兰会在哪儿。

我在说话，她摘下帽子放在座位后面。她取下发卡，长发披散，让风吹得飘了起来。我还没来得及帮她，她便从车上跳下来，拉起裙子向通往海边的小路跑去。我坐着看她，觉得她只是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她却没停步，一直沿小路跑了下去，我看不见她了。等我从车上下来跑到小路上，她已经下到了山腰。

“克里丝丁！”我边喊边要靠近她。山坡陡峭，我下得也不比她快，也没法接近她。我想我可以到下一个上坡处赶上她，她却跑到了另一头。等我到了的时候，又看不见她了。

“小心山埂！”我喊道。

跑到第二座小山顶时，我看到她站在那里四下张望，似乎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跑，已经没路了。很快她又跑起来，消失在最后的山脊后面。“克里丝丁！”我大喊着，我不知道等我跑到后，她是否又不见了。

我看见她就站在我的正下方，看到了她的头顶，她的肩膀。她背靠悬崖，胸脯一起一伏。她想缓口气。我爬了下去，站在她身边。我还喘气的时候，她的呼吸平静了下来。

“这就是那山埂了？”她问道。

我点点头。

“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她说。“我想知道你不会一个人到这儿来。要是不到这儿再来一次，你就没法回纽约。白天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情

况。”我还没想过要抽时间到这儿来，还没真正想过，但我知道她没错。我或许会自己到这儿来，或许永远都不告诉她。

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在此争执是一年当中更晚些时候的事。山埂上长满翠绿而滑溜溜的青草，缓缓延伸向下。下面海浪起伏，每次涨潮都会向上多漫一些。曾发生过的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过去1000年如此，下个千年还将如此。

刚才的山坡追逐像是另一种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克里丝丁在我之前跑下山坡，从我身边跑开，我喊她的名字。那时，他肯定也在喊我母亲的名字。我曾想听到“阿米莉亚”这个名字，想看我母亲被她丈夫追逐，从通向海边的小路上跑过。

“要涨潮了。”我说。

“离海岸这么近。”克里丝丁说，好像在我们和海水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裂缝。我们离海水约10英尺高，似乎再过一秒，若有个不规则的浪头打来，我们便会被海水打到。我看着远处的海浪，想要找出点迹象来。海水的泡沫挂在山埂上，随着水波涌起，风卷着水花向我们直直吹来，轻轻地打在衣服和脸上。我尝到了海水的咸味，这总让我觉得惊奇。我很难相信，看上去这样的海水竟会如此潮湿与冰冷。就在这样把我的衣裳打湿的海水里，就在味道还留在我嘴中的海水里，我母亲淹死了，死因却不为人所知。他的犯罪动机也如她的死一样不为人所知。我脸上海水流淌，我哭了。

360

克里丝丁小心跪下去，趴在地上，头刚伸出山埂。她的手轻拍岩石，我也躺在了她的右边。

我们看着大海，感觉像是山埂在上下起伏。每次海水涨起，我都觉得我们会被淹没了。涌起的黑色波涛撞在岩石上，变成白色，像喷涌的泉水般溅到我们脸上。水很凉，让人透不过气。克里丝丁的头发一缕缕地垂下，还滴着水。海水从她前额、鼻子、下巴滴下来，我也一样。她解开左手的袖子，把衣服卷上去。她把指尖伸到水里，然后是整只手。她呼吸急促起来，我赶忙去拉她的手，她却把我推开了。

“上帝，我从不知道海水会这么凉。”她说。

她把手又放低了些，随着海水涌起，胳膊肘也放到了水里。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突然把胳膊抽了回来，好像一秒也没法忍受了，又好像她整个身体要浮起来呼吸空气。她站起身，左手扶着胳膊，仿佛断掉一样。

“我们的年龄比她那时大。”她说。



我吻了她。她的嘴唇和我的一样，也在发抖。我们嘴里是海水的咸味。

“我们会活得很久，德夫林。”她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分离。”

克里丝丁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小金盒，样子像贝壳做成的打开的书，是我送给她的礼物，里面装的是一张我们的合影相片。

现在它里边装了些别的东西。

“我们一起抓住它。”她说。

我们一人抓住链子的一边，慢慢向海面放下去。开始，小盒子还摇摆着。

“等浪退下去。”她说。我们又被海水包围了，能看到的只是白花花一片。我的头疼起来，好像上面贴了块冰。白色的浪花渐渐退去，海水又变成了黑色。

“现在。”克里丝丁说道。

我们放开手，小盒子掉落下去，链子伸展着，似乎还有人抓着一样。小盒子先掉在水里，然后链子也一节节地掉了进去。

我们看它掉进海里，看着它金色的光一点点消失在水中。开始我们还能看到它在海底，可一下子，它便消失了，不知道还会掉到哪里。

小盒子里，紧紧叠在一起的是库克医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我在他离开的那天早上，从他的书桌上找到的。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我一直在想你母亲的信。“你只用说是或不……”我的选择是“不”，但我没勇气说出口。我想这比什么都不说要强点。“如果我收不到你的回音，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我过去常想，这是她给我的第三种选择。她知道无论她说不说，我都会这么做。

我曾经把她的信当做“提前的宽恕”。但我错了。如果她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她不会告诉我孩子的事。她会告诉我她改变主意了，她会选择她的未婚夫而不是我。

我觉得她更担心的是听不到我的回音，而不是我对她说“不”。我觉得她提到第三种选择是为了提醒我不要那么做，因为她已经预见到那会对我有怎样的效果。或许，我没有给她回信时，她会很后悔给我这样一个选择，这样一个我无法做出的选择，更别提一生如此了。

我也有疑惑。你母亲并不相信，但我却慢慢相信，命运总是

不幸。她会觉得我会选“是”，这样就可以像她想的一样，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分离，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或许曾救过你的命，但也不全是为你我才杀了弗朗西斯·斯特德。我从雪地向他走去的时候，我脑子里有无法忍受的想法。

我跟她的重逢，她与斯特德的婚姻，他对她的抛弃，她与他在山埂上的搏斗，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当她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她如果无法承受这一切呢？如果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受到绝望的吸引，吸引甚至大过她抵抗的愿望呢？像她那样天性的人，会转变得那么彻底，甚至连过去的痕迹都不曾留下吗？

我曾说过，她死的方式让她的生命没有了遗憾，可我在杀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那晚，我却不相信这个。还有很多时候我也不相信这个。

我觉得我们最好以后不要再见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封信。就算我能学你的样子，能从皮尔里和探险的事中抽出身来，你最好也不要和我有联系了。我不愿让你作为我的伙伴而蒙受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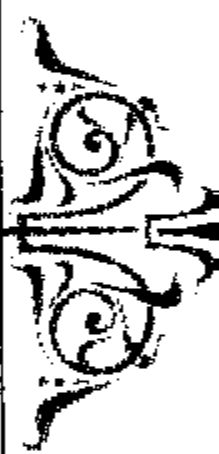
可无论如何，我无法从皮尔里和北极的事中抽身出去。我跟皮尔里开始的戏必须演到最后，但不能以你的幸福为代价。我担心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你会向坏的方面转变，而且没法弥补。

你应该得到幸福。你继承了我的血脉，但不是我的历史。我知道无论从天性还是环境来说，我都不是个幸福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你身上，有一半你母亲的血，还有一半你母亲曾经爱过的人的血。

看上去很难相信我竟是如此的一个人，可我必须是。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脸，已经过去差不多30年。我没有她的照片，我只有她简短的一封信，一张泛黄的纸片。自从给你看过之后，我自己便再没读过，因为我担心，如果再把它打开，它或许会碎掉。

当然，我已经熟记在心。有时候，整封信会像儿时学的圣歌一样从我的头脑里过一遍。信里的句子、短语会在我每天的思绪里出现，支离破碎地反复出现，像标点符号一样。

“你不该害怕我。”有时我醒来的时候，她好像刚刚跟我说完这些话，好像我是在睡梦中听到这些话，而最后一个字在我醒来



后似乎还在空气中回荡。“我。”有几秒钟，我会觉得她就在屋子里，她刚问了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字是我。“你爱不爱我？”

如果她还活着，或许我在街上碰到她都不会认出她。弗朗西斯·斯特德怕她变成谁？我的阿米莉亚，现在会是50岁了，她看上去怎么样？我只跟她相处了三个星期。负罪、内疚、羞耻这些感觉对我的影响，都不如悲伤来得深。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我看到你从船上下来。尽管你叔叔没有给我寄过一张照片，我也知道那就是你。我跟你回到旅馆，几个小时后把字条塞到了你的门下面。我不在曼哈顿见你是对的，因为在那儿我遇到了你母亲。

第二天，我从楼上的窗户那儿看着你，你在炎热的天气里在布希威克街的另一边等着。我该叫你进来，可还有些佣人没有离开。你站在那儿，马上就要进入我的生活，就像是我从信里变出来的人一样。

第一次的时候看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直地盯着前面，身上穿着不合时令的厚衣服。过了几秒钟，你摘了帽子，你就在那儿了。我看到你的头发，你的脸，你还在用手帕擦着汗。

“我的儿子。”我说道，好像在这前一天我曾看到的年轻人，还有我刚才看到的年轻人，我是刚刚认出来一样。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成了我的儿子，立刻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亲人。现在看来，好像我一直都知道你一样。那种陌生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

“德夫林。”我说道。好像我用你的名字唤醒了你。你看看表，放回口袋，然后从街对面走来。

“我的儿子。”我又叫了一声。你从窗下走近的时候，我急急地下了楼梯去迎接你。

我从没告诉过你我和你母亲的最后一刻。

从旅馆分头出来以后，我们在街上约好的地方又见了面，那是一家茶馆。我们坐在那里聊天，希望那个下午没有尽头。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得坐轮渡回布鲁克林，她也早过了到莉莉家的时间，得马上找去北边的马车。

她说希望那座桥已经完工，她就可以和我一起走到桥的最高

处,然后再回来。我告诉她,几年以后,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走过大桥。

她抓住了一个愚蠢的时机,在正亮灯的人行道上,她吻了我的嘴唇。

我常常在想,她最后一眼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她在车里,我步行到河那边去。风从河面吹来,在建筑物间穿过。我的手扶着帽子,怕被风吹走。

我们还年轻,我们没有担心,还会再见。

记住,德夫林。

曾和我们一同生活过的人们那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再见。

爱你的父亲

于布鲁克林

1909年10月26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纽约的探险家

作者= (加拿大) 韦恩·约翰斯顿著 赵伐 张陟译

页数= 3 6 4

S S 号= 1 1 6 2 7 5 4 8

出版日期= 2 0 0 6 年 0 4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